

由國民代表會到國民參政會

十二月二十日平津各報載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監

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案有一條如下：

定期召集國民參政會案

(一) 國民參政會於民國二十二年内召集之。

(二) 國民參政會代表之產生，採用選舉及延聘兩方法。

(三) 國民參政會之職權應以訓政時期約法爲基礎，參酌中央政治會議及國難會議所舉各點規定之。

(四) 關於國民參政會之一切法規，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於四個月內，依照立法程序制定頒布施行。

國民參政會案是由如下的幾種決議，逐漸構成的：

一(一) 四屆一中全會國民救國會的決議，(二) 國難會議國民代表會的決議，(三) 三〇九次中央政治會議及三三二次同會的決議。但國民救國會的決議只定原則，而兩次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則爲對於國難會議國民代表會決議的修

改和限制。此次之國民參政會案直接的前身乃是國難會議的國民代表會案。

* * *

偶在書架上存留國難會議油印的案卷，我想把當時議決國民代表會的經過及此案的本意，略爲敘述。在這個訓政時期中央民意機關成立沿革上可說是一種文獻了。

九一八以後，國人起了各種運動。在本年四月之前，因國難會議之召集，國難會員各處集會，其所商籌的，有兩種方案：一是憲政促成的方案，一是國防政府的方案。待到國難會議在洛陽開會時，極力主張國防政府的一派拒絕出席。其主張實行憲政的，或出席，或不出席而寄送提案。國難會議所收到的這一類提案有十三件。各案之所爭者計有五點：

(一) 國民代表大會應行召集與否？

(二) 召集的時期如何？

(三) 召集的方法如何？

(四) 憲法起草的方法如何？

(五) 國民代表大會未成立以前應否設立民意機關，其組織及職權又應如何？

提案之中沒有反對召開國民代表大會的，所以第一問題的答案很一致，即應當召集。但召集的時期則主張各異。多數提案主張在民國二十二年召集，尤其是主張民國二十二年以內成立民選政府者不少。第三至第五問題因第二問題的答案不同，也各自紛歧。現歸納各案爲六類，列其要點如左：

第一類

- (一) 組織各當聯立政府。
- (二) 特設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機關。
- (三)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以前制定憲法。
- (四) 憲法未成立以前，設立代行議會職權之民意機關。

第二類

- (一) 由本會決定憲法大綱，並選定專家草擬憲法。
- (二)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民選政府成立。

第三類

- (一) 國難會議閉會後一年內成立國民代表大會。

(二) 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並監督財政外交。

第四類

- (一) 立法院立即草擬憲法。
- (二) 二十二年元旦召集國民大會議定憲法。

第五類

- (一) 六個月內完成地方自治。
- (二) 由自治機關選舉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

第六類

- (一) 依建國大綱完成訓政，召集國民大會制憲。
- (二) 在訓政時期內設立中央民意機關監督財政外交。

以上提案經過兩次大會討論。第一次大會開始討論此案時，首由禦侮審查委員會派員說明各案的提案理由及方案。說明以後即付討論。一部分國民黨同志認爲審查委員會替提案人充分把促進憲政的理由加以發揮，不啻爲反黨者張目，大不滿意。會員遂紛紛主張散會。第二次討論此案時，審查委員會中人遂明白提出主張。審查委員會幾個委員的意思是怎樣的呢？他們的意思彼此並不一致。所以在第一次討論本案時，先聲明審查委員會不願製成結論，各委員均保留發表意見的自由。其中有數人曾經一度交換意見

，構成如下的主張，在第二次討論之開始時發表：

憲法是生長出來的，不是勉強創造出來的。寫得最好的憲法法典，不一定是實際能夠實行的憲法。民元的約法寫得最不好，但在當時却有幾分實際的力量。民十二年的憲法寫得最好，但未產生前已經死了。

國民黨不是反對憲政的黨。辛亥革命是國民黨前身的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命的產物是民元臨時約法。國民黨總理孫先生雖不贊成全體的法條，却最贊成其中「中華民國主權在於全體國民」的一條。他說除此以外都不是他的意思。但是辛亥革命被官僚政客們破壞了。國民黨知道白紙黑字的憲法並不能產生憲政。所以孫先生規定一個訓政時期在憲政時期之前，其意在造成憲政的條件，再去寫立憲法。憲政的基礎打定，然後憲法不落空談。

這個主張發表以後，反對憲政即施行的空氣高張起來。其結果只通過第六類的一案，並且是全場一致起立通過的。其提案原文如下：

- (一) 政府應如期結束訓政，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
- (二) 在國民大會未召集前，設立民意機關，定名為

國民代表會。

(三) 國民代表會至少有議決下列事項之權：

1. 預算決算
2. 國債
3. 重要國際條約

(四) 國民代表會由各大都市職業代表及各省區地方代表二百人至三百人組織之。各大都市之代表至少應占全額之半數。

(五) 國民代表會應于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一日以前成立。在國民代表會未開會前，國民政府應依據上列原則，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

回憶這個提案沒有構成之前一夕，參加提案的幾個會員爲了此項提案會經交換意見至三小時之久。最後構成此案的理由大抵如下：

國民對外交財政沒有監督機關，是現在政府國難當前時最大的國難之由來。政府一切設施無論是否爲事理所當然，均不能得國民的諒解。

反之，國民雖有意見，却沒有合法的表示的方法。

其結果，對政府懷贊助的意思的人，漸因意見無從發表而與政府隔離。對政府有批評的意見的人，漸因主張無從實現而走入非法的路。

爲集中國民的力量以濟當前的難關計，必須在政府

之外設一監督財政外交的機關。其構成尤當注重都市的代表。中國的經濟中心漸由農村轉到都市，所以都市代表應占半數。

這是此案起草的理由。但經大會原則通過後，有些人對都市代表過半數的規定大起反對，尤以蒙古籍會員爲烈。後來大會便把這句話保留起來了。此外八月一日改爲十月十日。

國難會議閉會後，此決議案便由行政院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交政治會議討論。政治會議構成兩個決議案。

(一) 訓政時期中央民意機關定名爲國民參政會。

(二) 國民參政會決議事項之最後決定權，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這是中政會對原案所加的限制。原案的國民代表會是在中央系統之外與國民政府對立的國民代表機關。中政會把牠改成在中央系統之下與國民政府對立的選舉兼指派的機關。這是此案在中政會的經過。

本年七月初旬，中政會召集了一個談話會，這會並沒有名稱。按召集的信件來說，是一個學術界的人的談話會。所討論的問題有外交，政治，經濟財政及教育。其關於

政治所得到的結論，共有五項，但詳細文字不復記憶。其主要的一條大意如下：

國民代表會以都市職業代表及各省地方代表組織之。都市代表產生時即行成立。

這顯然是把國難會議所保留的一句，舊話重提了。這會雖沒有何種效用，但牠却與國民參政會案有相當的關涉，對於中政會對該案的討論上不能說絲毫沒有影響。

從去年四月到今年十二月，由國民代表會到國民參政會，經過公式非公式的討論，及有權機關無權機關的商議，方纔成立如今的原則決議。此後還要經中央交立法院制定法令，由國民政府公布。立法院說不定又要經過多少次討論才達到具體的草案。而由國民政府公布以前，還須交中政會審查。此時又不知要有多少的修改。近年來的法案恐怕沒有比這個再難成立的了。

記者是參加過這案好幾次討論的一份子。在國民代表會提案造意時，記者便已參加。此後參加禦侮審查委員會，以及會外的交換意見，還有修改提案條文的審查會議，及本年七月的談話會的討論。

我沒有很多的意見，但以爲一種制度有沒有當前的作用，有沒有前途的發展，這不是制度本身所能決定的。假

如國民對於政府一切設施，都抱不問不聞的態度，又或抱一無論如何都不參加的態度，則無論何種制度都不會施行得好的。民權沒有從政府授予的。民權是國民爭取出來的。國民不去行使民權，坐而譏罵政府不給民權，這是不對的。如果國民一切不管，一切不爭，則政府雖授以民權，他們也不能夠享受。

不獨民權如此，無論什麼法律都是如此。人民不主張自己的權，則雖法律贈予該權，他也享受不了的。

教育罪言 (四)

旭生

我前幾次已經把我國現在教育界裏面的情形大約說了一說。所舉的例子，雖說差不多全是耳目較近，聞見較切的平津的情形，可是「平津爲我國文化的中心」，其他地方，不能比平津好，殆可斷言。像這樣一團亂糟的教育，前途還能有什麼希望！新舊人物的代謝，非常迅速。國家各界的主要角色，轉瞬就要爲這一班青年學子所代替。你想從這樣教育訓練出來的不學無術，暗昧無識，虛詐油滑的「人材」，他們登台後，能作出什麼好事情！對於國家能有什麼好影響！我國前途的命運，不就被現在的教育所

國民參政會雖去民權主義甚遠，但指出走向民權主義的路。並且牠的本身就是經過多少次的爭論纔出現的。牠將來是不是真能走向民權主義，仍然看國民是不是繼續的往前去爭。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北平

(附記)本件歷次提案及討論與發言人，因未得本人同意，不便將姓名一一指出。

斷定了麼？我前面說：民八五四運動前後爲教育界有自信的時期，直到近幾年來，才爲教育界自信力消失的時期。難道說，這幾年的工夫，教育界的品質，就能這樣的一落千丈麼？——唯唯，否否，不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果我國的教育，受病淺，容易療治，民六七時的養護，已經差不多元氣恢復，那無論什麼人，也不容易在這幾年之間，就把牠鬧的精到這步田地。現在的情形，我們在教育界的同人，全要負一部分的責任。可是一定要找出幾個罪魁禍首，那却是不可能的。我國

士大夫思想的荒謬，發源于數千年前，蔓延植根于全國人心靈的最深處。想把牠摧陷廓清，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五四前後，教育界的名流，對於牠的病源，雖屬稍有所知，却並未能診斷清楚，也未能作根本改革，救正。不過打了一嗎叫針，一時稍現活氣。思想一部分的解放，整理國故的方法逐漸精密，遂令牠感覺到自身的活動力，尙未完全消失，社會因之對於牠，也就生出一種無限度的希望。實在牠的病根，不惟說還沒有拔掉，並且可以說簡直沒有拔。講學間的人應該念書，念書人應該特別安富尊榮的觀念，仍爲一般人所認定的天經地義。加以民十六七革命以後，政治至今未就軌道；農村破產，人心皇皇，教育界亦未能獨外；教育破產的呼聲遂因之瀰漫于全國。現在必須要將牠腐爛的主要原因，一一推定出來，指明出來，然後才能開始商量療治的方案。主要的原因，據我們研尋的結果，略如下述：

一，士大夫在我國成一種特別安富尊榮的階級。這件事，在兩千餘年前，大聖人孔二先生的時候，已經成功。孔二先生在封建時代，教育僅及貴族，不下平民的時候，獨能不顧一切，「有教無類」。不管什麼市僧屠沽，只要他們自己能誠心誠意，拏一塊乾肉作贄見，請求教

，全要一點不厭煩的教誨他們。他這樣精神實在是了不得的。但是因爲他希望人求學的心太盛，說話不甚小心，就生出來很大的毛病。他對於請學稼的樊遲，就痛罵他「小人哉」；可是對於好利干祿的子張，不過安慰他一頓，說你止要如何如何的作，你自然得到體祿了。他又說什麼「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好像辛苦生產的農夫活該餓著肚子，而讀幾句書的大老官們，總應該喫的飽飽的，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從此以後，貴族階級雖然破壞，而念書的人却成了一種新貴族階級。以後經過老社會黨許行陳相陳辛彭更諸人的嚴重攻擊，孟老先生沒有法子，才勉強宣布了「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原則。可是他總覺得「勞力者」應該「食人」，「勞心者」應該「食于人」，「食于人者」就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也不算什麼奢侈。自他們這幾位大聖賢把念書人抬得這樣高以後，念書人應該特別的安富尊榮，不要同泥腿赤脚的農夫同受困苦飢寒，成了不可移易的大原則。小孩自從進了學堂門，充滿了什麼「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啦，什麼「問道誰家子？讀書作高官」啦，心內終日憧憬著的，不過是些吃好的，穿好的，高坐堂皇，打人屁股一類的事情。幸而得志，自然可以大過其作官癮；即使不成，

也還可以魚肉鄰里，武霸鄉曲，成他們那一種特別好吃好喝的游閒階級。科舉變而學校，換湯又何嘗換藥。他們爭著上中學大學，心目中何嘗有什麼高深學術的問題。不過是同從前考舉人考進士一樣，想達到享受比別人高的目的而已。記得蔡子民先生曾對北大法律政治經濟各學系的學生說：你們來這裏要認清楚，是研究高深學術的，並不是要作官的；如果想作官，止要到法政專門學校已經够了，用不著來到這裏云云。這些話是很對的，但是幾千年根深柢固的病痛，這樣的輕描淡寫，怎麼樣就能拔除掉的？又加以物質文明的進步，個人生活的需要一天比一天高，而全國人民的生產力，一點也不能幫助他們增加，除了積極的剝削，加緊的壓榨，還能有什麼好辦法。現在這樣教育制度底下的學生，如果不讓他們上中學上大學，他們還可以農，可以工，可以商；他們一上了中學大學，他們便不能農，不能工，不能商，百分之九十幾，也不曉得士是怎麼一回事，應該作什麼。他們所知道的，就是已經踏進了這一階級，生活就應該提高。每月至少非得著一百八十塊錢，就不能够生活。他們也不管一般的社會是怎麼樣的生活，他們的親戚鄰居，以至于他們的父母是怎麼樣的生活，他們總是要「居是官，行是禮」的，舒舒服服的生活。

大家全知道軍閥是禍國的，是要不得的，可是因為要舒舒服服的生活，就是當軍閥的小嘍囉，大家也要爭著幹。大家全嘆息于軍閥的難除，其實有什麼難除？如果所謂知識階級也者，全體不給他們合作，他們一天也幹不下去。民十四五後的北洋軍閥，止因為一大部分的知識份子不同他們合作，他們立時倒下，足證軍閥沒有知識份子助桀為虐，是沒有什麼壓了不起的。可是大家雖然全說軍閥禍國，大家却全不肯同他們合作，因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必須要舒舒服服的生活，不依附軍閥就無法達到此目的。因為有這樣重大，所以只好讓軍閥牽著鼻子走。想舒舒服服的生活，他們的目的與軍閥同。自己不能生產，又不能幫助人家生產，想達到目的，惟有剝削民衆，他們的方法亦與軍閥無異。所不同的，就是軍閥模模糊糊的禍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却是心中比較清楚的禍國。他們受社會的特惠，得過比較完備的教育，而忘却責任，專圖享受，其罪殆有大於軍閥者。並且打開窗戶說亮話，今日中國最大的問題，並不是什麼國民黨，共產黨，……黨，誰得最後勝利的問題。作民權運動的和平派——立憲黨——既沒辦法，激烈派——老同盟會——自然會成功；如果主張民生主義的和平派——國民黨——對於民生最近找不出

來辦法，那激烈派——共產黨及其他向左各派——也自然會取而代之。政權從這一派落到那一派手裡，即使變更之深，有所犧牲，也並不是大不了的問題。可是這一班不管全國大多數情形如何，却一定要舒舒服服過日子的先生們，在專制時代他們要做官，在立憲時代仍要做官，在共和時代仍可以做官；在北洋軍閥手下可以做官，在國民政府仍可以做官，就是到共產黨……黨統治之下還是要做他們的官；在中華民國可以做官，在「滿洲國」，日本國……國，也未始不可以做官！只要你給他官做，使他舒舒服服的過日子，他就可以不顧一切俯首聽你的號令；如其不然，不管你是什麼人，他也要同你鬧的天翻地覆！現在國民黨中的黨官，固然太多，可是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不能每月掣到三百五百一千八百塊錢而發憤投到共產黨旗下的，也實在不少。像這樣的政黨，是否有多大的希望，實在也太成疑問。這一所無處不需要做官的先生們，真足以把我們國家，民族，送入萬劫不復境地而有餘！却是做官教育，遠承數千年，直至今日，還是頂時髦的教育也！嗚呼！

二、書本教育的留毒。我前邊已經談過：求學問好像要自己旅行，讀書却不過是念遊記。遊記念得無論怎麼

樣熟，總不能得到什麼新知識。可是我國數千年來，總是書本教育，偶然跑到自然界裏面作若干觀察的，已經是很少很少，不要說近代的實驗方法了。原因就是我國士大夫求知識的興趣並不很發達。他們所注意到的，不過是切己的現象，這就是說：人事間相互關係。他們把經驗過的人事的變化，全寫在書本子上面。求實用的學問，就是到那裏面去找。這個方法本來有相當的價值。可是書本教育因此就形成了。殊不知人類為自然界中間的一小部分，不把我們的周圍環境，與我們有關係的自然界弄清楚，却想方隅自限，把範圍內的現象弄明白，是不可能的。並且宇宙中間，不惟同我們人類接近的自然現象，同我們有關係，就是離我們極遠極遠的自然現象，也常常在我們中間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學問的對象是不應該有範圍的，而我國却永遠是故步自封。歐西的科學家，哲學家，注意到自然界的全體，而自然科學逐漸發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也受牠的幫助，更加明了；我國的學術界，注全力於人類社會間的現象，而歷史科學，社會科學反倒比較落後；也就是這個道理。復次，宇宙中間的實在現象，異常複雜。非用極銳利的眼光，把各種現象，分離開，抽象的把觀念和觀念中間相互的簡單及複雜關係，全整理的清清楚楚，

然後再把牠們用實在上面，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是這樣半抽象，尤其是全抽象的科學，開始研究的時候，總是與實在不完全符合的，沒有用處的。純粹數學，幾何學，論理學，全是這樣。專務致用，不大會抽象思想的中國人，對於這一類的知識，很難有相當的成功。我國在玄裝窺基輸入因明以前，不能有已發展的論理學；在利瑪竇徐光啓輸入幾何以前，不能有真正的幾何學；就是在他們辛辛苦苦，把這些輸進來以後，這些科學經數千百年，還不能有像樣的進步；也就是這個道理。我國的士大夫，一方面興趣不夠發展，不肯到自然界裏面去求知識；一方面思理不夠銳敏，不能在抽象知識境域內作出什麼貢獻；所以數理科學，自然科學，在我國全未發達，大家的精神全集中于歷史及社會的知識。又因抽象科學太無根基，所以即在歷史及社會知識方面，與抽象科學有密切關係的方法的一部分，也未能儘量研精，因此這些方面的知識，雖儲集的不少，而終未能造成真正的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歷史方面，也是敘述的方面多，比較研究的方面少。這一部分的知識，大約全在書卷裏面；能在書本子裏面常打圈圈，本來差不多也就行了，所以我國數千年來，求學問的惟一方法，就是讀書。科學廢了，改成學校，仍是讀書。八股策論廢

了，換成科學，也止是讀書。專讀書的習慣，施之於數理科學，自然科學，不過成一種笑話，如我從前所說，讀徧生物學書，却不能辨桑榆；對於科學自身，永遠是隔靴搔癢，不能有任何發展而已。用到社會科學上面，那可就不相同了。因為，各科學的性質，其抽象具體的程度，大有差異；牠們的對象，其現象繁簡的程度也大有差異；治牠們的方法精粗的程度也大有差異；其結果確定的程度也大有差異；所帶地方性的多寡也大有差異。比方說：純粹的數學論理學，牠們的對象，現象是極簡單的，方法是抽象的，精密的，所得的結果是確定的，毫無地方性的。如果你在英國學這一類科學，你就可以一點不變的拿到日本去用，非洲去教。半抽象的物理化學，對象的現象，稍為複雜，方法精密，結果確定的程度，也就稍差一點。所帶的地方性雖很少，却有一點。因為將來很可以在中國找出來一種新原質，從前的方法一概用不上。再進到具體的科學，如地質生物諸科，現象愈繁，方法亦愈難精密，確定的程度亦愈減少，所帶的地方性亦愈增加。如果在外國學習農業，跑回中國，不精細研究本地地方氣候若何，土壤若何，附近的水泉若何，林木若何，人民的經濟狀況若何，而貿貿然想學到在外國所學的法子實用于中國，未有不鬧

出大笑話者。又況由生物進至于人類的生理，心理，現象的複雜，一級一級的增加，方法精密，結果確定的程度，一級一級的減少，所帶的地方性，一級一級的添多。直至最後的，最複雜的，最不確定的社會現象，其所帶的地方色彩，蓋有異常濃厚者。所以我們跑到外國去學社會科學，所真能學到的，不過是些方法。至于其結果，所真能實用于中國的，頂多也不過百分之四五十。並且這一部分可用的同不可用的全混在一起，非先对于中國的社會，作一種詳細的調查，精密的統計，確實的研究，絕沒有法子把牠們分離開。進一步說，不惟結論而已，就是方法，所能用的，也不過百分之八九十，並不是全體。因爲，很可以有一部分現象，外國有，中國卻沒有，那治牠的方法，在中國就全沒有用；反過來，另外一部分，中國有，外國卻沒有，那就不能不創造一套新方法去應付牠。所以在外國學數學論理學的先生們，跑回中國，立時拏他所學的教，還可以說得下去；至于學社會科學的先生們，回到中國，不作調查，不作研究，就想把牠所學的原封不動，照樣教授或實用于中國，那簡直是一場大笑話！可是我們中國的人，跑到日本，學到一些對於社會的知識，就趕緊跑回來，告訴國人說：社會科學是這樣的；社會是應該照這樣

改革的。以至于跑到美國法國俄國以及其他各國的人，學到一些，無不趕緊跑回來，告訴國人說：社會科學是這樣的；社會是應該照這樣改革的。他們有時候因爲爭奪飯碗的關係，就驢唇不對馬嘴的亂吵吵。吵的利害，如果有機會，還要鼓動軍閥，不惜草菅人命的互相殺戮！所以中國這二十多年的內亂，雖說原因複雜，而這一班學社會科學的先生們，實在要負不小一部分的責任。近來關心于教育的人，如陳果夫諸先生，痛心于文法各科學生的冒濫，急想有所整頓，意思是很對的。但是他們所擬的辦法，或想將文法各科停止招生數年，或想將公私立大學中文法各科停辦，止讓國立大學辦，我却是不贊成的。因爲他們諸位先生沒有找出來文法各科真正受病的癥結，並且他所提的辦法，是枝節的，沒有很大的補益。可是我雖然反對他們那縮減的辦法，我却是要發憤說一句話：如果現在不把任何大學——國立，公立，私立——中的法學院，一律完全停辦，另起爐竈再來，那社會科學在中國可以說毫無希望！因爲幾乎全體的教授，把社會科學的性質鬧錯，他們就不知道社會科學應該怎麼研究，怎麼樣會希望他們能指導學生！——中國現在至多可以辦幾個法政專門學校，訓練幾個實用人材，作法官律師文官等等。另外把全國人材集

中，不曉得够辦一兩個研究社會科學的學院不够。——可是在社會科學方面，鬧這樣大的笑話——簡直是一齣悲劇——仍是止知道讀書的流毒也！噫！

有上面所說兩個重要的原因，教育的受病已經够嚴重了。可是這些病的來源已經綿延數千年，我們的先民應該

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

顧毓琇

(一)

胡適之先生新近在湖南演講我們所應走的路，結論是

「惟科學可以救國。」科學對於中國的重要，誰都承認。

即使談到東西文化的大問題或是新舊文學的小問題，大家各有各的意見，但是中國在今日情況之下，必須講求科學，却是大家都承認的。

國家處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之下，我們總得有點自信心，總得要找一條出路。青年們所應走的路是什麼？這是個青年在沉悶着沉思而不能得到確切答覆的問題。「革命尚未成功」，那麼青年還是都去「革命」麼？去「革」誰的「命」？怎樣纔算「革」得成功？執政的當局祇希望大家去「革命」，結果人人想「革命」，那亦不是辦法。現

負責任的。然則，難道說我們就不負什麼大責任麼？否！絕對不然！如果沒有現在環境上和教育界自身上的各種原因，那病雖嚴重，還不至于危急到這步田地。想知道這些原因是什麼，大家仔細想想，並沒有什麼難找出。至于我們對於這些原因的意見，且等我下次慢慢說來。

在革命的領袖似乎都有覺悟了：蔣中正先生提倡「禮義廉恥」，胡適之先生提倡「科學救國。」

科學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更進一步，要討論我們所需要的怎樣的科學。

(二)

要討論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我們先要認清楚我們的時代。「時代錯誤」的意見，即使提倡成功恐怕亦是徒勞無功的。我先要聲明：我們下面討論需要怎樣的科學，不是指注重物理化學或是注重生物地質而言。還有，下面的討論，只是個人粗淺的見解，希望當代的科學家同一切對於提倡科學及解決中國問題有興趣的國人加以指正。

我認爲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巴斯德發明微生物的時代

，已經不是牛頓發明力學定律或是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代，已經不是麥司威發明電磁論或是愛迪生發明電燈泡的時代。假使中國的青年，都立志要做發明家，要學巴斯德，要學牛頓瓦特，要學麥司威愛迪生，那我可以預言一萬個青年裏頭，一個人都不見得可以有那樣的成就。科學進步

到現在，差不多各方面都有許多人做過長時間的努力。換句話說：各項科學研究，已經漸進於精細的境界，你要努力於科學的研究，只可以先做點關於極小部分的工作。你若要想發明點驚天動地的貢獻，那是夢想。你若要靠你科學的發明（注意我所說的是發明）以致中國於富強，那亦是夢想。

中國人每希望「某生少有大志」，我認爲這希望每每是危險的。科學的發明，像一切其他學問的新發見一樣，一半靠努力，一半靠天才。天才不是個個人可以勉強的，某人或者有文學的天才，不一定就有科學的天才。愛迪生說：發明九分靠努力，一分靠天才。就這一分天才，便是不可強求的。所以青年要肯注重科學則可以，要想人人做科學的研究，才能上亦有所不計。若是希望人人做發明家，結果希望同被人希望的人都將要大大地失望。

我們的時代已經不是科學的境域還沒有開發的時代，

研究科學即有發明貢獻，其範圍亦必極小。要有大發明須靠天才，而天才只是偶然的，不可強求的。所以，我們不希望多數的青年想做發明家的巴斯德，我們只希望青年能抱着一個小小的志願，學應用科學家的巴斯德，學他造酒，學他養蠶，學他爲牛羊治病。

（三）

我們在現在的時代，已經有了不少的發明了。科學的發明是人類共同的遺產。我們不必斤斤於中國人自己重新去發明一切已知的科學真理和事實。巴斯德的微生物，不是法國人專利的，就像牛頓的力學，不是爲英國人發明的一樣。甚至於瓦特的蒸汽機，愛迪生的電燈泡，雖然多少是專利品，但是我們亦儘可以仿造。

我以爲要希望中國富強，要解決中國的生產問題，要中國的物質進步，現在世界上已經有的科學知識，已經够我們受用了，只要我們會去受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至今還沒有同「物質進步」發生直接的關係。我們不必等「相對論」來救中國於淪亡吧，我們更不必希望中國再出一個愛因斯坦，發明一個「新相對論」，來解救中國的危局吧。我們目前所需要的，老實說，只是西洋人已經發明的科學知識，而更重要的，便是這種科學知識的應用。

(四)

中國太窮了，我們沒有那麼許多錢做純粹科學的研究。這種論調在陳果夫先生提倡理工教育，胡適之先生提倡「科學救國」的呼聲裏，居然間乎亦聽得見。最近時代公論（第三十六期）上李成談先生主張停辦各大學的理學院，理由便是國家太窮，各大學理學院所造就的科學研究人才，沒有機會可以做研究，並且國家亦沒有那麼許多錢供給大學畢業生做純粹的科學研究。

我個人是不贊成停辦理學院的，不贊成的理由，此處不必細說。但我認為理學院是否為專為造就純粹科學研究者而設的問題，正同法學院是否專為造就政治學者經濟學者法律學者而設，實存是值得討論的。

我最近同幾位科學教授討論這個問題，這幾位教授都是在學術上很有貢獻，而研究論文時常送到外國雜誌上發表的人。我先問他們每年每系的畢業生，假定為二十人，有幾個人可以有資格再圖深造做科學研究的。他們說假定

兩個（十分之一）可以進研究院試試，將來的成績當然還不知道。我問他們其餘十八人做什麼？他們辛辛苦苦學了科學，到畢業時候，教授們告訴他們沒有資格做研究，更不必說做發明家，更不必說發明了救中國。他們學錯了，

不應該學科學，他們是沒有成就就可以希冀，他們豈不是只有後悔，失望和悲觀？他們或者會去教書，但是中小學的理化教員位置亦有限，又況他們既無教書的準備，更無教書的興趣，那怎樣辦呢！一位最熱心科學研究的化學教授開口了，他希望大部分的理化畢業生到實業界去工作。

理學院大部分的畢業生，最好到實業界去工作，這確是一條光明的大路。胡適之先生提倡了「科學救國」，果真許多青年學生學了科學，學到大學理學院畢業，畢業以後，他們仍要請教胡先生「我們所應走的路」在那裏。事實告訴我們：做發明家做科學研究只是少數人能做的，我們大部分學了科學的青年還要走「應用科學」的路。我們不要人人希冀學發明微菌的巴斯德，我們還是學造酒，養蠶，為牛羊看病的巴斯德。我們的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各種學問，可以去幫助國內農業工業礦業及其他各種實業的發展，我們可以使得實業科學化，我們可以促進整個社會國家的物質進步。

大部分的理學院畢業生，我們若是希望他們到實業界去，請問理學院的課程和教育方針應否對這點加以注意。我們最低限度，應使青年學生知道學了科學不一定都去做純粹的研究，一定都去做發明家，因此畢業以後，即不能

進研究院，亦正不必懊悔，不必失望，不必悲觀，他們自有他們的大路，值得終生的努力。這就服務精神上而言是很重要的；我們不希望每年各大學的理學院畢業許多預備做純粹科學研究而失敗的落伍者，我們希望大學的理學院除能有機會挑選傑出的研究人才，及供給中小學好科學教師以外，還能供給社會許多有志於實業的應用科學家。至於應用科學的知識，同中國實業的現狀，在準備大部分理學院畢業生將來從事於實業的計畫之下，自然亦應有相當的注意。我們不要以為科學是西洋的產物，我們提倡科學教育便可以照外國的方法辦！

在胡先生「科學救國」的呼聲之下，我認爲科學教育的目的及方法都是值得國內科學教育專家提出來討論的。我們要認清事實和需要來決定一切的方針。

(五)

塞上的中秋

要說中秋節的月亮是讓人排着瓜果賞的，有時她也靜靜的看見人類的摧殘和流血。

去年中秋我伴着一個朋友在美洲的落磯山巔黃石公園

總結起來，我們可把上面所討論的列成下面幾點：

- 一，現在世界上已有的發明已經够中國受用了。
- 二，中國太危急了，等不及新發明。
- 三，新發明不一定能救中國。
- 四，中國太窮，要做許多純粹的科學研究，實爲經濟所不許。
- 五，科學研究同科學發明不是個個人可以立志強求的。
- 六，我們大部分學科學的青年，恐怕仍須向實業界去找正當的出路。
- 七，中國的科學教育方針，應該是注重基本訓練，而以促進物質進步爲重要目的
- 八，我們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學的新發明，而是已有的科學發明的應用。

青海

盤桓。今年中秋我帶着四百多人在遼寧同內蒙交界的地方，守着兩個村子，我們用的車號還是中華民國。讀者，這是『九一八』快交週年的時候呵，我讓你們想像我的環境。

今年的中秋節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因為那幾天我遇着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現在我把他們寫下來，也叫關裏的人知道東北農民和商民在被壓迫下的苦處，同義勇軍的活躍。

* * * * *

我的兩個村子相距五里遠，周圍一百方里荒地便是屯墾的試驗場，這地靠着興安嶺同洮兒河，四圍都是內蒙的王爺府和公爺府。我們到最近的火車站，要起一百八十里的旱路。

村子裏是幾個大學畢業的同事，幾十個衛兵，此外便是工頭，種地的工人，同開荒的地戶。

因為這兩個村子雖然成立不到兩年，「九一八」以後倒還沒有放棄，也沒有投降「偽國」，所以外邊說我們有迫擊炮，有機關槍，有手榴彈；講到我們的衛兵也是能騎劣馬，打槍百發百中，好不威風。可是實際上呢，我們祇有幾十枝七九鎗，和一些匣子炮，手鎗，同老式的火器，統計還不得一百支。不過因為人心齊全，內容不露，所以外人也不敢輕於來嘗試「搶密」，我們也不愁幾百個鬍子。

舊曆七月中旬，靠近熱河的城鎮都發現了義勇軍；突

泉，通遼，瞻榆也幾次攻破。沿着洮昂鐵路一帶，城裏滿是便衣隊，但是他們很少武器，也沒有給養，他們的責任是宣傳。這些地方都是我村子東邊南邊的出路，所以消息一到，全村就起些恐慌。但是我的衛兵都是很靠得住，我在那裏坐着不動，也就沒有亂子。至於我的生活呢，面子上是好整以暇，還叫他們好好的種地，自己每天單獨的騎馬，把闖村的人心穩住。其實我心裏也常常發悶，天天的探報很少好消息，除了我一個最親信的助手和一個衛隊長以外，旁人竟沒有可以給他們知道的事情。我的主張就是一方面不讓他們聞着，白天做工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一方面不許他們散佈謠言，誰造謠就重重的罰。反正，除非是真的義勇軍到了，我能給他相當的接濟；此外呢，不管是日本，是蒙古，是滿州或者是鬍子，我們都得幹他一陣。打得過最好；打不過，我們就往興安嶺裏頭跑。

七月中旬我就接着報告，知道在陰歷八月一日，各地的便衣隊要有相當動作，滿州國的軍隊也不見得穩。我想着一起事，交通就斷絕，我的工人大都還沒有棉衣，子彈也覺得缺乏，剛巧老等候着的一筆款子到了，於是派了一個姓牛的工頭，到附近三百里外城裏去辦貨。牛工頭是七月底出村子的，我給他一星期的期限。但是因為大水的緣

故，他到八月十三才到家，幾乎送了命。

八月初一約定起事，是一件大笑話，我不會放在心上。爲什麼呢？約定了日子做秘密的事情，一定會落到間諜的耳朵裏。況且各處的情形不同，有的會被各種壓迫到提前起事，有的能因爲時機不熟而不起事。果然，在村子東邊二百多里地的一個城市，在七月三十早晨便被一千多義勇軍佔領了，那城裏有我們的辦公處，居然也高掛了青天白日旗。街上買大煙同白麵的日本浪人和幾位日本商人，也痛痛快快的槍斃了。義勇軍一進街，便忙着做青布的條子，一個一個的掛在手臂上。縣署，財政局也攻破了，能跑的也跑了，該殺的也殺了。公安隊，警察都反了正。但是在城裏的幾十個日本守備隊，因爲佔着地勢，有迫擊炮同機關槍掩護，竟攻他不下！義軍進城太匆忙了，所以連鐵路也沒有拔去，電線也沒有割斷。早晨六點進城，十一點便吃飯。正在吃飯的時候，日本從南方開來了鐵甲車，於是城內的日本守備隊同城外的鐵甲車便向義軍集中地點開起炮來。這個時候，割電綫拔鐵路已然是馬後炮。但是還有城牆可守，於是義勇軍，便衣隊，反正的滿州軍警，同天天想關內出兵的商民，都拿槍去守城，同日本對轟了一刻。後來看看支不住，除了商民而外，就都開着

城門躲向鄉間去了。商民呢，又回舖子關上大門，把槍埋起來，再預備當滿州的兵差。那天進城的一千多義勇軍，出城時在三倍以上。搶劫是不曾有的，血氣是滿足的。不過公平的一句話，他們欠組織，欠軍事智識，武器也不够一打。這是現在一部份義軍的實情，他們所以能暫時存在，並不是他們有實力，却因爲他們的存在並非用兵的要塞，也不是交通的機紐，那麼他們的存在，與當地的商家農戶倒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而於日本沒有多少妨害。

不過讀者要知道，我是最佩服真正義勇軍奮鬥精神的一份子。義軍偉大的事蹟，早已滿載在中國的報紙。我不過舉一件事情，請大家來改善這種缺點罷了。

從那七月三十破了城，我村子附近二百里以內，便有許多鬍子活躍，他們的成分，大半是一個蒙古人和一半中國人混着。時常也有義勇軍北上的消息，馬占山將軍西進的前鋒，也到了我們附近。

陰歷八月初十我想預備給工人們過中秋節，派了姓侯的工頭帶人到村南九十里的鎮上辦菜，買月餅，燒酒，米麵等東西。候工頭是河北人，極其老實可靠，但是膽子不太大。講起這鎮市，有三千多人口，但是沒有城郭，街心

裏僅蓋了幾座土礮樓，平時有兩團滿州鬍子兵駐在各商店裏頭，吃着喝着，還在附近種些大烟。五月底那些兵都開拔了，祇剩下一連人。只一連人，又因為同蒙古兵不和，便都拉出去當鬍子了。

要是從我的村子去這鎮上須得走一天。鎮上我們有一所聯號，是姓李的糧棧，姓李的是退伍的軍官，他店裏還住着一位姓魯的。魯君便是我的通訊員，從前也在吳玉帥手下當軍官的。

因為又有消息說八月十五不穩，我在村子裏成備得很嚴。八月十日那一夜，我親自查夜到十二點，我覺得困乏，就派我的衛隊長替我，我好躺一會。半個月以來，我睡覺是不分晝夜，那時有工夫就歇着，有事便起來。這晚上還沒睡到兩小時，忽然一枝電筒從窗外直照着我的床鋪，我一翻身起來，躲在暗裏，拿手鎗瞄着那電光來處。

原來是姓談的衛兵來回話，說侯工頭連夜的跑回來了。九十里外的村子，已被鬍子佔領了。

我把他們叫進來，侯工頭蒼白的臉，手中拿着把鐮刀直發抖，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我問他怎麼一回事。他說，「我下午二點鐘進了鎮，跑到振興北糧棧找魯先生。但見各商家往振興北運貨，預備藏起來。李掌櫃的擎着匣子

炮在關門。魯先生匆忙的說，中秋是不用過了，你趕快回去送信，二千多鬍子同幾百紅槍會不久就要進街。是不是義勇軍我再給通消息。我說我怎樣去回話？魯先生當時便寫了一張字。我立刻走出店門，看見成群的人馬已覓從兩邊山上過河了，鎗子也呼呼的亂响，我就向北奔跑，一直回來報信。還聽說牛工頭剛從城裏回來，趕着三輛大車的貨物和子彈，有蒙古土爺的兵保護着，已到了王爺府裏。」

我一想這不糟了？邊疆上的勾當，喜歡趁風打劫，我這兒派出去的人，性命都有些危險。而且還有叫人眼紅的子彈？當時我也一聲不做，叫侯工頭去吃些飯，好好的歇着。

當下他們退出去，我才默默的抽一枝烟捲，想想該怎麼辦。抽完了紙烟，我打發人到廚房叫預備兩客飯，跨兩匹好馬，再自己輕輕的走到老鄧房裏，他是已經醒着。

我向來不願意叫人往冒險的地方走，總是叫他們自告奮勇。所以我就把一切情形同他講了。告訴他我要一個人到王爺府打聽牛工頭的下落，亦許東西還能設法運回來。並且魯先生的性命也得研究一下；鎮上的鬍子同義勇軍的關係亦要證實。當下他就答應去了，我們還叫談衛士同去，因為談是最赤心的人。

我陪着他們吃完飯，千萬丁寧着不要冒無謂的險。送他們出了村門。那時已是早晨三點鐘了，月光把遠處山頭照得通明，靜悄悄的狗也不叫，談衛士問我要了半枝沒有抽完的煙捲，我看他們穿着便衣，背起匣子上馬，得得的拼命去趕一百多里前程。呀的一聲，村門又關上了，我心裏好像送了兩個喪事！最親信的兩個人，去了！

老鄧是一個青年，二十四歲裏却飽含着風霜滋味。他走出了馮庸大學，便在內蒙一帶飄流，不講騎馬打鎗，就他一口蒙古話也能幫我好多忙。他兩年來被政府同蒙古捉了三次，可是雄心依然存在，新近才被政府同蒙古捉這一次因爲他同蒙古的交情，所以叫他去。至於談衛士呢，跟過郭松齡，打過馮玉祥，真是一馬當前的勇士。我最喜歡他騎馬的姿勢，他那靜默的魁梧真叫我佩服！

八月十二的早晨，談衛士回來了。那市鎮已完全爲鬍子攻下，李掌櫃的是斃了，魯先生不知下落，匪人是拉出去的張連長帶進來的，幾幫合伙來胡搶什麼「天扛」呀，「何發財」呀，「王八頭」呀，都是些鬍子頭的名目。老鄧已經到鎮裏去打聽他們同義勇軍的關係。至於牛工頭同貨物子彈呢，王爺府說是已經送過河奔鎮裏去了。王爺府離鎮二十多里地，是初十上午走的，這是王府的回話！

這真是糟之又糟！或者王府的下人已覓結果了牛工頭，搶去東西。如果真的到鎮上去，那麼人命是留得住的！

我村子的西南五十多里地，有兩個公爺府。這兩位公爺是同情於中國的，我知道他們實力還不充足，深怕他們八月十五起事，自取滅亡。八月十二的下午，我好好的歇着幾點鐘。一到晚上十點鐘，我就叫背上四匹馬，同三個衛士踏着月色到那公府去，勸他們不要動，並且問鎮上的消息。公爺府的附近山頭上，都早下了守衛，人近的時候都放朝天鎗——叫鎗。我們好容易過了幾道口子，同公爺講了些話，到三點鐘便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們聽到遠處許多的馬蹄聲，南方山後也上了一個一個的黑影。我們對他開着幾槍，就放開馬奔回村裏頭。五十幾里地的飛跑，把我的馬——「小火車頭」跑壞了，也找不到人陪，便把他打死了。

八月十三的下午我的心好像兩隻書桶，儘拿着望遠鏡也不見山頭有老鄧和牛工頭的影踪。好容易到到五點鐘忽然見着幾輛大車在動。那前邊騎馬的居然是老鄧！老鄧回來了！我真是高興，可疑心這幾輛大車是那裏來的。

過了半點鐘，老鄧同我又在屋裡抽着煙捲。牛工頭忙着點買來的東西。老鄧的微笑叫我非常滿意。原來牛工頭

真的往死裏闖，三大車東西到得鎮邊，就有遊擊的鬍子叫他往鎮裏送去，那時鎮上還沒有挨戶搜檢，于是他把車趕到一家相識的人家，把子彈取下來埋在地底下，把車同貨物送在草堆裏。東西藏好了以後，他便上街去閒逛，看那成群結隊的鬍匪幹些什麼。他走到「振興北」，「振興北」已竟成了鬍子大本營。可巧那史頭有一個二頭子，同他有些相好，也會受過我們的好處，居然招待起來。「振興北」院子後頭，一堆血漬裏躺着不閉眼的李掌櫃，那頭兒說「因為李掌櫃的平時太刻薄些，況且人馬進了街，他還捉着匣子胡打，打傷一個弟兄，打死一匹馬，所以就把他開了。還有一個姓魯的被一個弟兄打了一槍，他倒在泥水窪裏，混着的時候兩鎗偏偏又穿過了衣裳，好運氣，連血絲都沒有掛出來，就躺着不動。一位紅槍會看着奇怪，想把槍頭扎他的腦袋。姓魯的可跳起來了，一手搶住槍尖，說道「朋友，我也沒欠你們的命，我是這兒的長客，不過借住着。你們打我三槍，還要扎我，難道我們真有天大的仇？」我在一旁看是他，就呼喊着「算了罷，饒了他罷，」所以沒有死！」

當時牛工頭聽了消息，吃了幾盃鬍子酒，就向腰包裏掏出五塊現洋票，悄悄的送過去。這二頭子知道有些故

事，便走出街上，一同談着。牛工頭便請他把幾車東西設法偷運出去。果然，十三一早，這二頭子一馬當先，保鏢似的經過了幾道鬍子卡，他一揮手回去了，還託牛工頭給我送個好。他們要在這鎮上過現成的中秋，吃李掌櫃的月餅！牛工頭走不到幾里地，遇見老鄧正徒步往村裏去，于是就打伙回來。我見了他二人真是喜出天外，趕快殺豬喝酒。點查的東西，牛工頭說除了兩大包烟捲，一雙新襪子，旁的統統沒有丟，幾多工人也歡天喜地的披上新棉衣。子彈呢，還埋在鎮上上底下，過幾天鬍子走了，才好去發土。

當晚牛工頭好好的睡了一覺，明天早起，又自告奮勇的探信去了。十四那天，魯先生借着替李掌櫃買棺材的名義，也從虎口裏跑出來，夾衫子還帶了兩個窟窿。他說這一羣鬍子，本來不敢打那市鎮，但是偏遇着紅槍會，兩方訂立合同；紅槍會幫鬍子破街，讓他們把東西統統運回南方一百多里的巢穴。然後鬍子幫忙紅槍會到洮南打日本。所以紅槍會便衝鋒進街，蒙古兵打了兩排子彈，看看不對勁，回馬去保王府了；鎮上的商店便遭了災難。現在他們正趕着做藍布的義軍臂章，過了中秋去打日本。

後來這一批人馬開拔了。搶劫的財貨，就用搶來的車

馬運回去，路上還演着鬍子搶鬍子的故事。至於打日本呢，幾幫鬍子出了鎮上十里地，大家就想「分流子，」各走各的。可是紅槍會一生氣，說要扎死他們，於是便直奔洮南。離洮南幾十里地，逢着日本兵，機關槍掃死好幾十紅槍會，他們也就散了。讀者，紅槍會本身是不好俘虜掠的，聽說那邪法真有點道理，所以無論蒙古鬍子，或者滿州兵，都不敢犯他。但是他們的肉身，愚忠，怎能抵有組織

的日本軍隊呢？

反正，今年的中秋，我看着我們村裏過節，知道鎮上的鬍子過節，也想到鎮上的商民同農戶沒有過節。我自己是無心過節，幾夜連着賞塞外的寒月，到極煩悶的時候，思量起法國在摩洛哥的「國外孤軍」。或者思量起我去年中秋落機山的朋友！

海外寄來的一個花球

(通信)

適之先生：

我是上海滬江大學今年畢業的一個學生，到美國來才

兩個多月。頃讀獨立評論第二十一號及國聞週報上先生的

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覺得有寫一封信表示我欽佩先

生對於李頓報告所取態度的必要。在國內時嘗聞校長劉湛

恩先生談及，中國人與人相處，責難質問的多，鼓勵欣賞

的少；你作了一件事，對不對是另一問題，寫信爲文罵你

的總一定較多，向你表示同情和欣賞的總是絕無僅有，即

令那件事是對了，有接受鼓勵與同情的價值。這，我深覺

是現代中國人倫理上一個缺陷。因此，我寫這封信來，沒

有別的意思，只是表示我對於先生毅然發表這種不易討好的論調的勇氣和識見的欽佩。我願意學着在該罵人的時候罵人，在該給人同情和欽敬的時候，鼓勵人。先生不以我的話爲僭越吧？

今天又接到一期獨立評論，看了自殺那篇文章，我所以在這一點上敬佩先生的理由都被該文作者說了。日本這個刁滑奸頑的集體，挾着躍躍欲試的武力，臨在我們這個中乾外不強的民族上面，我們自然應該以十萬分的小心，十萬分的慎重，斟酌緩急，權衡輕重，利用一切能致的現勢力的牽制去對付他的。現在不是不負責任唱高調的時候

。今早閱美國華僑辦的中國日報，知道上海的同學又準備示威運動反對李頓報告。他們的態度卻是真的毫無內疚的願爲王之碎不爲瓦之全。不到三個月以前我還是上海的一個大學學生。抗日救國運動中許多領袖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們的純潔和高貴的決心。但我知道像先生這一類的看法我那一班同學是要忍不住罵的。此函到時想已經有各地很多青年呪過先生了。但是請先生不要灰心。他們的不顧事實不審自己力量的言論，錯是錯了，但是他們代表的是純潔神聖的國民意志，澈底要求正義的意志，一絲一毫不遷就事實的意志，是一個國家的奔突迸發的生命力，抵抗力的表現；我寧願咽着淚讚美，欣賞他們的表現；至於先生及其他具有同樣理解的明達先進的忍辱負重的論調，

是代表較成熟，較穩重，已經在社會中嘗過事實上磨練，懂得實際上解決問題步驟的人士的意志，這是老成持重委曲求全的看法，而先生等所主張的又並沒有超過持重求全所應有的限度。先生的態度是對的。至於將國土喪掉了，自己還在早一個會議，晚一個電文，說一些不相干的虛張聲勢痛快淋漓的話欺哄國人的人，我替他們怪害羞的。這一種的人們，不但不配執政，不配下訓令，連當今日中國的國民都不配！和我年齡一樣的年青同學們，不管他們怎樣主張，他們比今日的達官貴人萬倍的可敬可愛。先生便是真受了點氣，也請「對付着點兒」罷！

(陳仁炳十一月二十九日美國綠杉磯南加州大學)

北晨叢書

日美戰爭

蘇俄軍備與俄戰爭

日本陸軍大佐佐木一雄著

(每册九角)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美國陸軍上佐達威士著

(每册五角)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日本十六專家著

(每册一元)

第三卷 日美果戰乎 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大著

(一元一角)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日本海軍專家池崎忠孝著

(印刷中)

第五卷 太平洋之戰潮 美國海軍上佐易理歐著

(印刷中)

第六卷 日美無戰事 日本清澤潤著

(印刷中)

第七卷 太平洋大爭戰 日本海軍少佐中島武著

(印刷中)

第八卷 美國海軍戰略 美國海軍少將馬漢著

(印刷中)

購書者請向上海北平路五五號北晨社發行所或各埠代售處函購或向上海北平路五五號北晨社發行所函購

北平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織

胡適

關於國民參政會的演變歷史，上期有陶希聖先生的投稿，說的很詳細。我們從那一段歷史裡可以看出現在的統治者對於人民參政的問題始終抱着懷疑和畏懼的心理。他們十分不願意人民參政，所以把國民代表會變成國民參政會，所以取消了立法院和監察院半數委員民選的原議，所以又在國民參政會裏設立「延聘」的代表，所以又規定國民參政會決議案的最後決定權仍在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我完全贊成陶希聖先生說的：

國民參政會雖去民權主義甚遠，但指出走向民權主義的路。牠將來是不是真能走向民權主義，仍然

看國民是不是繼續的往前去爭。

所以我不反對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我現在只討論這個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成，應該如何選舉國民參政的代表。

我提議：第一，國民參政會不應該有政府延聘的代表，應該全由選舉產生。這是一個根本態度問題。加入延聘的代表，就是政府不信任民選的代表。政府不信任人民，人

民決不能信任政府。國難會議的失敗全由後來執政的人不信任那已發表的會員名單，一批一批的增加國民黨員，惟恐黨外會員太多了要和政府爲難。老實說，多數國難會員的拒絕出席，都不是出于本心；他們原來都感覺「國難」的名義是不應該拒絕的，在國難的號召之下他們是應該誠心與政府合作的。平津的國難會議會員在二月初發出擁護政府的通電是全體一致簽名的。但政府終不信任他們，他們也就從不信任政府的態度逐漸變到拒絕出席的態度了。

這一段歷史是值得今日執政者的嚴重考慮的。在這個制定國民參政會組織法的時機，政府與國民黨應該考慮他們究竟要一個什麼樣子的國民參政會。他們要的是一個政府御用的參政會？還是要一個能監督同時也能贊助政府的參政會？我們要鄭重的忠告國民黨與政府：只有能搗亂也能監督政府的參政代表的贊助是有力量的。御用走狗的贊助是不值得要的。政府有不怕搗亂，不怕監督的誠意，在要緊的關頭，人民代表自然會誠意的擁護政府。政府若先存了不信任民意機關代表的私心，至多只能添設一個位置

御用代表的機關而已。

第二，國民參政會的代表人數不必過多，至多不應該過一百人。現在國內的實際情形，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國家決不能有三五百人才來做國民參政。即使有那麼多人才，也決不應該把他們一齊擠到國民參政會裏去。此時所需要的是一個能代表一國人望的第一個民選的雛形國會。必須人數少，被選資格稍嚴，然後可以使人感覺做參政代表是一種很高的榮譽，然後可以使各省的第一流人才肯出來當選做國民參政。美國參議院會員，每邦出二人，全院止有九十六人。我們此時應該略仿其制度，每省出代表至多四人，其新設之省（察，熱，綏，寧夏，西康等）每省至多出二人，特別市出一人。總數約一百人。如此則國民參政會也許可以有網羅各省第一流人才的希望。

第三，國民參政會代表的選舉應該以省為選舉區單位，每省的代表皆代表全省，皆由全省選民投票選舉出來。此條用意與上條同，同是希望國民參政代表能得上選人才。以全省為選舉區，則所選出的人也許是全省的第一二流人望。若再分小區，則所出代表不過當地的土豪劣紳或小政客而已。況且全省人多，不容易賄買操縱，亦是一利。

第四，國民參政會代表的選舉法應該廢除舊日國會選舉的間接選舉法，改用選民直接選舉方法。舊日的間接選舉法，由選民選出極少數的『初選當選人』，然後由初選當選人開會選出覆選當選人。這種複選制，當初的用意是要各地人民推舉他們所熟知的本地賢豪，再由這些各地的領袖人才選舉他們所公認的全省人才為國會議員。豈料結果恰和事實相反。各地的劣紳土豪做了初選當選人，人數既少，容易被惡勢力操縱，容易做選舉的買賣。例如有一次安徽的初選當選人在蕪湖開會，決定選舉肯出最高價錢的人為參議員；他們索價太高，無人肯收買他們的票；他們急了，只好推代表到上海去尋某大地主，請他出來作參議員，他們只要五萬元的代價！這種流弊是我們今日應該全部革除的。

第五，直接選舉法應該先有一個『預選』機關，推出加一倍或二倍『候選人』來，由人民從那些『候選人』裏用無記名方法投票選出他們的代表。直接選舉的最大困難在於大多數人民不知道誰肯當選或誰配當選；若由人民任意投票，票數必紛亂散漫，少數有組織的團體就可以操縱選舉，選出的人未必是適宜的人選。『預選』（Primary election）即是補救此等困難的最好方法。在沒有民治

訓練的國家，我們主張：應該用智識程度較高的法團代表

的實行方案了。

來做預選機關，在選舉期前三個月開『預選會』，依照法定的代表人數，加一倍或兩倍，推出適宜的人才為國民參政會代表候選人。此項法團代表，約以下列各種有組織之法團為限：

- (1) 省市黨部代表
- (2) 省市商會代表
- (3) 省市教育會代表
- (4) 省立大學（或國立大學在省區內者）教授會代表
- (5) 省市律師公會代表
- (6) 省市總工會代表
- (7) 省市銀行錢業公會代表

此項法團程度皆較高，皆代表社會上相當的權力，故最合宜於做預選機關。況且此項法團雖以全省為範圍，事實上自然皆以大都市為活動中心，他們推出的候選人自然側重大都市的代表人物。在這個過渡時代，大都市的人才，不但代表大都市的職業，並且比較的最能代表國家的人望。有了這種預選機關的制度，國難會議原案所主張的「各大都市之代表至少應占全額之半數」的精神也可以有個妥當

第六，為防範預選機關把持預選起見，可以參用選民簽名請願補推候選人之法。預選制流弊較少。預選所推出之候選人，未必即可當選，故賄買預選之弊自不易發生，一也。參加預選的各法團程度較普通選民為高，不能不顧全他們在社會上的信用，不能不推舉一些負人望的人才，二也。即有一部分候選人是不狼滿人意的，全省選民投票時，那些名望較劣，或輿論所不滿的候選人是不易被選的，三也。預選會是公開的，預選結果是必須公布的，預選機關對預選是應負完全責任的，故輿論的制裁容易發生效力，四也。——有此四利，預選制的流弊已不多了。但預選結果發表時，也許真有太不滿人意的，那時就應該有補救的方法，就是選民一千人以上的簽名蓋章的請願也可以推舉一個候選人，也可以呈請選舉監督列入選舉票上，與其他候選人同由全省選民投票選舉。如此，則預選機關雖欲把持包辦，也不可能了。

第七，選舉應該完全用無記名投票。秘密無記名投票是保障民權的最大利器。一切賄買運動，一切利誘威逼，到了秘密投票時，全無用處。必須使人人明白無論花了多少金錢，而選民還有最後到期不交貨的無上權利

然後賄選之風自然減除。

以上我提出的幾項都是原則的問題，希望得着讀者充

(廿二年元旦)

中國的科學工作

翁文灝

中國人近來喜歡罵自己，只見自己壞處，即使真有好處也不承認，這也不免矯枉過正。即如近二十年來中國科學工作確已認真開始，漸有進步，但大眾似乎很少能夠認識。

有一次中國科學社在某省省城開年會，照例的請了許多軍政大官吃飯。席終免不了有若干不誠意的（也是不科學的）恭維話。其中有一位教育廳長却冷冷的說道：「雖然有中國科學社，可惜中國還沒有科學。不過終希望有了科學社就會產生科學罷了」。我怪他當面譏笑得利害，却佩服他說話的誠實。

又有一次我們在日本東京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那時新組織太平洋科學理事會（Pacific Science Council），日本人不願意中國加入，他們却不是說中國沒有科學，乃是說中國還沒有代表全國科學的機關。經過我們的說明，大會也通過中國的加入了。會後有許多外國代表順道到北平

來，我們便很想使他們看看中國的科學。那時北平政府的教育總長某君設宴歡迎，他的演說起首便說：「中國那裡有什麼科學，請你們多留幾天逛逛名勝古蹟罷。」幸而人家聽不懂他的話，我在旁邊輕輕的叫做翻譯的司長把他的話改變了，免得我們自己打嘴把出醜。其實這也代表許多人的心理，以為中國講科學的也不過洋八股的一種，自己家裡騙飯吃罷了，那裡瞞得過外國專家。

幸而實際的情形並不盡是如此。中國科學界近年以來確是有點實在工作。這種工作外國學術界是狠能注意的。一九二四年英國有名的「自然」週刊（Nature）曾有一篇文章，題為「中國的科學復興」（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of China），狠稱贊中國的文化及學術事業，不過因為政治混亂狠替我們担心，恐怕不克長久維持。在中國長久的外國人向來是容易看透我們的弱點的，但是像上海的沙惠倍先生近來著論也承認中國有若干門科學確有顯着

的成績了。這並非我們引外人之言以自重，不過借以說明中國科學界真有若干人曾經或正在切實的努力，而且他們的努力已有相當結果值得社會的認識。因此我們可以知過中國的科學事業並非都是洋八股，為做官賺錢的工具，他們確有若干真正的價值。

中國人似乎很有科學的天才，所以在狼薄弱的基礎上往往能有狠特出的成績。我們初做地質工作的時候狠感覺沒有古生物人材之苦，所以特請了美國葛利普教授到中國來，於是不到幾年中國古生物誌內便有了中國人的著作了，而且不久便有狠精到的著作。當李四光先生的紡錘蟲研究及趙亞曾先生的長身介研究出版後，美國舒蓋脫（Ch. Schuchert）教授曾經寫信給我說：「想不到你們中國古生物學一來便跳到最上乘了」。當然這種成績在中國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葛利普先生常高興的告我，趙亞曾的著作如何受西洋學者的稱引，但在趙先生在滇北遇匪被害以前，中國學術界有幾人知道他的名字呢。趙先生固然是特出的人才，但自他死後，他的工作已有人能夠繼續，而且比他還更進一步了，這又是如何愉快的事。

中國科學界中很有人富於抽象力，能夠從簡略快速的觀察中得到正確的結論。譬如南京附近的地質，謝家榮先

生在中央大學教書時，只草草的觀察便已大概看清了。近來有外國學者做了一萬分之一的精細詳圖，但據他自己說，所得的結論完全與謝先生所說的一般無二。因此他對我們其他工作也相信確實可靠了。這不過就我所知道的隨便想到舉一二個例，可見我們中國人對科學工作真是大有希望，不可妄自菲薄。

其他科學如生物學氣象學生理學藥物學……都有狠好的成績，其中一部份成績還更在地質學之上。考古學也是狠有成績，歷史語言研究所安陽的發掘工作法國科學院還自動的給了一個獎金。即如比較晚起的化學與物理學，近年以來也有了若干真正的貢獻。就我所知的，即如清華大學一方面，一年之中便有十來篇專門論文在歐美有名的科學雜誌上發表。須知歐美學者衆多，科學論文非有相當程度是不容易得他們歡迎發表的。但近來中國學者的著作得世界科學出版界的登載及稱引確已屢見不鮮了。我並非故意要替我們科學朋友在此吹牛皮，我覺得近來青年心理受黑幕小說類的文章的影響實在太深了，我們應該將好的樂觀的方面也說一點給大家知道。我們也許不一定做「隱惡而揚善」的君子，但又何必一定隱善而揚惡呢。須知中國社會之中，却不是沒有進步。黑漆一團糟之中時常看

得見閃閃的光明。努力向進步方面走呢，還是跟著大家崩潰以同歸於盡呢，這便在我們的選擇了。

同時我們可以想見中國社會對於事實的認識是如何遲鈍！普通人且不必說，做教育總長廳長的人也還有一概抹殺的哩。因此認識的遲鈍，所以真正努力的人往往得不到社會的輔助，埋沒了許多真正人材，就攔了許多真正進步。如果社會的認識必須純靠宣傳來取得，那結果一定是假的壞的工作者得了便宜，真的好的反相形吃虧。但無論什麼工作都非有社會上物質的或精神的幫助不能進行，如果社會認識過於遲鈍，則這種幫助便不容易得了。

科學工作的進步於他方面亦有連帶好處。第一是教育。近幾年來的教育界固然不好的地方太多了，但大學教授標準自然的提高，似是不可否認的進步。別的方面我不知道，至少理科方面，現在已有幾個大學非有相當研究能力與成績的人斷斷乎勉強不來。試再舉幾個掛一漏萬的例，譬如北京大學的地質學系及清華大學的物理學系，這樣努力下去，跟外國大學比較也不一定差多少罷。而這樣可舉的例實在不祇這兩箇。教授既好學風自然也不容易壞。功課如果實在，學生的出路究竟也容易找。因此我感覺要改良中國大學教育，與其痛哭流涕的勸告，或朝三暮四的改

革。不如埋頭從實際工作去領導。如果各科都有真實的工作，標準的人才，假名目混飯吃的遊民自然不易立足。人選澄清了，一切事都容易商量。同時我們要提倡公平無私的輿論，拿實在成績做唯一標準，不必怕得罪人，但也不要怕稱贊人。只要輔助得好人上來，好的工作做得出，壞的份子自然減少，壞的現象也自然消滅了。這種看似迂曲的路，也許比滿街空喊救國的倒多有一些實効。

本來西洋近代文明差不多全是建築在科學基礎之上。不但科學的知識，而且科學家的人格也往往足為青年的師表，社會的模範。中國向來更是全靠人格感化做社會重心的。例如明之王陽明，清之曾文正，都曾為一時七大夫鼓舞向上的源泉。但是從前所謂理學，所謂道統，當然是不合時宜了。如果中國有科學家，立身行己，處世接物，表現出真正科學精神，足以引起社會的景仰與效法，他的影響到是很大而很好的。這不是開倒車，這是走正軌。中國科學興起甚晚，這樣的人物當然還不容易產生。但是我們也不是沒有很可佩服的人。不揣冒昧，再舉一例以實吾言。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學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來忠于所業，從未外騫。學校散了，沒有薪水，他一樣的努力工作。經費多了，待遇高了，他也是這樣的努力工作。標

本有所得，他便盡力研究。研究有所獲，他便從速發表。他的工作只求一點一滴的進益，並不追求鋪張揚厲的虛聲。這都是真正科學家的態度。他對於後起的學者不但盡心指導，而且盡力的拿好的材料給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幫助他。因為有他這樣的人格，所以養成中國許多動物學家，莫不仰爲宗匠。固然，中國生物學工夫未必沒有勝過秉先生的。後輩勝過前輩，本是當然，也正見中國科學界的進步。後起的學者原應該就自己的工作追過前人，不必以前輩的缺點限制自己，而且更應該想到各種工作開創作始的艱難。誠然，秉先生專對於中國生物學工作略有偏重，尙可改進，如汪敬熙先生近來在本刊所指出的，我也不是完全沒有同感。不過我以為這並不是任何人的過失。現在像秉先生一類工作之特別發達，正可證明他的工作及人格的感化力之偉大。如果他方面或別的學科也有人能像他一樣的一面努力工作，一面提掣後進，當然也能够一樣的發展了。

不過科學事業在中國的確不是沒有很大的困難與危險。最大的危險，是像許多中國事情一樣，在他的意義與價值未被認識時取不到必要的同情與幫助。等到大家認識以爲好的了，便成爲一時時髦，大家來湊熱鬧，掛羊頭賣狗

肉，弄得喪盡信用爲止。『研究所是可以同衙署一樣地變成一羣無業遊民噉飯之地的』。（汪敬熙先生語見本刊第二十六號）。所以我們希望中國科學發達，我們却也並不希望科學機關發展太快。『有人之後才能設研究所，絕對不可以先掛出研究所的招牌，然後再點着燈籠去尋人』。（亦汪先生語）。

汪先生所說提倡科學研究應注意的事（本刊第二十六號），以及他對於科學出版物的意見（見本刊第十九號），都是很有見地，希望國內提倡科學的人們格外注意，庶幾萌芽之業克見光大。我嘗想中國科學家除科學工作的本身責任之外，還有二種責任。第一是在世界科學界中取得應有的信用及地位，因爲外國科學家對於中國科學工作究竟還免不了若干輕視的積習。一部份原因不過是先進懷疑後進，從前西洋人對日本人也是如此。我們必須拿真正的成績，來證明我們中國人的能力。還有一部份原因也是我們工作的本身價值參差不一，尤其是發表的方法及形式，太不講究，不足以引起人家的注意與重視。在這一點上汪敬熙先生所說的『以機關爲主體的雜誌太多，』真能說著現在的通病。日本自從設立學術研究會（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之後，全國科學發表的重要

論文都集中在幾個 Journals 之上，便是這個意思。中國地質學會會誌亦是這樣的，彙集各機關或個人的貢獻，而各自注明其來歷，至今已滿十一年了。第二是應該對國內證明科學工作的意義及價值。現在一般社會對於本國科學工作認識的缺乏，也要怪中國科學成績的表現實在還太少。但近數年來中國所費的科學設備之錢實已不算甚少。有一家外國洋行的經理人曾對我說：中國各大學及研究機關購買科學儀器的設備費，有一時幾乎超過全國工業的機器輸入。所以有好幾家洋行營業迫得舍彼就此。中國科學家如此加重社會的負擔，試問所得的貢獻是否足以相稱？如

提倡自然科學教育的幾件急務

施行自然科學教育，好比旅行似的，預先得有一個打算，基本的需要是些甚麼，要準備的又是些甚麼；不然，路上生出種種麻煩，反到不如回頭另準備的好。回顧我們這幾十年來提倡科學教育的情形，就有點像旅行未準備得好的樣子。我們所做的，好似一天一天的只在討論旅行的必要，和描寫人家旅行中的興趣，同時亦喊着，走！走！，倒無暇討論一個進行程序，更未去顧慮那途中必得準

III 所得少，當然一般社會視為贅物，失其信用了。這就是說中國科學界必須極力避免重複的非必要的設備，而盡力利用已有的設備，認真的多做出工作來，如此方能值得社會的幫助。

我們不可妄自菲薄，我們却不妨求全責備。中國科學工作從許多方面看來，實在還是幼稚得很，有許多出版物的確可惜他印的太早了，缺少必須的審查與修改。但這種毛病都是初期發展不可避免的現象，可以留給科學家自己去討論，不

八家多費心。

孫學悟

備的東西，或者虛心的去翻閱人家行程日記中有甚麼原則，我們可以效法的。可是每想到或者望見人家到遠山青水秀的地方所得的快樂和益處，自己心中不免慌跳起來，不願一切條件便擬起程飛跑直追。其實長途旅行就是這樣簡單的嗎？只背着一些從雜貨店買的罐頭食品，穿着很漂亮人造絲襪子，你才能跑多遠呢？

這路程既然是我們民族必得走的，那就不如及早平心

靜氣的去成就一些旅行中急需的人才，準備幾種日用品必需品的製造，使多數人都能購得一份，結起隊伍來走。這樣一來，設若途中有不幸而死亡的，尚能有人接着前進，不至於半途而廢再重新打算。如何設法成就這種人才，如何準備這基本日用品必需的製造，依我看來便是當今中國自然科學教育上的急務。

我們先討論這人才問題。科學教育事業上的情形和一個裏工業上的情形頗有相同的地方，實際工作的效率全得依靠中級的人的努力。有人說得好，設若把歐美各國工業裏中級的人突然拿開，他們的工業立刻即得墜落。其實科學教育事業上的情形又何嘗能逃出這個道理！而且科學教育上的其餘一切人才都得從這中級選拔。中級的人的工作是通上接下的，是維持科學事業繼續前進的要素。科學教育的實行都得經過他們的手。他們在試驗室裏與學生接觸的時間多；對於學生的心理，興趣以及學生的困辨比別人認識的深。試問外國的大學教授有幾位不是從助教升上去的？再試問我們大學的教授有幾位是從助教升上去的？怕這一點是我們的教授和外國大學的教授的資格上一個根本的區別。這區別的影響使我們社會生出一種很不健全的心理：一，當助教的人好像被人貼上一個相棋上的「兵」

字號，任憑你建了甚麼功勞，終身得當「兵」，除非你改行；二，一個人只有外國大學的一張文憑，任你怎樣，亦可當國內大學的教授。這樣一來，中國科學教育界根本上遺留下一種不通的狀態，你永久做你助教的事，我只曉得演我話匣子式的教授生活，上不接下，下不能接上，弄成一個上火下寒，中焦積鬱的局面。中國辦了幾十年的科學教育，迄今未曾改變這種無道理反教育的風氣，豈不是可怪的吗？這風氣若不趕緊改革，真正科學教育上的人才是不會養成的。一般實用人才是得由國內教育機關助教地位訓練出來的，不是自己能以省事而讓外人替我們成就得好的。

我們科學教育上的日用品直到如今還沒有甚麼統一的準備，這豈是偶然的嗎？提到這日用品——基本科學課本和簡單器具，更感覺到我們犯了「學而不思」的毛病。回想我們費了幾十年的工夫提倡科學，化了鉅數的金錢，備妥的日用品必需品在那裏！試問我們有幾本真正適用的小學中學科學課本？或者有了，我未見過！可是我所見的都是「做」出來的，並不是由本地「生」出來的，更不是從教學經驗中一年一年的集成得來的。

中國未達到根深蒂固的時候，適用的課本當然

是急務之一，但教員學生能多利用自己的手製造簡單儀器來證明科學原理尤為要緊。簡單儀器的價值倒是一件小事，然而牠的影響確是一件大事。因為科學必得試驗，試驗必得用儀器，儀器應當用手做，所以除了無處不引用手的一個根本道理以外，尚有幾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不能不偏重這種主張。因為

(一) 中國「士大夫」向有一種輕視用手的心理。凡備有形體的東西，別人做好了，他未嘗不樂用，但自己却不肯用手去做。這種心理，這種態度，惟由試驗室裏的工作上，才能期望消除得去的。不然，不但科學教育在中國失去本身的價值，即科學的真性亦怕漸漸的弄到主觀化的田地，被人當着甚麼美術品看待了。

(二) 自然科學是研究「物」及其原理的。因為要研究物所以要與牠接近。可是一般人的心理，都有一種不「與物為伍」的成見。那知道素日因為我們不與物接近，等到用着牠的時候，如當國難危急的今日，他就會不隨我們的心願了，難道我們還不醒悟「禍自何來」嗎？

(三) 藉以養成學生有創造的自信力。因為學生在學校裡未曾受過可以有自信力的訓練，例如無應用極普通物件做簡單儀器的習慣，畢業以後，只能把所學的用口來說

一說，把原理教他的學生用意去會一會便算了事。即使所在的學校經費充足，這畢業生亦只能夠效法老師的辦法，由海外購買幾件莊嚴的儀器罷了。這樣一來，經濟上的損失尚屬小事，給學生遺留下一心理——或者連科學原理亦只生產在外國——這倒是一件大事。

這訓練教育工具製造的主張，本來是施行科學教育進程中必得演的一幕；不過因為我們處在特殊心理環境之下，得更貫徹的努力罷了。這基本工具的創造是得大家協力去作的。要使這使命早日完成，全國的研究機關都有供給資料的義務。科學教育與研究事業是二位一體的，分開不了的。

結論起來，我們現在深刻的覺悟以前那自然科學提倡方法的籠統，未預定一個有時間性的程序，又未判別進展中步驟的先後，只觀察歐美科學發達的現狀，未注意其發達的來歷。換言之，只看過各科學發達歷史的橫斷面，未暇分別檢察每一種的豎斷面。結果，我們幾十年來，栽培了一棵無根而望枝葉茂盛的自然科學的樹。我以為這樹木不結果，不是因為我們後人無福氣，是前輩「失其養」所以不長了。現在培養這根本的急務，便是我們的義務，不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永久不會甚麼進步。

這急務就是：（一）培植大學的助教；（二）提倡自己搜集科學教材的工作；（三）獎勵各級學校教員編輯自己用的基本教本；（四）獎勵教員學生從事簡單儀器的發明及

教育罪言（五）

旭生

製造；（五）提倡科學教育工具博覽會。教育方針，將來無論如何改變，這急務是得要首先進行的。

十二月三十日於塘沽

上一次我談及教育腐敗而應該由古人負責的兩個重要原因，那情形已經很嚴重了。由于書本的流古，好像把人關在不見天日的繡房裏面，他雖不見得立時病倒，可是面孔蒼白無血，身體疲軟無力，一點發育滋長的氣象也不能有。由于好舒服的流古，就像毒菌充滿血液，麻痺了全身的抵抗力。止等候外面些微的感冒，就可以引起體內的蘊毒狂熱。在這個時候，如果有洞明脈理的良醫，將養保護，注之以血清以遏其病菌之蔓延，漸漸使之習熟于風日以增加其抵抗力，亦未始不可恢復其身體的健康。如果毫無覺察，漫不小心，更狂嫖亂賄以助其毒菌之烈燄，則病體委頓，臭惡四溢，將有使人不能不掩鼻而過者。不幸現在的教育頗似後喻。我們再將教育腐敗的應該由現代人負責的幾個重要原因，分析如下：

三、環境奇劣。環境一詞包孕宏富，凡非在教育界

自身，應由教職員及學生直接負責的事項均屬此類。約略論起，可分三方面：（一）家庭方面；（二）社會方面；（三）政府方面。

先論家庭方面：我國舊日家庭制度，對求學問，不甚適宜。在從前科舉時代，還可勉強對付；到這一種與社會經濟情形完全不合的學校制度成立，兩方面精神的抵觸，才完全顯露出來。我們在外國，看見不少初在大學畢業的青年，單身一人，自身謀得最小限度的生活費，以其餘暇在圖書館或實驗室中研究。將來學術界的偉人，有不少是這樣成功的。可是在我們中國，這條路就幾乎行不通。大學畢業後，每月至少非有一百八十塊錢就不能够生活。想拏這樣多的錢，就不得不拚命去教書，向前研究的工夫全被佔完。這是因為我國的青年特別的貪婪或懶惰麼？少有一點，却不盡然。當他們求學的時候，家中已經供給得筋

疲力盡；雖畢業還遠，家中早在那裏希望著了。這在道德方面，也萬不能不顧及。即使家中還有飯吃，不立刻希望擊回錢去，而弟弟妹妹的學費，父母已經無力再行擔負，不得不卸到老大哥的身上。並且中國人自來有早婚的習慣，本來大學已經畢業了，標梅之期已經少過了，當然應該趕緊結婚！再說，這幾年的青年，因為社會的大不景氣，眼前沒有什麼理想的光明來引誘了，除了物質的享受，還能有什麼慰安？剛出了學校門，父母，弟弟，妹妹，愛人，子女，仰望著一個人的就有一大羣，正好拚命的拉套，拚命的拏錢，那還談得上高深的研究？加以內亂循環，農村破產；自稱的大學，把畢業生無限度的製造，生產過剩，每年失業的畢業學生，以數千百計，益使青年心怔神駭，惆恍而無所主。大家常怪各大學在校學生，對於熱心辦學，無暇顧及學生畢業出路的教職員不知愛護，而常找出幾個無聊的政客作校長，覺得這些真是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其實，他們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間，其舉動固然笨拙可笑，而其情亦堪憫矣。上面所說的各種原因，除了婚姻一事，內中一部分的責任應由他們自己負，其餘一切等等，也不能怪他們的自身，也不能怪他們的父母家人，幾千年沿襲來的家庭制度，也未見得完全錯誤。這樣的

責任，除了歸之于與社會情狀完全不相合的學校制度而誰歸！

再談社會方面：這方面，一言以蔽之曰：麻木而已，無制裁而已。我國人本來偏重消極，不積極作惡的人頗多，而孳孳為善的人亦少，「各人自掃門前雪」。社會的制裁力已經很有限。又加以思想方面的大變化，大混亂；既有中國舊思潮和外來思潮的衝突，而外來思潮中又分兩個極有勢力却絕不相容的思潮。社會本身的蛻變，思想的大衝擊，全聚在這個時候。中國四千年的歷史裏面，很難找出一個時期可同現代相比者。社會理想（*ideaux sociaux*））廷樹不起來，還說到什麼制裁力？復次，大學中應該有生活的練習，人人應該對於政治有相當清楚的觀念，所以大學中不能禁止學生入黨。但是，學校為研究學問的地方，並不是作政治活動的地方，所以不能獎勵他們，利用他們作政治活動。可是我國自民八以後，學生牽入了政治的旋渦。民十四五以後，更進而作實際的工作。對於革命雖稍有補益，而學業日滋荒疏。事畢歸校，隨班聽講已感困難，而生計迫之，社會迫之，不得不要求畢業。依原則言，國家如認學生為有勞，按績給獎可也；至學校的文憑，則為證明真學問的充分，並非酬勳的東西，何能隨便

亂給；可是時勢所迫，有不能不遷就者。並且這一班的先生，雖說學問沒有得到，他們在社會上的活動能力——並不是服務能力——却是不小，所以他們畢業以後，頗能得到重要的位置。盲目的社會，震眩于其暫時的成功，而忘却其本身的空疏。歸結，大部分的學生以為不必工作，不必讀書，止要會亂出風頭，混過四年，出了學校門以後，就可以不怕失業。在這樣的空氣裏面，想同他們談什麼高深學術的研究，豈不是空中栽花！加以近三四年來，農村破產的情形，日漸尖銳。學生在校的時候，對於畢業後的生計問題有不能不焦慮者。可是他們鎮日所聞見的，不過是：甲不學無術，却得優美的位置；乙貪婪偷錢，已成不

受制裁的富豪；丙荒淫無度，却屬黨國的要人；……。這樣耳濡目染，就是有道德高尚積極負責的教職員為他們的帥表，已經不容易範後生小子的身心，納于軌物，而況今日的教職員，既不能同化社會，却差不多全由惡濁社會同化者乎。

（未完）

附上期『教育罪言（四）』正誤：

頁	行	誤	正
八	下七	什麼麼	什麼
八	下十	重大	重大原因
十	上七	辛幸	辛辛
十	上十	思理	思想

漫遊散記 (十三)

丁文江

雲南的土著人種

●蒙自個舊的土人——儂人——獯夷——

黑苗——獬雞——獬獠——土僚——獬獠

自從我宣統二年在貴州遇見仲家和苗以後，我對於西南的土著人種就發生了興趣，很想有機會研究他們。但是民國三年再到雲南的時候，因為走得太匆忙，一切都沒有

準備，而且那時專心注意地質鑛產，對於人種也幾乎忘却了。直等到我從個舊到龍樹脚，方纔再遇見這種土人。

龍樹脚原名龍樹邑，在個舊東南四十多里，蒙自西四十里，是前清道光以前很有名的銀廠。現在銀廠雖然完全歇業了，因為地點在蒙自個舊兩個大城之間，而且有歷史的關係，仍然是一個很大的街子。我于民國三年三月十七

日到那裏，恰巧逢着起街。滿街上都是異言異服的人。最足以引起我注意的是儂人。他們男子的服裝和漢人一樣，不容易區別。女人則大不相同。上身所穿的是小袖的短襖。大襟上面沒有扣子；從左面斜圍到右面，纔用兩個扣子，扣在右面腰間。這種長領和尙式的襖子，和我以前在貴州所見的大略相同，但是靠頸項的地方，領子忽然變爲圓的，把喉下的部分完全遮住。大襟的上邊，從圓領子底下發生，再向右斜圍過去。大襟，圓領，和袖口都有鑲邊。短襖的下面，是一條百褶的長裙子，上下兩種顏色，束在短襖的裏面。最奇怪的是她們的帽子。額頭上扎着一塊繡花的包頭。包頭上面戴着一個圓布帽子，一直遮到耳朵上部。帽子似乎沒有頂蓋，因爲上面是另纏着一塊長布，在前面斜裹成一個十字，把頭髮完全遮住。有幾個還帶着一寸多口徑的圓銀耳環和很重的銀手鐲子。

人數最多却是儂夷。但是他們看見我要照相，紛紛的逃避，不能詳細觀察。只見他用青布纏着頭，遮沒了頭髮。上身也穿着短襖，裙子也是百褶式的，但是束在襖子外面。領子的後面有一塊方布，四邊繡着花，把背脊上部和兩肩的一部分遮住。

此外還有黑苗。她們的衣服完全是長領式的。喉下

胸上完全露在外面。大襟沒有鈕扣，因爲上襖的下部束在百褶裙子的裏面，裙帶就當做腰帶。帽子是一個上大下小的圓套子。套子上織得有十幾條狹邊。頭頂上用一塊布扎上，布的下部與帽套子相連。

以上這些人大部分赤着脚。偶然也有幾個穿了草鞋。

三月二十二日我從個舊向賈石龍走。在哨谷村的附近，遇見着一個猓雞女人。她却和龍樹脚的儂夷態度剛剛相反。她先走過來用很流利的漢語給我說話要求我給她看「西洋鏡」——我的照相匣子。我就趁機照了一個相。她看了半天，不得要領，纔失望的走開。她的裝束又和別種人不同。上身是一件長襖，一直拖到膝蓋。下面是雙管褲子，沒有裙子。長襖上面着一件背心。背心用紐扣扣住。背心的前面有一個圍裙，用兩根帶子，掛在頸項上。頭上用一方短布遮住頭髮，脚下穿了草鞋。最奇怪的是她遮東西的方法：一個口大底小的竹籃，一面靠在背後。一條長皮帶子，兩頭扎在竹籃的左右；皮帶的中部却担在她額頭上，所以竹籃的重量，大部分在額而不在于背！我的挑夫告訴我這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時候留下的制度，來懲罰他們的！

四月八日我從個舊到蒙自，看見幾個漢獠。她們大概

是着的盛裝。身上穿了三件衣裳：最裏面的袖子最長，但是也到不了手腕，上面一件袖口恰到肘灣，最上一件只到腋下。每件的袖口都鑲得有花邊。領子是圓的，但是大襟用兩根帶子札着，沒有紐扣。衣服很長，不穿裙子，但是從頸項上又掛下一條圍裙，遮在衣服的前面。帽子尤其古怪，前面的頭髮是從兩邊分向後的。離額髮交界一寸多戴着一條包頭。包頭上面有一個七八寸高的竹弓，頂着一個長布口袋。口袋下部和包頭連接的地方，扎着好幾串用綿線做成的鬚子。挂在耳朵旁邊。

在蒙自附近又看見土獠在田裏工作。她們的裝束，一半像獠，一半像獠。衣服有兩件：裏面的袖子長而小，外面寬而短。領是圓的，大襟用紐扣。下面着雙管的褲子，前面也有從頸項掛下來的圓裙。帽子是一個單簡的布套子，

最後我在婆西車站看見幾個獠。她們的裝束差不多完全和土一樣：上身穿長襖，圓領，用紐扣扣襟。下面是雙管褲子，不着裙子。帽子也是平頂的布套子。

以上所講的七種人照他們的服飾，可以分爲三類：第一是黑苗。他們是穿純粹長領式的衣服，上身的襖子比較長，束在百褶裙的裏面。第二是儂人和獠夷。他們的衣

服在長領圓領之間，上身的襖子很短，百折裙束在襖子的裏面。第三是獠，獠，土和獠。他們的衣服全是圓領的，下面不穿裙子，穿雙管的褲子。前面有從頸項掛下來的圍裙。

以語言而論，也與上面的分類相同。苗語自成一類。獠夷和儂人都是台語（Tai）——就是所謂夷人。獠，土獠和獠說的話都是獠的分支，就是所謂蠻人。據蒙自縣志，除了我看見的七種人之外，蒙自境內還有獠子，沙人，窩泥三種。獠和沙人都與儂人，獠夷相近，都是蠻人。窩泥與獠相近，都是蠻人。蒙自縣志是乾隆五十六年修的。其中夷俗一門，列舉以上各種土著，而單單沒有講起苗家。據我所知滇南的苗族大抵是乾隆以後的移民，不是土著，所以他們生活最苦。縣志可以做一旁証。

以體格而論，除去苗族身材極低與他族不同外，其餘的雖然言語習俗不同，其實種族上似乎沒有甚麼分別。個人的意見窩泥、獠、土獠、獠雖說與蠻語相近的話，恐怕原來都是蠻人，因為漢代蠻人南侵，被獠征服，纔說蠻語。惟有所看見的獠，長得特別的醜——顴骨特別的高，嘴唇特別的厚。但是這也許是偶然的。就是所謂獠也絕對和大涼山的真正的獠不同，恐怕也是蠻人而變化

的。彝人和僂人是雲南土著中的兩大民族，僂在北而彝在南。以前的土司都是這兩族人做的。

武定的土人——麥岔——獠獠——羅婺——苗

我于民國三年四月十三日回到昆明。因為要向迤北，迤東作長期的旅行，在昆明購買牲口，僱用僕夫，耽擱了十天。在這期間我請雲南兵工廠給我做了一付量圓體徑的曲足規（Callipers）。當時我並沒有帶任何人種學的書籍。只有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旅行者的指南」Guide to Travellers 上面有一小部分講研究人種的方法，附得有傅勞額Flower的曲足規的圖樣。兵工廠就是用這圖仿做的。再加上幾件普通測量用的儀器測桿，皮尺，就是我研究人種粗淺的工具。

我於四月廿四日離開昆明，經過富民縣沿途耽擱一直到四月三十方到武定縣。武定在明時是一個土知府，前清改州，民國改縣。在迤北總算是一個重要的城池。到武定的第二天，就遇着趕街子。街上大多數是麥岔。但是我知道太遲了。等了我趕到，街子已經要散。他們看見我穿着旅行的外國衣服，拿着照相機，立刻嚇得四處亂跑，不多時街子上就看不見他們的踪跡。我只匆匆的看見一眼，覺得麥岔與我在蒙自所見的人種，體格上沒有甚麼分別。男

子的衣服和漢人一樣。女人只看她們着得有裙子，衣服似乎是個圓領的。言語則更沒有機會研究。幸虧縣裏的一個差役告訴我麥岔人自稱為格泥。我纔知道他們也是僂人——至少是說僂語人的，因為法國教士衛要爾Verrier所研究的獠文字，就是從格泥人得來的。即此一端，可見得考證雲南土人種族的名稱很是困難。

我有見武定的縣長張先生，告訴他我研究人種的目的，請他幫忙。他說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武定縣屬有一個環州土舍。土舍和他的親族是羅婺，是貴族；所管的人民是獠獠，是奴才，只能做佃戶，不能有土地。目前這位土舍行爲很不好。他所屬的獠獠到縣裏來告狀，反對他們的土舍。我要研究獠獠，當然可以叫他們到我寓裏來果然我回到寓所不多時就有十六位獠獠光降。他們的裝束完全與漢人一樣。為首發言的一位，說的很好的漢話。因為蔡松坡在雲南實行徵兵制。徵兵的時候，每縣應照各村落的分佈向各村徵派人來當兵。因為如此，所以凡窮鄉僻壤的人，都有機會加入。徵兵的服務期限是二年。二年以後，退伍歸家，作為後備兵。這一位獠獠就是民國元年被徵去的兵，新近退伍回來。他在軍隊裏兩年。眼界當然高了許多，所以就當了反對土舍的首領。

我問他們爲什麼要反對這土舍。這位退伍的兵士說道：「從前的老規矩，我們獵獮是奴才，他們羅婆是主人。

田地是他們的，我們只能當他們的佃戶。不但田地如此，而且我們的生命財產一切都在主人手裏，他要我們死，我們就不敢活。現在的這一個李士舍，年紀很輕，遇事胡爲。向我獵獮照例的要錢還不算，而且常常到人家來騷擾，甚至搶奪人家的婦女。前幾年來了兩個基督教內地會的牧師，一個姓郭，一個姓王。到獵獮地方傳教。他們看見我們受羅婆欺負，很爲不平。這兩年來許多獵獮都入了教。漸漸不肯聽土舍指揮。李士舍因此常常派差役到這種村子裏來拿人去亂打，所以我們纔到縣裏來告他，請縣長保護我們。

我趁機請他們給我測驗身體。他們很懷疑。幸虧這位退伍的兵士向他們說，他在軍隊常常幹這個頑意見，他們就勉強聽我調度。所測驗的結果如下：（十六人平均數）

公分

身高	一五九，八〇	頭部指數	七八，一
頭長	一八，〇二	胸週指數	五二，二
頭寬	一四，〇五	足長與身高	一五，七
頭週	五六，三一	手長與身高	一二，〇

胸週	八三，七〇
足長	二五，〇〇
手長	一九，二〇

他們又告訴我內地會在武定一帶的大本營在武定城西的洒普山。歇了幾天，我特別到那裏非訪這兩位牧師他們的教堂和住房在洒普山的西坡一個花苗的村裏。建築雖然很單簡，裏面的陳設佈置却是很潔淨。一位年老的郭牧師英文名是 Brooks 是澳洲人，到雲南已經多年，能說中國話和苗話。還有王牧師夫婦是新結婚從英國來的。郭牧師穿的是中國衣服，人極其嚴正。看見我似乎不很歡迎。王牧師夫婦還是西裝，很高興的留我吃茶。我說明我的目的以後，郭牧師倒也極力幫忙。但是下午的時候所有的男人都到地裡做工去了。只有幾個婦女在家。測驗體格眼見得是做不成了。郭牧師把在家的婦女叫了四個來。穿上了他們禮服盛裝，給我照相。這四位都是花苗，都是已經出嫁了的，但是只有兩個生了孩子。這兩個把孩子揹在背上，用兩根繩子交叉于胸前，完全給日本人揹孩子一樣。頭上都沒有帶帽子，但是生了孩子的兩個把頭髮在前面結成一個四寸多長的角高高的豎在頭上。這是婦人已經有孩子的記號。其餘的兩個把頭髮平盤着。有一個前面還剪得有「

劉海。」渾身的衣服和貴州的花苗一樣，但是華麗的多。

除去普通的長領花衫以外，還被上一件花外套，極大的袖子不過到肘灣。上邊全是紅白相間的花紋，有一位腹部裙子外面斜束一硯四方的紅花布。裙子也是花的，札在長領衫子的上面。腿上是花布裹腿。脚下三個穿的草鞋，一個穿的布鞋。大概布鞋和前「劉海」都是模仿漢人的時裝。

據郭牧師說花苗來到武定不過二百年。都是因為雍正以後東川的獠獠被漢兵殺完了，從貴州西部移民過來的。

從酒普山回到武定，我又向武定西面的舊山箐去看銅鑛。那一帶是青苗的村落。到那裏由縣裏的差役領我住在一位青苗的村長家裏。這位村長是青苗中的首富，是很有體面的人，漢語也說得很好。他住的是瓦屋樓房。房子上房一排有五間，很好的木料，但是門窗都很簡陋——窗子是單有豎的長格，而且也沒有糊紙。樓房很低，大部分是堆的包穀（玉蜀黍）上房面前是個院子。院子左面是門，右面是豬圈牛槽。院子裏堆得滿的糞土。

這位村長聽說我要測驗體格。到村子裏面找了十個人來，可惜我到得很晚，又還有其他的工作，匆匆只測驗幾點（十個人的平均數）：

頭長 一七，八公分

頭寬 一四，五公分

頭週 五五，二公分

頭指數 八三，四

他們男子的衣服大抵與漢人一樣。女子用青布纏頭。上身穿的是沒有鈕扣的青布長領衫子。下面是一條青布裙子，束在衫子外面。大部分是赤腳，偶然也有穿草鞋的。

據村長說他們是明末從四川移過來，原來也不是土著

我因為聽說環州是個土舍，是羅彝人的中心，就決心繞道環州再到元謀。從武定到元謀的大路是一直向西的。到環州則須繞道西北。我于五月七日從武定起身經過母西村，石臘他，糯谷，阿洒拉於五月十二纔到環州。上列的村子，都是獠獠。男子的衣服大抵與漢人一樣，女子則穿半圓領的衫子，百褶長裙。但是衣服大部分是麻布的，織物是奢侈品。他們的生活極其可憐，因為他們不會種水田，都在山坡上種包穀小米，蕎麥，所以還不如種稻子的苗家。近幾年都信了基督教。在石臘他就有極簡陋的教堂。

獠彝人的窮苦，我在糯谷村看見得最真切。我那天到得比較的早。他們的住房不但是土牆茅頂，而且家裏的豬

圈牛槽，與住房相通，五月裏的天，沒有法子可以安身。我于是住在我自己帶的帳棚裏。我的馬夫來告訴我，村裏人不肯賣料給他。牲口只有草吃，明天恐怕不能上路，我把村首找了來，先給他一硃錢請他幫我買包穀或是豆子喂牲口。他搖頭說道，「大人！我們自己吃的糧食都沒有，實在買不出來。」我再三央求他，他纔答應想法子。但是去了許久沒有回信，太陽要落的時候，我忽然看見來了三匹驢子。騎牲口的人，一跨下來，就有人招呼，把牲口接了過去。不多一刻，就有人拿了一大斗包穀喂牠們。我看见了，很生氣，立刻把村首叫來，質問他道，「你說拿錢買不出糧食來。爲什麼這三匹驢子一到就有料可喂而我來

了半天，牲口還餓着？」他哭喪着臉回道，「大人！這三匹驢子是環州李士舍家裏的。我們是他的下人。他又是有名的凶神。沒有事還要拿人去打。我們就是餓死，也得給他喂！」我問他道，「他是不給錢的。我拿錢向你買，你爲什麼不賣？你有錢不好再去買回來嗎？」「大人！你那裏知道我們的苦處！村裏頭沒有那一家有餘糧的。賣給你以後要再買，非走幾十里路趕街子不可。街子上糧食又貴。路又這們遠，來往要兩天，所以大家都不願意」。我立刻又拿了一塊錢給他，說了許多好話。他纔給我弄了幾斗包穀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報目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郵費」每月一元
 「國外郵費」每月二元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另議

胡公超 葉實秋 梁上沅 余允旦 潘隆基 羅洵美 邵洵美

主編 的 新 月 期五第 卷四第

紀念志摩 春雨 窮袴 橋 詩(七篇) 醫生

秋心遺稿 豈明 廢名 臧克家，卞之琳 方瑋德，莫辰 沈從文

松尾芭蕉俳句評 我們爲何和如何寫小說 論翻譯的一封信 書報春秋(二篇) 海外出版界(三篇)

傅仲濤 李冬辰 梁實秋 張岱年 灌嬰 寧超 白公 中書君

每本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華 藝 文 刊 月 半

創刊 出版 白 的 次 目 期 本

發刊辭 某日的怨望 祖國之一角 戰區之結尾 快樂的結尾 南旋談叢

菲村 小平 鶴子 零心 良濤 劉枕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定價：每期三分。 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連郵六角；半年三角。 國外加郵六角。

北平：訊通 院學法學大平北 轉房號院二第

行發店書月新 行發店書月新 行發店書月新

假如我是蔣介石

丁文江

自從日本攻擊山海關以來，全國人士又紛紛的宣言抵抗，連許多軍人也打電報請纒。但是抵抗強敵不是發宣言打電報所能發生效力的。假如日本再向昌黎灤縣進兵，

心，堅固的團結，縱然抵抗，決不能發生任何的影響，縱然局部有短期的效能，決不能防止全部分的瓦解。

在塘沽上陸，佔領天津，並且利用東交民巷的守衛來擾亂北平，我們的當局應該用甚麼方法來保全將失未失的國土，——縱然保全不了國土，至少要保全國家的人格，使敵人不能長驅直入，使他受相當的損失，使世界知道中國人對於國土是不肯輕易放棄的，——我們還沒有看見有任何具體的討論。

我先說明白的認識，因為決心和團結都要從認識來的，我個人向來極端唱「低調」的：我向來主張中國遇有機會，應該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之內與日本妥協。並且應該利用一切國際的關係，來和緩我們的危急，來牽制日本使牠與我們有妥協的可能。不幸我們把幾次難得的機會都喪失去了；國際的形勢又因為其他的複雜問題有于我們不利的趨勢。等到日本公然的承認滿州國，積極消滅黑龍江的義勇軍，我們就知道日本一定要有進一步的舉動，

到今日而言抵抗日本，談何容易？平津到山海關是一片平原，無險可守；所有日本人儘有而我們全無的武器在這平原上面都可以發生可恐怖的效率。日本人完全掌握遠東的海權，渤海是等子日本海軍的演武湖。一旦有事，秦皇島隨時可以上陸，斷我們軍隊的後路。北方軍事最高機關所在的北平還有幾百日本兵守衛。不必說北方的青島，烟台，海州以及南方沿江沿海的城，是日本人俎上之肉。在這種情形之下若是我們沒有明

認識絕大的決心，我們出兵就是挑釁。但是這種主張我們能承認嗎？我們

若是把與河北唇齒相依的熱河省，不發一兵，拱手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能保全察哈爾·綏遠嗎？我們能堅守河北省嗎？譬如山海關被日本佔領以後，日本政府說這問題可以地方解決。只要中國兵退到昌黎，讓「滿州國」的警察佔領山海關，日本就不再進兵。表面上看起來，我們立刻屈服了，可以得一時的苟安。但是幾個月以後昌黎依然會發生衝突，我們得退到灤縣。灤縣將來一定發生同樣的衝突，我們得退到天津。如此則每次日本只要犧牲一百二十個官兵就可以佔領我們一大片的土地。我們變成一大塊肥肉，被日本人從從容容的，一刀一刀的割去，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吞下，舒舒服服的消化掉。這樣便宜的事日本人豈有不來？這樣沒出息的國家，還有誰肯援助？

這不是我們的幻想，是稍懂得日本軍閥的計劃的人所不能否認的。日本軍閥有這種計劃原不從今天起的。起初也不過是少數人的幻想。其後在東三省處處順手，處處不費氣力，他們纔要把他們的幻想整個兒來實行。要不是義勇軍擾亂，馬占山，丁超，李杜，和蘇炳文的反抗，熱河早已有日本兵的踪跡了。我們的軍事當局不于蘇馬沒有失敗以前向熱河進兵，是很大的失策。到了今天，若是依然以苟安為目的，這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

我們是極端反對自殺的。任何國家，無論環境如何困難，都要有決心在萬死中求生存。我們要明白的認識下列的事實：

(一) 日本是得步進步的。決不是割一小塊土地，就可以保全一大塊土地的。他們是要實現「全亞洲」主義，和「亞洲主義」的。我們越不抵抗，這種主義越實現的快，越有實現的可能。

(二) 日本的實力不是無限制的。要併吞中國不是可以不計代價的。我們唯一的生路是盡我們力量來抵抗。我們不能保全國土，我們至少應該使敵人出最高的代價來買他，不能拱手的奉送于他。如此方始能使我們的敵人反省，他所要買的土地價值是否太高。

(三) 我們無論如何抵抗，是不能希望日本因此而放棄他的計劃的。我們要生存，還得要靠國際的均勢。但是要人帮忙，先要自己幫自己忙。個人如此，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只要我們肯犧牲，有犧牲的辦法，得到犧牲的成績，我們不怕沒有人援助的。若是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土不甚愛惜，而反希望傍人來替我們抵抗，天下那裏有這樣便宜的事

件？

如果上面所說的話是對的，我們主張抵抗，不是唱高調，是唱最低的低調，不是憑一時的情感，是用充分的理智，不是謀自殺，是圖生存。把這個前題認識明白了，然後纔能有決心，有辦法。

假如有了認識，有了決心，辦法在那裏呢？要知道我們要提議具體的辦法，不但先要知道許多未經公佈的事實，而且要了解握軍政權人的心理和能力，不然，空言的辦法，是決不能實行的。不過假如我是蔣介石，我的辦法如左：

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自從九一八以來，南京政府常常以舉國一致相號召，並且對非國民黨的人表示願意合作。但是南京政府依然是黨政府，黨的內部依然是四分五裂。在這種情形之下，非國民黨的人有兩種感想，使他不能充分的合作。一是覺得政府沒有誠意；政府當局和他們共過患難的黨人，在這種危急情形之下，仍然不能澈底的放棄私怨，謀國家的生存。非國民黨的人加入黨的一部分，是否有合作的可能。二是覺得政府沒有能力。當大難臨頭的時候，舉國一致來負責任，天下事還未可知。現在各人依然以各人的政治生活為前提：你伺我

隙，我攻你短。非國民黨的人加入黨的一部分，于事有何裨益。這一次三中全會，在廣東的重要會員都沒有加入，加入的孫科和伍朝樞，還有一個置身事外。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謀澈底的抵抗，是極端困難的。廣東派和南京派的分裂，原因固然是很複雜，但是胡漢民和蔣介石的衝突至少是導火線。廣東派之至今不能合作，蔣胡之不能以誠相見，是最大的原因。假如我是蔣介石，我一定立刻使胡漢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誠意，用極誠懇的懺悔態度，請胡到南京。天下惟誠可以動人，何況在現在的情形之下。縱然胡始終不肯來，至少使國人知道蔣有與胡合作的誠意。不來的責任，在胡而不在蔣。若胡真能到南京，不但全國人知道國民黨又變為完整的政黨，我們擁護牠，也還值得，也還可以希望發生效力，而且世界各國（日本在內）都知道中國的首領居然是「閹于牴外禦其侮」的，于我們抵抗的能力，以際的形勢有莫大的影響。

第二我要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曾經反蔣的閻錫山和馮玉祥在北方依然有相當的勢力。日本人終日放謠言，說某某要擁戴某某，推倒某某建設第二個「滿洲國」在北方，與南京對抗，我個人絕對不相信馮閻二人與這種謠言有任何的關係。但是要在北方抵抗日本，山西是我們真正

的後路。察哈爾是我們第二道防線。北方兵工廠比較的在安全地帶的是在太原。我們預料平津到山海關的區域是不能久守的，如果張學良或是任何其他的軍隊退出居庸關，他們和政府的聯絡，全要倚賴山西。所以第一步要與閻錫山有澈底的諒解，由中央儘量的供給他原料，日夜增加兵工廠的工作。在北方作戰所需要的子彈，當然要由山西供給。馮玉祥是提倡積極抗日的。看他在河南內戰的成績，他是壕溝戰術的能手。今日不妨給他一部分的軍隊，守一部分的土地。如是則全國軍人都了解這一次作戰與內戰完全不同。拚命不是爲個人而是爲國家的。然後軍隊的調遣，給養的供給，子彈的分配，纔不至于因政治問題而發生顧忌，發生障礙。

第三我要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如果共產黨不能同意，無休戰的可能，應該責成廣東福建湖南江西四省從速合圍，縱不能立刻澈底的消滅牠，至少要封鎖牠在一定區域之內，使牠在抗日期內不能做破壞的工作。共產黨與第三國際的關係，是大家都知道了。中俄已經復了交了。形勢與去年一月不同。爲抗日計，與其與蘇俄訂不侵犯條約，不如與中國共產黨休戰，這是很容易了解的。

以上的三件事實上能做到如何的程度，雖然沒有把握；但是以蔣介石的地位與責任，是應該要做的，做到十分，我們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如果對於江西的共產黨有相當的辦法，長江以北的軍隊可以儘量的向北方輸送；把守衛南京及長江下游的責任交給則共的軍隊。總司令應該來往于石家莊與鄭州之間。軍隊戰守的分佈應該打破防區制度，通力合作。如防守膠濟路固然可以交給韓復榘，但是蔣介石直轄的軍隊，未始不可加入。救援熱河，固然可以責成張學良，而馮玉祥何嘗不可以指揮。山海關以西一直到平津，用甚麼軍隊佈防，甚麼軍隊作戰，應該通盤籌算，由全國的軍隊在最經濟最有效範圍之內，共同擔當，夫然後可謀軍令的統一，勞逸的均平。

國家當然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國家，抵抗也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工作，這是不用說的。但因為地位的關係，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所負的責任，比任何人爲重大，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今日已經到了死中求活的地步。無論內政的經過如何，在今日都不能算賬。當局的人果真能爲中華民國爲最後的掙扎，國民當然要同他站在前線準備犧牲。要不然束手等人家宰割，固然是該死，無計劃，無決心的

對付，犧牲未必不大，而結果是不堪問的了！

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

孟真

張學良將軍這次要盡他的軍人的職任了！以這幾天來東一枝西一節的事實看來，張將軍的這個決心似是無問題的，「君子樂與人爲善，」及今振作盡職補過，猶可得國人及後人不少的同情，他的晚節猶可以不負他的聰明和意氣。他本來是個很聰明的人，並且是愛國的人，只以早歲的環境所養成的習慣，使他陷於現在中外人心中對他的地位，這是我們中國人最痛心的事之一，就他自己說也是最可惋惜的事。現在來了這個可以雪國恥雪家恥雪自己之恥之機會，而他的反應似乎不是使人失望到蓋棺的，他應該澈底的大振作，不特要表示決心，表示胆量，還要表示木領。他要打得好才算數，若以前不打，現在打而不好，照樣是醜事。所以他在現在，要用盡能力要不顧一切犧牲。

這幾天北平城內的怪現象真正要把中國人的惡根性全盤托出了。要人「得風氣之先」，先送家眷回去，市民不相信鈔票，失勢政客廣泛的散布流言，尤奇怪者，是大學

學生們的恐慌，紛紛出走，要求免考，否則請學校當局保證他們的安全。要求請假不扣分，否則學校當局是打官話。回想他們一年多以前的請願，示威，軍事訓練，抗日工作，等等，真正再滑稽也沒有了。由今思昔，他們似乎是遵下列一個公式而行的——責任不在自己則請願，禍害不及本身則示威，明知用不着上陣則軍事訓練，與日本人相離太遠則抗日，一旦事情變了，自己可以陷在困難或危險中，則取三十六計之上計，然而還是罷考不忘分數，逃辦不含升級的！這是中國的所謂「優秀分子」，這是受最多教育的成績！這現象真比日寇的脅迫還嚴重，因爲日寇只是外患，這是自己的根本沒有辦法。就這現象以測中國前途，真正一團漆黑。當這正當一鼓作氣的時侯，偏偏碰到這樣喪氣的事，我想現在張學良可以向他們請願了罷！

我們若深一步想去，所以到這地步者，也不由他們自己，也是環境使然。他們對執政者本無信賴，一也；他們的師長平日對他們毫無表率，二也；他們的師長在這時候

毫無所表示，三也。教員先去，何怪學生，校長不到校，他人勢必至於心慌。中國是無處安全的，青年的將來不是榮以奮鬥便是辱以就斃的。大家此時在動腿之先，且請想想看，向那裏去呢，就地抵抗，又何嘗專是軍人的責任呢？

中國人之不抵抗，爲世界詬病，北方人之不抵抗，爲全國詬病。上月還有一位廣東籍的中央委員，大大的罵北方人呢，我是一個北方人，年來爲此生了無限的悶氣。我有好幾次對東北朋友語，你們不抵抗，連累及於我這山東人，向來以爲「北方之強者」居之，而今萎靡至此。其實這樣氣話也很有不公平處，東北何嘗不抵抗呢？義勇軍在那樣環境中之抵抗，真是可泣可歌的。丁李馬蘇馮王諸英傑，真是我們應該焚香頌禱的。只以東北原來的軍政權太不高明，太少組織，故不曾應機而作最有效最有組織的抵抗，以至爲東北的民衆留下惡名，這是最可恨的。我希望現在華北的軍政組織不若九一八前東北的軍政組織之紊亂，我希望北方的軍隊個個都是十九路軍，我希望北方的健兒都是步丁李馮王馬蘇的後步者，我希望北方的人大都如上海的市井大俠在去年淞滬抗日時節的義烈！這是北方人要恢復人的名譽的機會！

我們若想到我們背後並無路走，而是無底深淵，雖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

看目下的形勢，這次騷動決非短時期的，所以這抵抗要是最有系統，較能持久，並且步步爲營的，若只是胡亂抵抗，聊以塞責，適以暴露中國軍隊之無能力，中國人民之無組織，其害是不可量的。唯最有組織的抵抗，方能賭一下子國運，方能爭回已失的人氣。所以我希望當局者應該趁情勢未十分迫切的時候，一分鐘不忽略的將華北局面全安置在作戰的準備之下。此中工作包含下列各事——

- 一，鐵路的運輸，變作戰爭的布置；
- 二，食量集中在軍隊可以應用，市民可得供給，而不以遺寇的場所；
- 三，大學學生應捉來做後方輔助工作，或使其服粗工，不得任其作自援式的逃命。
- 四，嚴懲離職守的官吏，教育界人在內。
- 五，公物應由政府協助其遷移他去，而對私人搬家應作相當的限制。
- 六，通盤籌算抵抗中的各步驟，各綫路，以免一處有幾處動全局。

七，社會上須立時組織起各種協助團體來。

八，各界捐輸應由負社會信用的人辦理，以使市民

樂於輸將，而免于上次「馬將軍捐款」之各種

笑話。

大規模的抵抗便是中國受嚴格的國民訓練之開始。中國之

澈底腐敗，非借機會鍛鍊一下子不可的。譬如打鐵，鋼是

打出來的。以局勢論，這是中國人挺起身子來做人的機會

，以力效論這是我們這老大國民再造的機會。打個落花流

水，中國人才有翻身之一日！

我們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

蔣廷黻

我們一面看見敵人在那裏用炮用火轟擊我們的城池，

屠殺我們的同胞，一面又看見離前線五六百里的大學的學

生在那裏開大會討論提前放假停止攻試及要求學校担保生

命安全諸大問題，我們在這個時候，處這個境遇，還有

什麼話可說呢？我們文人從此以後沒有資格罵武人了，因

爲在這個時候，好幾百位兵士已爲國家犧牲了他們的性

命。

勇敢，不怕物質危險的勇敢，照心理學家的研究，大

半是天生的，與人們的知識道德沒有多大的關係。所以怕

日本人來擲炸彈或怕土匪來搶而要預先設法避免，這是人

之常情，不必認爲可恥。不過，避了就算了，應不着說些

虛僞的話。

我們都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不能上戰場，上戰場也是

無用的。國家現在不是缺乏兵，是缺乏軍器和軍事的科學

知識。所以我們不上戰場，國家也不能怪我們沒有盡職，

我們自己在良心上也沒有什麼過不去。

我們都是今天不知明天事。恐怕連日本人也是今天不

知明天事。在這個當兒，我們不要連平日所有的一點常識

和一點責任心都拋棄了。我們應該緊緊的拿住這點常識和

責任心來作我們的引導。我們雖有許多不知道的事，有幾

件事是常識和責任心所指示很明顯的。

第一，如我們有些許特長可以助軍隊禦侮的，只要機

會一到我們面前，我們就應該不辭勞苦貢獻於國家。假若

同類的事發生在西洋或日本，牠們大學的學生，我敢說，

第一要問的，不是停攷不停攷，放假不放假，自己性命安全不安全；他們第一要問的是：我能有什麼貢獻？

第二，如我們在這個時候不能積極的幫助國家，最低限度我們不要爲國家之累。後方社會的安寧及人心的鎮定與前線的戰鬥力有莫大的關係。假若同類的事發生在西洋或日本，學校當局未得政府的命令就放假的，縱不鎗斃幾個，也要受嚴重的處罰。因爲這事徒增社會的驚慌。所以要回家避難的，不應再在校內校外鬧事張聲了。

第三，在這個時候，我們——二十多歲的青年男子——既不能保禦國家，最低限度不可要求別人來保禦我們。在這個時候還要求學校担保我們生命的安全是我們的大羞恥。難道這點丈夫氣都沒有了？如果我們幸而保全我們的生命，我們還要在世上作人。這點丈夫氣都沒有的人保全了生

命有什麼好處？將來爲國家服務那一套話我們還有臉說得出來麼？

第四，在這個時候，我們再不可說虛僞的話，作虛僞的事。電報不必打，宣言不必發，傳單不必散，標語不必貼。避難就算了，回家過年就算了，逃攷就算了，不要再在報上說什麼擴大反日的工作。如全無事可作，讀讀儒林外史。

第五，信謠言不如信報紙。謠言是全不負責任的，報紙不能全不負責。

青年們，我們仔細想想，平心靜氣的思想，我們的國家如何到這種田地。豈不是因爲我們的祖宗和他們的祖宗當青年的時候和我們一個樣麼？中國的大患不在榆關，是在我們的心裏。

一月八日

三中全會之教育議案

亮 功

此次三中全會所通過之教育議案，係根據程天放氏所

略述如下：

提之「確定教育目標與改革教育制度案」及中央組織委員會所提之「改革高等教育案」，加以折衷而成，頗能不偏不激，適合于目前中國之需要。惟愚見所及，尙有兩點，

一，此次教育議案對於教育制度上之最大改革則爲師範學校之單獨設立及工商農商等科之脫離高中而改爲職業學校，并且將逐漸恢復各省舊有之高等專門學校。此種辦法

，差不多是要恢復前幾年之舊學制，但是對於現有之整個學校系統如中小學之六三三制及四年制之大學，則毫無變更。若論師範科及工農商等科之與中學分合，各有利弊，

Ergebnis 內甚詳，(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pp.

668-704) 無庸贅述。惟吾人對於此次教育議案之師範科

及工農商等科之分校設立，尙有疑問兩點：一，師範科及工農商等科既脫離中學而獨立設校，則原有之一個中學將分而爲兩個以上之學校，而舊有之高中將僅設預備升學之普通科，學生數目，當然甚少，似此是否經濟，是一問題。二，假使在一種縣市，其地方財力僅能設立一個中等學校，在此種情形之下，如僅設立一個普通中學或任何一種職業學校，即使能適合地方需要，恐未必能適合多數學生各個需要。此種辦法，是無異使地方設立之學校來決定學生未來之職業，而不能使學生各自按照其能力興趣及志願自由選擇其職業，如何補救，亦是一問題。

二，此次教育議案仍不免有過于遷就事實之弊，如議案中關於師範教育一項，程天放氏之原提案主張「師範學校應脫離中學而單獨設立，師範大學應脫離大學而單獨設立」；并且主張「教育部擇全國適宜地點，設師範大學兩所

或三所，各國立大學之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概行併入師範大學。」中央組織委員會之原提案主張「師範教育不應另設專校以免畸形發展之流弊；」及「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應即停辦。」此兩種提案，皆有一貫之主張，而絕對的衝突。而大會所通過之議案，則爲「現有之師範大學應力求整理與改善……」及「大學設師資訓練班，凡大學畢業生願任教師者應入該班。：所謂「現有之師範大學應力求整理與改善，」當然是承認其繼續存在，而同時又于大學設立師資訓練班，稜稜兩可，理論上未免矛盾。如果認爲師範大學應單獨設立，則不妨如程天放氏之主張于國內擇定適宜地點，多設立師範大學，僅有北平師範大學一所，似屬不足。現在教育議案中既承認師範大學單獨設立，而各大學之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應否存在，并未提及，而所謂大學之師資訓練班，是否替代現有之大學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抑或附設于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亦未說明。此種含混並存辦法，未免過于遷就事實，而無一貫之主張。

以上所述，係個人對於此次教育議案懷疑之點，拉雜寫出，以供教育當局之參考。

漫遊散記 (十四)

丁文江

雲南的土著人種 (續)

●環州的羅婺

我于民國三年五月十二日從阿西拉到了環州。這是土舍李自孔的所在地，是武定所屬的三土舍之一。其餘兩個是慕連，和勒品。土舍是土官裏面最低的一級。土官原有土知府，知州，知縣，土司，土舍等階級，武定原是明朝的土知府。自前清雍正改土歸流以後，這一方的土官，都已取消，只留下這三個土舍。土舍的官雖小，但是他是一個土皇帝；凡有他所屬的土人都直接接受他的節制。他就是非法的殺人，漢官都不過問。

環州是萬山中的一個村落，一共不到一百戶人家。東南離武定縣城五十二公里，北距金沙江七公里，西距元謀縣二十九公里，高出海面約二千公尺。交通極不方便。做土舍的是羅婺族的人。羅婺二字與獠音很相近，或者就是蠻書所謂盧鹿。環州的居民都是羅婺族，這是黑夷，是貴族。此外他們的奴僕都是白夷——據獠人告訴我，他們也是白夷。

我一到環州，就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帶了五六個差役來見，說是李土舍的母親自老太太——自氏是黑夷的大姓。一坐下來，她的跟人就送上一瓶燒酒來，說是土舍衙門送的土儀。這位自老太太穿的是尋常的漢裝，但是用黑布裹着頭。說的很好的漢話。他說照前清的規矩，漢官來到，土舍應該出村子跪下迎接。因為她得信太遲，兒子年輕好頑出門去了，找他不着，所以失禮。她自己親來賠罪。我問他的家世，他都說不上來。坐了幾分鐘，就起身走了。

不久有人拿一張洋式的名片來，上面寫的是李玉蘭，字佩秋，武定。說是土舍的太太，本來要來拜見，因為生病不能出門。問我能不能過去談談。我正要看看土舍家裏的情形，就立刻同來人走去。土舍的家原來是個衙門，有大堂，二堂。堂上放着有公案，硃筆，籤筒。兩邊還有刑具。領路的人一直把我帶到上房的西廂。一進去方知道是土舍太太的臥房。這位土舍太太纔不過二十歲左右。一臉的病容。上下都是省城的時裝，腳不過五寸，大概是纏過的，

頭髮結着一條大辮子，拖在背後。棹子上有玻璃鏡子，雪花膏刀牌的紙烟和三國演義。牆上掛着許多照相。床上是綢帳子，繡花枕頭，但是原來白的被單已經變得烏黑。我因為要避嫌疑，同時拿一張名片請見她的婆婆。她先謝謝我親來見她，說是很不應該的。不過因為生病不能出門，而且有話要告訴我，所以纔派人去驚動。正說着的時候自氏老太太來了，她就不開口了。自老太太比早上更客氣，一定要坐在門檻上。

我先問他獠獠到武定告狀的事。自氏歎口氣說道，「這些人原是我們羅葵的奴才，相傳十四代，從來沒有反抗。自從郭王兩位牧師來了，他們紛紛的入教，就漸漸的容易管束了。幾個月以前有從省城退伍的兵回到這裏來，他們就叫大家抗租。他們說在兵營裏面，獠獠和大家一樣；不但夷家不敢欺負他們，連漢家對他們都很客氣。爲甚麼再當土舍的奴才。近來竟敢到縣裏告我們了。委員！請你寫封信給張大老爺，把他們打幾十板子就沒有事了！」

我再問她土舍家裏有沒有家譜，有甚麼古代的傳說。自氏都說沒有。她的媳婦插口道：「委員，你以爲我們也是夷家嗎？（獠獠對漢人自稱爲夷家）那你就弄錯了。我婆家姓李，這本是漢姓。我是慕連土舍的女兒，娘家姓糯

，但是原來姓鳳。鳳也是漢姓。我的娘也是漢人。我父親是很念過書的。我常常聽他說凡有土舍，祖上都是漢人，都是江南人，和委員是同鄉。明朝時候跟着沈英征雲南，纔封在武定做土官的」。

我知道以上的話完全是不確實的。據武定州志，環州李土舍原姓安，是四川建昌（寧遠）人。始祖名安納。于明萬曆四十八年奉四川建昌道宣慰司安世爵調到雲南，征伐武定的土官鳳朝文，有功授職做環州甸的土巡檢。他的後人有做過元謀土知縣的。有加同知銜的前清雍正時李素衡奉調攻東川昭通，運糧失事，纔降職爲土舍。慕連土舍本姓鳳是不錯的。但是鳳氏是獠的大族，原是安氏的分支。安氏是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獠的豪族。世守武定，就是所謂水西安氏。足見得土舍的祖宗是我的同鄉話是靠不住的。但是這種傳說在漢化較深的土人中間流傳很廣。在雲南貴州都說是跟沈英的江南人。在廣西都說是跟狄青的山東人。

我問她們的風俗服裝。糯太太告訴我，他們羅葵婦人與獠不同：穿棉布的多，穿麻布的少；穿雙管褲子的多，穿裙子的少；穿圓領有鈕扣的長衫，不露前胸。但是無論已嫁未嫁，沒有生子的都著尾巴帽：樣子像唱戲小生

所帶的頭巾。兩頭是尖的，背後有兩根帶子。有錢的人用銀豆子鑲邊，上面用五彩絨線繡花。等到生了兒子就用青布或是黑布盤成功一個上大下小的纏頭。這叫做鑼鍋帽。

女子有一二歲即出嫁的。男家請客慶賀。慶賀完結，女子又回到母家，等到長大了，纔到男家。有時同丈夫在母家同居，等生了兒子，纔離母家。結婚用媒人，但是單是代表男家，女家照例不能遣媒求婚。

最重要的神叫做土主。我從富民到武定的路上已經看見過。廟在大路邊上，與漢人的土地廟差不多，但是只有男神。神是泥塑的，有六隻手。神座前面滿地的雞血跡。神身上滿貼得是雞毛。這是敬神的時候重要的禮節。

羅婺的語言是雲南貴州通行的獠語，是所謂藏緬語屬的一種。自稱為Neisupo，稱漢人為Sapo，稱獠為Lisupo。Po說是「教」的意思，大概就是漢語的「部」字，因為後漢書白狼歌裏已經用她譯漢文的「部」字。古代的部落區別，多少含有宗教性的。所以他們至今翻譯部為教是很有意義的。

羅婺也有巫師叫做比冒，專管念爨文的經咒。糯氏太太叫人取了一冊來送給我。書是用草紙抄的，一共十三頁。原是硃筆，而硃上又蓋了黑墨。文自左向右，每五個字一

句，加有硃圈。我請這位巫師來講給我聽書裏面的意義。他說他只會念，不會講。我問他是否知道這文字的來歷。他毫不遲疑的說道，「是孔夫子造的。孔夫子兩隻手都會寫字；右手造了漢字，所以漢文從右向左；左手造了夷字，所以夷字從左向右！」民國十八年我在貴州大定，遇見一位積學的白夷。講到這問題，他對我講同樣的話。足見得這已經是很久遠，很普遍的傳說。

我要求自老太太叫幾個羅婺來測驗身體。她叫了十個人來，平均的結果如左：

身高	一六二，六〇公分
頭長	一八，八八公分
頭寬	一三，八二公分
頭週	五七，二〇公分
胸週	八二，二〇公分
足長	二三，八〇公分
手長	一七，六〇公分
頭部指數	七三，〇〇

所量的這十個人都自稱是黑夷，但是他們的身高和頭指數——兩個最重要的點——都與獠相近，而與真正的大涼山的黑夷不同。我疑惑他們或者是白夷冒充黑夷，或

者是黑夷和白夷的混合種族。因為這兩種人表面上雖是不通婚姻的，而白夷是奴才，生的女兒黑夷可以隨便拿來使用。有時還搶掠漢族或其他的民族的女子來做婢妾。種族的純粹當然是不能保存的。大涼山黑夷的身高是很足以引起人注意的，因為他們的平均數在一七〇公分以上，是東亞第一個高身的民族。不但男的如此，女的也是如此。這位自老太身高就在一六五公分以上。

我量完了十位羅婆，要求給兩位太太照相。自老太似乎不很願意。糯氏太太却很高興，但是說請「委員明天再來，因為今天沒有裝束。」

第二天早上這位李土舍親自來見。他纔二十七歲。穿一身青布的短褂褲，褲管極大。光着頭，赤着腳，一副黑臉，滿臉的橫肉。我問他話他一句不答。他帶來的差役說，「土舍年紀輕，不懂事，漢話也不大懂得，請委員原諒。」我給他照了一個相。他紅着臉坐在橙上，一言不發，却又不走。直等到我對他的跟人下逐客令，他纔蹣跚蹣跚的走了出去。

下午糯氏派人來請我去照相。我到了那裏，她已經經着了盛粧：頭髮盤起，用黑湖縐纏頭，上大下小，頂大如盤。身上穿一件藍色綢衫，兩袖露出紅色的緊身。下邊是

百褶裙子，真可算夷漢合璧的粧束。此外還有兩個年輕的僕婦。頭上帶的「尾巴帽」，上身著的鑲邊大袖圓領的長衫。下邊踏着花鞋，一個穿了裙子，一個只著雙管鑲邊褲子，兩個腰間都束着很寬的帶子，陪著主人一同照相。

照相完了，糯氏請我房裏坐。並介紹我一位中年的小脚婦人，說是她的母親，從慕連來看她女兒的。糯氏對我說道，昨天有許多話要向委員說的。因為我婆婆來了，不方便，所以沒有開口。今天沒有外人，我要把我的苦處告訴委員，出一出氣。我是慕連土舍的女兒。我母親是漢家。我六歲的時候就許配于李自孔。我父親很開通的而且很愛我。從小就把我送在昆明女學堂裏念書。我十二歲的時候李家就要求結婚。我父親說我年紀太小不肯聽他。不幸我十五歲的時候父親忽然死了。我從昆明奔喪回到慕連。忽然一晚上來了幾十個人，明火執杖，把我從父親棺材旁邊拖了出來，抱上馬就跑。我起初以為是土匪。以後纔知道是李家派的人來搶親。我自己想我是土舍的女兒，又受過點教育。被人強搶，豈不可恥？當時就想自殺。繼而一想，李自孔是我父親給我定的未婚夫。遲早總是娶嫁給他的，也就罷了。那知道丈夫異常的凶暴。我雖然百般的承順，總不能得他的歡心。結婚不到五個月，他就往外邊

強佔人家一個有夫的民婦。我十五歲搶來，今年二十一歲。這六年中，完全守寡。幸虧我婆婆很慈善，我倒也相安，但是我陪嫁的婢僕，多不堪我丈夫的毒打，逃回慕連去了。如今只剩下剛才陪我照相的兩個丫頭。一個多月以前，我出門回來，叫人煮了雞子酸菜吃晚飯。那曉得我丈夫所佔的民婦的一個女僕在旁邊偷偷的下了毒藥。我吃了兩口，覺得口味不對，就賞給兩個丫頭吃了。當夜我們二個人都中了毒，腹痛了一夜，幾乎死去。幸虧是三個人分吃的，毒不很重，歇了幾天纔慢慢的好了。我想我丈夫如此的很毒，我萬萬不能再住在他家。一個人私自逃回慕連。到了東坡，遇見我的哥哥；他力勸我回來。說「你中毒你丈夫是否知道，還不能証明。既然嫁了他家，不可輕易離開」。派了十二個人送我回來。我到環州村口，我的丈夫已經聚了一百多人，拿了刀鎗，要殺到慕連去。他看見了我，如瘋子一般，上前要打我。幸虧我帶了人，他不敢下手。只把他自家裡的人，一個個打一頓，對我不威。我母親聽見，親自跑來看我。他初起吩咐門上，不准我母親與我見面。歇了兩天，我母親住在村裏不去，我婆婆纔把她接到家裏來。他還天天吵鬧，要趕她回慕連去！

糯米太一面說，一面哭着。我于是纔了解房中陳列品

的由來。但是我是外客，無從安慰她。正在很窘迫的時候，自老太太派人來請我去照相。我乘機起身告辭。她又說道，「委員是外人，我本不應該把家事煩你。但是一來說說出氣，二來我哥哥要到武定縣去告我丈夫。我希望委員了解這事體的真相，主張公道。」她又拿了她的丫頭的一頂帽送給我，說做我研究的材料。

六個月以後我從人進東回到昆明，遇見前署武定縣的張縣長。他告訴我李七舍被獠獠告發的案子已經了結了。因為他的太太人很明白。獠獠都愛戴她。正打着官司的時候，上舍太太出來調解，居然發生了效力。我方纔知道昆明念過書的女子，究竟不同。這是後話。

自老太太也是盛粧；也是黑羅鍋帽，圓領大袖的長衫，下面束着百褶裙子。她似乎猜到媳婦在我面前說了他兒子的壞話。照相一完，她就對我說道，「我的兒子太不知事了。媳婦並沒有錯處。他偏與她不和。不過委員！你要曉得，我守了廿六年的寡，只有這一個兒子。凡事只好請大家看我老面上，不要十分與他爲難！」

我回到寓所，又找了一個會說漢話的差役來，問問他羅婆的方言。以下是羅婆語最普通的幾個字和漢語及衛爾所研究的麥岔（即 Ch）語的比較

漢	Gni	羅	Gni	羅
父	Feba	婆	Neese	Nadu
母	Fema		Nabi	Numu
夫	?		Naho	Nobo
婦	Maishlee		Gn(i)gna	Nibu
兄	Apou		I eeghhe	Iazi
弟	Gh ip'ee		Shlapee	Puder
巫	Scha		Ich'eghhe	Chiupa
千	T'itou		Leepee	Lepa
萬	Tiva		Tch'chee	Chepa
高	Gaii		Gnitouka	Nipo
矮	Gua			

衛亞爾的 *Gai* 辭典是普通所認為標準的獵獾語。看上列的表雖然兩種語的關係很顯明，但是不同的點却出乎意外的多。

我在環州住了兩天，于五月十五日起身向元謀。因為聽見說直寧的東面雞冠山新發見了銅鑛，就決定先到雞冠山看看。從環州到雞冠山路不過十三公里，但是全是山路，此口不能通行。幸虧上舍衙門的人給我僱了十五個夫子措行李，纔能出發。這些夫子不用說都是獵獾。

漢人對於獵獾有許多成見。第一是說他們如何野蠻。第二說他們「登山如履平地」從武定送我到環州的差役，尤其說得神奇。他說獵獾走路如飛，因為他們是「鈹腳板」。從小的時候就光著腳在鈹釘上走，所以腳板極厚。那知道從環州僱的許多獵獾走路還不如漢人。將到雞冠山的時候，要下一個洋鈹坡。有的地方路極其窄狹。有一個十七八歲之獵獾，揹著東西，竟走不下去。等到人家把東西替他揹過去，他空着身子還極其害怕。我在他後面，只看見他的腿發抖。最後竟要人扶他。可見得獵獾的「上山如飛」，「鐵腳板」都是神話！

民族國家主義與中國的教育(書評)

衡哲

書名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著者 Cyrus H. Peake

出版者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2.

本書共分五章。前三章是一個縱的敘述，是中國學校

制度及民族國家主義的一個歷史的研究。後二章是一個橫的解剖，是民族國家主義在中國的文化社會上，發展過程中的幾個重要痕跡。第一章所講的，是中國在兩次戰敗的時期中（一八六〇至一八九五）的一個覺悟，一個改良教育的新努力。第二章所講的，是中國為日本所敗之後，民國成立以前，在教育上的新進展。最重要的，是科舉制度的廢止，及日本式學校的創立。第三章所講的，是民國成立以來，二十年中的教育狀況。在這三章之中，著者特別要讀者注意的，是（一）新教育的唯一目的，是那個中國新覺悟到的民族國家主義。（二）欲使這個主義成功，中國的當局者，始終以為非賴軍國主義不可。故六七十年來

，中國在教育上的努力，也就著重在軍國主義的一方面。第四章是指出民族國家主義在中國教科書中的特殊地位。第五章是敘述近年來與這個主義有關係的文化運動，如三民主義，文學革命，收回教會學校之類。書末另有兩個附錄。其一是中小學教科書的選錄與解剖。其二是書中所用的中文字句的原文，這對于英美的讀者，很有用處的。

我們讀過此書之後，不免發生一個矛盾的思想。我們一方面對於著者的態度與方法，要表示敬意，一方面又深切的感到紙上談兵的遠離乎實際。著者是一位有歷史見解的人，故他能指出，中國之所以必待戰敗于英法之後，方能感到民族國家主義，正因這個主義是一個國際社會的產物。而中國之深信軍國主義為增高她在國際地位的唯一工具，也因中國所受的國際教訓，正是如此。我以為這個態度是很不錯的。而著者對於材料的選擇與安排，對於這個题目的眼光與判斷，也是值得好評的。比如在一百〇三至一百十頁中，他能依據了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的兩大原則，來解釋中國的教科書對於德育一門的態度與方法的變遷

，我以為是很合乎學者的身分與手段的。

所不幸的，是著者對於文字太信任了，故全書遂不免成爲紙上談兵。賓部的決議，教部的命令，學校的課程表，種種教育會議的記錄，以及一切關於教育的統計，報告，議案，通電之類，自然也有他們的地位。但假如把他們作爲觀察一國教育進退的唯一憑證，那就不免有紙上談兵之譏了。比如說吧，在紙面上看來，教會教育權的收回

，似乎是一個大成功，而在實際上，却亦不能那樣的樂觀。這類的例子書中甚多，都足以證明著者對於事實的漠視。因爲我們知道，教育並不僅僅是一個學校制度或課程的問題，更不是一個紙上的問題，乃是實際社會的一個大問題。對於這一層，著者似乎不曾注意到。故此書雖有相當的成功，但總不免是僅僅一個書桌上的成功，而不是一個活的與實際的成功。

蘭州的教育慘案與開發西北（通信）

李行之

適之先生：

獨立討論我已購讀到第三十二號了。在半月以前，我對牠有些「怨望」，心想寫給總司機樞的「老先生」；旋因先生有湖南之行，再則我還有所期待。現在，先生返平已一週有餘，而我所期待者，終於失望！迫得我不得不動筆了。

在一月以前，蘭州教育界不是發生了慘案麼？經過的情形，平津各報會有很詳悉的登載，以先生之留心時事，關懷教育，或早已瀏覽及之。我測想先生定能抽些閒空，本著獨立不依的精神，把這事評論一下，爲邊省教育有個

新設計，爲蘭州被難的教界同仁有所慰藉。誰料先生竟嘿無一言，貴刊亦無片言隻字的紀載和評論。若說這事不關緊要吧，我想較諸貴刊所屢次討論的「侮辱回教事件」，有相當的「重要性」，或且過之。先生是全國教育界很有名望的，爲把全國教育通盤籌算計，爲與教育界互通聲氣計，都不應愒然置之，視若罔聞。

再就年來高唱入雲之「開發西北」一問題來說，也是很值得合辦貴刊的諸位先生討論的。自九一八事變以訖淞滬戰後，政府諸公爲什麼不亟謀「收復東北」，而轉個灣兒來大倡「開發西北」？既是要決心「開發西北」，將開

墾荒地或開採礦產，以發展實業乎？抑開導文官，啓發人文乎？總該縝密計畫，擬定策略，「爲事擇人」，委派專家到西北去開發；萬不該隨隨便便「爲人謀事」，私遣利慾熏心者開西北的金窖而大發其財源也。此問題除孟真先生存貴刊第三十號略論及外，別人還很少談到。孟真先生說：「開發西北，總要先使西北有可以發展的環境，然後人民自己可向發展的走上走。使得人民自己向發展的走上走，政府所負第一責任是：一，維持社會的秩序；二，澄清政治的腐惡；三，給與人民以一種蘇息；四，便利交通。這個人民自行發展的先決條件，在各處皆適用，而在活地獄的西北爲尤甚。」這是最切要而中肯綮的話。自「開發西北」之論起，我們西北人最不好說話：說我們自己開發吧，輕則便妄加以「愚而好自用」的惡諷；重則恐怕還要犯「違抗中央命令」的罪名。若奉請外省人去開發吧，一則恐怕請不到專家，二則恐怕「人生地疎」，利未興而弊隨之。孟真先生之言，實獲我心！蓋西北各省，苟有發展的環境，固不乏建設人才也。這也並不是「夜郎自大，如譚克敏升了官，擢引貴州小學畢業生充當甘肅財廳秘書，只可說個「遇」「不遇」，並無所謂「才」「不才」。——除非貴州人都是「天縱之聖」，甘肅人盡是「

天生奴才」。貴刊風行海內，所評論的問題，都很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甚願先生嗣後主編貴刊時，對於西北問題多加論列，俾西北教育漸有振興的希望；開發西北者，免得墮入魔道。幸甚幸甚！有瀆清神，很對不起！順祝撰安！

二一，十二，二八，李行之。

答

丁文江

我們很感謝李行之先生使我們注意蘭州的教育慘案。胡適之先生又到上海開會去了，所以我代他答覆。

我們對於蘭州教育慘案沒有評論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因爲獨立評論是個週報。每一星期的時評平均不過兩篇。有時僅有一篇。而且大抵都是講在本期所發生的事件。一週內可以評論的事件，當然不止此數，不免顧此失彼。二是因爲獨立評論的編輯者都是有其他職業的人，精神往往不能專注。並不是我們對於蘭州的慘案有任何的忌諱，或是認爲不甚重要。

關於開發西北的問題，我們曾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因爲題目上未有西北二字，所以李先生沒有注意。翁文灝

先生在本報第三第四兩號發表一篇很長的文章講「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其中第四段專討論西北。全段雖不過二千多字，但是其中有極重要而很少人知道的材料。翁先生說：

「西北交通不便，鑛業工業都不容易發展。因為他的產品只能供給本地，不能運銷外面。而本地又是人口稀薄，生活甚低，銷耗的力量甚是有有限。固然鐵路延長公路推廣之後，可以好些，但也不能完全銷滅了天然的距離。」

他又說：

「如果我們承認發展農業是開發西北根本之計，我們便不能不覺西北農田的缺乏，像某機關的移民九千萬的計劃未免幼稚得可憐。西北面積雖廣，但有種種天然限制。(一)雨量太少 最好的區域也在二十吋以下，更有許多不到十吋的地方，所以非有灌溉的水利，農業是極困難或不可能。(二)大部

分是山脈及高原，不適耕種。(三)大部份是沙漠，最好的一部份算是黃土，沖積平原面積極少。」

他把陝，甘，綏遠，新疆的最好的農業區分爲六處。(一)渭河平原，面積一千方哩(二)綏遠平原，面積三千方哩。(三)河套平原，面積四千方哩。(四)寧夏平原，面積四千方哩。(五)甘肅的西部，面積一萬二千方哩。(六)新疆，面積二萬方哩。六區面積合計不過四萬七千方哩，還不及東三省松遼平原之一半，土壤也不及東北之肥。以每方哩能容四百人計算，共計只可容一千九百萬人，而原有的人口已經在一千萬人以上。所以再加八九百萬人已經是西北殖民的最高限度了。

以上的數目字是翁先生搜集所有的材料，多年研究的結果。凡有地理知識的人，都無法否認的。可是這篇文章發表過以後，絕少引起討論。政府的當局依然唱他們籠統的高調，實在太可憐了。李先生是西北人，所以我請他特別注意，並且希望他把這種根本的知識向西北同鄉宣傳。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郵費」每月一元
「日本及其領地」每月一元
「香港澳門」每月二元
「南洋羣島」每月二元
「歐美各埠」每月一元
「每月四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國聯調解的前途

胡適

中國的政治

Tawney 原著 蔣廷黻譯

中國民族對付衣食不足的方法

壁黃

讀顧毓琇「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後

孫逸

漫游散記(十五)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

第三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每期待價	四分。預	定全年五	十期，連	郵費一元	六角；半	年九角。	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	元六角。	郵票代洋	九五折。
------	------	------	------	------	------	------	------	------	------	------	------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西安 | 蘭州 | 武昌 | 開封 | 安慶 | 無錫 | 青島 | 濟南 | 廣州 | 重慶 | 雲南 | 漢口 | 汕頭 | 油頭 | 興寧 | 成都 | 長沙 | 太原 | 山東 | 蘇州 | 杭州 | 徐州 | 常州 | 海州 |
| 北平圖書公司 | 天津圖書公司 | 上海圖書公司 | 南京圖書公司 | 西安圖書公司 | 蘭州圖書公司 | 武昌圖書公司 | 開封圖書公司 | 安慶圖書公司 | 無錫圖書公司 | 青島圖書公司 | 濟南圖書公司 | 廣州圖書公司 | 重慶圖書公司 | 雲南圖書公司 | 漢口圖書公司 | 汕頭圖書公司 | 油頭圖書公司 | 興寧圖書公司 | 成都圖書公司 | 長沙圖書公司 | 太原圖書公司 | 山東圖書公司 | 蘇州圖書公司 | 杭州圖書公司 | 徐州圖書公司 | 常州圖書公司 | 海州圖書公司 |

◎獨立評論社啓事

本刊創辦時，因慮及寒假期內印刷所須放假停工，故預計每年只出五十期。本期出版後，休刊兩期。（一月二十九日及二月五日）。第三十七號本刊於二月十二日繼續出版。敬此布告。

國聯調解的前途

胡適

今天（一月十六日）是國聯十九國委員會開會的日子。據報紙上的消息，今天集會後，又得休會幾天，等待國聯秘書長德拉蒙和中日兩國代表團接洽修改十二月十五日的十九國委員會決議草案及理由書的結果。十二月十五日的原草案已够和緩了，因為日本政府的堅強反對，國聯秘書廳已擬有修正草案，頗牽就日本的主張；但據報紙上的揣測，這個妥協的新修正案還不能得日本的接受，而我國政府則已電令我國代表團『猛烈反對』了。我們現在先敘述原草案和電傳修正案的內容，然後推論國聯調解的前途。

十二月十五日十九國委員會通過的兩個決議草案和一個理由書草案，我們在本刊第三十二號會推測其內容，並

指出其重大意義。這三項文件的全文，本月八日已在日內瓦發表了。理由書共分九節：其（三）（四）節說明委員會此時應該先依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三項試行『調解』的工作；其（五）（六）節說明十九國委員會應該改組為調解委員會，並得邀請美俄兩國代表參加；其第（八）節說明調解委員會在辦理交涉時，『凡法律問題，應依據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議決案的第一第二部分；凡事實問題，應依據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前八章所樹立的證據。至於解決方案則須根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內所提出之原則，同時參考第十章所載的建議。』其第（九）節內，十九國委員會明白表示『單是恢復九一八以前的原狀不能夠得着一個永久的解決，而滿洲現政權的維持與承認也不能看作一個解決』。

決議草案兩件，其第二案是對於李頓調查團各團員表

示感謝，謝他們的忠實公正的工作。第一案共分十節：其

(二)(三)節敘述國聯大會於三月(各報電文均誤作二

月)十一日議決案中已規定解決中日爭議的原案，「確認

此種解決必須尊重國聯盟約，巴黎公約與九國條約的旨趣

」。其(四)節「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其任務為與兩當

事國協力，辦理交涉，期於依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之原則

，參考其第十章之建議，求得一個解決」。其(五)(

六)(七)節規定此項調解委員會由十九國委員會組成，

並有邀請美俄兩國參加之權，並有便宜行事之權。第(

八)節請調解委員會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以前報告其工

作。

十二月十五日以後，十九國委員會即休會，由國聯秘

書廳與中日兩國代表團磋商議決草案的接受的問題。中國

方面早就宣告：調解的先決條件是取消「滿洲國」。日本

方面堅決反對議決草案，其反對最力的幾點，我在本刊第

三十二號「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一篇裡已討論過

了。簡單說來，日本最反對的是：

(1)理由書末項明白否認「滿洲國」的維持與承

認。

(2)邀請美俄兩國參加調解。

(3)解決方案須根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之原則。

(4)由調解委員會辦理中日交涉。

據近日報紙所傳，日本的反對已發生了不少的效力，

決議草案已有修改的傳說。據說，國聯秘書長德拉蒙已提

出一種修改案，其大意有這幾點：

(一)調解委員會原擬由十九國委員會組成，今擬

改為由英、法、德、意，比五國組成。

(二)不明說邀請美俄兩國參加，只說招請與中日

有利害關係之聯盟國及非聯盟國。

(三)承認中日兩國直接交涉之精神，調解委員會

得為援助中日爭議之解決而提出建議。

(四)決議案之理由書改為主席的宣言，不作為決

議的一部分。

(五)刪除理由書最末項否認滿洲現政權的宣言。

這是日本新聯社所宣傳的消息，我們不敢斷定他的可靠程

度。如果這消息是確實的，那麼，國聯此次未免太牽就日

本的強力的要求了。所謂「德拉蒙修正案」的五項，若果

然如日本通信社所宣傳，其中有幾項(如改十九國調解委

員會為五國小組，如刪除理由書末項)都是根本違反原草

案的精神的。

然而強暴的侵略者還不滿足，他們還在要求國聯拋棄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解決原則，尤其是那一章的第七條項

。我們應該記得，那第九章在提出十條適當解決的原則之前，先提出了兩個消極的原則；第一是不主張恢復原狀，第二是不主張維持「滿洲國」。並且在那十條積極原則內，其第七條雖然主張滿洲自治，但很明白的說明「滿洲政府的改組，應於無背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之範圍內，使其享有自治權」。據十四日東京新聯社電訊，日本政府不但反對由書的末節，並且明白反對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中的第七條原則，「因該第七項中有許滿洲自治之事，顯然爲日本所不能受諾」。日本要求決議案中明白規定將此條除外。

無疑的，這一點是今日國聯與日本折衝的焦點，其餘的比較的都是枝節。我國代表團早已宣言過：取消滿洲僞政權是調解的先決條件。所以國聯若不能明白否認「滿洲國」，則是國聯自己先已否認了李頓報告書的第六章與第九章的基本立場，則是國聯自己先已否認了三月十一日的大會決議案，則是國聯自己先已喪失了調解的資格。這種調解，不但中國政府決不能承認，世界的公論也決不能承認。所以我們推測，國聯的讓步至多不過刪除理由書的末

項，但決不至於承認日本的蠻橫要求，拋棄李頓報告書的前九章或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則，尤其是否認滿洲僞政權的根本原則。

這回十九國委員會重行集會，遠東的局勢更形惡化了。日本的軍閥在新年元旦的晚間在山海關開釁，造成了武裝向世界挑戰的局面。山海關已被日本佔據了；日本軍隊正在積極準備進攻熱河。中日的大戰事也許不久即可在熱河及榆關兩方面同時爆發。在這種形勢之下，強暴的日本不但要中國接受一個城下之盟，簡直是要使國聯在那帶甲的拳頭之下接受他的無理的要求！

所以我們推測，除非日本有根本悔禍的覺悟，這回的國聯調解是必定失敗的。我們愛護國聯的人，只希望國聯這回的失敗是一種光榮的失敗。所謂「光榮的失敗」者，只是希望國聯做到這幾點：

第一，明白宣布此次調解失敗應該完全由日本負其責任。

第二，應即由行政院繕具報告書，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前八章的事實部分，聲明滿洲事件的發生及滿洲僞國的造成完全由日本負其責任。

第三，應即由國聯大會正式否認滿洲僞國，並聲明

日本破壞國聯盟約，巴黎公約及九國條約的責任。

第四，應即由行政院依據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探

中國的政治

著者陶內先生，論學問，是英國當代的大經濟史家之一；論政治經驗，是英國勞工黨後臺的主要人物。兩年以前，他受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委託，曾來中國調查農工狀況。去年他又參加國聯派遣來華的教育考察團。數月之前，他在倫敦發表一部小書，名曰「中國的農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Allen and Unwin, 7s. 6d. net)。這書的好處，誠是一言難盡。書本一章泛論中國的政治和教育。茲特節譯此章，分兩期發表。下一期的將標題「中國的教育」。

蔣廷黻

在現今世界大勢之下，中國近二十餘年的內亂將不能長久繼續。前途就只有兩條路：或是中國自己產生一種政治平衡而設立一個强有力的政府以維持之；或者外來的勢

取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原則，提出國聯認為公允適當的解決方案。

一九三三，一，十六夜。

R. H. Tawney 著 蔣廷黻譯

力，用某種名義，強以平衡相加。華府會議的政策是要使中國能走第一條路；現在日本顯要採取第二條路。日本首要把東三省變為她的保護國；然後學歷代以北制南的方法，利用東北的優勝地位，來支配全中國的政治。日本的成敗如何——目前的局勢以成居多——最要的關鍵是關內中國的前途。東三省的命運最後不會在東京或日內瓦，是要在關內的中國決定的。因為東三省論文化和民族完全是中國的。如果日本能割據東三省，那必是因為日本能使用一個有組織的國家的種種力量而中國不能。如果中國也能，那末，東三省一定要受中國的吸力，不受日本的吸力。一句話，就東三省論，中國本可拖延，只要——這是很要緊的——在拖延的時候，中國能夠得到內部的安定和團結。中國成功的條件是甚麼呢？

這些條件一部份是政治的，一部份是經濟的，一部份

是心理和社會的。中國思想家偏重後兩種而比較的忽略了第一種。平常的時候，我們都相信現在是經濟支配政治的時代。但是在現狀之下的中國，經濟的進步完全為政治的變亂所阻止。所以中國的第一個問題是創造一個效力較高的政府。

這個問題的解決只能一點一滴的進行。中國太大，各地狀況太不相同，交通的缺乏致全體太無構結；因之，全國各部決不能同時前進。統一的程序只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執行。有些省分必須前導；有些省分後隨。某一區域必須負荷十九世紀歐洲的普魯士和彼得蒙（Piedmont）所負荷的使命，作為改革的中心，樹立公德，效能，及廉明政府的標準及榜樣。

有了中國的經濟地理，這個統一的中核區域應在何處是毫無問題的。東三省就是沒有日本的問題，是未成熟的新墾地。黃河流域的人民太窮苦且知識太低。黃河流域以南的省分，內有二萬五千萬的人民，是將來的希望所在。此區域內有世界上最大自然商路之一，即長江。海關的收入三分之二屬於此區域。鐵路，除東三省外，亦以此區域為最多。過二十萬人口的城市，全國有十五個，此區域佔了十二個。工業，東三省不算，此區域幾包而有之。現代

的教育機關，此區域有其過半數。如中國有一個區域能創造一個新國家，那就是這個區域。

可惜這個區域不能一致。南京與廣東的戰爭，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因為日本侵略的震動，始為停止。此區域內還有些地方受土匪之害；有些地方受軍長師長旅長之害。此外還有些共產黨的區域。廣東的反中央雖然不能說完全無故，但居然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危急的時候發生，這真是中國不統一的最可惜的表示。不過廣東與西洋的通商關係最久；省的自信心最高。廣東有其特殊政治傳統。就是廣東與南京感情好的時候，牠不願接收南京領袖的惠賜。南京命令所能實際通行的地方不過五六省，其中最重要的是江浙及河北山東的一部分。人口總數約在一萬萬左右。若在歐洲，就可算為一個大國。

政府要得人心必須在其範圍以內起始。中國既須有一個中核的廉明行政區域，政府似乎應集中心力於這幾省的改革。我並不贊成有些外國人的意見，說中國惟一避亂的方法在分爲幾個小單位。如果這個提議見諸實行，必致引起千百年的內亂，何況不能實現。經濟上，尤其從海關及鐵路着想，中國是一個整體。文化上及精神上，中國的統一還超過有些有中央集權政府的國家。這個統一必須維持

，並須設法使之具體化爲政治的組織。這事業的完成要費好幾代的效力，但第一步是在找一個施力之處，是要建設一個基本區域；在此區域內，國家能够有效率的執行國家應行的事業，然後傳播牠的影響到以外的區域。直轄的省分應該作有秩序，有安全，有效率的模範。牠們應該嚴厲取締收稅人員，官吏，放債者，地主及土匪的榨取。牠們應該建設現代的道路，現代的警察制度，現代的公共衛生及現代的學校。一句話，在這個可行善政的區域內，作一個人人人能看見的善政的標樣。在上古的中國，常有地方人民不堪諸侯的暴虐，請求鄰邦的賢王來統治他們。如果中國各地的政府多靠善政成績所能產生的威信，牠們就不須這麼多槍桿來維持牠們的地位了。

這個政策——其實無論任何政策——要實行，政府行政的機械必須整理。中國輿論家多批評政府之壓迫言論；他們說這個政府是個軍政府，不過加上一個文人宣傳部，這誠有理，且是可惜，因爲一個不容輿論批評的政府就難得輿論的贊助。雖然，中國政府的大弱點還不在此，是在有政而不能行，是在缺乏有效力的行政制度。除少數例外，中國人簡直不知行政是什麼。

文學在中國享受了好幾百年的權威。一般人對文學的

尊重雖然很佩服，但此尊重不幸使中國人不能認清政治的性質。相信紙上寫了字就是作了一件事已成爲牢不可破的習慣。結果中國的政治以發表宣言爲始，亦以發表宣言爲終。在西洋，人們有時只講辦法不講目的；中國人則只講目的不講辦法。中國人會議了又會議，起草了計劃以後還得草計劃，報告以後還是報告。紙張堆積如山，但全無辦事的力量和機械。好像一個機器出了毛病；大家不去修理，反坐下寫一篇機器出毛病論並通過一個議案要機器明天行走。這就是中國的文學政治。

此外中西政治的觀念的不同還多，我只再舉一二個例。在中國，法律不是通律，不問對何人都要執行的；法律是一種高尚的理想，能企及固好，但遇了具體的事件必須斟酌情形變通辦理。到了這實行的當兒，原則反不要緊；要緊的是受法律制裁的這個人的特殊情形。中國人所敬仰的不是鐵面無私大公至正的法官；這樣的法官似乎太粗暴，太不近人情。中國人所敬仰的是一個聖哲的，和氣的中人，能調和雙方的利益。西方行政注重負責的執行；中國行政官注重如何避免衝突，即國法因之受損亦所不顧。西洋政府的機關是個權力的楷梯，各級各人的職責是分明的。中國政府機關是個團體。個人以團體爲護符，責任不

可捉摸的散在全團體。

對於中西政治的觀念的優劣來作抽象的批評簡直是空費力氣。百年以前，中國的傳統辦法還行得通；時至今日，行不通了。因為我們不能靠私人彼此的了解來管理一條鐵路，辦現代國家的財政，或執行一部複雜的，在在與民生有關的法典。

中國的新式行政有許多困難。新的行政無成法可守，因為新的行政系統成立不久。經費也不足。官吏地位無保障。往往換一個部長致全部的大小職員都換了。中國雖有一個考試院，類似英國的文官委員會，好像至今中國官吏的進退還是靠私人的關係。家庭制度也是一種障礙，致親戚的援求有許多時候不能拒絕。官吏的教育很不完善。無論這教育是得自西洋或中國的大學，中國的文官知道西洋的政治學說較多於西洋的實際行政，而知道西洋反多於中國。一個外國旅行者在中國最感奇異的是他所認識的中國人最不知道的國家就是他們自己的中國。學政治的知道海牙法廷及美國大法院如何行使職權比知道中國城市村莊如何辦地方公事還清楚。學經濟的知道西方的工業資本界及機械農業比知道門前的手工業及郊外農夫的農業還要多。

效率較高的行政，就是在西洋，也是近代的發展。中國直到最近始感需要，因此中國新式行政之幼稚並不足怪。中國行政的弱點由於財政困難及社會情形者，只中國自己能改除之；屬於技術方面者，倘利用西洋國家的經驗，改革的進步可以增速。關於鐵路管理，治水災旱災，救荒，及公共衛生，中國已利用外國專家的知識。行政也有其技術方面，是西洋專家所能貢獻的。行政人員的選擇和訓練；機關內工作的分派，機關與機關的關係，與財政部的關係，與負政治責任者的關係；官吏地位保障問題及陞級問題；中央行政者及地方行政者關係的安排，如何能一方面使中央有相的節制，一方面使地方能保存自動的能力——這都是良好行政的基本條件。西洋國家，因長久的試驗，已得着專門的技術。中國不應盲目的往前，出幾十年的浪費和痛苦，來尋找別人已經找到的。

我們愈想到各種特殊的行政，愈覺得有利用外人已有的知識之必要。無論一個人的智慧多末高，有許多事情不能生而知之，如：提倡農村合作，改良土地制度，發展鄉村工業，設立普及初級教育及有效的視學制，執行工廠法，組織效率較高的警察，及其他許多一個現代的國家所必負的責任。中國的行政當然應該是中國式的，不是西洋式

的。但要作到中國式的不必重演外國曾經演過，且受了苦
始改除的錯誤。

我不提議中國應請幾個外國名流到中國來作幾個月的
旅行，也不提議送中國人到外國去參觀，去得幾個空泛的
主義。老實說，中國大有主義過多之患。我提議，第一，
中國應聘請些外國官吏曾有特殊行政經驗者來中國幫助組
織各種行政事業；第二，中國應派遣些經嚴格選擇的官吏
到外國行政機關去，作較長期的實習。爲執行這個政策，
最自然的輔助機關是國聯。

中國的地方行政簡直是個未曾探險的區域。五十多個
大學裡的政治學教授沒有一位告訴了我們中國二十餘省，
一百餘城市，千九百多縣，及五十多萬村之中的兩三個省

中國民族對付衣食不足的方法

學 黃

，城，縣，村的實際行政是怎樣。田賦的怎樣分派與徵收
，簡直是個不可破的神謎。好像中國近代政治的改革僅限
於上層的政府；至於下層，舊的惡習完全保存，此外又加
上了一些新的惡習。關於地方行政，外國也有許多經驗是
中國可以借鏡的。不過，在未下手之先，應該仔細調查幾
個區域內的縣，城，村的行政。政府如顧不到，幾個大學
可以合作來辦這件事。調查一定要發現許多的弱點，然後
可以攷察在外國當初這些弱點是怎樣改革的。近年各種的
政治方案如教育，衛生，農業的改良，到實際執行的時候
，都帶地方的行政官吏。這些方案的實行都以同時改良或
甚至首先改良地方行政爲條件。

衣食不足是中國民族的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

的是衣食）不足的問題很注意。他們的節用，節葬，非樂

并不是近年才有，乃是自古有的。我們最早的政治思想的

的主張，以及他們對於工藝機械的用心（墨子書中，可見

兩大派——儒，墨——都感覺到這個問題。荀子富國篇說：『

這種用心的痕迹），都與他們『憂不足』的見解有關係。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發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
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可知墨家對於物力（最重要

（註一）荀子雖則不信墨子的這個見解；但這并不能證明
儒家全沒有感覺到這個問題。『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篇）。孔子已經認足食爲三大政之一；可知他很想到了民食不足的問題。據孟子說，行了他的理想的王政之後，還不過達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孟子梁惠王上篇）的境界。由他的話看，「不饑」不過現在人的烙餅窩頭够吃罷了；因爲要七十歲才可以食肉，可見七十歲以下的人一定很難得食肉的機會。曹劌的鄉人也有「肉食者謀之」的話，（左傳莊十年）指明只有貴族才有肉吃。所以中國大多數人民吃東西的質量不能滿足營養的需要，乃是幾千年沒有解決的問題。食的問題這樣，衣的問題也是一例。

衣食不足的問題，與人口問題是很難分開的。因爲一樣的數量，人少則每人平均所得比較多，人多則每人平均所得比較少，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減少人口是解決衣食不足的一種方法。天然的，或許說是顯似不受人力支配的，減少人口法有饑荒，水災，旱災，蝗災，瘟疫，刀兵等類的現象。這是我國的洪亮吉與英國的馬爾薩斯（*Malthus*）所早已說過的。（註二）人爲的可以減少人口的事情，除了近年由外國傳來的制育運動不算外，在中國前代的個人方面有殺嬰，斷產，出家等等。韓非子六反篇說：「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可見戰

國末（或稍後，假如這篇不是韓非的手筆）有殺嬰的事。並且看那文章的語氣，這事不是頂希罕的。斷產的藥方，假如某些醫書不是僞撰的，至晚趙宋時代已經有了。明歸有光的母親因爲怕多子的苦，至於服所謂能使「奸不數」的螺水而致死。（震川集先妣事畧）出家爲僧尼，不嫁不娶，當然也會使人口減少。（註三）在歷史上佛教特別發達的時候，至有一路上行人半是僧」的話。就是現在，和尚尼姑的數目，雖只是人口的一很小部份，但也不能認爲於人口毫無影響。殺嬰，出家，斷產的企圖，雖是大部份由于個人的情境；但因人口太多而起的衣食不足的壓力至少是這些現象的助因。到了現代，制育當然是惟一的適當的減少人口法。或許有人恐怕制育盛行以後，人口弄得太少。我想這要看從那方面說。我以爲制育只會使小孩子減少，發育不良的人減少（因爲全國的小孩子少，每個孩子平均的衣食衛生一定進步——假如衣食品等的分配比較公道，）壯丁大約不會減少的。中國現在人口雖多，恐怕發育不良的人和病夫也多。

減少人口是從消費的人那方面想法子；但人類也可以從消費的物那方面想法子。後種法子中有（一）通有無，（二）節縮。時間上的通有無就是積貯——在豐年，將剩

餘穀麥等物貯藏起來，備荒年不足時之用。古代有許多政治家提倡這個法子。空間上的通有無就是移民移粟——梁惠王所自鳴得意的『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的辦法。節縮是節衣縮食。單以縮食為例，每天只吃兩頓，甚至一頓；不吃飯而喝粥；以及素食。雖則除僧尼外，很少人完全素食，但許多貧民吃動物性食物很少，幾乎是素食。（註三）但通有無的好處有限。節縮簡直不是法子；因為實際上衣食還是不足——不够保持體溫，不够營養。

積極的增加物量當然是可能的。第一，可以使耕夫增加。商鞅之法，『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書列傳）。西漢時賈誼也錯都主張設法盡毀游食之民歸農，也是這個主意（漢書食貨志上）。西漢初執政者設法困辱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納重租稅，「子孫不得仕宦為吏」，見史記平準書），雖有別的原因，但也是崇本抑末，勸人歸農的表現。第二，可以使耕地增加。商鞅開阡陌（假定有這事），以及移民墾荒，乃至於開疆拓土，都是增加耕地的方法。第三，可以使耕法改良，例如趙過的代田法（也見漢書食貨志上）。這三種方法，雖是在中國前代都試過；然而沒

有弄得很好，它的效力抵不上人口的增加。即以西漢為例，哀帝時，天下戶口最盛，但百姓的資富就不及文景時代。王莽時，『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也見食貨志上）這些現象，是當時人口增加比衣食品增加更快的結果，不能專歸罪於王莽之為政不善。我們在現在看起來，對於他的詔上所說『予遭陽九之阨』云云，似乎應該表些同情。西漢末的情形已經那樣，到現代更加厲害。現在中國的可耕地不算少，耕夫尤其多（據何廉先生的估計，文見獨立評論第六號）。假如地方平靜，官吏不侵漁，農業資本由政府補助，并耕法力加改良，那末，衣食不足的問題，雖不能設完全解決，至少也可以解決一大半。積貯，移粟，移民的法子也可以補助一部份。

在中國歷史上所試過的企圖解決衣食不足問題的方法，沒有一個長期有效的。就是極慘酷的饑荒，刀兵，結果也只博得短時期的够吃够穿。至於節衣縮食并不是解決的方法，因為它就是衣食不足問題的本身。最可驚嘆的是：我們民族雖則沒有直接解決這個嚴重問題的方策，却有閃避不理這個問題的法子。這些法子構成了我們國民習慣的極重要的部份。

這類的方法的第一個是等異消費。孔子曾說過，「爲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似乎孔子的意思贊成某一種的平均分配。但是無論孔子的真意如何，後來的儒家是要「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的。所謂貴賤有等，就是要皇帝衣食最好，諸侯次之，大夫又次之，士又次之，平民只可穿粗布吃窩頭。所謂長幼有差，就是孟子的五十歲以上衣帛，七十歲以上食肉的辦法。這種等差分配法是降禮的荀子所極力主張的。他主張這個的理由，雖則不是因爲怕衣食不足（其實等異方法不能真正解決衣食不足的問題），但是，儒家的這種政策施行長久之後，使一般平民覺得他們衣食不足乃是天經地義，不覺得怎樣不平；的確是延緩亂世來到的一個方法。戰國時主張與平民平均勞苦，平均消費的絕不是孔子之徒，而是墨家農家。許行主張君民並耕而食，墨者主張無論什麼人的棺材都只足「桐棺三寸」；這種「尊卑無別」的制度是儒家所最反對的。中國的政治受了儒家思想的支配幾千年，而墨家很早就衰微；主要原因恐怕是儒家所主張的分配消費法極有利于統治階級，而墨家主張於他們絕無好處。但無論如何，等異消費是我們民族閃避衣食不足問題的一條路徑。我們民族的第二個閃避這個問題的方法是相信有命。

衣食不足的人是生來命不好，「命該如此」。大家相信「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所以衣食不足未到極端的人還可勉強安生，不至於爭奪作亂。這又是使我們不注意衣食不足問題的嚴重性的一個原因。很有意義的是：明等威并安命都是儒家的主張；這似乎因爲人不安命則等威就不能維持。所以這種方法與第一種閃避方法是聯帶的。（註四）

此外閃避衣食不足問題的方法還有退讓（自動地或被動地減少自己的消費，讓與別人），希望子孫富貴（自己雖受衣食不足的苦，希望子孫可以豐衣美食，算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求來生福（此生衣食不足，求補償於來生；此種思想，印度文化傳來後很盛行），用麻醉劑。有一個醫學家說，鴉片，海洛英等麻醉劑，似乎中國人吃比外國人吃爲容易上癮。有人以爲這或許中國人身體特別。中國人身體特別不特別，我不敢說。據我的意思，以爲這與衣食不足也有關係。生活太苦，就喜歡麻醉，以忘却苦痛；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外國的工人喜歡喝醉酒，就是這個道理。中國吃鴉片等品的人中間，窮人的數目很多；並且越窮越要吃；恐怕也是這個道理。並且，因衣食不足而精力不足。精力不足的人不能享受活動的娛樂（跑路，打獵，踢

球等，) 只能享受懶惰的娛樂。這大約也是容易上癮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閃避衣食不足的方法，就是養成耐苦的習慣——捱餓捱冷地活下去。許多人說耐苦是我們民族的美德。但這也看從那方面說。因為會捱冷捱餓，就老用這種消極閃避衣食不足的方法，結果，始終不想講求積極的方法去解決我們民族衣食不足的問題；這種的害處就不小了。或許有人說，假如衣食不足，活得下去，也就沒有問題。我禁不住要回答說，「其然，豈其然乎！」倘若世界上一切民族都用捱餓捱冷的方法對付衣食不足的問題，那末，大約特別會捱的民族要佔便宜。但是人家用積極方法解決衣食問題，衣食充足，因而身體強健，精神飽滿。我們因衣不足，不得不把一部份的能力去抵抗冷氣，同時因食不足而身上可用的能力太少。無論做什麼事，還是人家行呢，還是我們行呢？我請讀者自己下個斷語。

好些牙科醫生覺得什麼病都與牙有關係。我上文所說，大約要使讀者覺得也是那些牙科醫生的見解。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許多事情——信命，好退讓，望子孫，望來生，喜麻醉等等——都是由于衣食不是而起。這些事情當然還有旁的原因。然而衣食不足縱然不足最初引起這些現

象的原因；但因為這些現象是暫且對付衣食不足的法子，衣食不足就成了助長這些現象的一個大勢力。所以要改進國民的習慣，增加他們的奮鬥力，不能不先解決衣食不足的問題。縱使一時不能做到人人「衣帛食肉」，至少也得趕快做到人人「不饑不寒」。

(註一) 我疑心學學的衰微和中國科學不發達有關係，但前者不是後者的原因。這兩件事似乎都是由于重禮樂的政治思想(儒家)戰勝重工藝機械的政治思想(墨家等)的原故。儒家所以戰勝的一個原因，本文已經提過。

(註二) 洪亮吉治平篇(卷施閣文甲集卷一意言)，可以說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具體而微。據洪氏門人所編年譜，洪氏治平篇作於乾隆五十八年，即公元一七九三年。馬氏人口論第一版出於一七九八年。兩作相差只五年，這是件有趣味的事情。

(註三) 關於印度人的出家食素是否由於人口太多，衣食不足，這個問題，我很希望知道印度歷史的學者不吝賜教。

(註四) 墨子非儒下以「執有命」為儒者之說。論

語頗淵篇載子夏說「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可見儒家實執有命之說。

讀顧毓琇「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後

孫逸

(一)

「科學救國」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自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顧先生乘這一個機會，向學科學的人指示了一條應該走的路（本刊第三十三期），確是值得注意的，但可惜我讀了這篇論文之後，感覺到很失望，顧先生的說話，似乎牧師傳教的意味太深厚了一點，頗有麻醉的性質，他無異告訴我們說，中國人是無需上進了，亦不能上進了。這一種思想，我們是不得不加以糾正的。

同時，我也不禁感到悲觀，原來一班知識最高階級的大學教授，祇是些歌頌著過去，滿足著現在，無望於將來的不思上進的人們，中國怎能向前進呢？

顧先生開宗明義的一段總論裏說：「我認爲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巴斯德發明微生物的時代，或是愛迪生發明電燈炮的時代。」雖然顧先生並未指明現在究竟是什麼時代，但其中意思大概可知是「你若要想發明點驚天動地的

貢獻，那是夢想」的時代。這種和老學究所謂除了孔子便無來者的沒出息的思想，是根本錯誤的。天下並沒有絕對的真理，學問亦永無止境，發明驚天動地的貢獻的時代，永遠存在！當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很有一般人說，此後的科學是第五位小數以下的科學了（這就是說「各項科學的研究，已經漸進於精細的境界」）可是就是在這幾年之中，淘氣的倫忒根發現了X光線，多事的居禮夫人，發現了鐳，使當時的科學界，展開了一新頁。就譬如說最近吧，大家總以爲此後的科學總是循着電子說的道路進行了吧，可是叛逆的Neutron的學說，却又突然跳了出來了。顧博士啊，驚天動地的事兒正多着呢！

當然，我並不反對顧先生所謂「你要努力於科學的研究，只可以先做點關於極小部分的工作」，但若以爲除此以外，便無任何更大的希望，那却是根本不對的。同時這種使青年氣沮的指示，在道德上亦是不應該的。顧先生所謂「你若要靠你科學的發明，以致中國於富強，那亦是夢

想。「這話當然也對。事實上，這種以一人發明之力而致一國於富強的夢想，亦是從來沒有人實現過的。可是若是要集多數人之力，集多數人的發明，當然是有希望致中國於富強的。」

(二)

中國人究竟太聰明了。「現在世界上已有的發明，已經够中國受用的了。」中國人可以舒舒服服，不費一點氣力，直接拿外國人千辛萬苦的發明來應用，這正和日本打中國，中國可以不費一毫氣力，靠國聯的幫助來擊退日本的夢想，是完全一樣的。大學教授和政府要人，原來都是中國人，思想本來是差不多的啊！

模仿，依賴而不去創造，是中國最沒出息的思想。中國人專靠外國的發明來應用，終不免一輩子做「老起」，老是趕不上旁人！

孫中山先生說，中國學外國，須迎頭趕上去。顧先生這種追隨背後的精神（幾乎是毫無趕上的意思），似乎是應該提倡的啊。

是的，「瓦特的蒸汽機，愛迪生的電燈泡，我們儘可以仿造」。但我們應該知道蒸汽機和電燈泡已經發明了多少年了？世界上最新發明的東西，你能仿造嗎？這些最新

的發明的張本，多藏在發明者的保險櫃裏（當然其中亦有請求專利的，但這大家知道是危險的方法），你能仿造才怪！於是，旁人用一九三二或一九三三的槍炮，中國人還祇能用十九世紀的槍炮。一個很巧妙的專想措油者的活報應。

顧先生不主張中國人學純粹科學，然而他又說：「中國科學教育方針，應該是注重基本訓練，而以促進物質進步為重要目的。」我對於這一點，亦不免有所懷疑。基本訓練是否是偏重純粹方面的？又，無新的貢獻，怎樣能「促進」？

中國人終究是太聰明了！非要自己能看到結實，是不肯下種的。中國人不植樹，因為等到長成森林後，他自己早已壽終正寢了。中國人不墾荒，因為到荒原得到報酬的時候，他已經是嗚呼哀哉的了。有決心移山的，祇有其笨不堪的「愚」公！所以，中國人也不學純粹科學，純粹科學者自身是採不到果實的。

當然，「相對論」救不了中國，一切純粹科學對你都不能有什麼實際的幫助。然而已往的事實告訴我們，應用科學總是跟了純粹科學走的，科學家研究純粹科學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到，旁人亦不能預期到，它將來有怎樣實用

的價值。但這實用的價值，自然而然會產生的。法勒第研究磁誘導的時候，他並不是抱了要發明一架電機的目的的；倫忒根研究X光線時，亦決不會想到它有這樣大的應用。同時，你倘然離開了熱力學的理論，要築一具恆動機器，却永遠也不得成功。

自然，有人以為「中國太危急了，等不及新發明。」新發明不一定能救中國。」好吧，你用世界上已有的發明吧。但是，你却永遠祇能用十九世紀的鎗炮，或用二十世紀的器械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三)

中國人窮，這是已成的事實，誰也不必諱言。但是，我們是不是願意永遠窮下去，不再富起來了？這回答是不用我說的了。

有人說：「中國派遣到外國去的留學生，所帶回來的東西，正是不多不少的幾件外國玩意兒。」這話現在似乎更對了。外國人已有的發明太多了，中國人不用再努力了，拿他們已成就的來應用吧。但是，中國人所仿造的外國東西，是否能和外國人自己所造的東西競爭呢？於是，洋貨隨着留學生一起回來了。

於是中國更窮了。

中國要不窮怎樣？應該自己犧牲代價，應該自己替自己想方法。你以為中國人不能有新貢獻麼？除非你承認黃色的人比白色的人才能卑下，這話是不會對的。

(四)

顧先生似乎是反對中國青年研究科學的。「假定兩個可以進研究院試試」，但是「將來的成績當然不知道」。這無異告訴青年們，你們是沒有希望的，你們不用研究了！（有希望的，祇有現在這一班大學教授了吧？）就算中國的青年，都聽了顧先生的話，不再繼續研究了，那末，我試問，中國現在對這一班大學教授們就完全滿足了嗎？這一班大學教授已經够了嗎？不必有人再研究更專門的學問了嗎？

顧先生孜孜不倦地告訴青年們說，發明是非天才不辦的，并拿愛迪生的話為證。然而，我以為青年們正不必灰心，愛迪生本人是不主張天才學說的。「天才百分之一是靈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淋汗」（見M. A. Roanoff 著 Edison in Laboratory · Harper's Magazine 一九三二年九月號）他除了「拼命幹」之外，他什麼也不知道的。青年們，幹吧！

無論研究學問是否是能成功，然而，至少我們要去研

究才有希望能達到成功之路。同樣，一個人志向，無論能否實現，「某生少有大志」總要比沒有大志的某生要好一點。因為有大志至少還有幹的精神，而無志則什麼都完了。顧先生以為「我們不希望每年各大學的理學院畢業許多預備做純粹科學研究而失敗的落伍者」，我以為我們寧願有許多做科學研究而失敗的人，我們不願有幾個沒出息，不上進而歌頌過去，滿足現在，無望將來的大學教授！

顧先生所謂「理學院大部分的畢業生，最好到實業界去工作」。這我當然表同情。這本來是一條正當的路，同時亦是必須的路。中國本來不需要學地質的人做交通部長，或教育部長，學化學的人做教育廳長，學天文的人做公使，或學電機的人寫幾篇短劇啊。

但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的，即是到實業界中去，就不需要研究了嗎？關於這點英國人已經先有經驗了。英國倫敦大學的馬丁（Dr. G. Martin）氏談於英國的工業，不能與德國匹敵，曾經說過：「德國化學工業之發達，實以鼓動研究為其基礎，而吾國（英國）不然，大學評議會準以法規，使最良好之學生，初無研究之機會。：但實需最高發明及實用人材之商業界，恒未有身受研究方法之人，以致（英）國中實業界及教育界之間，存有深淵巍壁，

不可溝通。工廠之首領，或大工業之指揮，因對於研究之精神及實施，素未領略，故對之亦毫無同情之表現。然在德國則情形異是，……對於科學研究工作之同情心，乃德國工業界之一特徵……」

所以，事實上並不如顧先生設想那麼簡單，以為到實業界中去是無需乎研究的。

（五）

我可以舉一位大科學家的話，作我的結論。

柏金（Berlin）是發明第一種煤焦油染料 mauve 的人，亦可說是這偉大的煤焦油染料工業的創始者，他當然是一位應用科學家，但他曾說過：「科學研究之目的有二，既為科學自身之故，復可作工業上之應用。吾所謂為科學自身之故者，是蓋吾人觀及此煤焦油染料工業神奇之果時，慎勿忘一切研究之源，我不過對自然之法則及秘密，欲得一更深刻之知識而已。倘無此種研究，即不致有煤焦油色質可以發現。」

一九二三，一，八，晚，

編者按：顧毓琇先生原文的主張確是有點太偏，我們也料到那篇文字一定要引起科學家的抗議。孫逸先生這篇抗議的大意是我們都很贊同的。自

然界的秘密，決不是二三百年的人力所能完全發現或發明的。我們的科學家儘可以放胆去幹；一分的努力自有一分的酬報。

此文中引愛迭生的話，原文是 *Genius is one per*

cent inspiration, and 99 per cent perspiration，我曾試譯爲『天才是一分神來，九十九分汗下』。附記於此。（胡適）

漫遊散記（十五）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

龍爪山的獯獯

我從環州到了元謀，於民國三年五月二十日過金沙江到了四川會理縣境內。沿途所遇見的都是漢人，只有從松坪關向通安州的時候，在普降河附近，遇見一位獯獯貴族婦人，騎着馬，跟著一匹馬，從我身邊經過。她看見我繪圖，就下馬來問訊。她聽見說我是北京來的委員，很恭敬的說道，「舍下離此不遠，請到那裏休息」。我的鄉導告訴我她是普隆沙土司的妹子。我因為她家不在路邊，就謝絕了。她也匆匆的上馬去了。以後鄉導說沙土司做人最好，家裏藏得有許多書。我很懊悔，沒有去拜見他。通安土州原也有土司，但是我去的時候衙門沒有人，而且這是會理著名的銅鑛，漢人很多。我忙了看鑛，就沒有理會別

的。

直等到六月四日我到了會理縣城想到縣城東北的龍爪山去測量，纔又有機會看見土人。龍爪山離城十八公里，是會理境內有數的高山；出海面三千八百公尺，比泰山高出一倍多，比五臺還高三千尺左右。天晴的時候很遠的即望見牠，——我以後到發窩的望鄉臺大山，離牠一百三十多里還看得很清楚。一直到東川西南的牯牛寨大山，離已二百多里，還隱約的認得。但是山周圍都是獯獯的村落，不但上山要他們帶路，就是下山的住宿也非找他們不可。於是縣衙門裏派人從龍爪山脚找了三個獯獯來，決定于六月七日引我上山。

從會理城到龍爪山直線雖不過十八公里，道路是彎彎曲曲的，實際上在四十華里以上。而龍爪山高出會理城一

千三百多公尺——差不多與妙峰山和北京城的比例一樣——還要下山住宿，所以路是很遠。我天剛亮就出北門，到三元橋與向寧遠的大道分路。我們的路順着一條支河向西北。起身時候本來是陰天。一過三元橋就下起大雨來；路上的水有五寸多深，很是難走。我們都披着雨衣。三位帶路獾，帶着羊毛的氈斗篷。這是四川獾的制服，無論冬夏都是如此。此外他們的裝束與漢人沒有多大的分別，不過經頭的布要比漢人的長大些。

從會理城起，走了六公里多路就到山根。上山的路很窄狹，又因為雨忽下忽止，路十分難走。路是順着山溝向上的。從山根起，走了八公里，到了溝的盡頭，已經上了七百公尺。路原是向西北的。到了這裏，要改向北；還有七公里，再上高三百公尺，就可以到山頂了。當時雨更下得大了；滿山都是雲霧，幾步之外，就完全看不見路。我們的雨衣也都濕透了。而那三個帶路的獾，一走到溝頭的嶺上，都蹲在地下，不肯再上，因為他們都已經喝得爛醉了！

原來一出城的時候，我就看見他們每人身邊帶着一個油鑊式的瓶子。起初我以為是他們帶的水，沒有注意。以後看見他們不時舉着瓶向口裏倒，問他們方知道是酒，三

個獾之中，只有一個漢語說得好。他對我說道，「我們夷家只有包穀（玉蜀黍）做的酒，力量不够大。昨天晚上委員賞了我們錢，我們就在城裏每人買了一瓶好燒酒。原來想帶回家去喝的。下了雨路難走，身上濕了，有點冷，所以路上先呷幾口。」那知道不呷則已，一呷就沒有限制。剛到山根有一個已經把酒喝完了。狼狽的上山，一個人掉在後面。等到了嶺頭，那兩個也就喝醉了。

我上龍爪山原是想去測量的。眼看見一山的雲霧，目的是達不到的了，天色又不早了，鄉導又是幾個醉漢，只好決定放棄登山的計畫。從嶺頭仍然向西北下走到山腰的龍爪山村投宿。

向下走不到二公里，雨忽然止了，雲漸漸開了。向北望龍爪山雖然依舊是一片濃霧，西面的高山和山下的深谷却逐一的現露出來。路也由西北轉向了北，順着龍爪山的西坡走。高度仍然在出海面三千三百公尺以上（一萬英尺以上）。路的西面是一個極深的大谷，就是安寧河下游的撒連河。從我們的路到谷底至少有一千七百公尺深——美國馳名的哥老拉多峽谷 Colorado Canon 一樣。若是從龍爪山頂上計算，還要加上五六百公尺。這大概是世界上最深的峽谷。谷底滿都是水田。六月裏都是綠秧。山坡全

是紅土。紅綠相映成一幅絕好的畫圖。谷西面的高山，平均也在三千公尺左右，自南至北，像一道高牆一樣。會說漢話的一位獼猴，酒也醒了。指着谷底的一個大村說道，「這是撒連，著名出甘肅的地方。撒連北面是潘林溝，田地極其肥美，是我們會理最好的地方」。我問他道，「這大溝裏有你們夷家嗎？」「一個也沒有！我們夷家，第一怕蚊子，第二怕熱。所以我們村落都在高山。這種溝裏，全是熱風。下去就要得瘧氣。我們如何敢住！」。

再向北走了六公里纔到了龍爪山村。這是一個十幾家的獼猴村落，緊靠着龍爪山的西脚下。出海面仍然有三百公尺。六月裏天氣，傍晚的時候溫度仍然在攝氏十六度左右。村子裏面房屋極其簡陋。我就住在帳篷裏過宿。

我原來的計畫，下了龍爪山要沿西坡繞到山北再向東到白果灣，去看會理著名的一碗水鉛銀鑛。所以三月七日，從龍爪山村出發仍向北走。但是夜間又下了大雨，我的洋布帳棚不但是弄得滿的泥漿，而且浸透了水，異常的重，驢子駝不動。只好臨時僱幾個人抬着走。如此一耽擱，出發的時候已經過了十點，眼看趕不到一碗水了。和羅果鄉導商量，到毛毛溝祿家過宿。

祿家離龍爪山村不到十二公里，不過昨天走的一半路。但是全是山路。因為龍爪山是一條南北的大山。所有的山溝都是從東向西，流到撒連河的深谷裏去。我們初起向北。二公里半到了紅岩子，再向東北。路線正與溝成一直角。沿途都是一上一下。紅岩子過去，過了兩條溝，就轉到了龍爪山的北坡上。從此又向上走到三千五百公尺左右，然後再下到毛毛溝。過了溝上東北坡纔到祿家。（高出海面三千三百公尺）沿路又下着雨，走的很慢；二十多華里路大半天方始到着。

祿家是羅果的富戶：每年有六十石糧食可收。田地以外，還有五六個奴僕，三十頭羊。牧羊是獼猴重要的工作；羊毛可以做氈斗篷，羊乳可以喝，還可以做乳餅。以上的種種事實足以證明獼猴原來是畜牧的民族。原作的地方大約在中亞細亞，因為這種生活不是在高山深谷水田的區域所能發生的。

祿家的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是一位身長六尺的中年婦人，漢語不大會說，但是招待很是殷勤。我仍然住在帳棚裏。因為棚布是濕的，裏面很悶。雨不下了，就走在門口閑看。祿家住宅四圍有院牆，門口有一座柵樓。忽然女主人走了出來，向山坡上一望，一把拉着我向裏面跑，口

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

丁文江

這是我在燕京和協演講的題目。當時並沒有稿子。以後在報紙發表的是聽講人的紀錄，當然與我所講的不能完全相符。我現在追憶兩次講演合併寫出來，登在本刊。

在今天國家危急的時候，青年的責任是什麼？青年應該做什麼？這種問題不但青年要問，就是我們已經不是青年的人也常常要問。但是沒有答覆這問題以前，我們先要知道我們工作的效能，因為抗日救國不是單憑情感所能收效的。不管效能如何，盲目的工作，不是負責任的辦法。

今天中國對日本的關係完全是變態的，通常國際的關係不是和就是戰。我們的領土被日本佔領了一年多了；上海的戰爭，我們死去好幾萬人，損失萬萬元以上；現在山海關又被日本佔領了，而我們既然沒有宣戰，又沒有議和！於是許多人提議出兵收復失地，與日本斷絕國交。他們雖沒有明言對日宣戰，但是如果我們實行這種主張，宣戰當然是免不了的。對日宣戰，能够發生效能罷？我們政治上的情形和官兵的訓練，我暫且不提。單就物質上講，

我們沒有宣戰的可能。中國號稱養兵二百萬——日本的常備兵不過二十萬——中國的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數論，當然我們是佔優勢的。但是我們的一師人往往步槍都不齊全，步槍的口徑也不一律。全國所有的機關槍大概不過幾千桿——歐戰的時候作戰的軍隊每一師有一千五百桿。七五公厘的野砲大概一萬人不到兩尊——實際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砲，坦克，毒氣和飛機可算等於沒有。所以以武器而論，我們的二百萬兵，抵不上日本的十萬。歐戰和上海的經驗告訴我們，近代的戰爭是最殘酷的，是限于戰鬥員的。海上和空間完全在日本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砲台都是四十年以前的建築，絲毫沒有防止日本海軍的能力——吳淞的砲台不到五分鐘就毀于日本砲火之下。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的時候，江北的軍隊受日本海軍的監視，不能過江。最後上官雲相的一師夜裏用小船偷渡，因為擁擠，船翻掉好多隻，淹死了好幾百人，而過江耽擱久了，瀏河沒有防禦，日本人就在那裏上岸，抄襲十九路軍的後路。上海事變一發生，南京政府就不能不遷到洛陽。

凡日本的海軍和空軍力量所達到的地方當然完全是日本的組上之肉。所以我們對日宣戰，完全是等于自殺。

作戰不但要兵器，而且要錢。中央的收入，最好的時候不過六萬萬多萬。其中一半以上是內外債的抵押品。九一八以前，中央所能自由運用的款項每月不到三千萬。上海的事件一發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一落就落到二百萬！當時凡有靠中央接濟的機關立時等于停頓。軍隊的餉項也就沒有着落。所以一旦正式宣戰，日本佔領上海，封鎖我們江海沿岸，中央的財政立刻就要破產。

以上的事實原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提議出兵收復失地的人，或者是另有作用，或者是爲情感支配，不免自己來欺騙自己。

我們既然不能對日宣戰，我們只好抵制日貨了。抵制日貨是應該做的，是可以做的，因爲至少我們要使得我們的敵人知道他們侵略中國會發生惡影響的，是要受相當的損失的。可惜我們去年抵制日貨的成績太可憐了！去年中日貿易進出口一共是五萬萬圓（五〇〇，四九七，〇〇〇圓）。其中由中國輸出到日本的是二〇六，四四二，〇〇〇圓，由日本輸入到中國的是二九四，〇五五，〇〇〇圓。兩者相抵，我們的對日的入超是八千七百萬圓！這是

連東三省的貿易計算在內。東三省去年的對日貿易進口是一三四，八三二，〇〇〇圓，出口是一〇二，七一九，〇〇〇圓。所以入超是二千二百多萬圓。若是把東三省除外，我們依然有五千五百萬圓的對日入超。這是有兩種原因：一是因爲日圓落價，所以日貨特別的便宜，二是因爲日本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的關稅，所以我們的輸出減少。但是單中國本部，對日貿易總數仍然有二六二，九四六，〇〇〇圓之多，足見去年抵貨的成績是不可問的了。

去年的成績不好，今年不妨從新努力的。但是從上面的數目字我們又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日本全國的對外貿易共約爲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所以中國本部的對日貿易（東三省除外，香港在內）還不到日本對外貿易總數的百分之十。縱然我們的抵制日貨政策絕對的成功，中日的貿易完全消滅，日本的對外貿易仍然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之多。由此看起來，雖然抵制日貨可以使日本受相當的損失，然而決不能制日本的死命，決不能使日本交還我們的失地。何況不用政府的力量來裁制，中日貿易絕對的不能消滅——就是多量的減少也不很容易。而且中日貿易原不是單于日本有利。果真消滅，中國也要受很大的犧牲呢？

所以目前要出兵收復失地，不但不能成功而且還要有

前唯一生路。

更大的損失；抵制日貨最大的效能，是使日本減少對外貿易百分之十。真正要收復失地，非中國能戰勝日本不可。如何能使中國有戰勝日本的力量，是全國人民的責任，尤其是現在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責任。因為這決不是幾年以內所能做到的。如果中國有這一天，一定是現在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努力奮鬥的結果。

為保存熱河華北，目前固然要積極抵抗，但是這種抵抗，決不是短時期可以了結的。縱然日本不攻熱河，我們當然還要收復東三省。縱然熱河又喪失了，我們還要保全華北。所以抗日的工作，不是憑一時的熱心可以了事的，是要有長期的繼續工作，使中國真能自衛，真能戰勝日本，纔可以發生真正的效能。

我所謂抗日，不是單指收復失地而言的。目前的問題

認清了這個目的，然後我們再問青年的責任是什麼？

已經不是收復我們已失去的東三省，是保全我們將失未失

青年應該做甚麼？

的熱河和平津。在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時候，大多數的日本人不過希望維持「南滿」的權利。因為佔領遼寧和吉林太容易了，於是纔擴張到錦州以西，長春以北。假如日本又輕輕易易的佔領了熱河，日本軍閥一定要向長城以南打主意。華北如果不保，中南兩部又豈能偏安？如此則中國全部的滅亡不過是時間問題，要使日本軍閥不能實行他們的計畫，唯一的辦法是使日本受最大的犧牲纔能佔領熱河，使他們的軍閥知道中華民國的土地是不容易讓與人家的，是要用金錢和性命來交換的。這兩件東西日本都不是不甚愛惜的。若是我們咬緊牙關抱定了不賤賣主義，他或者出不起這樣大的價錢，放棄他們一部分的野心。這是我們目

這個問題也只有在變態的國家纔會得發生的。假如中國的國家和歐美一樣，全國的青年早已接到了動員令，拿着槍，揹着包，「執干戈以衛社稷」去了。那裏還容你演說，捐款，貼標語，喊口號，視察前線，慰勞傷兵呢？因為這些輕鬆的工作，都是不能拿槍作戰的人所能做的，輪不著青年的。做這種工作，決不足以盡青年的責任的。如果有大學學生要逃難逃致，縱然不被槍斃，至少也被學校革除，家族不容，社會不齒。

如此說來，我豈不是勸青年去當義勇軍嗎？這却又不然。義勇軍的作用與抵制日貨一樣，是應該做的，是可以做的，是能使日本受相當損失的，但是不能制日本的死命

的。已失的土地不是單靠義勇軍所能收復的，將失未失的省分不是單靠義勇軍所能保存的。凡有青年憑他的良心，爲國家去犧牲，我對於他們萬分的感謝，萬分的敬仰，但是我決不勸告青年去當義勇軍。第一我對於目前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是否有當義勇軍的資格，不免有幾分的懷疑。前幾天我看見報上發表了幾位燕京學生從熱河的來信。他們敘述從北平坐汽車到熱河的經驗，似乎已經覺得很是苦痛。有幾位受不了震搖，已經嘔吐了。如果當了義勇軍，吃不飽，穿不暖，睡不足，在冰天雪地之下，做日本人飛機重砲的目標，他們是否受得了，實在也是問題。就是義勇軍——或者尤其是義勇軍——不能不講紀律的。紀律最重重要的原則是能服從命令。在學校裏以主人自居慣了的學生，不肯聽校長教員命令的學生，是否肯聽義勇軍連排長的命令。也許我這種懷疑是過分的。歐戰的時候，許多大學的學生，每天非洗澡換衣服不可的學生，在戰壕裡喂了好幾年的虱子。足見得吃苦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只要有軍令的強迫或是愛國的眞忱。但是目前中國的需要和歐戰時完全不同。歐戰的時候（尤其在不用徵兵制的英國）所最需要的是「人力」[Man Power]。中國現在並不是如此。在熱河和東三省能當義勇軍，肯當義勇軍的人至少在十萬以

上。目前的問題，不是缺少人，是缺少錢，缺少槍，缺少子彈，缺少服裝，尤其是缺少能指揮和組織的人材。現在一個受大學教育的學生去當義勇軍，縱然他能吃苦，肯服從，學會了打槍騎馬，是否比一個字不識的義勇軍高明，還是疑問，而他從小學到大學，十幾年的工夫已經糜費了國家社會好幾千的金錢。從社會國家看起來，這是極不經濟的一種辦法。不錯，這種自動的犧牲精神，是足以感動人心，激發士氣的，所以我已經說過了。我對於他們只有感謝，只有敬仰，但是這只可聽極少數的人憑自己的良心情感去做的，不必也不可勸告的。就是在歐洲大戰的時候，作戰的國家也未始不打這種算盤，所以凡有有專門技能的人，都設法使他們做專門的工作，不一定強迫他們到壕溝裏去。

凡是不能或是不肯當義勇軍的學生，當然不妨做些後方的工作。捐款也好，慰勞前線也好，救護傷兵也好。這些事我並不反對。但是我要請他們覺悟，這都是太太小姐們所能做的工作，不算什麼希奇。不能發生多大的效能的。這不過在無法之中，做自己良心上的安慰，就譬如我們幾個人辦獨立評論一樣。決不能因此要求學校裏放假，停課，或是免考，正如我們不能因為辦獨立評論，要求學校

不叫我們教書。

我說後方的工作不能發生多大的效能。這句話也許要加以說明。工作最切實的莫如捐款。但是我們仔細想想，我們的困難真正是因為沒有錢嗎？我們每年的軍費在三萬萬元以上，佔中央收入百分之五十。這十年來日本的軍費還不如我們的多。只有一九二一年他們的軍事預算到過三萬萬五千萬元。何以我們不能和他抵抗？再進一步說，人人都知道我們養兵太多，而沒有餘錢來供給武器。假如明天我們能够把兵額減少了一半，省下錢來去購買或是製造新式的武器，我們就能抵抗日本嗎？甲午中日開戰的時候我們海軍的噸數船隻都在日本之上。何以海戰我們弄得一敗塗地？足見得單有武器，沒有能運用武器的人，還是不行的。現在的軍官真有運用新式武器的能力與否，實在還是疑問。因為目前的高等軍事教育比任何高等教育還要落後。三十年前所通行的翻譯教授制度，只有軍事教育仍舊的沿用。這就是落後的鐵証。在這種狀況之下，私人的捐款最大的效能，只能使前線作戰的兵士知道後方的國民沒有忘記他們，或者可以振作他們的敵愾心，增加他們的抵抗力。但是我已經說過，這種工作，太太小姐們多能做，多肯做的，實際上用不着青年，輪不到青年。至少青年

不能以捐款為他們不讀書的口實。

還有許多工作大可以不必做的。即如所謂軍事訓練。在目前的狀況之下在大學裏面臨時添設這種功課，效果是很有限的。學生所可以學的，不過是普通的步兵操法。這種技能除了去當兵之外，沒有用處。不願或是不能當兵的人來受這種訓練，不但是白費時間，而且帶幾分欺人的性質。願意當兵的儘可向前敵去投效。國家養一個大學學生，一年平均要用一千元，學生私人的費用還不在內。一個兵士一年只要用一百多元。拿辦大學的費用來養成當兵的人材，那是多們不經濟。縱然說有少數人要以此為當義勇軍的預備，要求學校幫忙，學校當局應該要求他們立下志願書，在短期時間之內，一定去做義勇軍，不去則願意受相當的懲罰。如此纔能够免去虛偽欺人的毛病，增加社會上對於學生的信用。

第二種不必做的工作就是所謂抗日的宣傳。這種工作日本人天天在那裏替我們做着。許多中年的人做起來比學生要有力量。況且宣傳的目的無非是要引起國人的愛國心。我認為這並不是我們的缺點。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知道愛國的。要不然金元清三朝的入寇倒不會遇着那樣長期的抵抗了。但是若是單有了愛國心，國家就不會得滅亡，那

麼，金元清也不會得成功了。許多學生以爲愛國心是進過學校的人所獨有的東西。要向民衆去宣傳。這是很大的錯誤。上海事變的時候，送給十九路軍的絲綿背心都是不肯要錢的裁縫做的。當老媽子丫頭的人，拿首飾出來捐款的，我所知道的就不止一個。前天我在交民巷走路。看見有幾個日本兵僱洋車，一排七輛放着，只有一個車夫理會他們，而開口就要四毛錢。結果日本兵只好走路。中國的不識字的民衆何嘗不知道愛國呢？不但民衆如此，軍閥又何嘗不是如此。吳佩孚的不肯住租界，段祺瑞的離開天津，都是他們愛國的証據。我所見過的軍人，如馮玉祥，閻錫山，蔣介石，張學良，孫傳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我相信都是愛國的。可惜他們雖然愛國，他們沒有法子使愛國心發生效能！中國上上下下都是低能的國民，都不知道新式的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統治。其中有許多人受的教育太粗淺了，人格上沒有經過相當的陶鎔和修養，利慾當前的時候，免不了要受誘惑。這是我們今天不能抵抗日本的根本原因。

今天青年的責任是什麼？青年應該做什麼？他們應該要十二分的努力，澈底的了解近代國家的需要，養成功近代國民的人格和態度，學會了最低限度的專門技能，然後

可以使他們的一點愛國心，成功結晶品，發生出有效能的行爲。抵抗日本，收復失地，一定要到中國能有戰勝日本力量的那一天，纔會得成爲事實。要中國能有那一天，一定要澈底改造一個新式的中國。做這種改造新國家的預備工作，是今天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唯一的責任！

這是積極的。消極的講起來，至少青年不可做于抗日有妨礙的舉動。逃難，避考，向影戲園寫恐嚇信，溜冰場拋炸彈，都是例子。中國的鐵路都是單軌的，都是缺少車軌的。軍政當局根本不知道運輸應該有事先的計畫。一旦運起兵來，火車立刻就要誤點。逃難的人一多，火車的運輸更形擁擠，鐵路的秩序更沒有法子可以維持。一月初旬東西車站的紊亂，都是逃難避考的學生所演出來的。這不但增加了政府許多困難，而且損失了國民許多信用。普通人民對於學生的舉動向來是原諒的。到了這一次，社會上的質難漸漸的深刻。北平已經有人提議把北方大學的經費改充軍餉。聽說南方也有人向政府提出同樣的建議。這種計畫如果實行，中華民國的前途更沒有希望，因爲要建設新式的國家，必須要有受過新式教育的人材。大學如果停辦，新人材的來源就斷絕了。那不是等于自殺嗎？但是要得這種提議不能實現，青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恢復社會

的信用。要不然他們就是國家最大的罪人！

看影戲溜冰都不能認為是不正當的娛樂。溜冰尤其是維持健康最好的運動。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有一部分向來是反對運動，反對娛樂的。所以我們在私塾讀書的時候，一步不准出書房，終年沒有假期。不料到了今天，受高等教育青年，還有這種錯誤的思想，以為娛樂和運動是與救國不相容的。試問要做救國工作的人，就不要維持他的心理上身體上的康健了麼？終日「楚囚相對」，貼慷慨激昂的標語，喊痛哭流涕的口號，一定要弄出神經病來。抗日的工作又豈是神經衰弱的人所能擔任的？日俄戰爭的時候，我在日本。我沒有看日本政府對於娛樂場有絲毫的限制。歐戰的時候也沒有任何的國家禁止青年運動。我不是要獎勵青年在國難期中作為無益。凡真正作為無益的人——只知道看電影溜冰的人——無論在任何社會都是廢物，于國

難的有無，沒有關係。況且如果我們認為某種娛樂是于抗日有妨礙的，我們只可以要求政府正式禁止，或是提倡一種風氣，用社會的力量來裁制，萬萬不可用恐嚇的手段，來擾亂秩序。拋一個炸彈，並不能使電影院關門，尤其不能使看電影的人，省下錢來，捐給義勇軍，徒然增加市民的恐慌，損失政府的威信。我們只要看見北平娛樂場發現炸彈的第二天，米麵雜糧一齊加價，就知道這種舉動是誤國不淺的了。

抗日救國，不是幾天的事，並且不是幾年的事，是要有長期的決心和努力，纔能夠有成效的。在目前的中國，四十歲以上人很少有建設新中國的能力；我們的唯一的希望，是在目前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我相信逃考逃難，以貼標語喊口號自欺欺人的學生是少數的，是一時的，所以我把這兩次的演說合併寫了出來，獻給他們。

中國大學生的成績與缺點

詠霓

中國目前的苦境完全是前一輩人所造成。中國將來的前途當然要靠現在青年的努力。以前的國事還有許多甚至于大部份操之于不由學校出身的人，以後的重要事情差不

多全要大學畢業生去担任。現在已經是大學畢業生負責的時代。所以大學生的程度和能力關係是重大的，試看他們能不能擔當他們的責任，至少是在一種職業中自盡其

實。

從好的方面看，民國以來大學生的能力實已頗有進步。就我所知道的例如北京大學中央大學（連前東南大學在內）及清華大學的理科學生，北洋大學交通大學（包括上海與唐山）的工科學生，即使未曾出洋留學，也頗有人能在他們的專門工作中有實在的貢獻，和良好的成績。近年來的中國地質學工作，至少從量的方面看（在地質學中量的關係亦甚重要）中國學者所做的已大過于外國學者，而中國學者中本國畢業的所做又超過于留學回國的。在中國礦業中本國畢業生也很有極好的成績，此外各科學中本國畢業生都有相當成功，證明中國大學教育並不完全白費。對於大學教育失望的人一概抹殺未免有些冤枉。民國十七年北京大學開三十週年的紀念會時，葛利普教授曾有一個講演，歷數北大學生在古生物學上的發見和貢獻，引為北大的光榮。我想各校同學會以及其他學校團體，很可以仿此辦法，不時統計一下他們同學在專門職業上或學業上的貢獻與成績，這定是很有激勵意義的，也可以增加社會的信仰。同學之中如能有一點學問或事業上的建樹，他所給予母校的光榮，當然大過于產生了幾位造孽作惡的大官。

大學教育的目的在養成好的有能力的學生。如果出來的學生是有用的，其他方面即使有些不甚滿意的地方，當然儘可逐步改良，用不著一筆抹殺絕對灰心。

中國事情往往是這樣，某種事情起先大家希望太高，以為只怕不辦，一辦起來便有飛快的天大的好處。等到剛剛有些辦起來了，當然好處還不甚顯著，而初辦的事缺點不能盡免，於是就有人向著缺點盡力攻擊，把事業整個推翻。其結果是事事失其信用，人人覺得灰心。所以我們常聽見說教育救國，科學救國，過了幾天便又喊教育亡國。科學雖還沒有人說他亡國，但剛剛有些發軔，便已很有人說科學無用。這正和政治制度一樣，試了這個又試那個，一忽兒又回到這個，輾轉反覆而民不堪命國不可救矣。無論什麼事總要用真知去分別好壞，有毅力去逐步推行，尤其是要從中國千餘年的八股腦筋去接受現代文化，更要有許多耐心用許多苦工。

以上已是題外之言。我說中國大學學生很產生了許多有用之材，但我也不是說他們毫無缺點，就我所感覺的可分為幾點說明。

第一是缺乏普通的常識。說起來也許有人不肯相信。我常感覺許多大學畢業生，只要有人領導，叫他們做窄小

的專門工作還甚容易。而要他們自己去解決比較普通問題，却往往甚難。偶讀國聯教育考查團對於中國教育的報告書，其中也有這樣的話：

……教育機關之人員，有時遇著比較普通之問題，雖利用所有一切材料，尙難由已知之事實中求出結論。……彼等對於普通問題，甚至對於現成材料，均無充分之知識。……

因爲人生在世遇著的實際問題甚是繁多，決不是全靠教科書內的現成方式一一可以解決。教育所給予我們的好處，第一是養成思考能力，只要有相當材料，便能自己得到真實的結論，或是遇見一定的問題，自己能够找出解決的途徑。如果缺乏這種普通能力，而只學到一些專門技術的成法，則那個人只能在專門事業上有他的局部的貢獻，（當然亦甚重要）而對於社會事情的見解及判斷，一定不能正確，叫他担任普通的事物或是專門事業中比較綜合的職務，他反不能勝任。萬一他的專門技術又不甚高，或雖好而偶而不得其用，他便成了無用之人。而且如果社會上有許多見解不清判斷不明的人，社會的進步便會受他們的壞影響。並因此養成盲從的輿論，影響到國家政治。

第二是缺乏應用的精神。大多數中國學生的心理似乎

常想有什麼用，才去求什麼學。而不常想有了學問，便極力去用。他們常探聽什麼學有用，什麼學無用。所謂有用者，便是容易找事，謀生活的意思。這本是人情之常，未可厚非。可惜的是除了生活問題之外，便缺乏用其所學的志趣。譬如一個學化學的，如果沒有機會做一個化學試驗所的研究員，而做了一個普通機關的職員，不但他的學問不會上進，而且很短的時間會把他整個的拋棄了。儘有空閒的時間，他寧使去打麻雀。不但想法自己去做一些工作，即使有現成的化學書報，近便的化學講演，也懶得去看去聽。其實無論何國社會上究竟能吃專門飯的人少，做普通的事多。但做普通事的人生活之外並不禁他對於某種特別事情上多用一點心。例如西洋人在中國傳教或做外交官的往往成了漢學專家，或對於某種研究有了特別知識。所以不肯應用，不能應用，也是中國許多自以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煩悶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各種事業都靠試驗與磨鍊出來。所以努力去幹，雖學問本非甚深，後來也能成功。不肯應用，雖功課成績甚好，亦是徒然。近來上海很有幾家工廠，都是由化學程度並非甚高的人，極力試驗成功的。這便是應用精神的表現。而現在大學生這種精神似乎不多。

第三是缺乏開創的能力。中國雖是一個古國，但在現代世界中我們應該開創的事業正是甚多。開創一種新事業像開墾一片新田地一樣，必須要有一種 Pioneer 的能力與精神。不能專吃現成飯，隨着他人走。現在大學學生在校時常是探聽人家學的多的科目，跟着去學。出校後專向人家已做的事業搶着去做。至于許多尚未發達的科目，或尚未開創的事業，反往往無人過問。結果是一方面人浮于事，一方面是有事無人。我以為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最要緊的是要養成學生對於事業上幹功立業的志趣。再給他實現此志趣的能力。有太多的人，除生活以外無他志，或是誤解人生觀，只圖目前的享樂。青年人應該信仰『事在人為』，

今日中國的兩線希望

尹 及

「有志者事竟成，」奮勇的把有益的事業担在自己肩上，做一分是一分，得一步進一步。

大學畢業有了專門學問的人，能够得到一個專門機關，有專家的指導，有專門的設備，從事研究有所貢獻，這固然極好。但一國之內也用不着太多的調查所或研究所，即使調查研究的結果，也希望有人能拿去實用。

要試驗大學生的真正能力，最好的方法是放他在地廣人稀的西北地方，看他能組織起什麼事業來。也可以放他在黑暗混沌的衙門內，（現在還有的是）看他能不能有正確的見解，與做事的效率。

今日在中國與明末的中國，真可謂無獨有偶！明末時

流寇橫行，今日則共產黨猖獗（雖說剿匪勝利了，但這「勝利」能支持幾時？據會觀察克復後匪區的某君談，他說

「這次總算官兵打贏了！」，其意在言外了！）。明末

天災人禍一齊來，今日的水災旱災和兵燹大烟也一齊有。

當明末李自成打到北京時，崇禎皇帝向諸大臣籌款抵抗，

諸大臣相顧愕然，不拔一毛，崇禎遂廢然興歎，他說「君

非亡國之君，民非亡國之民，而臣皆亡國之臣」。今日中

國的「臣，」何莫非如是？國難到如此地步，尚有陳孚木

李國杰這種的「臣」！尚有「相顧愕然」望風逃避的士

大夫（指學生們）！明末時人心呈整個瓦解的像，今日中

國的人心也是真正的土崩瓦解。明末時亡國的恐怖來自

東北，今日亡國的恐怖也是來自東北！現在這個恐怖已「進關」了！我們眼巴巴看着亡國的大禍就在目前了！

但是我們眼巴巴的看着今日的中國與明末將亡的中國一樣，有甚麼地方可以想法兒來保留這個祖國呢？那是看現在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到底有甚麼重要的分別？和有甚麼有希望的共同點。

我想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分別，就是在明末時無所謂「國際均衡」，而在今日則有所謂Balance of Power

明末時的生死爭鬪，是那時的中國人與那時的滿洲人的爭鬥，無第三者的干與，彷彿兩個獸物在籠裏相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縱有第三者加入戰團，這第三者也是想收漁人之利，想把兩造一齊吞下去，如元朝把金人及宋人一齊征服一樣。那時候並無一種「大家都活着，大家都均衡着，大家都看着大家」的思想。所以明人與滿人相持，誰打敗了誰誰作奴隸。

但是現在的世界不同了。任何兩國打仗，總有無數的其他國家瞧着，預備着，留意着打仗的結果是否破壞十七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的最大原則——就是「國際均衡」。所以甲午之戰，俄德法英等都瞧着，預備着。等到馬關條約把遼東半島給了日本，俄德法就馬上起來干涉，強迫日本

把牠交還中國。當然，俄國是無疑的有自吞遼東半島的野心，但是讓日本一人吞下這塊肥肉，畢竟有損於「國際均衡」。所以俄國租到旅順大連，英國就馬上要租威海衛，法國就馬上要租廣州灣，也無非是要保持這個原則。

也許歐戰後這個「國際均衡」的原則，有些改變，但是仍大體一樣。試看法國今日在歐洲的種種政治活動，無非是保持歐洲大陸的均勢。爲保持這均勢起見，法國不惜利用與「國際均衡」原則相背的國際聯盟。基於「國際合作」的國際聯盟，竟被自私的法國拿來作維持國際均衡的工具！可見得今日究竟是一個國際均衡的世界，還未到一個國際合作的樂土。

這個「國際均衡」原則曾引起很多次戰爭，但也曾保持過相當的和平。試看中國收回山東就可知了。歐戰時青島及膠濟鐵路和山東省的一重要部份都落於日本人之手。老實說起來，那時日本佔了山東比現在牠佔了東三省還要危險，因爲佔了山東便是扼住中國的咽喉，那時國都在北京，日本在濟南擋住津浦路的通車，就可沿黃河岸把中國截而爲二。況日本在山東南去也行，北去也行，所走的都是寬坦的平原和快通的火車，要征服中國，山東真是最好沒有的大本營。更糟的就是英法諸國居然在一九一九

年把日本人佔領山東予以法律的及條約的承認！

但是在一九二二年我們居然把山東拿回來了。我們能够把這塊緊要地方拿回來，難道是因為我們那時長強了嗎？難道是因為我們打了一次勝仗嗎？難道那時的中國是統一了嗎？一九二二年的中國比一九一九年的中國，不但是沒有變好而實在是每況愈下。一九一九年不過是南北兩政府對峙的時候；一九二二年接着直皖戰爭便來了奉直戰爭，那時正是軍閥混戰的時候，中國最少有三個政府。政治上那時的中國既是分崩離析，而在思想上，在社會行為上，在道德信條上也正是新舊派衝突時期，雖統一的局面更遠。以較好的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加上五四運動猶不能阻止巴黎和會把山東送給日本，而較壞的一九二二年的中國——分崩離析的中國——居然不勞一兵一矢把偌大的山東收回來。我們試捫心自問，我們那時憑甚麼收如此的功効？兵力嗎？中國兵打不過日本。好政府嗎？北京內閣朝立而夕倒。財力嗎？連馬上贖回膠濟路的錢都沒有。

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那時的成功，不是憑我們自己的力量，而是憑外來的力量。這種力量便是國際均衡的壓力。日本佔領山東與太平洋上國際均衡的原則不合，所以英

法美——尤其是美國和英國太平洋上的屬地——非要日本把山東（二十一條凡爾賽條約都給了牠的山東）放棄不可。這與俄德法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相像，日本雖蠻橫，然凜於已變成政治舉動的世界公論之不可蔑視，也居然乖乖地聽服了。

今日本之佔據東三省，其違背國際均衡之原則，與佔據山東正復相同，列強早晚總要取某種政治舉動的。但是現在都不動，那是因為列強自身內部問題太多了：失業問題，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和歐戰後賠款戰債的種種負擔，都是使列強個個都觀望着。但是我相信列強決不能白白讓日本單動的吞併東三省，因為如此則遠東的國際均勢不能保持。

除非列強馬上要共管中國（照現在情形看，馬上共管是不容易實現的），列強的利益終究在維持中國的政治獨立，不是因為他們有甚麼厚愛於中國，而是因為惟有這樣才能維持遠東的國際均衡。所謂門戶開放主義者，就是保持遠東國際均衡的意思。所以由政治獨立之立場看，國際均衡原則是對於中國有利的，而中國欲維持政治獨立，亦止有運用國際均衡之一法。中國罪孽深重，懦弱無能已到極點，純粹憑自己的力量自救危亡，恐怕是廢話。古人

有言；「孟賁之勇不能自舉其身」，何況中國現在尚無「孟賁之勇」乎？救中國的危亡，非有外力不可，而這種外力——國際均衡——一定要由我們自己運用。

運用國際均衡的外來力量，不能算是羞辱。自有外交以來，那一國不是運用此力量來保持自己的國土？自己力量不夠，當然是要利用外力，這是不消說。加富爾看薩典利亞的力量不夠敵奧，不得不求助於法國。美國十三州看自己力量不夠單獨抗英，又不得不與法國訂盟。求外力不算是羞辱，視乎自己能否運用，看自己能否作主。如果我們能自己作主，那麼運用國際均衡的力量，也許是中國保持政治獨立的一線希望罷？

中國外交受陳語爛調的禍真不少！李鴻章時，還用「遠交近攻」「以夷制夷」的話標榜於世，到了近幾年，連甚麼交都不講了，要打倒一切強國，鬧到四面楚歌到處仇敵的困境。無事時則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以打倒帝國主義者，拯救弱小民族爲己任；有事時則哀號乞憐，但是所乞憐的都是已得罪過的了。原來外交上有一基本原則，就是「一時只能够有一個敵人」，(you can afford to have

only one enemy at a time)，這個簡單原則，過去的當軸袞袞諸公，似乎未曾領會，鬧到現在中國連一個得力的

朋友都沒有，自陷於不光榮的孤立。今日的急務是在國際間找朋友。找朋友的道，第一在自己充實力量，第二也要作外交上聯絡，最少可以防止外敵從中破壞充實自己力量的工作，如俄國與鄰邦訂互不侵犯條約，爲的是聯絡左右鄰舍，使自己建設工作不至於破壞。

俄國近來的外交值得我們效法。你看牠絕不「遠交近攻」，近的牠交，連兇橫的日本牠都忍耐到底。遠的如美國牠能交則交，不能交也罷。反正最能與你搗亂的是你的近鄰，除非你要征服你的近鄰，不然你須與他們和好。如近鄰難於和好，則須認清誰是最大的敵人，然後抱「一時只容許一個敵人」之原則，盡力與其他的和好，和好方法不外知己知人，應其所需。朋友都是費力氣找來的，絕沒有天墜落來給你的，國際間亦何嘗不是？

中國的近鄰，強大的算是俄國和日本，現在與日本和好之路既走不通，當然要與俄國和好。但和俄第一要明瞭俄國情形，第二要想想中國能給俄國什麼好處。加富爾作薩典利亞的商務總長時，便提議把對法國入口商品的關稅律減低，以買好法國，復親自去巴黎與拿破崙第三訂交。

後來更不怕議會罵他賣國，居然肯割二城 (Savoy and Nice) 給法國。西洋外交家之斤斤欲買好得力的朋友如此

，我國的外交家的開口罵人帝國主義者又如彼，我國的外交怎能收勝利？所以我們要結好俄國——我們敵人的敵人——，一定要我們先給牠點好處，而要知道牠要甚麼，先要考察牠國內情形。中俄復交那天，大公報組織蘇俄考察團的主張，是很對的。

一九二二年美國是太平洋國際均衡的樞紐，現在恐怕要算俄國了。現趁中俄已復交，這個機會不可失。運用國際均衡的支點，也許是俄國，今日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分別也在這裏，看我們能否利用這個機會罷！

今日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有希望的分別已如上述，有希望的共同點是甚麼呢？我以為是這樣：華南是反攻的大本營，是救中國恢復中國的策源地。

清朝征服華北比較快點，征服華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費了五十年功夫才告成功。反抗清朝的勢力都不是在華北華中的一望無際的平原，而在高山峻嶺的華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鄭成功還佔據臺灣，到康熙晚年（一六八二）經過康熙雄謀大略的用兵，才告克定。假如中國今日是給外敵征服，華北必在先，華中次之，華南必最後，將來反攻的勢力，如洪秀全孫中山輩，也許來自兩廣。

我們試想，華北離東三省最近，受外敵的刺激，應該最深，抵制仇貨的運動也應該最烈。而實際上不然，抵貨運動，反在離東三省最遠的廣東為最熱烈。近年以來，公建設事業還算兩廣首屈一指。論起民氣，無論誰都不能否認南方比北方強烈些。頭一個敢與日本人開仗的還是十路軍的南方人，這並不是說北方人不成，北方民氣之所以不振也許有可原諒的理由，但南方民氣的確比北方強烈些，事實具在，無容諱言。

原來南方與北方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就是北方災荒多，而南方災荒少。災荒對於中國人人格的影響，美國有一位學者（Ellisworth Huntington）已詳言之。災荒於中國人自私性格的養成，實在值得注意。中國為一根深蒂固的災荒國家，所以處處都露着互相傾軋排擠的現象，彷彿人人都不能一飽，至於所謂同情心憐憫心更談不到了。災荒多重的地方，此種性格愈為顯著；災荒少的地方，則比較好些。（此點俟異日詳論）

華南受條約的束縛，比華北地方較少些。華北受辛丑條約二十一條等等的束縛，不知吃虧多少。即如這次山海關的陷落，據何杜國說因為辛丑條約都把險要給了敵人，所以華軍無險可守，節節敗退。華南亦未嘗無條約的束縛

，如香港澳門雖橫梗於珠江出口，但都不是致命傷，歷史上亦未曾有過以香港澳門為對華南用兵根據地的事實。以視東三省現已變作日本對華北用兵的根據地，及平津各處都有外國駐兵，那塊地方比較容易作反攻根據地，就可不言而喻了。

華南比華北富庶，少受經濟上壓迫，運籌策畫，都比較容易下手，這也是事實。國民黨的革命，幾乎完全倚靠廣東的財源，以一省之力，廣東給養革命黨的迭次用兵者，凡三十餘年。除江浙而外，中國沒有一省有如此能力的。這其中廣東的華僑在財力上的接濟當然不算少。

教育罪言(五)(續)

至於政府方面，對於教育，一言以蔽之，曰漠視。如專專就迹象上看，十七年以後，教育經費，大體全頗有增加；積欠比從前總算較少。並且國府主席當軍旅稍有一點暇豫的時候，就自己兼任教育部長，藉圖整頓，可謂重視之至，斥為漠視，寧非厚誣。雖然，專就教育經費言數量大小，關係尚屬第二位，頂重要的，却在其款項的穩定。教育管理，不在于法令嚴密，雷厲風行，而在于不輕改革

照現在情形看，華南恐怕是中國的又一線希望。

這並不是勸諸位避危就安，馬上要到華南去。當此華北危急存亡的時候，在華北有職守的，當然應該忠於職守，不應抱頭鼠竄，回南躲避。在此處一日有職守，即一日應當在此處守候着。但依歷史的觀點看，華北雖亡，華南仍可作反攻的大本營及自救的策源地。

以上是雜亂的感想，無以題之，題之曰「中國的兩線希望」。這裏當然有不對的地方，尚望讀者指教。

二十二年，一，十八。

旭生

，鎮之以定，持之以恆。近數年來，政府對於教育，毫無確定計畫，並且可以說，牠對於教育界裏面的情形，有莫名其妙妙的地方。實在教育經費並不需要怎麼樣特別的增加，止要遵守先總理的遺訓，對於庚款，不要任意掣用。對於各種學潮，止要不築室道謀，稍持定力，也不需要什麼軍隊的後盾，就可以完全平息。如果這樣辦理數年，雖說教育制度與社會經濟情形完全不合，終非妥善的辦法，而

想辦到教員學生規規矩矩地上課，像清華大學那樣的情形還不很難。清華那樣貴族的教育，雖非我們所嚮求，而學生總還可以學點東西，不至如前面所說把功課弄清楚的學生止達百分之十的比例。可是政府爲便私圖，將庚款隨便動用，專就現在經費的數目而論，牠所少發的實在有限，可是教育界因此而受的損失，已經難以數計。至於蔣介石先生當日之自兼教育總長，適見其他對於教育情形的隔膜。我揣想他的意思，必定說，教育的不良爲社會秩序不安寧的主要動因，比方說，學生思想左傾，動好搗亂之類，所以毅然決然，自兼部長，力圖整頓。他的魄力固然可佩服，可是他的看法却完全錯誤了。教育不良能影響到社會秩序，固然不錯，但這種影響，必須經頗久的時間，才可以看出來。對於這一點，直到現在，教育界自身還沒有很清楚的觀念，蔣先生軍務倥傯，我想他是不會看到這些的。至於學生思想左傾，動多搗亂，那全是社會秩序紛亂的結果。止要社會稍有秩序，以中國人之好靜惡動，左傾搗亂，雖不敢說要完全絕迹，牠絕不能成大患害，殆可斷言。倒果爲因，必至止湯揚沸，究有何益？幸而蔣先生尙頗持重，未敢嚴厲整頓，否則即封閉若干大學，槍斃若干教職員學生，亦不過治絲而益紛之耳。數年之間，教育毫無

全盤計畫：今天說大學區制好，就試行大學區制明天有人反對，就把牠停辦。實在，不管一種制度怎麼樣好，開始實行的時候，萬不會沒有阻力；不真正實行三年五年以後，也難看出牠利弊之所在；試行一年半載就恢復原狀，即使舊制全非，新制全是，而終不如不改。前日何所見而行大學區制，後日何所見而廢大學區制，袁袁諸公，以及教育當局，均毫無成見也。一事之起，政府漫無成見，多詢之于教育界元老蔡李吳戴諸先生，這本是一種賢明的辦法，可是這些位元老意見也不一致，並且有時候，一位的意見也不見得很堅定；這樣而想教育能有全盤的計畫，豈不甚難？並且我所尤不能明白的，却是吳稚暉老先生的態度。吳先生的道德人格爲我們所敬服的一個人，他的誠見也很多超絕羣倫的地方。但是他對於教育界中每一次風潮，總是持仍舊貫主義；你要問他的理由，他好像要說這些洋八股學校，反正是辦不好，不如隨牠去。他看準現在的學校所教的是洋八股，我現在異常佩服他觀察力的銳利，因爲我對於這一點，直到近一兩年，才深切的感覺到——雖然說他老生意中的非洋八股的範圍，同我們意中的非洋八股的範圍，大約還不很相同，可是現在各中學大學裏面所教的東西，差不多全體並不是真正的科學，不過是一種

洋八股，那却是毫無疑問。他老先生觀察力既是這樣的銳利，而又身負教育重望，我想他一定要嘔盡心血，想出些補救的法子。但是一直到現在，却還完全沒有看見，並且好像也沒有去作，那豈不是一件令人難以索解的事情麼？如果說他怕得罪人或怕麻煩，那又不像他老先生的素行。然則在這些地方，也只好疑以傳疑，不敢冒稱解人了。

政府的情形既如彼，教育界元老的意見紛歧並不堅定又如此，並且處到現在複雜萬分的環境裏面，想要教育的發展，真是「憂憂乎其難之」。此外如政府內容的不景氣，用人的毫無方針，均足使青年的身心受一種惡劣的影響，因為大家所詳知，不再贅論。

四，教職員的太不負責任。現在教育的惡濁腐敗，雖說古人同現在教育界以外的人們，均不能不負責任，而最重要一部分的責任，却不能不卸在教職員的肩頭上，那也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其他的一切，對於學生的影響，還不過是間接的，至于教職員的學問品行，却是時時刻刻直接影響到學生的身心上面。可是他們負的責任雖然如此重大，而所以養成這樣腐敗的真正原因，分析起來，却又頗為簡單。第一，他們不肯切實研究學問；第二，他們對於學生不能負指導訓練的責任。這樣的譴責他們，他們不免

要推委說，現在學校設備不完善，生活無保障，怎麼樣能責備人來負責任研究和作事呢？他們這些話當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但是如果把各國的思想史，科學史詳細翻閱起來，一定可以看出來當那些大思想家，大科學家作出他們的大發明，大發現的時候，他們所服務的機關設備未見得就怎麼樣的完善，他們的生活未見得就會絕對安定。昨天我聽傅孟真先生說：曾經得過納伯爾獎金的物理學大家布萊克（Black）先生，他的研究室在一個很卑下的房子裏面，即使晴天而光線亦不充足；外邊又為公衆打靶的地方，終天煩囂。他這樣的實驗室，無論北平任何大學中的實驗室也要比他的高明。但是他竟在那樣的地方作他很重要的發明。北平各大學的設備自然說不到很好，但是像樣能用的也還算有一些；十七年以後，教職員的薪水欠的還不算很多，可是求田問舍的教職員雖說頗有一些，而肯對於他們所教的學科作一種切實研究的人已經是鳳毛麟角，不要說什麼發明與發現了。他們自身就沒有研究的興趣，怎麼樣能指導學生去研究呢？至於學校的無紀律，教職員所負的責任也極重大。我相信：如果一個學校裏面的教職員，全富于研究的興趣，對於學生的訓練肯負全責，那個學校裏面就不能有風潮，即使偶有風潮，也一定很快地平息。

可是現在的學潮，大部分總有些教職員作背景。真正的原
因由于理想不同，意見不同的頗少，差不多全體是由于飯
碗的衝突。像這樣學問，這樣品行的教職員，怎麼能談到
指導和訓練學生！即使他們能辦的巧妙，安靜無事，也不
過誤人子弟更有效率而已，與教育家，思想家，科學家的
責任，固絲毫無關係也。

五，學生思想的懶惰。學生對於功課方面的懶惰，
大部分應該由教職員負責。但是他們——尤其是大學的學
生，已達成人的年齡，具相當的知識，對於來到他們前面
的一切事情，就應該用自己的理性審擇一番，得了相當明
了的認識，然後負責的付他們：這才是應該取的態度
。可是現在的大學學生，對於一切，大至于國家政治的組
織，近至於母校重要的變革，大多數全認為與己無干，漠
不關心。學生的團體，除了極少數人所組織的或能照軌則
進行外，全體的組織，如學生自治會等類的團體，差不多
沒有一枚不是由少數人把持的。你要怪他們的把持麼？那
却不能這樣簡單的斷定。因為大多數的學生全覺得這會
裏面的事情，對於他們毫無利益而袖手不問，管事的止有
很少的幾個人。那會的前途止有三條：第一，如果碰巧這
些管事的人是很熱心的人，那結果就是這些人累得要死，

事情也辦不出來什麼大成績，並且常常受那些說風涼話的
人的閑氣；第二，如果這些當選的人是一些平常不熱心的，
那會務就要完全停頓；第三，如果這些當選的人是一些好便
私圖的，那他們却很可以利用他們那些小小的職務，得著
種種的生發。除了第二種情形不必談外，在第三種情形之
下，固然是把持，但是在第一種情形之下，又何嘗不是把
持？你又怎麼樣能怪他們把持呢？並且，好便私圖的人，
何時蔑有？何地蔑有？不過異邦大多數的民衆看的很清楚
，不肯放棄自己的責任，就有少數好便私圖的人，也看得
出如果亂七八糟的作，與他們自己毫無所利，所以不能去
作，不敢去作。至于我國，就是大多數的大學生，也不清
楚社會是應該怎麼樣組織，自己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而
竟一味旁觀。你要問他們為什麼不肯問事，他如果是很誠
實的，一定告訴你說，這些事情對於他沒有什麼益處。然
則他們的不理事，同好便私圖的人是一樣的，也是自私自
利的。所不同的，就是他們的自私自利是消極的，至于好
便私圖的人却是積極的。天下事總是積極者戰勝消極者，
然則在中國，好便私圖的人，很容易達到目的，又有什麼
可奇怪呢？所以中國事，括總說起，少數的作惡為患猶小
，大多數的昏惰為患甚大。大學生因為自己所處的學校大

，就很自命不凡，然而他們的昏惰，並不亞于他界，這真是有志之士所極感棘手的事。他們大多數沒有問事的習慣，並且可以說沒有用理性去思想的習慣，所以偶爾問事，他們思想的淺薄極可憐憫。我現在隨便舉一個例子：國難以來，各報的讀者論壇，我倒常常翻閱。這些文字大約爲各大學的學生所寫。主戰之聲轟然于耳，但是怎麼樣戰，戰的近果若何，遠果若何，大體變化若何，這些問題，却不常有人想到。我個人自從國難以來，是前後一致的堅決主戰派，但是，我們相信，即使全國動員，堅決抵抗，而一定要敗；敗的結果，沿海大城，除却廣東的，一定要被敵人占領，東北的大平原也早晚要被敵人占領；這些結果，現在主戰的青年，恐怕未見得全想到吧。沿海大城失後，餉源無著，繼續抵抗，我們相信是可能的，但是很艱苦的；這些鉅大的困難，恐怕今日主戰的青年差不多全沒有大想到吧。東北大平原失後，想要繼續抵抗，一定需要地方的民衆團結起來，連絡起來，同敵人作連續不斷的游擊戰，然後才能找出最後的出路：這也是一件萬不可易的事。但是作游擊戰，在山間易，在平地難。我們應該想出什麼一樣新辦法才能戰勝這種困難。在平原作游擊戰，需要馬匹甚多，而我國馬政不修，馬匹不敷用，戰勝這種

困難，雖說不見得無法，而方法却是必須我們嘔盡心血去想。像這一類的問題，多至不可勝數，我疑惑今日主戰的青年，恐怕全沒有想到吧。即使持久以後，戰可以勝，而傷必異常的鉅，痛必異常的深，全國優良的青年恐怕要有一多半的傷亡，這樣的結果，恐怕今日主戰的青年未見得有人想到吧。這一切重要的問題完全沒有想到，而冒然去戰，自欺欺人，又何怪山海關炮聲一響，大多數的平津大學生趕緊向後轉，回家走呢？我們辦教育十餘年，止養出些思想如此昏惰的學生，真足令人痛哭也！

要而言之，現在教育腐敗的責任，古人要負百分之三十上下；環境，或可以說教育界以外的人們要負百分之二十；教職員要負百分之三十以上；學生自身也不能不負百分之十上下的責任。而在教職員中，負責任尤重者，爲所稱之教育專家。

六、教育專家的尸位素餐。我這樣的譴責教育專家，大家不要疑惑我又來附和孟真先生，同在美國學過教育的諸位先生們爲難，也不要疑惑留法學生想希圖留美學生的飯碗。實在我個人雖然沒有學過教育，更不配稱什麼教育專家，但是我在大學教書十餘年，辦理教育行政也有五六年，我毫無有意意思逃脫我個人應負的責任。實在情形，

却是我國興學四十餘年，而教育上很基本的一件事情，並不難看出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把牠弄清楚。教育是一種社會事業，萬不能離社會經濟而獨立，實在是天經地義，萬不容磨滅的一件真理。中國的社會經濟情形同歐美各強國及日本有極大的差異，是無論何人全可以看得到的。可是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是抄襲日本，就是抄襲英美法德各國的。他們這些國家全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剝削的壓榨的國家，我國却是同他們相反，是被剝削的，被壓榨的國家。人家是大富豪，我們是窮光蛋。一個家徒四壁的貧人，想教育子弟，却抄襲人家大富豪的辦法，無論說學不像，就使能亦步亦趨，究竟能有什麼用處？我現在深相信梁漱溟先生的話，我們所抄襲的教育制度，止可名為都市教育制度，可是我國全體是無限農村所集合的，非另外創造一種農村教育制度，我國的教育前途是無希望的。——我沒有讀梁先生書以前，這個意思我也已經有了，不過都市教育，農村教育兩詞，却是沿用梁先生的對於這樣一個基本問題，我的聞見很鄙陋，好想很多的教育專家，並未會嚴重考慮過似的。止有舒新城先生前年曾到我家，談到這個問題，有深切的認識。舒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我直到現在還沒有拜讀過。對這個問題認識頂清楚，知道現行制度根本要不得的，據我所見，大約止有梁漱溟先生。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他對於鄉村教育所提

出具體的方案。在外國學教育的人，好比在外國得到一套新式建築，就想原封把牠搬到中國來住。他在這個時候，至少應該有兩步萬不可少的工作：第一，是現下的地面是否可以放得穩，如果放不甚穩，必須要有些平基補牆一類的工作；第二，是應該看看這樣的建築與中國的氣候相合否，與衛生有益否，如果不相合，必須用理性斟酌新舊，創造出來一種與中國的氣候相合的新建築。第一種工作在那建築裏面，者就可以作。至于第二種工作，那却非跳到建築外面，精密考察研究，沒有辦法。我國的教育專家，好像囚在他們那一套的建築裏面，永遠沒有能跳出外面，看看與環境適合不適合的機會。他們所能作的，至多是第一步工作。至于第二步，雖不敢說他們永遠沒有想到，但是意識是含混的，好像除了這一套或其他相類的一套，萬不能有什麼新的一套，所以他們也沒有感覺到跳到外面看的必要與可能。我個人不敢冒充教育專家，但是總願意也跳到外面看一看。至于所想出的新辦法對不對，那却希望大家破除成見，精細的來討論。

現在教育腐敗的原因，據我所分析到的，大約如上所述。並且我們相信，現在教育界及教育界以外的人們，固然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可是制度自身也有極大的缺陷。不設法改革，而想挽救已經頹壞的學風是不可能的。至于我們所擬的改革的方案，且聽下回分解。

民權的保障

胡適

前幾天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的席上，楊杏佛先生說了一句很沉痛的話：『爭民權的保障是十八世紀的事；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裏還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

先進的民族得着的民權，不是君主欽賜的，也不是法律授予的；是無數的先知先覺奮鬥力爭來的，是用血寫在法律條文上去的，是時時刻刻靠着無數人的監督才保障得住的。沒有長期的自覺的奮鬥，決不會有法律規定的權利；有了法律授予的權利，若沒有養成嚴重監護自己的權利的習慣，那些權利還不過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只能規定我們的權利，決不能保障我們的權利。權利的保障全靠個人自己養成不肯放棄權利的好習慣。

『權利』一個名詞是近三十多年來漸漸通用的一個新名詞。當這個名詞初輸入的時代，梁任公先生等屢作論文，指出中國人向來缺乏權利思想，指出中國人必須提倡這種權利思想。其實『權利』的本義只是一個人所應有，其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義權』，後來才變成法律給予個人所

應享有的『權利』。中國古代思想也未嘗沒有這種『義權』的觀念。孟子說的最明白：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正是『權利』的意義。『一介不以與人』是尊重自己所應有；『一介不以取諸人』是尊重他人所應有。推而廣之，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正是個人自尊其所應有，自行其所謂是。孔墨兩家都還有這種氣概。但柔道之教訓，以隨順不爭『犯而不校』為處世之道，以『吃虧』為積德之基，風氣既成，就無人肯自衛其所應有，亦無人肯與強有力者爭持其所謂是。梁先生們所謂中國人無權利思想，只是這種不爭不校的風氣造成的習慣。在這種習慣支配之下，就有了法律規定的人權民權，人民也不會享用，不會愛護的。

然而普通人的知識和能力究竟有限，我們不能期望人人都懂得自己的權利是些什麼，也不能期望人人都能够監護自己的權利。中國人所以不愛護權利，不但是長久受了不爭與吃虧的宗教與思想的影響，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原因，就是中國的法制演進史上缺乏了一個法律辯護士

的職業。我們的老祖宗只知道崇拜包龍圖式的清官，却不曾提倡一個律師職業出來做人民權利的保護者。除了

王安石一流遠見的政治家之外，多數儒生都不肯承認法律

是應該列為學校科目的。士大夫不學法律，所以法律刑名

的專家學識都落在一種受社會輕視的階級的手裡，至高的

不過為刑名師爺，下流的便成了訟棍狀師。刑名師爺是幫

助官府斷案的；人民的辯護還得倚賴自己，狀師訟棍都不

能出面辯護，至多不過替人民寫狀子，在黑影子裏『把案

』而已。我們看『四進士』戲裏訟師宋士杰替他的乾女兒

打官司，狀子是按院大人代寫的，是宋士杰出庭代訴的，

還幾乎完全敗訴了，我們看這戲的用意，可以想見我們的

老祖宗到了近代也未嘗不感覺到法律辯護士的需要。但『

四進士』的編著者是個無名的天才，他的見解完全不能代

表中國的一般社會。普通人民都只知道訟棍是惹不得的，

宋士杰是人間少有的，同包龍圖一樣的不易得。所以他們

只希望終身不入公門，不上公堂；上了公堂，他們只準備

遭殃，絲毫沒有抵擋，沒有保障。好勝是天性，而肯吃虧

是反人情。中國人的肯吃虧，不好訟，未必是宗教與哲學

造成的，絕大的造因是因為幾千年來沒有保護人民權利的

律師階級。

西洋人的權利思想的發達同他們的宗教信條正相反。

基督教的教主也是教人不抵抗強權的：『有人打你的左臉

，你把右臉也給他打。』然而基督教的信條終久不能埋

沒羅馬人提倡法律的精神。羅馬不但遺留下了羅馬法典，

更重要的是她遺留下的法學與辯護制度。士大夫肯終身研

究法律，肯出力替人民打官司；肯承認法律辯護是高尚的

職業，而替人伸冤昭枉是光榮的功績，——有了這種風氣

和制度，然後人民有權利可說。我們不要忘了：中古歐洲

遺留下的最古的大學，第一個（Saleruo）是醫科大學，

第二個（Bologna）就是法科大學，第三個（巴黎）才是

神科大學。我們的士大夫是『讀書萬卷不讀律』的，不讀

律所以沒有辯護士，只能有訟棍：訟棍是不能保障人民權

利的。

中國人提倡權利思想的日子太淺，中國有法律教育的

日子更淺，中國有律師公開辯護的日子又更淺了，所以什

麼約法和憲法裏規定的人民權利都還是一些空文，軍人官

吏固然不知道尊重民權，人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享用保護

自己的權利。到了權利受損害的時候，人民只知道手忙脚

亂的去走門路，托人情，行賄賂；却不肯走那條正當的法

律的大路。直到近幾年中，政治的衝突到了很緊張的地步，一面是當國的政黨用權力制裁全國的輿論，不容許異黨異派的存在，一面是不滿意於現政權的各種政治勢力，從善意的批評家到武裝反抗的革命黨派。在這個多方面的政治衝突裏，現政權爲維護自身的權力計，自然不恤用種種高壓方法來制裁反對勢力，其間確有許多過當的行爲，如秘密軍法審判的濫用，如死刑之濫用，如拘捕之衆多與監獄生活之黑暗，都足以造成一種恐怖的心理。在這種政治勢力的衝突之下，尤其在現政權用全力制裁武裝反抗的政治勢力的情形之下，一切情面門路友誼種種老法子在這裏都行不通了。直到這個時候，才有人漸漸感覺到民權保障的需要。民權保障的運動發生於今日，正是因爲今日是中國政治的分野最分明，衝突最利害的時候。我們看上海發起這個運動的宣言特別注重『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就可以明白這個歷史背景了。

我是贊成這個民權保障運動的。我承認這是我們中國人從實際生活裏感覺到保障權利的需要的起點。從這個幼稚的起點，也許可以漸漸訓練我們養成一點愛護自己權利並且尊重別人權利的習慣，漸漸訓練我們自己做成一個愛護自己所應有又敢抗爭自己所謂是的民族。要做到這種目

的，中國的民權保障運動必須要建築在法律的基礎之上，一面要監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訓練我們自己運用法律來保障我們自己和別人的法定權利。

但我們觀察今日參加這個民權保障運動的人的言論，不能不感覺他們似乎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把民權保障的問題完全看作政治的問題，而不肯看作法律的問題。這是錯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謀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離開了法律來談民權的保障，就成了『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道理』，永遠成了個糶夾二先生，永遠沒有出路。前日報載同盟的總會宣言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話，這正是一個好例子。這不是保障民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

我們以爲這條路是錯的。我們贊成民權應有保障，但是我們以爲民權的唯一保障是法治。我們只可以主張，在現行法律之下，政治犯也應該受正當的法律保障。我們對於這一點，可以提出四個工作的原則：

第一，我們可以要求，無論何種政治犯，必須有充分證據，方可由合法機關出拘捕狀拘捕。誣告的人，証實之後，必須反坐。

第二，我們可以要求，無論何種政治犯，拘捕之後，必須依照約法第八條，於二十四小時之內送交正式法庭。

第三，我們可以要求，法庭受理時，凡有證據足以起訴者，應即予起訴，由法庭公開審判；凡無犯罪證據者，應即予開釋。

第四，我們可以要求，政治犯由法庭判決之後，應

與他種犯人同受在可能範圍之內最人道的待遇。

這都是關於政治犯的法律立場。離開了這個立場，我們只可以去革命，但不算是做民權保障運動。

以上所說，不過是舉政治犯一個問題做個例，表示我個人對於這個運動的見解。除了政治犯之外，民權保障同盟可以做的事情多着哩。如現行法律的研究，司法行政的調查，一切障礙民權的法令的廢止或修改，一切監獄生活的調查與改良，義務的法律辯護的便利，言論出版學術思想以及集會結社的自由提倡，……這都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二，二，七。

教育罪言(六)(續)

旭生

我上一次曾經說過：我們相信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與我國的社會情形完全不適合；由無限農村組成的中國，應該創造出來一種農村的教育；至於從前所用的都市教育應行廢棄。所以我們對於教育是根本改革派。但是在我陳述我們的改革計畫以前，先要陳述我們相信當擬改革計畫的時候所應該遵守的幾個根本原則。

一，擬計畫以前，對於各國的及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

應該完全知道，但是當擬計畫的時候，應該把這一切完全忘掉，專就我國的社會情形，社會經濟情形想出一種教育他們的方法。將計畫擬好以後，對於現實的與理想的教育有不銜接的地方，當然不免要找出來些過渡的救濟方法，但是這些救濟方法，應該是改革計畫完成以後再添加的，不應該從計畫未成以前就混進去的。這也是很平凡的原則，用不着怎麼樣說明。不過我還要聲明一件事：就是我們

雖然相信：擬計畫以前，對於各國的及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應該完全知道，可是我個人對於這些，實在知道的很少，所以我所擬的改革計畫，一定有很多不適宜的，不精密的地方。這些却全希望肯承認我們農村教育觀點的教育專家來幫助我們，糾正我們，擬成一種確可實施的中國教育制度。

二，這種新教育制度實行以後，人民是應該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的。我們終天談民治，教育制度應該注意到平民均等受教育的機會，這也是如日月經天，萬不容磨滅的一件真理。可是我國現行制度，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由我們北幾省談起，有二百畝地的農家，不過能占全體農人百分之四五的比例，或者還要更少一點。他們已經很算富農了。但是他們如果想供給一個大學學生畢業，一定要鬧的筋疲力盡！至於其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對於高等教育，絕不敢有所希望！我從前說，作官教育，可以陷我們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而有餘，可是一個大學生當他畢業以後，他家裏已經供給得筋疲力盡，他就不想作官，不想每月拏幾百塊錢，風俗上怎麼樣能允許他？道義上也怎麼樣能允許他？想這樣拏，而自己又沒有一點生產的能力，社會怎麼樣能夠養這樣多的寄生蟲？所以上面所說這一點

如果做不到，不惟民治永遠做不到，教育的自身也永久沒有清明的希望。可是這一點能達到不能，却全在我們所說的第三件根本原則能作到不能。

三，新教育方法一定是與生產相聯合的，尤其是要與農業相聯合。我國從前半耕半讀的理想是很好的，可惜沒有辦到。不過在從前行科舉制度的時代，離這個理想還不很遠；學校制度成立以後，士農分業，似乎萬沒有再合的餘地了。大家也疑惑半耕半讀，乃中世紀不進步的辦法；時至近世，必須清楚的分業，才能專精勵志，學術界才能有迅速進步的希望。大家因為有這樣含混的觀念，所以對於都市教育的系統，雖也間或有人看到牠同社會經濟的情形不適合，而對於牠總不敢有根本上的懷疑。其實半耕半讀未能作到，並不是因為農人沒有工夫不能去研究學問，却是因為歐美工商業的社會，把教育都弄到都市集中，集中的結果是一切設備比較精良，進步比較容易；我們想赶上他們，遂不禁盲目地跟著他們跑。殊不知：集中是一件事，集中于都市是另外一件事。我們現在散漫著夢想從前科舉時代的或可以半耕半讀，固然要鬧到圖書儀器不完備，工具荒陋，進步毫無的危險；可是集中在大都會，那却是初改革的時候，沒有看見將來的流弊，懶惰著不肯

改良鄉野的交通，因陋就簡的辦法。說集中以後，離家鄉遠，即學校設在鄉野，也不容易兼從事農業，那自然也有點道理，但是因離鄉遠而不得不含棄農業，那是因為沒有組織。如果感覺到必要，盡力組織，沒有找不出辦法的道理。並且士農分業，即在學業上，也有很大的毛病：農人終天同自然界接觸，而因為無知識，無方法，不能把他們所得的日常經驗，精細的記錄下來，比較起來。求學問的人，却老在書本裏面打轉轉，不同自然界真正接觸，學問不能真正的進步。並且因為他們的身體與自然界隔離日遠，耐勞苦的能力逐漸消耗。今日的士大夫，身體衰萎，不能任艱苦的工作，同農業隔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能把學校移在鄉野，另外的組織起來，與農夫的生活打成一片，則農夫能整理其經驗，已經踏進了科學的門坎，求學問人兼事農業，日與知識的泉源接觸，學問自然親切；身體也可得到健康，不致有神經衰弱等類的毛病，真是一舉而諸善備了。如果有人疑惑農業工商業全關重要，何以我們專注重于農業？那我們就答他說：中國是以農立國的，我們相信不惟今日如是，即將來亦仍如是。我們固然希望全國的農業工業化以增加其生產力，也希望我們的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不再受帝國主義的壓榨，可是我們

不希望將來工商業畸形發展，再步他們的覆轍。我們相信：改革教育而注重與農業相聯合，在最近的和較遠的將來，全不至于大有流弊的。

四，新教育制度的養成人才，要矯正從前供求不適合的弊害，須按著社會需要的數目而訓練。這個原則如果在國富充裕的時候，或者不很需要，可是在今日民窮財盡的時候，却是絕對必要。再進一步說，如果國富盈溢，即今日的教育制度，也或者可以不急著改革。前清鹽商鴉片商有錢以後，拏出來錢養些清客，還能間或對於文化有所補益，何以見得現行的教育制度，大經整理，就不能養出幾個人才呢？不過在現在的時候，學校裏面多養出一個廢物，另外一方面，就要添出好幾個餓字。現行的教育制度，無論怎麼樣整頓，總有很鉅大的不經濟，所以萬不能不從事改革。

我們所擬的新方案，略如下述：

現行的教育制度可以說是分爲幼稚園，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學，研究院七級的。我們覺得這樣瑣碎的分法實在是不必要。在我們的新方案裏面，止有三級：兒童二歲（以下所言均依滿歲計）至六歲受幼稚教育；六歲至十五歲受國民教育；十五歲以上爲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一方面爲專門教育，另外一方面爲大學教育。

一，幼稚教育。我們計畫中的幼稚教育的機關，雖然也叫作幼稚園，而離現制的幼稚園頗遠，離理想中的兒童公育辦法較近。兒童在兩歲以前，正在吃奶，應由母親招呼。兩歲斷奶以後即入幼稚園。每村可在村邊空地闢四五畝爲幼稚園。中心約畝餘，爲兒童的遊戲場。周圍建築些樸素堅固的土房爲兒童的住室。每所可容兒童十餘人，保姆二人。一切睡覺，吃飯，穿衣，沐浴等事，均由保姆經理。此周圍兒童住室以外可多樹林木，大小無定，亦爲村人遊息之所。兒童除風雨或大寒暑外，工作遊戲應均在遊戲場或小林中。外加一避風雨室，不得已時入之。房質應與村中通用者相同，惟注重于清潔及堅固。兒童的衣物食料均當由各家按月均攤送往。縣城附近可開一保姆訓練所，由每村送數婦女往受訓練。畢業後即在本村服務。薪金較其他經營農家副業者稍優。

二，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中頂關重要的是教職員如何養成，所以當談牠以先，不得不先談高等教育裏面的師範學校。

因爲在我們的計畫裏面，沒有中學小學的分別，所以我們擬議的師範學校，也沒有高等初級的分別，爲一專門

學校。牠的位置是在鄉野的。但因爲交通的方便，可選擇離鐵路百幾十里，有馬路可行汽車自行車，並適宜農業的地方。學校的房屋，止要不潮濕，不黑暗，堅固，清潔即好。無論校款如何充裕，不準建築清華燕京各大學一類的房屋，以致把學生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無論何種學校均應如此，不止師範學校也。師範學校附近有兩個大規模的農場。第一農場爲就我國舊法稍加改良者，第二農場爲新式工業化者。這兩個農場爲全校教職員及學生的共同耕作場，不得雇用工人。無論何種學校中均無年暑假，農忙即作田工，農閒即講學問。如初辦不易得能農事的教員，也只好暫請在農科畢業者經營農場。但以能手自耕種者爲限，不能者絕不聘請。師範學校的學生前一半入第一農場，習我國固有農事；後幾年入第二農場，習新法農事。學生由各縣選派。在新制度中，萬不準河南省人跑到山東省服務，也萬不準南陽一帶人跑到彰德一帶服務。止有鄰縣不出百里者教職員始可互相通融。每縣應先作一精密的統計，預計需要某種教員的數量若干。比方說，需要生物教員二十五名，那就要陸續選派三十五名就學。因爲恐怕有中途輟學及疾病死亡等類情形，所以必須多派十名就學。學生一切全係官費。在我們新計畫裏面，高等教育一切學生

，幾乎全屬官費，一定有人疑惑款項何來，那就需要分別來說：我們的學校是一個大農場的組織，教員學生自耕自食，本屬不成問題。我想經營的好，一定不止够教職員及

教職員的家庭以及學生工人的伙食。如有贏餘，即當儲蓄起以爲擴充學校設備之用。住可由國家負擔。學校在鄉野建築，地址容易寬暢，不成問題。建築樸實堅固，供學生寄宿，辦法同現在的學校可大致相似。至于行，我們理想中的學生，如果有一百二百里地，一定可以步行走去。不過我們希望師生多作有計畫，有組織的學術旅行。這一類旅行，路途較遠，應呈請教育部核準後，即由國家免費。然則食住行均不成問題，衣則應視學校的性質，分由政府或地方負擔。各省應斟酌地方的氣候，定每學生需棉衣若干，裕衣若干，單衣若干，皮衣需要與否，由省政府酌定。著爲定式，頒行各縣。材料不惟不準用舶來品，即他省土產亦不準用。本縣有土布即用本縣土布做成，否則用鄰縣的土布做成。每月可斟酌情形，給每學生零用費五角。法國戰前，凡服義務兵役者每人每日得銅子一枚爲零用費，此定五角，已較優厚。如此則每學生每年費用大約不出三四十元。畢業後必須在本鄉服務。應視地方經濟情形，酌給薪金。如一優良農夫經營農家副業，每年可得百元者

國民學校薪金可從百二十元起，漸加至百五十元止。如此則學校經費一定大減，從前六年義務教育猶患經費不足，現在九年仍不患無辦法。

國民學校略如現在的小學，但有兩點大異：一，先生學生盡屬農夫。農忙力田，農閒治學。二，授課不如現在的每點鐘變換而以時季畫分。自然科學授以春夏；數理科學授以秋冬；歷史社會及藝術各科分配于各季。自然科學十分之八的時間係由教員領導學生作附近百數十里的旅行，隨地引誘學生啓問，繼之以講授；只有十分之二的時間到課堂中以學生的實際見聞中與書籍相印證。英國的植物，法國的礦產，學生將來一點不知道，也尙無關宏旨。可是他們那近數百里裏面的動植礦物，氣候，土壤等類，一定需要他們全弄得清清楚楚。秋冬則學生全到校受課。衣食原料可由兒童父母送往學校，學校請人烹煮縫紉；但任此役者並非工人，亦係教師。兒童至十四五歲時，即教之以烹煮縫紉，使他們自己試作。不過教烹煮縫紉的先生，不必由師範學校出身。十二歲後，加授農家副業及作本地相宜之簡易工藝的知識。

三，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分專門教育及大學教育兩種。一切專門學校均與師範學校相類。不過商科各種學校

地址，可近通都大邑，工科各種學校地址，可近工業區域以便實習。附設農場亦如師範學校。將來全國人士，可以有人因職務關係——如法官醫生之類——不能兼事農業，但須無人不能從事農業，亦以防學或中輟，失業堪虞也。工商業的學校，須斟酌情形；如前二三年不須實習者，仍當附設第一種農場，資其練習。以後本業實習增加，農業實習減去。如開始即有本業實習，亦可將農業實習酌量減去。如法律等類學生應由國家考選者，衣服零用費由國家供給。各種專門學校學生均受嚴厲軍事訓練一年。將來除有陸軍專門學校教授高等軍事知識外，沒有另外的軍官學校。非專門學校畢業者不得爲軍官。此等軍官，非有外患，亦不得動員。各專門學校無齊一的年限，自三四年至十年不等。海陸空軍等類的專門學校，大約均須十年。三年後免除農業實習；後三年得有少量薪水。專門學校畢業生服務薪金額數均採「祿足代耕」意，按年漸進，但均不得超過優良之農夫工人所得一倍。凡一切實用科學均在專門學校講授，至理論科學則在大學內研究。專門學校學生的受課要比現在大學學生少的多，自修及實地練習的功課多的多。但仍有若干的受課，與大學不同。

大學教育前有預備學校。預備學校中止教授數學，國

文，外國文各種工具學問。雖亦有附設農場，練習農事，而無年限，自由上課；國家亦不供給衣服零用費。大學中以研究室爲單位。全大學中或有二三課堂。大學中無學生，只有助手。助手由受過預備教育的學生中考取。入後即有少額薪金。研究主任如認爲需要者，每週也可以給他們講授一半點鐘。餘時均受研究主任的指導，學習研究。他們除了將來可以代替主任，繼續研究外，絕沒有另外的出路。如果有特別研究，能在科學中自找出一新枝，得將計畫呈學校最高之審查會審查。合格後即由學校酌加一研究室，並任之爲新研究室主任。待遇則一切研究主任——因爲大學中並無教授——可得到優良農夫工人全年所得的一倍半。專門學校畢業生服務五年後，得入大學研究室中受指導研究。研究三兩年得有特殊成績後，可歸入專門學校作教授，其待遇與大學中之研究主任等。如某地方教育經費特別充裕者，可特選已經服務五年而成績優良的國民學校教員，入大學，研究本地方所特別需要的科門。如果成績良好，其研究主任認爲有繼續研究的能力者，得由地方或大學爲之設置一新研究室。待遇亦得比大學中研究主任。如過四年未得允許者，仍歸國民學校服務。

我們所擬新教育的輪廓大約如此。看見這個計畫的，

是否有人感覺到牠同蘇俄的制度有很多的相同點，疑惑我多從蘇俄的制度取材？那我就老實告訴他說：對於現行教育與社會經濟狀況的不適合，我于民國八九年初回國的時侯已經感覺到。但是那時候國難未急，我個人的精神頗覺麻木。偶然想到，不過想設法子補救牠，對於都市教育的自身，未能有根本懷疑。前年上半年曾在北大講演過一次教育制度的問題，也仍是這樣的思想。國難驟來，我麻木的精神頓受鉅大的刺戟，對於現在的教育狀況異常痛心。深思之餘，漸知教育制度自身的缺陷，中國抄襲外國教育制度的荒謬。但直至去年暑假時，消極方面雖已清楚看準而積極建設方面仍未能有所擬議。暑假後閉戶冥想，始得結果，大約如上所述。同時讀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一步，對於教育部分，驚為先得我心。對於他所用的都市教育，鄉村教育二詞，亦認為確切不易。但是這個時候，我對於蘇俄的教育，很慚愧的，什麼全不知道。所僅知道的，不過是他們完全不抄襲歐西固有的教育制度，而另外獨出己裁，以求適于他們那社會的新環境而已。我既然想出新計畫，就間或同朋友談起。有一個朋友問我對於蘇俄的新教育制度是否頗有研究，我答完全不曉得。他說你所說的同蘇俄的制度相仿處頗多。這我才非常高

幸，向他借到一本蘇俄新教育。讀完之後，才知道我對於新計畫中所懷疑的各點：教育縮成三階段，國民教育的延長，大學研究院的合併，均與蘇俄制度暗合，或大同小異。閉門造車，出門還能合轍，狂喜可知也。至于同蘇俄制度不同的各點，那却不是我所懷疑的。另外蘇俄的教育方法，有極多很好而我却没有想到的地方，我當然希望實用的時候，把這些儘量採擇進去。不過我現在却没有把牠攙在我上面所說的計畫裏面。這上面所說的計畫，大體可以說完全是我自己想的。我現在所希望的，就是全國關心教育的人們，把教育的現狀，極嚴重的思想；對於我們的新計畫，極嚴正的批評。如果覺到這個改革方案不好，就提出另外的方案；如果覺得牠還有可用的地方，就精詳的補正。有一年的嚴重討論，這個問題或能開出一點眉目，然後得著一個實驗的區域，從師範學校辦起以為改組國民教育的預備。三五年後，全國試用新教育制度，我國教育的前途，或者能有轉機乎！

(完)

編者按：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陸續發表在下列各期的本月上：

教育罪言 (一) 第二五期 (二) 第二七期

(三) 第三十期 (四) 第三三期

(五) 第三四期 (五續) 第三七期

讀者又可以參看本刊本期蔣廷黻先生譯的陶內先生

論「中國的教育」，其中有一部分的意見和旭生先生的結論頗相同。(適)

中國的教育

R. H. Tawney 著 蔣廷黻譯

在本刊第三十六期，我從陶內先生的「中國的農工」一書節譯了一段泛論「中國的政治」者。本期我續譯一段。爲未讀前篇者的便易，我可以說陶內先生是英國的一位大經濟史家及勞工黨要人。他曾受太平洋國交會的委託來中國考察農工，又曾參加國聯派遣來華的教育考察團。

中國政治的上軌道及經濟的進步最後要靠中國人民思想的改變。中國教育的現狀如何？教育在中國的發展上，能占個什麼地位？

中國現有的公立教育是庚子年以後的產物，大部份還是近十二三年的產物。在不及人生一代的短期內，在內亂外患，經費困難，旱災水災，交迫之中居然能有這個產物已經是特別。可驚異的不是牠的殘缺，是牠的存在。在西方直到近年，大問題是怎樣使人民了解教育的價值；在中國這不成問題。中國的大教育問題是：怎樣使教育以中國

的實在需要爲基礎，不以外國的模式爲基礎；使教育人生化，與中國生活的實際事實相關連；使授課及行政的標準提高；使現在這些無調勻的，相矛盾的工作成爲一個平衡的系統。

中國現在教育的弱點確是很嚴重的。應當作爲全部教育樓閣的基礎的小學，論質論量，都是很殘缺。究竟從六歲到十二歲的幼童幾分之幾入學，無從知道。充其量，平均不過百分之二十；在較好的省市或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僻遠區域，幾至全無入學的。入學的幼童之中，許多在學時期太短，不能收實效。中學分初高兩級，共六年。在許多地方，讀畢六年的似乎很少。中小學裡的工作，在一個旁觀者看來——自然也有例外——偏重形式，書本，理論，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程度。這種工作太忽略幼童的體質需要，太勉強他們用心；不圖喚起他們的興趣和好奇心，反圖堆積他們記性的負擔。他們應該利用耳目作有興

趣，有關緊要的事的時候，他們反守着課本，聽着教員。學校過於用口授的方法，以致忽略實際工作和試驗。除少數例外，這種教育不預備幼童了解他們所生長的社會。真的，許多時候好像中國故意用教育使後代的人們呆蠢，神經失常，和不快樂。

大學——例外除開——似乎有同樣的毛病。因為中等教育之不良，許多大學學生實不能接受大學教育之益。他們聽講太多，應考太多；自修太少，與教員接觸太少。教員也是每星期講演鐘點太多；許多因為經濟的困窘而兼課。教材過於利用外來的。頂壞的教授不過重演他們在外國所聽的講演，所讀的書本。頂好的過於注重知識的灌輸，忽略幫助學生預備他們將來在社會的生活。教授們還不注意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中國學生將來既要在中國服務，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比知道西洋的國會和交易所還要緊些。結果中國大學的空氣有如花房裏的暖空氣，不像天空的自然空氣。

中國現代的教育免不了學西洋，正如十六世紀的英國教育免不了模倣希臘羅馬。在中國，如同在歐洲，文藝復興的來源起於一種昔日所不知的或鄙視的文化的發現。那一般生長在一個快要崩潰的社會的人，得了這個發現如同得

了一個改造社會的仙方。在這種空氣之中，西洋科學自然時髦起來，而對於科學的崇拜免不了不知分寸。西洋歷史的因果也就顛倒了：他們以為西洋文化是西洋科學的產物，其實西洋科學是西洋文化的產物。因此，政治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反承認了一種反民族性的教育為聯盟，為理想的目的，豈非怪事！

新知識的發現時期產生了中國現代的教育。此時期雖未過去，但其工作已完了。此時期生出一種醞釀；牠不能再有所為了。下個時期的工作比較更加困難，但若擱置，其結果必是國家的解體。除非教育在土內生根，牠不能成爲活的教育。救國的秘訣，就是西洋有這個東西，也是不能輸進來的；牠並非貿易物品。中國如要得這個東西；牠必須是國產。中國教育家遷移視線的時期到了：以後可以不必望天，應該看看脚下的地。惟獨在這個地上——這個中國生活的實況的土地上——中國教育家能够找得材料來創造一個適合中國需要的教育制度。

中國社會有一種極驚異的特別：即知識階級與一般人民漠不相關。中國社會階級的區分，以財產為標準的，並不如在西洋那樣厲害。在舊日的中國，一個人之出類拔萃不是靠財產，是靠官級。因為官的出身由於科舉，所以

士大夫自然爲社會所尊崇。現在中國士大夫的威風尙存在，或者比往日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西洋科學的知識尤爲社會所推重。學生幾乎成了一個特殊階級。一進中學——大學更加——他們就進了一個特殊權利的階級。權利很多，義務則很少。有時候，他們好像全不知道民間生活是怎樣；除少數例外，他們也不想對民間生活的改良有所貢獻。教育僅幫助了少數人從一級攀到第二級，並沒有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除非知識階級與民衆的隔閡能够掃除，民族的團結不過是虛文。

小學教育當然是全體教育的基礎。在質與量兩方面均須改良。只要教員及行政者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初步的改革可以在短期內實現。所要改革者不在機械，而在精神。要把小學從現在這種無生氣的書癡的工廠改爲適合人生基本需要的學校並沒有不可能的理由。小學很可教小孩們養成健康的日常生活習慣。小學可以給小孩們作工的機會，如簡單木工，種植花草，飼養牲畜。小學可以幫助小孩們了解他們四週的環境：只要把十分之九的書本燒了，而把平常種地、手工，及附近的交通作爲地理，歷史，及自然的課本。簡單一句話，小學的改革很可以拋棄這個從西洋輸進的講授及教本制度。其實西洋也正在那裡廢除這個無

生氣的制度。學校的作用不在使小孩採取成人所認爲正當的模型或程式，是在使小孩康健及快樂。這個顯明的原則就是中國及所有的國家的小學教育改革的基礎。

小學教育推廣的問題比較困難，但深知此中情形的人認爲不是全無辦法。在比較進步的省市，如江蘇浙江及杭州天津，入學的幼童約與一八五〇年的英國相等。在這些區域，如有相當準備，應該能够實行強迫教育。教育部可以爲這些區域預定一個實行的時期，並且偕同地方當局調查校舍和師資，及趁早作補充的預備。要緊的不是一時要遍行強迫教育，是要在這些區域作個榜樣。

中國的中學教育也是太偏重書本。全國的中學太趨一致。很少的中學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課程，那就是說，以農工爲課程的中心而以其他科目爲輔助。高中除有普通文科科目預備學生升學及當教員外，照章程應該有職業科目，但實際上有的很少。結果一方面有些絕無學文科天才的人也受一種所謂普通教育——究其實，這種教育就是文科的專門；另一方面，中國正在需要有用知識的人的時候，學校反供給過多的善於宣傳舞弄筆墨的人。中學的改革也不是一件深微奧妙的事情，僅施行一個顯明的原則就够了：青年並不因爲作了學生就不是青年了。中學的課程應該

減輕和簡單化。上課的鐘點應該減少；露天活動的機會及個人或分組自動的工作應該加多。已有的高中如不設立職業課程，教育部應取消他們的註冊。專有文科課程的高中，除非萬不得已，不應添設。

已往中國大學教育的進步真可驚異。憑空造起，不過二十多年，到這個地步，可佩之至。發展既快，自然產生尙待解決的問題。有幾個大學，無論在那一國，都可以引爲光榮。其他則有很嚴重的，幸而可掃除的缺憾。因爲大學在中國影響之大，這些缺點的修改是很關重要的。

大學的弱點一部份在於組織，一部份在於教育方法。一方面，大學在地理上的分配是絕無佈置的。一九三〇年，北平及上海兩處有全國五十九個大學之中的二十五個，及全國大學學生百分之六十。同地有好幾個大學致工作重複，且原可以成立一兩個好大學，事實則因分散而有好幾個次等大學。政府既常欠經費，學校財政不能穩定，因之教授多兼課。

另一方面，許多大學學生不够資格；結果他們自己不能受益，而全校的程度爲之降低。學生聽講有每星期過二十小時的；他們的工作平時則忙於作筆記，攷試的時候則忙於背誦筆記，致犧牲自己的觀察和思索，而所得的知

識有許多絕無意義，因爲與自己的經驗沒有關係。教員講演的時候過多而又兼課，所以師生之間除講堂外難有發生密切關係的機會。因之學潮時起，教育工作不能進行。這種空氣是最不適宜於青年的長進的。

在中國，如同在別國，高級職業及政府機關大部份吸收大學的畢業生。因之上面所說的現像與國家的關係當然很嚴重。這班人員，在作學生的時候，對於中國生活的實況所學的既少，對於學校的章程稍不便於己就反抗，要這班人來計畫和執行一個改造中國的方案簡直是幻想。

大學的改良，在行政方面，第一要經費穩定。同時國立大學的經費既出於政府，政府當然可期望牠們不要有浪費，不要在同一個區域內有重複。能合併的應該合併，不能完全合併，也應該成立聯邦式的組織。這兩種改革倘能實行，學校就能按期發薪，而兼課的毛病就能廢除。此外如各地的大學能聯合起來，執行共同的嚴格入學攷試，大學的程度就可提高了。

行政的改革還是次要。根本的毛病還是大學教育的商業化。經濟壓迫學生去圖得學位，壓迫教員去幫助學生得學位。除幾個例外，中國的大學已屈服在這種壓迫之下。結果這些大學的學生人人都畢業，確是沒有一人受過教育

。這話我想不是過當的。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是受過教育的人，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畢業生。這個改革確不容易。現在的學生，將來的學生，以及他們的親戚，因為利害的關係，難免要反對。大學教育是許多職業的入門。牠不但是

一種投資，如同在別國一樣，並且因為中國經濟的落伍，

幾是惟一的投資可以圖謀較舒適的、體面的生活。除非大學能供給一班受過嚴格知識訓練而又能利用他們的訓練來解決中國特殊問題的人，中國的經濟發展及政治安定都不能有希望。

『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的討論

(一) 顧毓琇先生來信

適之先生：

今天看見孫逸先生關於「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的討

論同先生的「附記」(本刊三十六期)，十分高興，因為我在原文裏早曾「希望當代的科學家同一切對於提倡科學及解決中國問題有興趣的國人加以指正」。

這「需要」二字並不含有絲毫褒貶的意義。我希望當代的中國科學家都來客觀地討論這個問題，不要主觀地「抗議」。

論同先生的「附記」(本刊三十六期)，十分高興，因為我在原文裏早曾「希望當代的科學家同一切對於提倡科學及解決中國問題有興趣的國人加以指正」。

(三) 我不但沒有反對中國人學「純粹科學」，並且我是贊成青年注重「科學」的；我只覺得「純粹」的「科學研究」不一定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

但是我讀完了孫先生的大文，我覺得或者還有把我的「太偏」的「主張」誤解的地方，敬再鄭重聲明如下：

(四) 萬一我提出的討論有「使青年氣沮的指示」，我是十二分抱歉的。我的朋友同學生們都曾聽我說過：「在科學研究上，中國人的資質和成就並不會比世界上任何一國人差」。我願把這句話轉獻給有志「科學研究」的青年。

(一) 我個人向來是看重科學研究的，對於從事「純粹科學研究」的人，向來是欽佩的。

(五) 但是，我們若要希望「科學救國」，救危急存

(二) 前文所討論的是目前中國客觀的「需要」問題

年。

亡的中國，我仍然希望全國的科學家同全國有志科學的青年，鄭重考慮「我們所需要的科學」是什麼？

○ ○ ○

我順便報告最近幾天我聽見幾位物理學者討論這個同樣的問題。他們的討論，自然受了山海關失陷的影響。他們所討論的專題是「高射砲」而不是他們研究有素而有貢獻的「X光論」或是「波力學」。他們竟有放棄「純粹科學研究」而從事「國防製造」的趨向。我勸他們不要放棄已有成就的「科學研究」，但是我亦贊成他們分出一部分精力來幫助國家解決「國防」上的許多科學問題。不知先生以爲如何？敬頌

撰社

顧毓琇

一，二十二。

(二)汪敬熙先生來信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第三十六號所載孫逸先生批評顧毓琇先生「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那篇文章的話，我大體贊成。但是我還想補充幾句。

中國如沒有純粹科學的研究，只想以模仿的方法，利用外國的成方，去發展工業，那是一定不能成功的。辦一

種工業，決不是完全抄襲外國的成法，便可以辦好的。各

國的情形不同。就是利用他國的成法之時，一定是遇着許多多麻煩的困難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工業便辦不成。有毅力的聰明的工程師，既是沒有受過研究的訓練，當然是也可以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把這些困難打破，把這些問題解決了。但是這種工程師是甚難遇到的。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辦實業的種種失敗，原因固然是很多；我們卻不能不承認沒有勝任的工程師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要想養成勝任的工程師，就不能不提倡科學研究。不但研究純粹科學的人時時可代工程師解決困難問題，並且受過一些研究訓練的工程師自己也有解決困難問題的興趣和力量。近幾年來，有些工業，漸漸辦的成功。其重要的原因的一個就是辦這些工業的工程師是曾經受過研究訓練的。

求中國實業發達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須極力提倡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純粹科學的研究。

這是一個很淺近但是很重要的道理。可惜不是多數人所知道的，所注意的。顧先生是學科學的人尚不如此主張，那就難怪黨國要人是只知道提倡應用科學了！我們應該大聲疾呼的說：「沒有研究的精神，研究的訓練，就是想

利用外國的成法來振興中國的實業，是一定辦不通呵。」

汪敬熙 二十二，二，二。

行政研究的重要 (通信)

廷黻兄：

論諸君子作左列進一步之提倡：

昨讀獨立評論第三十六號我兄節譯陶內「中國的政治

(一) 各大學政治學系設行政制度研究講座。

」一文，甚感介紹之功。中國政治之改造應由地方着手，

(二) 中央研究院專設中國行政制度研究組。

而地方政治應以省為單位，改良省政當從行政制度開始。

(三) 中華文化基金設行政制度研究講座。

弟年來講學作文專介紹政治制度而不講理論者，即此旨也

弟意我國現代名人學者具有兩種錯誤的認識：(一)

。北大政治系今年設有中國行政制度研究一科，其目的在研究中國現行政府機關之行政組織，本學年內只以北平公安局與中國外交部組織為研究題目。此科創設伊始，以實際調查之工作為多。出版刊物可供參考者則甚少。選讀者僅以四年級學生為限。半年以來，選讀諸生頗感研究之興趣。公安當局已予弟等以盡量之援助，此則非始料所能及者也。

言科學則只注重自然科學，而不同時並重社會科學。(二)言社會科學則只言經濟調查或農村調查，而不注重行政管理。猶憶數月以前，適之先生曾有科學救國之論。當時弟即病其對科學之定義太狹。適之先生所着眼者為自然科學，殊不知國家之富強不能專賴自然科學之發達。社會科學至少有同等之重要。因為巴特斯之發明雖然「足够還清」法國對德五十萬萬佛郎之賠款，但美國韋洛貝 (W. W. Willoughby) 教授所提倡之中央預算制度於一九二一年經美國國會通過後，一九二三年美國中央政府的預算節省了三一二，一七二，二九二元美金。自然科學之巴斯特

中國只有政治而無行政。研究政治者多偏重政治學理，而忽視行政制度。弟人微言輕，雖欲有取挽救，亦恐無補於萬一。今得外國學者痛論之，得我兄宣揚之，得獨立評論廣播之，其收效自不可限量。但弟希望我兄暨獨立評

可以替政府還抵賠款。但政治科學之韋洛貝可以替政府節

省費用。弟認爲行政科學實屬刻不容緩，而中央研究院與文化基金會更有首先提倡設立講座之必要。獨立評論諸君子倘於鼓勵研究魚虫鳥獸之外，能以些少金錢提倡研究人事機關的組織，以使之科學化，則助進中國政治改造之功

當非淺鮮也。拜讀 尊文，因有所感，故不惜拉雜爲兄言

弟邱昌渭上言

一月二十八日

人與醫學（書評）

汪敬熙

Henry F. Sigerist: *Man and Medicine*.
1932. W. W. 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N. Y., U.S. A. x+340pp.
G. \$ 4.00.

這本書的著者H. F. SIGERIST 是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繼那有名的醫學史家SUDHOFF爲醫學史教授的。他作這部書的目的是想給醫科一年級的學生一個關於醫學全體的觀念。現在醫學一天一天發達，一天一天的專門化。醫科的功課門類愈分愈多。學生好像走入了一個大森林裏，只見一顆一顆的樹，看不見林子的全體了。這本書就是爲着救正此類而作。

他在這本書裏，以通俗的文字，極流暢的叙說：（一）常人的構造，生理和心理；（二）病人在社會的地位，

病人的行爲；（三）病的徵象；（四）病理；（五）病源；（六）醫學對於病人的幫助；（七）醫生在社會中的地位。他把醫學生所應知道的各方面都論到了。他對於醫學各部分的發達，有正確的了解、公平的估價；對於醫學與文化（CULTURE）的關係，看的清楚；更是時時不忘病人和醫生對於社會的關係。尤其好的，他處處都以歷史的發展爲他的根據。這本書實在是能達到他作書的目的。

因爲文字通俗，叙說流暢，且能供給一個現代醫學全體的歷史的觀念，不但適合初學醫的人之需要，而且適合一般人的一種需要。誰不想着知道醫學究竟是什麼樣的呢？他原書一出，在德國便甚流行。一年之後，便出了瑞典文和英文譯本。法文和西班牙文的譯本也快出來了。

現在聽說已經有人動手將這本書譯為中文了。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從我們不是醫生的人看來，我們的西醫多數是太偏了，很需要這本書所能供給的全部觀念。並且我們又深覺得，許多西醫是不了解他在社會的地位，不明白醫生同病人的關係，似乎也太相信「拜金主義」了。讀這本書的醫生及醫學學生多了，或者可以在提高西醫的道德標準上，有些好影響。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好處。現在國內各種中西醫學比較論，實在是太模糊，太不清楚，太不明白。

發為此種言論的人固然是對於中西醫學往往都是不甚了了。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論者絲毫不知中西醫學的歷史。這本書恰恰可以使讀者知道：(一)現代的西醫學是什麼；及(二)西醫學是怎樣發達起來的。這本書譯出來之後，至少可以使這些論者對於西醫的現狀和歷史有個清楚的觀念。希望他們再把中醫的現狀及歷史自己努力去弄清楚的，再給中醫一個公平的估價。希望他們讀了此書之後，自己能承認自己有所不知，少發些烏煙瘴氣的話。

業角 織丁 精紡 日本之 定價一元二角 王子建著

棉貨侵略是日本對華經濟侵略中很重要的一種，歷年日貨輸入值中向以棉貨占最要地位。本書詳述：(一)棉業組織的內容(二)勞工狀況及工人能率的高下(三)生產成本的分析(四)棉貨供求的比較(五)向外發展的前因後果。所有推斷，全以精確的調查統計作根據。非但可供我國實業家作借鑑，也是關心國際經濟者的重要參考品。

△北平文津街三號社會調查所出版▽

社會科學雜誌 第四期 要目

價值理論的意義…… 樊弘
世界食糧恐慌，原因及各國政府的救濟政策…… 王守禮
浙西農產貿易的幾個實例…… 曲直生，韓德章
日煤傾銷中之國煤問題…… 吳半農
書評…… 吳承禱等

定價：每期四角全年一元四角郵費在內 北平文津街三號社會調查所發行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目價報定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每月五角
「日本」每月一元五角
「南洋」每月一元五角
「歐美」每月一元五角
「世界」每月一元五角

學風

第二卷第十期

書評的價值及其作法…… 董懷恕
望溪手稿題跋…… 傅增湘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 金東原
金元之科舉與教育…… 傅永孝
西廂記底演變……

清未安徽新教育(下)…… 高正方
懷寧著述人物考(下)…… 蔣元卿
評「現代中國經濟史」…… (景賢)
「文憑」…… (景賢)
「鐵流」…… (景賢)

發行處：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冊零售一角
全年十冊連郵一元

國聯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述評

胡適

國際聯盟的十九國委員會自從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提出中日爭執的調解草案以後，很委曲求全的疏通日本，盼望日本不要使調解一條路完全閉塞。但國聯很明白的表示必須接受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十項原則。日本軍閥把持的政府始終反對「滿洲國」的取消，所以不肯承認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中的第七項原則。我們在一個月之前，就推測國聯「決不至於承認日本的蠻橫要求，拋棄李頓報告書的第九章或其中一部分的原則，尤其是否認滿洲偽政權的根本原則。」（本刊三十六期，頁四）

一月十六日十九國委員會開會以後，日本政府不但肯接受調解的原案，並且不肯接受國聯讓步的新案。（國聯讓步的要點是取消邀請美俄兩國參加調解委員會，和把原決議案的理由書改爲主席宣言。）國聯既不能否認其自身所委任之國際調查團的公正報告，就不能不承認調解的失敗。調解失敗之後，十九國委員會就依據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進行製作報告書及建議案。在報告書起草之前，委員會通過了三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承認滿洲

偽政權。這三項原則由英國代表提出，法國代表贊成，國聯的態度到此時始得着最明白的正式表示，世界的輿論也驟然趨向一致。

日本還想惑亂世界的耳目，避免調解破壞的責任，於是又假意表示願意繼續考慮調解的途徑。國聯的特委會，一面進行做報告，一面正式質問日本究竟能否接受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第七項原則。這樣正式的逼迫，使日本不能狡賴了。日本的答覆，延遲又延遲，最後還只是一篇謎語式的遁辭。國聯認日本爲絕無誠意，就用全力進行報告書與建議案。

二月十三日，十九國委員會通過了報告書前三章的初讀；十四日，通過了建議部份。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國聯以書本式發表報告書草案的全文；下午四時（北平時間十一點二十分）國聯用短波無線電向全世界廣播這一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報告書草案。

報告事實的部分完全採用李頓報告書前八章的記載，只補充了上海戰事及李頓調查報告完成以後的事實兩項。

這篇報告的結論，——即是國聯對於中日爭執的事實的判決書，——有這幾個最重要之點：

第一，報告書用老吏斷獄的文字，確切的判定東三省是中國主權之下的一塊領土；凡俄國和日本在滿洲所得的權利都是根據於中國的主權的。這就是說，如果中國在這裏沒有主權，日俄所得的權利就都沒有法律的根據了。

第二，在中國各次戰事與地方獨立時期，滿洲始終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

第三，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的二十五年中，滿洲與中國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關係都一天一天的更密切了，而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同時也繼續發展。日本所獲得或自以爲獲得的權利的行使，往往妨碍中國主權之行使。此種局勢當然引起兩國之間的誤會與衝突。兩方面的各種權利的互相連帶，法律地位的不分明，有時日本對於其特殊地位的見解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要求之對抗，這些也是許多事故與糾紛的根源。

第四，在「一九一八」之前，雙方各有正當的不平：日本利用有疑問的權利，而中國則阻礙那無疑的權利

的行使。「一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前，曾有用外交與和平方法解決懸案的努力，此種方法並未用盡；但形勢日見緊張，日本方面主張遇必要時用武力解決。——這就是說，報告書指明日本蓄意用武力解決。

第五，空氣緊張的原因，報告書中頗以爲中國方面負一部分的責任。如排貨方法的使用，如學校中的排外教育，都足以增加空氣的緊張。但報告書也明說，「一九一八」以後的抵制日貨則屬於國際報復的一類。

第六，報告書指出國聯盟約的目的正是要防止國際空氣緊張時決裂的危機。「據李頓調查團的觀察，中日間的爭執無不可用「公斷」方法解決的。正因爲懸案堆積已使空氣緊張了，那自以爲受侵害的國家如果感覺外交方法拖延過久，就應該喚起國聯的注意。國聯盟約第十二條對於國際爭執的和平解決，定爲會員國的正式義務。」——這是明白的對日本的責備，因爲當時日本「自以爲是受侵害的國家」。

第七，報告書明說「一九一八夜日本軍隊在瀋陽及其他地方的軍事行動，不能認爲自衛的動作；就是當爭

執時期內日本的一切軍事動作，總括看來，也不能認爲自衛的動作。」報告書雖然沿用了李頓調查團的話，說，「當九一八之夜，日本軍官或許自信其行動爲合法的自衛，此種可能，不必斷其必無」，但報告書很嚴重的申明：「合法自行的行使，並不免除一個國家對盟約第十二條的責任」。

第八，報告書明白指斥「九一八以後日本軍事當局的一切活動，無論在軍事上或在民政上，其主要動機都是政治的」。又明白指出，「一羣日本文武官吏，在滿洲境內計畫了，組織了，並且實行做出了一個獨立運動，來做九一八事變以後滿洲局勢的解決方法。……這一個由日本參謀部的援助與指揮的運動，若非有日本軍隊的存在，決不會實現。這不能認爲自然發生的，出於真情的獨立運動。」報告書又明白宣告：「上述的運動所產生的『滿洲國』政府的政治的及行政的主要權力都在日本官吏的手裏，名爲顧問，其地位皆足以充分把持行政。滿洲境內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都不贊成這個政府，並且認牠爲日本人手裏的工具。」

這是國聯對中日衝突一案的結論。我們看這些結論，

可以看出這些判斷無一條不是用李頓報告書的前八章作根據的。當李頓報告書發表之日，我曾在本刊作文，稱爲「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當時國內輿論都不贊同這個見解。我所以那樣稱許李頓報告，因爲我們知道那個調查團裏有顯然袒護日本的人，居然能全體一致簽字於一個很明白指斥日本理屈的報告書裏，使此次爭端的是非大白於世界，不能不說是世界正道的最大勝利。西洋國家有了長期的法治的訓練，對於公斷人的信仰是我們東方人所不能夢見的。公斷人也自己明白他們的地位的尊嚴，都不敢曲徇私情的偏向，損失自己在公論裏的聲價。即如英國前任外交部長雷丁勳爵(Lord Reading)，在二十年前做美國與加拿大的漁權爭執的公斷人時，他研究本案的結果，認美國的理直，就不惜宣判加拿大的敗訴。一個法家肯宣判他本國屬地的敗訴，這正是西洋人所以尊信公斷人的由來。自中日爭執提出國聯以來，世界輿論因爲認識不充分，因爲厭惡中國近年排外的囂張，因爲日本宣傳能力之大，因爲中國自身政治之實在不滿人意，所以同情於日本的議論在各國都頗佔勢力。在這種空氣裏，我們雖用全力做宣傳，終不能期望國外輿論的一致同情於我們。在這種形勢裏，止有負世界重望的公斷人的報告可以統一世界的是非

第二節：因爲日本軍隊出現于南滿線之外殊不合上述解決應遵守的法律原則，故大會建議此等日本軍隊的撤退。下文所建議的談判的第一個目的即是辦理撤兵，並規定其條件，次第，與時期。

第三節：關於調查團報告書中所述及的其他爭執問題，大會建議兩國依據上述各種原則與條件，商定其解決。

第四節：因爲此項談判進行時任何一造不應該強令其他一造接受違背上述建議之條件，所以大會建議雙方的談判應照下述方法進行：（1）請任何一造通告國聯秘書長願否接受大會建議的解決，其唯一條件即其他一造亦願接受建議。（2）談判的進行應由大會設立之委員會襄助，此項委員會之組織如下：九國條約簽字國，十九國特委會中其他會員國之願意加入者。兩造表示接受大會建議時，國聯秘書長即通告各國選派委員會之委員，並通告美俄兩國選派代表加入委員會。（3）在兩造接受大會建議後一個月之內，秘書長應採取適當步驟，開始談判。

第三章聲明大會建議之解決方案不是僅僅恢復九一八

以後的原狀，也絕不包含維持與承認滿洲的現政權，因爲此種現政權的承認與現行國際義務之基本原則不相容，又違反遠東和平所緊需的中日兩國間的和好。本章又聲明，國聯會員國應繼續在法律上或事實上不承認滿洲現政權，並應相約不作關於滿洲局面的單獨行動。會員國應採取一致行動，並應在可能時與有關係之非會員國採取一致行動。

○ ○ ○ ○ ○

這個建議案雖然仍是用李頓報告書第九第十章作根據，但有幾點可說是比李頓的建議有點進步。李頓第十章的建議的辦法本來有點太煩瑣，其中有些步驟（如所謂「諮詢會議」）本來就行不通。國聯的建議案把許多枝節都刪去了，只留下了幾個重要解決方式，這是一個優點。此案所定的方式只有四個：（一）滿洲主權屬於中國，故由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建立東三省自治政府，（二）日本軍隊撤退到南滿路線內，（三）其他爭執問題由兩國談判解決，（四）國聯設立委員會，襄助談判的進行，以免任何一造強令其他一造接受不合建議原則的條件。這樣的明白規定，表示國聯對滿洲局勢的認識已比李頓報告發表時更明瞭了，所以能毅然決然拋棄李頓報告所擬議的諮詢「滿洲居民代表」的笨重辦法，這是最大的優點。此案明白命令國

聯各會員不得在法律上或在事實上承認滿洲偽政權，這是李頓報告書所要說而未敢明說的話，也是一大進步。

但此建議案也有很使我們失望之處。第一，任何一造的接受建議，皆以其他一造也願接受為條件；若一造不願接受，則委員會不能產生，談判不能進行。在此局勢之下，國聯將取什麼步驟？第二，如果有一造不但不接受建議，甚至於退出國聯，國聯將取何步驟？第三，此跋扈的一造若更進一步，不但無視國聯的建議，並且繼續進行對中國作戰行為，如今日日本軍隊大舉進攻熱河之暴行，國聯應取何步驟？——凡此三點，都極關重要，何以建議案在此很明顯的局勢之下，完全不提起預防或救濟的辦法？

照現在事實上的趨勢看來，日本已決定不接受國聯的建議案了，已公然宣布要脫離國聯了，已公然大舉進攻熱河了，在此形勢之下，國聯的建議不待大會的通過，早已被日本拋入廢紙堆裏去了。中國方面應該如何自衛，那是我們自身努力的問題。但國聯的權威與尊嚴在今日已到了

最後的試驗時期，國聯既已代表世界公論發表了這一篇最明確又最嚴重的判斷，不應該不採取相當的步驟，使這「

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有一個可以發生效力的機會。我們希望國聯大會要明白：日本的暴行者對於國聯的建議早已明白答覆了！日本答覆不待松岡洋右的書翰，而在於熱河境上的飛機坦克的作戰！我們希望今日開會的國聯大會不但通過這個正義的報告與建議案，並且立即宣告日本的戰爭行為已足夠構成盟約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犯罪行為，「應即視為對於所有國聯其他會員國有戰爭行為」第十六條所規定的「制裁」方法，國聯大會應即宣告已到適用的時期，並應即採取有效的步驟，計畫此種制裁方法的實施。昔者威爾遜總統會宣言，要使民治在這個世界可以安全。今日之事已不僅是中國與日本的衝突了，今日之事乃是日本與世界正誼的作戰。國聯的責任是要使人類在這世界可以安全！

一九三三，二，二十一，國聯大會開會之日。

國聯態度轉變之推測

孟真

在這一星期中，國聯的態度，在九國起草會中所表見

者，及在十九國委員會中所表見者，突然轉於強硬的態度

。十九國委員會所通過的報告，在若干點上直比李頓報告書更合於事實，即是對日本的頑暴行爲做了一個更深切的認識，也即是對日本軍閥及其附和的國民作一個更嚴重的公義指摘。盟約十五條第四項下之草案能突然到這個地步，局外人誠然免不了驚愕，身受其痛的中國和全世界的些須相信正義者不能不感佩，而一般人亦不能不感覺何以在這幾個星期中國聯的「紙老虎」幾乎穿完之後，突然出了這麼一個路程。於是人人推測，其說不一，現在且將所聞及所可推想到者寫下，隨條約略討論一下。

一，國聯路窮命盡，且作困獸之鬥。這一說是

假定國聯作此一轉不過是不負責任的上台，其結果自然是瓦解得更快。我絕不能相信這一說，因爲：——（一）小國語言及行動之強烈的趨重於維持盟約亦不可謂爲全是高調，「捷克及瑞士的海軍」雖然不能來鎮壓中國東海，但這些小國都不是日本，也都不是蘇俄，大言與宣傳的外交姿勢究不能不有若干實在，也都不是中國，不是慣於專說空話的。小國的態度自也是他們本國在將來變化中可以相當實踐的態度。（二）大國的態度，特別是英法兩國是不會取不負責任的路徑的，上臺時總須先想到下一步。且法國報界久有爲日寇麻醉的嫌疑，何以這次少聽到法國報界對國聯

態度的嚴評？英國報界在保守黨及接近保守黨一派者，何以不多有責備國聯凶莽或過於理想者？且以今日所得倫敦路透電論，泰晤士報，即最可反應英國外交政策的報，大稱讚國聯對中日案之新趨向，何況起草會中提議對東北案應說明不承認「滿洲國」者，正是英國外交次長伊頓？他這議論正可與月前西門外交部長之說不可決定不承認「滿洲國」者遙遙相映。此一對比雖微妙而有趣，究不能說伊頓的話不是完全得到英國政府的許可的。（三）外交家說話，滑則有之，空則有之，詭詐則有之，僞善則有之，若像我們貴國的黨八股大言不慚，儼然「以天下爲己任」，只論說，不論作的，可是斷然無之。總而言之，國聯走上這一路，決不能看做輕易不負責任的衝動。國聯固然久已陷于絕境了，國聯固然實在不得了了，然而他的積極的一轉方向，總不能認爲回光返照。日寇也知道是這樣，所以久已說下的退國聯，而今也躊躇了，民政黨顯然不贊成即退國聯，海軍方面顯然不與陸軍同一感覺，雖然「勢逼如此」的末後總是退出，而此一躊躇——照他們以前的狂論不應該有的躊躇——很可表現他們了解此事之嚴重性。

二，英法已與美俄有合作的諒解或約定。這也未免過於樂觀。蘇俄以其立國之根本論，斷無與英法美取一

種同盟式的結合之可能，而美國對歐洲之戰債問題正在嚴重的危機中。戰債問題正接不上時，美國的下次政府竟與英法政府默契，是事實上絕不可能者。且前些時英國財長張伯倫聶爾正說了一個絕不合美國立場的演說，而謂同時英美對日已成默契，頗不近情理。日本人也看到這一層，所以也並未會拿國聯的這一傾向作爲一個抗全世界的開端。

以上的兩極端論既非事實所能容許，然則國聯之轉方向究應如何解釋呢？推測這事，自然要注意在英法兩國上，所謂「小國」向來是坦白的維持正義者，原不待論。我們先說法國。法國的小政變，即內閣變動，是常有的，然而大政變總是至少四年一次，即是以國會之選舉爲定。去年法國國會的選舉中，左黨得到一個很明顯的勝利。所以這四年內內閣無論如何改換，總是左傾的政府。我們或者想達拉捷內閣是在最近三個內閣中最左傾的，但法國不是一黨執政的內閣，而永是羣黨聯合的內閣，則在國會左派得勢的四年中，大體上應無根本變化。厄日歐總是此時法國國會中第一顆明星，和俄總是法國政府的一貫策略。法國外交在左派右派有一最不同之點，這一點如下。左派右派都是希望俄國還債的，然而右派以抗俄爲法國霸業之保障

，左派以和俄爲歐洲小康亦即法國榮盛的路徑。左派右派都是怕德國起來危害自身的，然而右派以繞德國四圍的國家之連合把德國壓住，左派以條約有效，國聯有威，爲「安全問題」之保障。惟其如此，所以法國政治左傾之後，出來了洛桑會議的成功，出來了法俄互不侵犯的協定。法國本已走上了這一條較光明的路，而德國最近的政治變動更使法國不能不維持條約，維持國聯。德國極右派之外交政策並不是上了台便與法國開戰，乃是上了台求與法國聯盟，向俄進攻。此計如售，便是宰割波蘭，其結果是法國失其東歐憑藉。此計不售，更有聯意的花樣，聯英的夢想。總而言之，是要先弄得歐洲現局破壞，然後條約可改，局勢可變。在這情形之下，法國單身對抗是名不正勢不便的，莫妙於憑借國聯的威權，作爲條約之保障，然後歐洲若干小國多可站在法國方面。國際聯盟本不是一個單純意義，說他是大國的工具也可，說他是法國在歐洲大陸上合縱連橫的機關也可，說他是大同思想國際合作之化身也可，說他是未來之希望也可，說他是第三國際的正面敵人也。他本有一個複雜的來原與演進，所以批評他的話本不能同，全看是從何一觀點著筆而已。且有一向及最近法意德三國對國聯的輿論，這個情理正是明顯，德國甚不愛國

聯，最近尤其輕視國聯，意國對國聯態度若即若離，法國則顯然最熱心。這豈不是他們三國自身立場之反映嗎？日本必欲頑弄國聯到底，以便消滅之，法國能不戒懼嗎？

再說英國。英國有一個「待以觀之」的傳統態度，有一個「鬼混過」的名譽。伊頓既在起草會中說了列入不承認滿洲國的話，這裏邊不能全無所謂。若說中國憤慨西門的表示可以使英國轉換態度，未免太把這中國人的感情看重了。在相當限度內，英國人決不願中國人與他生惡感，然而冒着大危險以救濟中國人對他的感情，是不會的。況且中國人此時絕沒有與他翻臉至於排他的貨的本領，他是看得明白的。況且他在中國的貿易究敵不上香港新嘉坡的陷落及澳洲的危險。若說，日本照這樣子起來，實在給英國的亞洲威權與利益一個大打擊，故不得不預防，未免看得英國人太知慮遠大了。這個打擊的要出現自然是很清楚的，然而這是將來的話，一旦對日本起了大危機是現在的話，英國人的脾氣決不會為將來且然的危險，先造出目前立現的危險來。且英國人所最顧慮者是俄國，縱然列國合起打下日本來，俄國在遠東的力量，勢必無形的大申張，英國又將如何收拾？若無俄國，英國早不會如此怕日本了，若中國有成強國的目前可能，英國早要把均勢的一端放在

中國了。無如這兩件事實皆明顯，所以英國依日本為其東防衛的心思，雖在荒木的吞併南洋澳錫主義下，究不會完全斷絕，至少在保守黨之右派中這樣。不過，遠東的均勢，歐戰後已不存在，日本之廿一條要求便是這個均勢因歐戰而破壞的第一聲。我們若想到華府會議之最初提議者是英國，用海軍協定九國公約代替英日同盟者是英國，則可了然華府會議已來英國在遠東的外交已進入一個新章，即安格魯撒克遜合作的一章，猶之甲午戰後英國取日本為與國之舉為時勢造成之一大轉方向也。美國既早標不承認偽國之主義，而後任總統羅斯福在遠東問題上原則繼續司江遜政策已有明白之指示，則英國在遠東局勢不得道路之困難中，長久下來，不得不逼到與美同一道路上去，是事實之當然者。英國之變態度，恰與駐美之英國大使回國同時，又恰在英國戰債代表團不久出發赴美之前，我們自不能不覺得美國新任總統對東北問題之立點已為英國所知，而英國為解決戰債軍縮等問題不得與美國立一個對遠東異樣的態度。況且俄國之決不會承認偽國，是人人所知道的，俄國之決不會與日本合作，也是不成問題的，則英國雖不能希望與俄國澈底合作，也正用不着顧慮俄國之或有擾亂行為。然則英國之取此一個新態度，可以當做一種對俄

的認識看，且可以當做對美的一種迎合看，也可以當做戰債問題討論之前奏點綴看。若以為英美中間沒有接洽，是絕不然的，若以為已有深切合作的默契，也未免言之過早。英美合作的趨向是大有了，此趨向之明顯自九一八以來無過今日者，然此合作究竟能否堅確實現，還待後來若干事件之推移，例如戰債問題之解決，中國之支持力，日本之步驟，歐洲大陸上之形勢，等等。我們中國人今日雖可略高興些，然還不能死心塌地，以為我們已有所恃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國聯走這一條路，雖然已經指出來一個明顯的方向，但在這一個方向的道路中歧路還是很多的，也許前面的荆棘閉塞着這條路。中國人是負斬伐這些

荆棘的先鋒責任者，我們不做我們應做的工作，而責備別人奈何不進一步，天下豈有此理？若問國聯下一步能不能走上十六條，這應該完全問自己了。不抵抗沒有結果，小抵抗有小結果，大抵抗有大結果。國聯能不能用十六條，正待我們能不能做比利時了！現在「抵抗」固已成爲衆口一詞的話語，然而放一槍，開一砲，盡民之膏澤以買飛機一類的抵抗，還不算數。既要抵抗，又要抵抗得好，否到昔日醉生夢死之無抵抗，今日醉生夢生之抵抗，其無濟而有害於國家大事國民榮譽是一樣的！我且問當此責任者一年中之準備如何？今天的努力如何？

我所知道的朱慶瀾將軍

丁文江

許多不滿意于青年的人往往歸咎于前輩的人格墮落，不能做青年的模範。平心而論，這種話不是完全公道的。前輩中可以做青年模範的固然不多，却不是絕對沒有。只可惜青年很少有知道他們的機會：因為一來這種人對於青年不能常常接近；二來目前的風氣以罵人爲時髦；除了哀啓以外，很少看見有恭維人的文字。青年所看見的大抵是

描寫社會墮落的小說，或是攻發人陰私的新聞。無怪他們以爲普天之下沒有好人了。我現在要來介紹一位我最尊敬的前輩給青年，使他們有所景仰，或者可以幫助他們養成他們自己的人格。

誰都知道朱慶瀾將軍是一位慈善家。留心東北近事的人也許知道他是義勇軍的首領。但是很少人知道他的詳細

歷史。我認識朱將軍不過十年，一共和他見面不過十次，不配給他做傳記。我現在只能把我個人的觀察寫點出來，表現他的人格。

我第一次認識朱將軍是在民國十一年夏天。那時候中國科學社在南通開年會。我因為有事要到上海，會沒有開完，就先走了。臨走的時候，張孝若說，「朱子橋將軍也是今晚上船。你路上可以不寂寞。」我知道他是民國以來的第一位廉能的疆吏：做過廣東巡按使，黑龍江將軍，政績都極好；而且宣統末年他在四川做新軍的統領，部下有許多人是我的朋友，他們每次講起他來，都是極口的推崇。但是我並沒有見過。聽見可以給他同船，我很高興，立刻請張孝若寫了信介紹，並且打聽他在江口所住的旅館。孝若對我說江口只有一家旅館可住，到那裏決不會錯過。

但是我到了江口，向旅館打聽朱慶瀾將軍，却沒有人知道。江口等輪船是一件很苦的事。下水船到南通都是在夜間，又沒有一定的鐘點，事前也沒有電報。南通不是一個「通商口岸」。輪船沒有碼頭可靠。只憑「洋棚」的人在一個高台上瞭望。看見了輪船的燈，立刻用小划子把客人裝到江心去迎着輪船。所以等船的客人都不敢睡覺。等到

旅館的人一聲叫喊，立刻就要起身。南通的蚊子極多。夏天晚間張着口說話，往往蚊子會飛進你口裏去。我雖然可算是有通人，但是離家鄉多年，抵抗蚊子的力量早已喪失，只好躲到帳子裏面去。帳子是洋布的，悶的透不得氣。牀上舖的蓆子，染過無數旅客的汗，臭不可當。不得已只好跑出來喂蚊子。等到實在咬得太利害了，又鑽到帳子裏去躲一陣子。如是進出了好多次，好容易聽見說望見燈了，連忙出來上划子。一出旅館門，就看見一位客人，身長六尺以外，挺着胸脯，在我前面走着。我心裏一動，想道，「這一位不要是朱慶瀾將軍？」再一看，他走的很快。旅館的夥計帮他拿着兩個極大的皮包，跟他不上。他就接一個皮包自己拿着。我想做過巡按使將軍的人，在內地旅行，豈有不帶一個當差的道理。這當然不會是他。上了划子，聽見他說的是一口山東話——朱將軍原籍紹興，在山東生長——我又疑心起來。就低聲向旅館的送客的夥計打聽。他回道，「這一位是鹽店裏管事的」。划子上的水手把燈一提，我看見這一位大漢，烏黑的頭髮，臉上沒有一點皺紋，大約歲數不過三十歲左右。我想不必再胡猜了。在宣統三年朱將軍已經當統領。那時候至少也有三十歲。民國十一年他至少在四十以外。這一位一定不會是他了。

上了划子一會子，方知道我們的船並沒有來，來的是
一隻貨船。沒有法子，大家又回到旅館。我既怕蚊子，又
怕帳子裡汗臭，只好在旅館裏穿堂過道，走來走去。看見
一間房開着門，我同行的一位熟人坐在那裏和那位大漢談
天。我就也走了進去，向那一位大漢請教姓名。他說，「
姓朱」。「台甫呢？」「子橋」。我纔恍然大悟，他果然
是我要見的朱慶瀾將軍。但是燈光底下細看他的面目，實
在像是比我年輕。問起他的歲數，他說是四十九，比我大
十三歲！

天大亮了船方才來到。上了划子，我問朱將軍道，「
子橋先生預先定了艙位罷？」因為我以為他一定是坐大餐
間的。他說，「艙位用不着定。好在如果房艙沒有地方
，總可以在統艙裏擠一擠的。」我方纔知道他是不怕坐統
艙的。划子搖到輪船邊，客人和行李，救火的一樣搶着上
去，倒沒有甚麼。上了船以後，却困難了。我們的船是太
古公司的大通，是長江船裏最老最不堪的一隻。那天又特
別的擁擠：統艙的客人把甲板上，樓梯口，鍋爐傍的地方
都佔滿了。朱將軍兩隻手提着他的兩個極大的皮包，擠在
人堆裏面，很難走動。我只帶得一個小包，手差不多空着
，我就把朱將軍的皮包接過一個來帮他拿着。這一個包有

五十斤重，我僅僅手提得起來。好容易擠到房艙，却早已
沒有地方。我怕他老人家要坐統艙，不等他同意，就向
艙裏跑。居然在房間外面所謂客廳上每人佔了一席之地。
我因為一夜沒有睡，困頓不堪：躺了下去就睡着了。等到
我醒轉來，看見朱將軍立着和人談天。原來他遇見了一位
四川軍官，是他的舊部。他非常的高興，向着他問長問短
，不但沒有睡，而且沒有坐。開出飯來，他一口氣就吃了
四碗。吃完了依舊的劇談。一直等到天將晚了，船到上海
，他始終沒有一點倦容。船一到岸也沒有看見有人來接。
他一個人提着他的皮包下船去了。

這一年的冬天，我到奉天。他已經做了中東路特別區
的長官，恰巧也在奉天。見了面他很高興約我去遼北。
十二月天氣，溫度在零度以下十幾度，而且刮着大西北風
。我穿了皮大衣還覺得很冷，他着的是夾呢的軍服，上面
只披着一件夾外套，但是他下了汽車，各處飛跑，沒有一
點瑟縮的樣子。回來已經天黑。我到一個熟人家裏吃晚飯
。主人聽說我跟朱將軍去遼北，大笑道，「你遇見這位
先生，真正是晦氣了。請問這種天氣，除了他還有誰會想
到遼北？他在此地沒有那一個不討厭他。他是老前輩，

凡有宴會，人家不好意思不請他。他又每請必到。到了以後，穿起軍服，正襟危坐。凡有要吸鴉片，叫條子，推牌九的人都覺得不方便。他酒既不會喝，菜又不知味，坐在棹上，只曉得等飯吃。吃起飯來至少三碗，叫一棹子客坐在那裏等他。人家請他吃酒席，真是冤枉。請他吃飯最好甚麼菜都不預備，只請他吃水餃子。給他幾十個水餃子，他就很高興了。你是做買賣的人，何必和這種人來往？我于是知道朱將軍在中東路特別區決不能久于其位的了。果然到了民國十五年我在上海的時候，他已經辭了職到南方去。我請他在我家裏吃中飯，只請他的舊部溫應星陪他。家裏人以爲三個人吃飯。有一百隻水餃子，一定够了。那知道他老人家甚麼菜都沒有十分吃，却一口氣吃完了六十隻餃子！

○ ○ ○ ○ ○

我第四次看見他是在塘沽火車站。民國十九年我從貴州回來，從上海坐船到塘沽，在那裏等火車。忽然聽見有人叫我的名字。回過頭來却是朱將軍。寒暄以後，他拉我到火車上坐坐。我去一看他坐的是一個鐵蓬貨車。掛在一列糧食車的最後面。他的舖蓋攤在地下。傍邊放着一個小爐子燒飯吃。我問其所以。他笑着道，「我這幾年無聊，

做點慈善事業。現在蔣回馮打起仗來了。陝西的人民都要活活餓死！我弄了幾個錢，買了幾車糧食，想運到西面去。第一是要車輛運輸已經很難。有了車輛，還要弄火車頭。好容易火車開動了，走不到幾站，火車頭又被人搶去了。臨時再得想法子。我現在就是在這裏等車頭。」我說，「子老何必自己押運？派兩個得力的職員還不行嗎？」他說：「你那裏知道！現在他們打仗，車輛和車頭都很缺乏。糧秣也不充足。要不是我自己在車上，不但車輛車頭半路上要被人搶去，連糧食也都要沒有下落！好在我沒有甚麼事。從此地走起，運氣好五六天也就可以到鄭州。到了那裏和馮煥章接洽好，再向西就沒有困難了。」

我聽他這番話，無言可答。等了一會，通車到了。我本來想坐頭等車的。想起他的鐵蓬車，心裏很慚愧，就買了一張二等車票回到北京。

○ ○ ○ ○ ○

我已經說過他是民國以來第一位廉能的疆吏。他在黑龍江和廣東的政績，我並不知其詳。我只曉得凡有廣東黑龍江兩省的人提起朱將軍，沒有不肅然起敬的。賑災的捐款，華僑是大宗的來源。他們捐款的條件往往是要朱將軍個人的收條。民國十七年我在澳門去參觀賭場。遇見一

個侍者告訴我，「現在澳門的生意遠不如從前了，因為省城的河南地方已經開了賭。省城的人就很少到澳門來了。」

「他又說，「先生你是外江人，不知道賭是廣東最好的買賣。做官的沒有不靠這個發財的。只有朱將軍不肯要這筆錢。其餘的那一個不弄幾十萬！」民國十九年秋天我到哈爾濱。火車上遇見一個會說中國話的白俄。他說，「我是生長在哈爾濱的，俄國沒有去過。我對於蘇俄的共產黨，並沒有惡感。但是我已經入了中國籍了。因為朱將軍在這裏的時候，我看他待人太好了——他待我們和待其他的中國人完全是一樣。我想我的財產都在哈爾濱，不如做了中國人罷。那知道他沒有許多時就辭職走了；後任的人就大大的不同。」他聽見我說我認識朱將軍，立刻肅然起敬。介紹他同行的朋友，請我喝酒。「你是朱將軍的朋友，我們應該款待的。」

從民國十九年到如今，只有前年夏天，他來看我一次。以後就不通音問。最近這幾天我方纔又看見他。他對我說道，「丁先生你是講科學的，凡事都要講計畫，講預備。我們只曉得胡幹。想到甚麼就幹甚麼，幹到那裏是那裏

。等你計畫預備好了再幹，人民都餓死了，國家也亡掉了！」

我與他見面的次數雖然不多，每次見面都談得很久。我從來不聽見他罵人，說刻薄話。他自己穿布，但是他並不怪人家穿綢；他現在自己吃素，但是他並不厭惡人家吃葷。他的刻苦是他的天性。他並不因為如此而不近人情。他口裏雖不減否人物，但是他並不是不識人。我第一次看見他，講起我們所認識的一個青年軍人。那時我很恭維他，以為前途很有希望。朱將軍把兩隻手向上一托道，「太浮。腳根沒有立定」。果然沒有幾年這位軍人就墮落了。我纔佩服他的先見。

他三十八歲做統領，四十二歲做將軍，四十四歲做巡按使。今年他整整六十歲。頭髮也白了，臉上皺紋也多了。但是他這幾根白髮，幾條皺紋，救活了百十萬災民，組織了十五萬義勇軍，為中華民國爭了幾分人格！

我所知道的朱將軍不過如此。青年的讀者，請你們想想，這一位前輩，配不配做我們的模範！

二十二，二，二十

評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

叔永

國聯教育考察團受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的委任，於民國二十年秋間來華考察。他們考察的結果，在幾月前已經用專著的形式名「中國教育的改造」一書發表了。這本報告書出版後，極受教育界的注意，并經國立編譯館譯成中文，於去年十二月出版。無論如何，這本書對於我國教育前途的關係是很大的。我們看見這本報告書的時候，雖和幾個朋友相約，各人寫一個書評，以表示我們對於牠的反應。現在時隔兩月，還不曾見有其他的批評發表，我不妨先寫出一點來作一塊引玉的磚頭。

這本書共分兩部分：第一部為通論，中又分（一）中國教育的情形，（二）國家教育與外來影響，（三）教學精神，（四）語言與文字，（五）行政原則，（六）財政組織，（七）教員，（八）全國學校的分布，（九）學校的合理的利用，（十）學童與學生的社會選擇，（十一）學制等章。第二部為各論，又分（一）小學教育，（二）中等教育，（三）大學教育，（四）成人教育等章，而以改革初步的建議案做牠的附錄與總結。這本報告書中的各

章，有的是事實的敘述，有的是觀察和意見的發表，而每一問題之末，在可能範圍內，必定提出幾條建議。這是這個報告書的特點，也是我們所以特別重視這個報告書的所在。

這本報告書的體裁，既是由通論而各論，由小學而至大學，成人的教育，設如我們依次一一加以討論，決不是這樣一個小小篇幅之所許，而且也無以見出此報告書中的重要觀點。我們現在且就事實，觀察，建議的三項來做一個討論的範圍。

關於事實一方面，考察團諸君雖經聲明，他們所引用的數字，都是根據政府發表的統計。他們不能保證這些統計的正確，但在他們考察的短時期內，不能希望他們製成新統計。這些話，我們當然是極表同意的。不過在有些地方，報告書中指陳的事實，與實際却有大相逕庭之處，這恐怕不能讓統計來代負責任罷？例如第二十頁說「因為各國退還庚款，纔有許多高等教育機關的設立，而且許多經費充足的大學也是由此成立的」。又如第二十二頁說「

中國中等學校的大部分，都是由外國人發起的」。這兩個說法，恐怕凡稍知中國教育的歷史和現狀的，都不能認為正確罷。最顯著的錯誤，莫如說平民教育會定縣工作的經費，有百分之六十，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補助。但事實上，我們曉得中基會對於平民教育會的補助，不過兩萬元，若拿此數與平教會的經費三十六萬元作比例，不過百分之五而已。這種經費的來源問題，本來沒有重大的關係，我們把牠指出，不過以見「走馬看花」式考察的危險，無論如何的專家也是免不了的。

關於幾個教育問題數字上的比較，我們得到不少的教訓。例如討論小學教育，他們發見由民國四年至十九年，十四年之中，學生的增加率為每年百分之七。因此他們推論，如中國欲實行四年的義務教育制，照此率增加，須要十年。但如每年增加百分之五，則達到此目的須二十至三十年。（第七十七頁）

最有趣味而又最重要之事實，在此報告書明白指出的，莫如各級學校每一學生每年用費及各級學校教員待遇的比較。照考察團的估計，中國每一個初小學生每年的用費為三元半至四元，高小學生約十七元，中學約六十元，（高中及師範職業學校約一百二十元，）大學約六百至八百

元。在歐洲各國，小學學生用費與大學學生用費之比，為一比八或一比十，在中國則為一比二百。教員待遇，小學月薪二十至三十元，中學八十至二百元，大學則三百至四百元。在歐洲各國，小學教員與大學教員月薪之比，為一比三或一比四，在中國則為一比二十或更多。（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頁）這些事實固然單簡，但狠可以指出我們教育上許多問題與癥結，例如中等以下教育經費的短少，小學教員待遇的應加改良等等。倘若我們看了這些數字，只當作是一些數字，別的不發生甚麼反應，那麼，我們用不着請甚麼外國專家來考察，更用不着看他們的報告。

○ ○ ○ ○ ○

關於考察團對於中國教育的批評，我們以為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外國教育的影響，二是我們的教學方法。若是我們的觀察不大錯誤，這兩點是他們批評中國教育的骨幹，也是我國教育的生死關頭，我們覺得有提出討論一下的必要。

（一）外國的影響問題。在報告書第一部分第二章討論「國家教育與外來的影響」，劈頭先說：

「此多種外國制度，為中國所竭誠熱心採用，而努力使之同化者，是否真能應付當今中國國家教育之

需要，中國尚無暇顧及」。（用國立編譯館譯本，下同。）

他們繼續地說：

「故主要之危機，即在對於外國文化之方法與實質，徒爲形式上之摹倣而已。現代中國最顯著之特徵，即爲一羣人所造成之某種外國文化之特殊趨勢，此或來自美國，德國，法國，或其他國家，影響之最重大者殆爲美國」。

考察團的這種觀察，不只是限於一地一時，而是說這一個「危機」，「癥結」，普遍於各級教育之中。例如在討論小學教育時，則說：

「關於課程及方法，中國之小學——實際一切學校及科學機關皆然——對於中國社會在科學上與教育上不可少之要素，尙未加以充分之注意」。

對於中學教育又說：

中國之中等教育，「對於……根本的文化問題，鮮能有充分注意與相當考慮者；大多數中等學校，不過率然相與摹倣歐洲制，美國制，或日本制而已」。

對於師範教育，他們又說：

「在歐洲各國，中學教師所受之訓練，事實上即根本與大學教育相同。……蓋此種任務，應由大學中之文學院與理學院負擔之。……但在中國，一如在美國然，因着重教育學，遂特別設有許多師範學校」。

像這一類的話，散見於報告書各部分的還很多，我們爲篇幅所限，當然不能一一的徵引出來。綜結起來說，考察團的意思，以爲一國的教育，應該根據歷史文化，社會環境，經濟情形，創造一種新制度，以求適合以上的種種條件，不可盲從外國，尤其摹倣那文化經濟和我們社會情形相隔太遠的美國，是不對的。

對於考察團這種意見，我們只有表示十二分的贊成，不過我們不曉得考察團諸君對於我國教育的歷史，曾經有過相當的研究否？在三十年前，我們無所謂新式的學校，更無所謂教育制度。我們所有的，只是一些八股策論的教書匠和讀四書五經的私塾。後來科舉停了，學校漸漸的起而代之，但經過了三十年的演進，我們如果到內地去考察一下，便可以見得有許多地方，這種私塾，還能與新式學校并行不悖。不但如此，我們曉得在許多學校裏面，雖然教的不是四書五經，而是白話國文地理歷史等等功課，

可是他們的教法，還是和從前唸四書五經一樣，而且許多學生的心裏，也還在那裏做他們的洋八股洋翰林的夢。在這樣情形之下，考察團諸君，認我們的學校教育過於外國化，我們的意思，却是覺得我們的外國化不够。自然，我們所謂外國化，並不是說外國學校用英語法語講授，我們也非用英語法語上課不可；外國學校以西洋歷史，外國地理為必修科，我們也非講授西撒拿坡侖羅馬希臘不可。關於這些方面，當然各國有各國的差別與需要。我們所要外國化的，乃是功課的編制，教材的選擇，教學的方法，人格的培養，是不是如外國學校的有目的，有辦法？我們

試看看我們中小學功課的龐雜，教法的呆板，正如陶內教授所謂「好像中國故意用教育使後代的人們呆蠢，神經失常，和不快樂」，那一件不是恰恰和近代的教育原理相反？拿考察團所特別指出的美國來說，我們參觀過美國小學教育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他們養成學生的活潑精神和健全身體的注意。但是我們小學教育的缺點，恰巧是與這個現象相反。這能說我們的小學教育是美國化嗎？所以我們對於考察團諸君所說：「新中國必須振作其本身之力量，并從自有之歷史，文獻，及一切固有之國粹中抽出材料，以建造一種新文明」，固極表同意，但謂中國目前教

育的失敗，由於過分的外國化，則尚不敢苟同。我們以為中國目下新教育的失敗，一大半由於新的只在形式而舊的仍是實質。這種實質的改革，除歡迎澈底的外國化——即種種方法精神的改革，無他道也。

（二）教學的方法問題。這個問題，在報告書的第三章中即有極詳盡深刻的討論。第三章的題目是「教學的精神，尤其是科學方面」，這可見他們認定科學在教育上的重要。而我們教科學的不得其法，尤其是教育無良好結果的一個重大原因。他們在第三章的末段說：

「中國欲返乎昔日之安定狀態，端賴一種教育組織，其大部分須建築於固有文化之上，而同時亦須受實驗科學精神深切之激發。中國人所應知者，即科學對於人類之價值，不在於人類之物質力量，而在吾人由科學而養成之態度。真正的科學，既非以物質支配世界之實際結果之總和，又非知識上之一種虛飾；乃係內心之生命，以適應現實環境為目的，努力從事，而尚未完成其使命者也」。

如何能使中國的教育組織，建築於科學基礎之上，這個問題，在本章裏已有相當的說明。他們說：「中國須使其新近之努力，與其過去所固有者聯合，又須從西方科學中採

取其具有真正人生價值之特點及其精神與方法，不可徒採其結果』。又說：『中國欲完成此種使命，與其憑藉摹倣，毋寧憑藉心虛之奮發。她必須發展一種教育制度，能滿足其需要，并與其自有之價值觀念相符，以養成再造中國之人才。她對此既有信心，對於實驗方法的教授，必須利用過去的教訓，使物質與精神，學校與外界生活接觸的可能，愈益增多，并隨時留意外界之反應，以便力謀學校對於環境的必要適應』。因為這種主張，他們對於背違實驗精神及不合社會環境的一切教法制度，都是極力反對的。例如在中學校用外國語言講授科學；因為採用美國的師範教育制度，製造出許多『知道如何教授自己所不知之科目』的中學教師；中學及大學教育的過於偏重講演與課本，都是與科學的精神方法相反的，都是他們極端反對的。我們對於他們這些主張，除了高舉雙手表示贊成外，并無別的話說。

可是在這一方面，他們又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他們在第二章裏說：『此輩（中國的）教育家，恒持一種理論，謂今日之歐美，實為近代科學發展之結果；故中國僅須採各國在科學上與專門技術上之設備，其文化程度即可與歐美并駕齊驅。……吾人恒謂此種理論為一種荒謬之主張

。近代之科學與專門技術，并不會產生現代之歐美；反之，歐美人之心理，實產生近代科學與專門技術，并使其達到今日優越之程度』。此種鷄與雞蛋先後產生的爭論，似乎能使我們大大的失望。如其近代歐美的文明，不是由科學得來；反之，近代的科學，是由歐美人的特殊心理發生，那末，我們提倡科學的主張，還有實現的可能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固然不能如某教育家的主張，說歐美的科學只靠各種專門技術上的一切設備，却也不能說只有歐美人的心理能發生科學，配研究科學。科學的種子，萌芽在西方，但牠能培養移植於世界任何處所，只要有適宜的土地與養料就行了。我國自來沒有科學，可以證明我們沒有科學的種子，但不能證明我們沒有適宜於科學的土地與養料。考察團的這一個說法，使我們明白土地與養料的重要，格外去留心培養，却不能使我們認為科學與我們無緣，聽其失敗，放棄。這是我們應該明白的。

大學教育的討論，占報告書中大部分，也是報告書中最精采的部分。可是他所舉出的大學教育的弱點，如學校分布的不勻，同地學校所授科目的重複，一個學校中課程的無組織，教員待遇的不善，經費分配的不均與不確定，教法的不良，入學的太易等等，雖然都是針針見血之言，

但却不一定要經過專家的考察才能見到。讀者不信，可參觀本雜誌上發表的徐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或幾年前作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所望於教育經費有着以後」，便可以知道這些教育的問題，是怎樣的彰彰在人耳目了。

們索性偷一點懶，把建議的全部分，暫時不討論，留給學教育的朋友們去研究。

附記

這篇評論，已經寫的够長了。關於建議的一部分，似乎沒有再加討論的必要。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們若果知道我們教育的弱點所在，那建議的部分，便成了邏輯上應有之義，不必再事討論。二是建議的方案，無論怎樣的好，要是能言而不能行，也是徒然的。我們曾經看見我國政府，對於許多重要議案的實行能力是怎樣的了，那末，我

這本教育考察報告，經國立編譯館於短時間內譯出發行，我們不能佩服該館同人的熱心與勤勞。但也許是因為譯得太快的原故，文中仍時時不免有錯誤之處。所以在本文引用的時候，我也隨便改易幾個字，這是要附帶聲明的。關於譯文中錯誤之處，如像定縣的平民教育促進會，譯成民衆教育運動，及其他中英文語意不符之處，希望下次改版時都能更正。

二十二，二，二十，

歧路（書評）

衡哲

書名 歧路

著者 曾寶瑛女士

出版者 女青年會全國協會 民國二十二年

上一個星期，我的老朋友曾寶瑛女士寄來了一本小冊

小說集。那時我正在病中，正希望有這樣一類的作品，來排遣那沉悶的日夕。所以不到半天的工夫，我竟把那本小冊子看完了。

子，叫做「歧路」的，是她去年夏間所寫的一本「問題」

作品，都是不容易寫得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文

藝的作品中，很不宜于加入含有道德性的討論。但我們却也不必因此「因噎廢食」。若是一位作者能有文學的天才與修養，以及對於人情的一點常識與同情，那麼，他所作的問題小說，或類似的著作，將不但可與純粹的文學作品分庭抗禮，並且靠了他們的充實的內容，與迫切的情節，尙儘有可以超過純粹文藝作品之處。他們的成功，正是所謂爲生命的藝術（Art for Life's Sake），戰勝爲藝術的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個標記。這是我看完會女士的小說集子之後所發生的一點感想。

這本小冊子共分爲五篇，每篇所提出的問題都是獨立的。第一篇「珍珠練」，是講有色人種（本篇特別指出中國人與印度人）與白人結婚的問題。第二篇「永遠條約」是講一位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在謀求職業時所受到的痛苦的待遇。第三篇「淡青色的信封」，是寫社會上兩重道德標準，對於女子生命上所發生的影響。第四篇「並蒂蘭」，是寫一位貧苦女子，想在孝與人格之中，犧牲其一的爲難。最後一篇，「拈蘭的照相」，是寫一個正在熱戀着的妻子，對於她丈夫同他的前妻的愛情的感慨。這五篇中，除了第五篇不能算是一個社會的問題外，其餘四篇都是不能使我們關心文化與社會問題之人忽視的。

會女士對於這些問題的態度，是很可佩服的。原來對於一個問題的態度，是人人不同的。故用武斷的方式來替小說中人求收場，或是用狹窄的眼光來評論他們的行爲，都不免有拉長了面孔講道德的嫌疑。會女士不是一位拉長面孔的人，故即在寫這些小說的時候，她也決不來教訓什麼人。她的態度是懷疑的，虛心的，不加結論而由讀者們自己去想解決方法的。故在「珍珠練」中，那個異族結婚的問題，到底也並沒有解決，只不過在那位中國女子對於她的英國情人所說的話中，「我曉得我是不能改變了，何必害你苦守等著」，暗示我們，她是爲了保全她的中國女子的人格，犧牲了她的愛情罷了。在講述女子謀求職業的問題時，會女士也用暗示的方法，使我們希望那位女主人翁，與其「利用女性的媚態」來謀生，不如乾脆的嫁給一個知己。第三篇也是沒有結論的，那位女主人翁說，「我現在已經失了自信力，不知怎樣才好」。我們真不知道，一位在熱戀着的妻子，發見了她的丈夫的不貞之後，應該怎樣才好。在「並蒂蘭」的結局時，我們但看見那位彷徨兩難之間的「少年女子」，仍舊是「呆呆地當窗坐着」。我以爲這些都是寫問題小說的最好方法。靠了這些方法，一件作品方能保有文學的意味，方能免去陳腐的道德教

訓，方能引起讀者的興趣與同情，方能使他們想，使他們發生研究的願望。

曾女士雖是一位教育家及實行家，但同時，她也是一位素有文學傳授與修養的人，而她的同情心又是十分深厚的，她的了解力的範圍也是十分廣大的。故她在這本小說中的敘景述情，都能真切確實。對於人品的描寫，除去極少數的幾位之外，也都是有深刻的個性的。而五篇小說的背景，也是各有各的個性——上中下三等的社會，新舊兩種的家庭，以及中國社會與英國不同的社會情況，都是寫得本地風光，不可互移的。這是這本小冊子成功的第二個理由。

我對於此書只有一個小小的批評，那便是，作者在寫

作這些小說時，似乎是心頭的衝動湧得太高了，只顧到把她的人物的問題與動作，亟亟寫下，以致在文字上面留下了好幾個匆忙的痕跡；雖然從全體看來，作者對於白話的運用，是甚為流利優美的。

中國青年女子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本書所指出的，不過是其中的幾個代表。所以我希望，本書的著者能乘著她的這個虛心的態度，同情的了解，以及文學的手腕，再寫幾本這樣的小冊子。我更希望國內受過教育的女子們，對於這類的問題，也能多多的想想，多多的討論，更能多多的把他們表露出來，使大家能多得到一點研究的材料。

第 審訂者 陶孟和

二 中國勞動年鑑

次 編輯者 邢林 頌河 吳必信 張鐵錚

社會調查所自民國十八年印行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後，就着手搜集一切關於勞動的資料，續編第二次年鑑。這本書便是三年來許多人繼續努力的結果。第一次年鑑的資料截至十六年十二月止，本書的資料，則自十七年一月編起，至二十年十二月止，時期既接，體裁也大致相同，但在選擇資料上，更為精審。全書共分三編二十一章，合計八百餘頁。定價精裝三元六角正，平裝三元正。又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定價布裝大洋三元八角，紙面大洋三元二角，凡同時定購兩次勞動年鑑者，第一次年鑑按對折收價以示優待，但此種優待以在總發行所購買者為限。總發行所：北平文津街三號社會調查所。代售處：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天津大公報代辦部，上海大公報代辦部，以及國內各大都市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目 價 報 定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每月一元
（日本及其通商地）每月一元二角
（南洋）每月一元二角
（歐美）每月一元二角
（零售）每份五分

如何開發西北

詠霓

西北是怎樣的地方，我在「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一文內（獨立評論第四號）曾經大略說明。好幾次有人引用我的話，證明西北不可開發。其實我並非反對開發西北，我只是指明開發西北不能盡如現在幾位理想家所鼓吹的容易。而且因地形雨量種種限制，開發西北的方法也不能如一般所說的移民實邊便能成功。最顯明的事實是現在稀疏的人口已在飢荒的要死，如何還能夠馬上談到人口增加。

但是偌大的西北地方（陝甘綏寧四省面積約與東北三省相等，新疆青海面積之和約二倍于東北三省），難道始終聽其荒蕪不治？決不能的。我們不但要賑濟災荒，治標一時，而且應該根本設法，第一步使這種地方經濟上足以自立，第二步更加發展以貢獻于全國的繁榮。

開發西北的方法，有若干人先注意于都市的建設。彷彿以為馬路加寬，房屋加高，甚至于成立了博物館圖書館之類，人口自然加多，經濟自然發達了。實際是相反的。近代式的都市建設只宜于中原區揚子區東部邱陵東南沿海

以及四川盆地（詳見獨立評論第三號第九——十頁）等富庶之區。在西北地方，民生憔悴，那有餘力以作非生產的建設。稍有些微的力量，必須儘量的用在直接有益生產的事情。在這種民不聊生的地方，如果還去提倡奢侈的生活，或裝飾品的文化，實在是有損無益，而且也不容易成功。津浦路上的頭等藍鋼睡車，搬到平綏路上，便不會有多大生意。北平的故宮博物院，如真搬到西安，也不見得賣得出許多門票。窮苦地方的農戶全家的收入還不到一百元，我們豈能更從他們身上榨出錢來，修蓋洋房！

大隊的考察團已經有人組織過，還有人在提議更加擴大進行，還聽見說要花幾十萬元錢來考察調查。這也不是最好辦法。固然我們也聽見說蘇俄的建設事業很得力于大規模的調查。但是人家是有目的的有組織的實在工作，不是像我們的毫無準備，熱鬧一場。西北各地不是未發見的南極大陸，一個普通考察團所能得到的知識，我們坐在家內也已知道的不少。如果現成知識不能運用，隨便閒逛一闖，決不會有很好結果。近年來有一種風氣，以考察為時髦

，內地的地方當局又肯出力招待外來的考察團體，請宴送禮，糜費巨款，最多博得些報紙的宣傳。其實考察團體往往盛興而往，一闕而散，對於地方除騷擾外有何益處。譬如陝北煤油礦在延長一帶分布甚廣，一萬元左右便可開一新井。固然成敗沒有把握，但照以前的經驗十個井內總有三四個有成功的希望。組織一個空洞的考察團，一來便花去十來萬元，何如用這筆款來做一些實在的工作。如果要再去再花幾十萬元，當然更不值得。以上這段話只是說明以考察為開發的誤會。至於以考察擴張見聞，到內地去領略民生疾苦，提醒一下智識階級空虛矯妄的迷夢，自是好事。或是有目的的有計畫的考察工作，當然更該提倡。不過地方當局對於這等事，亦只須予以旅行的幫助，和工作的便利，不必濫費公帑做個人的酬應，或無聊的宣傳。在富庶的省份，添些熱鬧倒也不妨，在貧窮得要命的地方，必須將涓滴的財力全用在實在的事業。

我想特別說明的是西北與東北根本不同。東北有天然未開闢的處女地，現成等人去開墾，所以只須大批的山東人河北人出去，地方便開發了。西北可墾之地既少而散漫，已耕的地又比例的多，而且歷時已久，所以一來便想大規模的移民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西北自有他的特別重要

之處。

西北的重要第一在他的地理位置。譬如關中平原，平常人都以為關中四塞沃野千里，從古為帝王之都，只要移民開發不難恢復漢唐盛況。其實整個的渭河平原土壤，我們已調查完了。最長的距離是從潼關到鳳翔，沃野決沒有千里，而且其間又不盡是沃野。把他與華北平原比較，大小相去如百與四的比例。這個小地方在古代所以繁盛，實因為他居東西交通的孔道。在東南水鄉尚未完全開發的時代，中亞細亞（例如漢唐時之新疆頗為繁盛，近來考古家迭有證明。）及黃河下游為當時經濟及文化的中心，而其間的交通全由此道，所以能成為建都要地。到後來因為移殖開墾的結果，東南地方愈加發達，又因為氣候乾枯或是文化變換的關係，中亞繁盛幾乎消滅，於是關中地位也日益衰落，中國的國都也逐步東移了。這是歷史的事實，也就是地理的定律。

現在西北地理位置的重要確又復活了，而且更加上古未有的擴大。自從前清帝國的疆土發展，使中國的西北境界遠及蒙古新疆。自從俄國勢力遠及東方，北亞及中亞漸見開發。現在西伯利亞及中亞細亞鐵路已環繞我們的蒙新邊界。所以一方面有我們東方的中原區與揚子區人口繁

殖，物產豐盈。又一方面是他們西方的嶄新的文化，與勃發的經濟。西北各省介處其間，其位置是何等的重要！當然近代海道交通最爲便捷，無論如何西北的陸路交通決奪不過東南水運的勝利。但自鐵道汽車及飛機應用日廣，西北後門的重要也並不多讓于東南前門，倘能充分發揮這種地理位置的意義，便是開發西北的妙法。

所以發展交通是開發西北第一關鍵。西北交通的大道從古以來是西出潼關，由渭河平原西登隴坂（過六盤山），復經皋蘭武威，出張掖酒泉，以向中亞細亞。陝甘地方的重要，全在于此。自從前清晚年，天津成爲華北商務中心，西來駝隊往來由寧夏經綏遠而至平津，綏包之商務漸增，陝甘之繁盛因之漸減。近數年來政失常軌，愈近政治中心土匪愈多，稅捐愈重，于是西北駝隊輾願深涉沙漠，不敢輕入內地。新疆與平津間之駝隊，大抵經額濟納而入烏蘭察布盟地。故交通路線愈移愈北更至最近，土匪擾亂愈甚，即此最北道之商旅亦復裹足不前。這幾道大路既然閉塞不通，不但近西北不能繁榮，而且遠西北的出產不能東來，則經濟上的出路變更方向，政治上也漸與中原隔離。對於這種情形不加救濟，而只知空言開發，如何有效。

要開發西北的交通，當然包寧隴海二條鐵路的完成與

延長爲最要緊的大事。但在鐵路未能完成以前，至少可把原有的大路消除土匪的擾亂，及苛捐雜稅的障礙。綏遠包頭一路，天然西來駝隊的要道，還可爲恢復蒙古貿易的起點，庫倫烏里雅蘇台通商均可由此出發，都應開闢汽車道，加以沿路保護。陝甘一路，天然東西行旅的孔道，因爲經過地方人口比較略多，左宗棠西征所修的大道，老樹垂蔭基礎猶在，急應重加修治，整肅治安，禁止苛擾，多加汽車，低收運費，庶行旅安全貨運通暢。一面更多修支路以疏通甘黃土高原各處物產，並連接漢中秦州等山間平原。脈絡既通，經濟自然較爲活動。只要運輸方便，西北的牧畜業及棉業確是很可發展的。

這本是各處一樣需要的二件最普通事，治安與交通。這二件事弄不好，其他一切事業都說不上。所以現在西北第一需要的，不是鋪張揚厲的建設空談，乃是勞來安集的保育政策。中國人民本是最有恢復經濟能力的，只要沒有政治的障礙。近來外國經濟專家（例如Lawney）很多主張中國不必東施效顰，急於振興大規模的重工業，並以爲恢復及改良農村小工業實爲目前要務。此說如爲中國全體言，不免過於消極。我以爲中國東部諸區，應該積極建設近代工業。但在西北各省言，除因地方特產的便利，可以

成立小規模的織呢紡紗等廠外，的確也應該特別注意小手工業，以補農業經濟的不足。至於秦嶺山中大鋼鐵廠等計劃，無論並無可靠鑛源，即使有之，也只可當作笑話而已。

以上只是對於近西北的一些大意，至于遠西北的問題，只要地方安全交通便利了，我已說過，甘肅西部及新疆沿山各處水草地的開發確還可以增加不少的人口。開闢田地本是我們中國人唯一的本領，也就是鞏固西陲最好的方法。至于對俄國的陸路交通，隴海鐵路延長到迪化塔城路

途遠極了。但從張家口或歸綏或五原北向俄邊的恰克圖，比從塔城經嘉峪關的大路，路線近得許多。我們如果不怕理想得遠一些，假使能從平綏鐵路的平地泉一直向北，造一條橫貫蒙古高原的鐵路，以接于西伯利亞之上烏丁斯克，其距離只等於從渾關到肅州，但地頗平坦建築較易。此路一經接通之後由西伯利亞到平津出海，比經由中東路至大連出海，路線要更近一千里左右，足為歐亞交通之捷徑，很可以分一部份東北的繁榮。如果中俄兩國真能親善不怕引狼入室的話，這個計劃似也值得考慮。

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

吳景超

——對於旭生先生教育方案的商榷——

旭生先生在獨立評論所發表的教育罪言，前後共有六篇。前五篇是批評的，指出現有教育制度的缺點；最後一篇才是建設的，提出他的改革教育的方案。我在這篇文章裡，所要與旭生先生討論的，只是他的方案。

我覺得旭生先生的方案，其最新穎的一點，便是注重

農業教育。六歲以下所受的幼稚教育，我們姑且不談。他的國民教育，與現在的小學不同的，便是「先生學生，盡屬農夫。農忙力田，農閒治學。」國民學校中的教職員，雖然是師範學校出身的，但是這些師範學校，「位置是在鄉野的，……師範學校附近有兩個大規模的農場，第一農場為就我國舊法稍加改良者，第二農場為新式工業化者。……師範學校學生，前一半入第一農場，習我國固有農事；後幾年入第二農場，習新法農事。」換句話說，從這些

師範學校出身的，只能教授農業，對於別種職業是外行的。旭生先生在高等教育中，還是一貫的注重農業，所以商科各種學校，工科各種學校，都要「附設農場，亦如師範學校。……工商業的學校，如前二三年不須實習者，仍當附設第一農場，資其練習。」「大學教育前有預備學校，預備學校……亦有附設農場，練習農事，而無年限。」

旭生先生爲什麼要使全國的教育農業化呢？因爲他覺得這種教育，才合于中國的需要。他對於中國社會的組織，以及變遷的趨勢，有下列一句重要的論斷。他說：

「中國是以農立國的，我們相信不惟今日如是，即將來亦仍如是。」

因爲他有這樣一個前提，所以才有他的全國教育農業化的方案。這是他的主張中最新穎的一點，也是我認爲最可商榷的一點。

主張以農立國的人，近來真是不可勝數，但是什麼算是以農立國，可惜沒有人給他下一個詳細的解釋。假如說中國以農立國，只是要表明中國的多數人，是依靠農業爲生，那誠然是一件事實，但我却認爲是一件可憐的事實。因爲這一件事實，只是證明中國的農業生產方法落後，要多數人在農業中勞碌，才可維持全國人的衣食。生產方法

進步的國家，只要有少數人在農業中努力，全國衣食的資料，便有着落。如美國在一九三〇年，只有百分之二二的人在農業中謀生，不但生產可以維持本國人的衣食，還有餘剩可以運往外國，便是一個好例。中國在農業中謀生的人數，現在雖無統計，但許多估計，都把他放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文化先進的國家，生活程度高的國家，沒有一國的農民，其百分數是在七十以上的。根據一九三二年的國際年鑑，農民百分數在七十以上的國家，可攷的有非洲聯邦的黑人，（七五・〇）印度，（七二・三）布加利亞，（八二・四）立陶宛，（七九・四）波蘭，（七五・九）羅馬利亞，（七九・五）及俄國。（八六・七）俄國的統計，是一九二六年的，那時五年計劃還未開始。現在我們敢說俄國農民的百分數，要降低很多了。以上這些國家，如把俄國除外，試問有那一個國家，不是比較貧窮的，生活低下的，文化落後的？所以如說中國以農立國，便是多數人依農爲生的意思，那麼我們最好努力改良農業的技術，使少數人耕之，多數人便可食之。如此便可使很多的人，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從事于別種實業，努力于他種生產，使中國的財富，除農業外，還有別種來源。

旭生先生又以爲不但現在的中國，是以農立國，即將

來亦仍如是。這個等語說，中國的經濟組織，是固定的，是不變的。但是旭生先生有什麼根據，下這種奇異的推測？在旭生先生所提倡的新式師範教育中，不是要學生習新式農事麼，不是設備一種新式工業化的農場麼？我相信中國的農業，如不開倒車，總有一天會採納新的生產方法，如旭生先生所希望的。假如有那一天，中國農民的百分數，一定要減少的，這可以外國的經濟為證。我們試看各國的歷史，凡是農業進步的國家，沒有一國農民的百分數，不是下降的。今列表如下：

國名	第一時期 農民百分數	第二時期 農民百分數
美國	一八八〇 四四・一	一九三〇 二二
比利時	一八四六 四四・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一
英國與威爾士	一八八一 一二・〇	一九二一 六・八
德國	一八八二 四二・五	一九二五 三〇・五
瑞典	一八七〇 五一・六	一九二〇 四〇・七
瑞士	一九〇〇 三一・二	一九二〇 二五・五
挪威	一九一〇 三九・五	一九二〇 三六・八
法國	一九〇六 四二・七	一九二六 三八・三
丹麥	一九〇一 四六・二	一九二一 三四・八
荷蘭	一九〇九 二八・四	一九二〇 二三・六

奧國	一八七〇 六二・六	一九二〇 三一・九
匈牙利	一八九〇 七〇・五	一九二〇 五八・二
加拿大	一九一一 三四・二	一九二一 三二・八
澳大利亞	一八七一 四四・〇	一九二一 二二・九
新西蘭	一八八一 二九・〇	一九二一 二七・一

以上這些國家，第二時期的農民，百分數都比第一時期為低。這些國家裏面的農民，有的只是百分數的降低，如表中所示的。有的不但是百分數的降低，而且是實際數目的降低。如美國在一九一〇年，在農業中謀生的人，有一千二百六十五萬，一九三〇年，只有一千〇七十五萬。德國在一九〇七年，農業中有九百八十八萬人，一九二五年，只有九百七十六萬人。丹麥在一九一一年，農民有五十一萬人，一九二一年，只有四十七萬人。法國在一九〇六年，農民有八百八十五萬人，一九二六年，只有八百九十萬人。但是這些國家的農民，雖然減少，而農產品却在增加。以少數的農民，產多量的農品，這是最經濟的生產方法。假如中國採用這種最經濟的生產方法，當然無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在農村中。所以假如中國的農業有進步，中國人依賴農業為生的人，是要減少的。

以上這些討論，只是要說明我與旭生先生對於中國情

形的觀察不同之點。我們的見解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認中國的國民，大多數以農爲生。但他以爲這是一件好事，所以要把教育制度去遷就他。而我却認爲這是一件可憐的事，能早日脫離最佳。脫離這種畸形的狀態，使中國除農業之外，還要發展工業，商業，交通業，運輸業，金融業，礦業，乃是我所希望的。此外，旭生先生認將來的中國，還是以農立國，而我以爲農業技術進步的結果，農村中可以不必要容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這些剩餘的人，將來一定是在別種職業中找生活。結果，中國人口的職業分配，一定要與現在不同。那便是說，將來大多數的人，不一定要靠農業爲生。我們即使學不到美國，學不到澳大利亞，也應當學到法國。英國當然不足學，因爲他誠如旭生先生所說，工商業畸形發展了，弄得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在農業中。不過我們要記得，工商業的畸形發展，固不足取，然而農業的畸形發展，如中國與印度，又何足爲法。

我對旭生先生的前提，既然不能完全同意，所以對於他的教育方案，也不能完全贊同。他提倡農業教育的精神，我是很表同情的，但是他要使全國的教育農業化，就未免「矯枉過正」。我們先不談將來中國的情形如何，就

拿現在的情形來說，中國人口的分佈，并不完全在農村中。中國人的職業，也不完全是耕田種地。中國在百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據我所知的，至少便有三個。滿十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據托格雪夫（Boris P. Torgashev）在中國評論週報三卷十四期中所說，至少有一百十二個。此外在五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我們還不知道有多少。陶內先生在中國的農工一書中，估計中國的市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請問這些人的子弟，也都應當習農業嗎？假如他們都習農業，那麼中國的商業，工業，運輸業等等，應當交誰執行？總之，「驅天下之民，歸之于農，」乃是中國以前的頑固思想，由于不明他種職業的生產價值而發生的。自從經濟學發達以後，誰都知道一國的經濟組織，不是靠一種實業所能維持的，一定要各種實業平衡的發展，才可以收國富民榮之效。所以我們如想建設繁榮的中國，不但在農業上要努力，在別的實業上，也要有相當的努力。旭生先生似乎也想到這一點，所以他也「希望我們的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不再受帝國主義的壓榨」。可是他只希望而已，在他的教育方案中，實在看不出實現此種希望的教育。他的國民學校中，先生學生盡屬農夫，一切的學校，都附設農場。從這種學校出身的學生，耕田種地，固然

是拿手好戲。但是要他們從事于別種職業，試問有無此種能力？

所以我的意思，以為在市中的國民學校與師範學校，與其附設農場，不如附設工廠。與其教他們種地，不如教他們織布。與其教他們拿耙，不如教他們開火車。與其教他們割麥，不如教他們打電報。與其教他們研究土壤，不如教他們研究都市交通。與其使法官耕田，不如讓他利用那些時間，去研究中國的司法制度。與其使醫生種地，不如讓他利用那些時間，去設法減低中國人的死亡率。總之，中國社會中的生產事業，不只農業一項；中國社會中所需要的人材，也不只農業人材。教育制度，要造成各色各樣的人材，要滿足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國民學校中的學生，旭生先生要他盡屬農夫，乃是我所不敢贊同的。

不但在都市中的學校，不必教授農業，就是農村中的學校，也不必專教農業。我是因為看清楚中國農村中的人口過剩，所以有此種主張。農村中的人口過剩，何廉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六號中已有說明，我們徽州人，尤其深刻的感到這一點。在我們那兒，農場是很小的，一個農場的經營，有時交給家庭中的女子便够了。這種小農場的生產，不能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同時農場的經營，也用不完一家

人的勞力。于是這些過剩的勞工，只好向外發展，向農業以外的職業去發展。中國南部有一句土話，說是「無徽不成鎮」，這是表示徽州人在外路謀生者之多，但這種情形，實有經濟地理之背景的。中國有好些地方的情形，一定與徽州相彷彿，如寧波，如廣東的許多部份都是。在這些鄉村地方，如只給他們以農業教育，一定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辦教育的，一定要斟酌當地情形，除農業教育外，還要辦商業教育，工業教育，以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此外中國還有許多地方，有其特殊的富源，如山西之煤，河北之鐵，湖南之鎢，雲南之錫，為充分利用這些富源起見，那麼在這些省裏，豈可忽略礦業教育嗎？

至如中國將來的情形，恐怕對於農業以外的教育，需要更有甚于今日。這是將來的話，現在也不必多談。

最後，我願意對於這篇文章的題目，加一解釋。「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二詞據旭生先生說，是採用梁漱溟先生的。他們都反對都市教育，而主張鄉村教育。假如目前的中國教育，是都市教育，那麼都市教育，誠然是可反對。但是與其稱目前中國的教育為都市教育，不如稱他為遊民教育。因為現在的學校，特別是中學，只製造出來一批一批的遊民。他們當然不會耕田種地，在農村中做生

灑的事業。但都市的事業中，又豈有他們的地位？他們固然不能從事于農業，又豈他從事于工商業？所以把中國的教育叫做都市教育，真是冤枉了都市教育這個名詞。假如我們說都市教育是工商教育，以別于鄉村中的農業教育，那麼都市教育在中國應當提倡，正如鄉村教育應當提倡一

樣。在創造新中國的過程中，我們要發展農業，同時也要發展其他的實業。假如我們承認這一點，那麼旭生先生的教育方案，就應加以修正，使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在他的方案中，都佔有相當的地位。

二月，二五，清華。

國聯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中幾個基本原則的討論

蔣夢麟

中國向來的教育，本來與社會隔離的；教育與社會，不是整個有機的組合。學校不適應於實現生活迫切的要求。新教育施行後，此種趨勢，不獨不見減輕而且加甚。教會學校與回國的留學生所設施的教育，均為養成社會的優越階級，而於一般民衆之需要忽略過甚。

中國目前當頭的大問題是：從民族的和社會的方面着想，怎樣取得經濟的獨立，與增進一般的繁榮與文化。要謀迅速和有效力的解決上述的目的，教育可以做一個有權力的工具——但教育的組織必須為有意識的為民衆謀利益。

這段的大意是報告書的開宗明義，是西洋近百年來教育的趨勢，也是我們近年來努力的方向。

我們中國，自近代式的學校創始以來，教育的組織為有意識的為政治謀革新，而其目的本不在為民衆謀利益；從政治改革方面着想，而非從民族的和社會的經濟獨立，及一般的繁榮與文化上着想。民國開始的時期，因政治上的紛爭，無暇顧及教育。政變而教未變。民六七之後，（一九一七—一八），一般人士知教育不從社會及民衆方面着手，無以改革政治，始漸漸改易向來之方針。十餘年來，我們已向那條大路上走。這是我們從歷史上看來的答案。現在可把報告書裏的幾個基本原則討論一下。

（一）中國教育的外來影響和歷史的背景

報告書裏有反覆注意的一句話，就是要中國教育改進，須先掃除在中國教育方面的歐洲的或美國的影響。所謂

「歐洲的」似乎不是考察團的本意要說的，因為我們在全書裡找不到在中國教育裏他們有指出受歐洲影響的地方。或許因為單說「美國的」有點不好意思，所以把「歐洲」來陪襯一下。現在我們要問他們所指的美國影響，到底是些什麼呢？

中國教育所受的美國影響，我們可以找出來的是：（一）大學及中學行單位制（或稱學分制）是採自美國的。（二）師範學院或大學教育學院的設立，也採美國制。以上兩點他們會一再指陳其弊。（三）教會學校的影響——此點他們曾指為使中國教育養成優越階級的一個原因。但是我們都知道，教會學校於中國教育制度，絕不發生任何影響的。（四）大學教員中不少美國留學生，及圖書館裏不少美國出版的英文書籍。

但是我們都知道，中國教育之受美國影響，開始於南京高等師範之創立（民國五六年間，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及北京大學之改制（一九一七），至今不過十六七年。在此以前，中國學校中無美國影響之可言。雖然北洋大學，南洋公學，創立於戊戌（一八九八）以前，並因美人丁家立福開森之關係，有幾位美國教授担任教課，但學校的組織，說不上是美國制度。不過這兩校畢業的學生，

到美國去留學的，確是不少。他如京師大學堂，（創立於戊戌，一八九八）及各省的兩級師範學堂，高等學堂（癸卯一九〇三前後設立），都是由科舉出身之名人担任監督，而主持校政的，大都係日本留學生。重要教課，多以日本人担任，中國留日學生任翻譯之職。同時各省政府，競派學生赴日本留學，復因地便費輕，私費生接踵而往者，為數甚多。當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前後，留學生之在日本者，不下二三萬人。

當時學制，係根據奏定學堂章程，而奏定學堂章程是以日本學制為模範，這是人人知道的。故自民五民六以前，中國教育，一大部份係日本化，一小部份係由科舉遺留下來的東西充塞進去的，還有一小部份是書院制度。當時中國的教育可謂由（一）日本制，（二）科舉，（三）書院，三個原素混合而成。庚子前後至明令廢止科舉之時，可稱學校附屬於科舉時代，書院同時並行。學校學生，同時應試科舉，而士之出身仍在科舉。科舉廢，日本制之學校興，而科舉附屬於學校，以秀才舉人進士等名稱賜學校畢業生，而士之出身在學校。民國成立，舉人進士之名稱雖廢，而科舉之餘毒仍然存在。以後雖屢經改制，其根本實少變動。

攷察團以校課繁重，爲中國學校病，這是受日本影響而來的。我們記得於民國初年，美國哈佛大學校長愛利亞脫氏遊日本時，力言日本學校功課太繁重，學生乏自動的機會，爲日本教育病。日本教育者讀他的記錄，頗有受感動的。（作者記得曾經讀過他的關於日本教育英文的記錄）同時我們曾經留學美國的，都知道美國學校功課並不過於繁重，而自動，敏捷，活潑，頗爲教員們所注重的。

以上是從教育方面說話，若從政治方面看起來，我們知道從前曾國藩羨慕外國槍礮好，派學生百三十人赴美留學，其議雖倡自容閎，而他的目的在學習美國政治與文化；但曾氏之意却不在此。此後清廷創立海軍，期圖自強。

甲午（一八九四）之戰，海軍盡殲，而政治革新之議漸起。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實爲政治革新之開始。庚子（一九〇〇）義和拳之變，又爲戊戌政變之反動。其後國事日非，清廷遂倡立憲之議。因爲要改革庶政，不得不養成新官僚，於是廢科舉，興學校，其目的固在造官而不在造民。辛亥（一九二）革命以後，革新運動漸及於民衆，而社會革命之聲浪起。五四運動，（一九一九）起於羣衆的愛國運動而轉入思想革命運動。五十年來由武器革新而至政治革新運動；由政治而至社會革新運動；由社會而至

想革新運動。其間雖無鴻溝之可分，但其犖犖大端，屈指可數。歷次轉變，其方向雖不一，而其原動力只是一個，就是於外患迫切之中，怎樣爲國家求生存。其初試爲武器；武器無效，再試爲政治；政治無效，三試爲社會革新；社會革新推動之不易，四試爲羣衆運動；羣衆運動屢試而成強弩之末，五試爲思想革命。

人類的習慣，凡欲解決一問題，必先注意其顯而易見者而嘗試之；嘗試而失敗，必進而求其隱而難見者。由淺入深，由流而源，都從經驗中得來。我們中國六十年來之經過，也就是如此。

中國立學校之初，其目的本來在以學校造成新士大夫，代替科舉出身之舊式士大夫。辛亥革命以後，舉人進士之名稱雖廢，而實質未變。洋科舉式或洋八股式的學校，仍舊在那裏造官多而造民少。在此種狀況之下，即使把攷察團所說的美國影響如師範學院制，單位制等都驅除淨盡，中國教育還是從前一樣。

可是我們也不要太悲觀。這二十年來，中國教育也很有顯著的進步。如小學學生人數之增多，現在比較民國初年，增加達一倍以上（現在整數八百八十萬兒童在學，民國初年爲整數四百萬）。大學的課程，圖書館和科學的設

備，學生的思想，均較往年大有進步。同時在造官教育的舊典型裏邊，民衆教育，社會教育，思想革命等等運動，也正在那裏萌芽出來。

政治的改革和教育的改革，成一平行線的。政治不能超越教育現狀而過分的進步；教育也不能超越政治現狀而

充量的發展。政治影響教育，教育影響政治，互爲因果。所以我們講到教育，不可忘却政治的環境。

以上所討論的，爲攷察團給我們的改革中國教育的第二個原則。我們繼續討論他們的第二個原則。

（未完）

中國心理學的將來

汪敬熙

心理學最初能得到國人注意，是因爲理學的餘風使我們喜歡談心說性。老輩的人之喜歡看看心理學的書皆是因爲這個緣故。王靜安先生之重譯霍甫定的心理概論（人名書名王先生是否如此譯法，現在記不清了），大概也是由於這個緣故。在十五六年前，更有一種原因使心理學漸漸風行。那時候，許多人有一種信仰，以爲想改革中國必須從改造社會入手；如想改造社會必須經過一番澈底的研究；心理學就是這種研究必須的工具之一。我記得那時有些同學因爲受了這種信仰的影響，而去讀些心理學的書，聽些心理學的功課。再加上教育學家的鼓吹，心理學也會時髦過一陣。

近七八年情形變了。第一，我們醒了；我們知道，

心理學實在不能在改造社會上與我們以重大的幫助。第二，近年來國家從來未得安寧，種種實際問題相逼而來，多數人沒工夫高談心性，並且也不耐煩聽這種議論。現在心理學不但不能引起人的注意；並且多數人對於心理學起了反感，以爲心理學這門學問至少是現在我們所不需要的。

因爲心理學會經時髦過，所以有許多大學設了心理學系。因爲近年對於心理學輕視了，所以每一個大學的心理學系學生人數非常之少。我可以武斷的說，現在每個大學的心理學系每年級的學生，是一定比教員的人數少。甚至於一二三四年級的學生合在一齊還比系內教授講

師的數目仍然是少。這是不應該的！在這貧窮的中國實

在不應該費許多金錢培植極少數的學生。如果這少數的學生真是人材，或者還可以說這經費用的不算妄費。無奈現在各校心理學系的學生好的實在不多。除了少數例外的學生，往往是理學院中根底最差的學生才入心理學系去。

但是在心理學本身說來，中國的心理學實已由翻譯外國書的時代走入國人自己研究的時代了。中央研究院心理學研究所，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之從前存在現已消滅的心理學研究所，都有實驗的研究發表。在這些研究之中，確有些能站得住，並且能引起外國同行的贊許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如何使這點心理學的萌芽長大了？如何使心理學能吸收一部分有研究興趣和能力的青年？如要將這點萌芽消滅了，實是可惜！至少對於心理學有興趣的人是如此想法。但是現在各大學心理學系的情形實是妄費國家的財力！這個問題實是值得想想。

○ ○ ○ ○ ○

我們應該先想想現在研究心理學的人所走的路途是不是有希望的途徑。如果走的是有希望的路，有有趣的問題

供研究，自然可以引起青年的注意，自然不患吸收不來好學生。

我們的心理學家確曾走過兩條「此巷不通行」的路子。

第一條是教育心理學家測驗之路。美國教育心理學所做的種種測驗，頗招美國學術界的非議；心理家中有人也給這些人一些嚴刻的批評。我們的教育心理學家大多數是美國教育心理學家的徒弟。這些學生往往是「青出于藍，而「淡」于藍」，比先生還差些。先生鑽到一隻牛角的中間，學生是鑽到角尖，尚不知回頭。從前心理季刊中那些無常識的利用統計方法的研究，多麼可笑，引人輕視心理學的效力怎樣大！近幾年內，有些教育心理學家發表了一些國文英文測驗的計劃，也會到各處做了許多測驗。但是有什麼效果？在國文英文教學改良上有什麼幫助呢？

我國心理學家專門動物心理學的頗多。近年有些原來不是研究此道的，也改趨此途。不過我個人總覺得這些動物心理學家自己走入了一個「絕徑」(Cul de sac)。爲什麼他們專去研究白鼠在迷津(Maze)內的學習？

用迷津研究學習的方法，已是用了二三十年了。這根甘

蔗內的糖汁幾乎是已完全壓出來了。爲什麼他們還是津津有味地去嚼這些蔗渣？這是第二條不通行的路。

這二種的研究實不足引起興趣。青年不屑於走這兩條路正是他們的好處。

○ ○ ○ ○ ○

但是心理學並不是沒有希望的路走；並且我們的心理學家有些確是在這種路上走着。例如，中央大學郭任遠先生正在研究的鳥類胚胎的行爲發展，就是一條有希望的路。

中國心理學可走的路途可分理論的及實用的研究兩方面說。

簡單說來，就國際心理學界近來的趨勢，和我國心理學的現狀看去，理論的研究有兩條有希望的路。一是利用動物生態學的方法或實驗方法去詳細記載人或其他動物自受胎起至老死止之行爲的發展。在兒童心理學及動物心理學均有充分做這種研究的機會。這種記載是心理學所必需的基礎。二是利用生理學的智識和方法去做行爲之實驗的分析。近年關於行爲的觀察積聚的多了，生理學的智識也增多了，做這種實驗分析的機會實在是多。這兩種工作都不是玄想空論，而是用實驗觀察去求可以實際證明的智

識。我國心理學家如能如此切實做下去，一定在心理學上可有所供獻。

這種理論的研究，普通人或者以爲是太不切實用。不過科學史上時時告訴我們，極有實用的發明多是從極無實用的科學發現來的。就是在實用一方面說，中國心理學也有一條極有希望的路可走。這條路就是工業心理的研究。

我國工業才見萌芽。在工廠的組織和布置，工人的選擇和訓練，工作的方法，各方面均有種種的問題等待研究。這些問題大半是在工業心理學範圍之內的。我國心理學家如走這一條路不患其無問題可研究，更不患對於國家無實際的供獻。

這種研究是以求能用節省工人精力增加工人快樂的方法，去增加工廠出產品之質和量。在資本主義的英美德日，在共產主義的俄國，和在法西斯蒂主義的義大利，均有此種研究。因此種研究實是能使社會全體和工人本身都能享受利益的。如能使此種研究在中國發達，結果不但可在增加全國的生產額數上盡一些力；並且可使工人少受一些苦痛，多得幾分快樂。

○ ○ ○ ○ ○

上面說的理論研究的路，我國的心理學家是有的正在這路上走着。領導學生走上此路頗有些困難。最大的一個困難就是各大學的生物學系沒有適宜的生理學課程。我國生物學家注重分類及形態的研究，忽略生理的研究，對於心理學的前途頗有影響。所以心理學家極容易感覺這偏枯之苦。

至於工業心理研究的一條路，現在是尙無人走。極希望有這種興趣的人努力，並且更希望有力的研究機關加以提倡。這種研究如果發達，心理學家自身也可得一種好處，就是可以為學生開一條出路。可以使學生在出校之後能用其所學；可以看見自己的學生向上生長；可以免去學生

塞 上 歸 來

青 海

好容易過了中秋，農場裏許多糧食也忙着收割。幾十方里的莊稼，一片的黃間着一片的綠，點綴着成羣的牛羊，倒也有天然的樂趣。可是我因為一個多月沒有好好睡覺，整天耳朵裏好像有小蟲歌唱。同時我接到了天津的信，說董事長已竟到巴黎去，從此以後每月祇許我有二千塊錢的開銷。讀者，要是你設身處地，在幾千里四面是匪的所

墮落入「官」，高等游民階級之苦。並且有出路之後，自然可以吸收些有才力的青年。英國近年心理學比以前發達。C. S. Meyer 所辦的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的確有些力量促成近來的發展。學問的興趣固然可以催促青年努力，但工作的報酬適當與否也是一個重要問題。

我國近年來用在心理學上面的錢頗為不少。國家對得住心理學，心理學家對得住國家嗎？心理學的將來完全在心理學家慎擇發展的路途呵！

二十二，二，二十二。

○ ○ ○ ○ ○

在，帶着幾百農戶和工人開荒，忽然你的費用減少了一大半，連支付工人的薪水都不够。同時中國滿州的郵政已經隔斷，就使不隔斷也有許多顧忌，再加上日本人的無形監視，你當時心理是那一種感覺？

我收到了這個消息，真是非常灰心，我到此來賣命，而安坐在天津北京的還要抽我的後腿？當時我不敢聲

張，消息一出去，會全局瓦解的。我決定了主意，非自己冒險回天津力爭不可。但是我一離開村子，誰能維持呢？

真是禍不單行，城裏的辦事處又來告急，說土匪又要進城，日本挨戶的搜鎗，局內的衛兵也有不務正業的，要是我不去鎮壓一下，恐怕要出亂子。我知道城內當事的那一位職員，胆子是太小，怕是故意張大其詞，要我出去。開荒要失掉了村子，還要城裏的辦事處做什麼？同時我找不到一個相當的人來維持村子。老鄧是好像有能耐，可是守着一個禮拜容易，守着兩三個月許能叫你發瘋，我還得試驗他一下。

剛巧城裏辦公處還藏着多少盒子礮，讀者，你要知道盒子礮要使用得法，三支便抵一座手提式。我想要把那些盒子礮都拿到村裏來，同時也看看城裏情形和公司情形的究竟，我當下便又派老鄧帶着我親信的牛工頭到城裏去，叫他們相機行事。盒子礮可拿則拿，千萬別走進日本人的圈套。我又送他們走了。

那時我的烟捲早已完全抽光，過日子是非常的煩悶。部下的衛士們看我一天儘吃些土豆，三頓飯的量還不抵他們一頓，都替我擔憂。他們也知道從我的馬「小火車頭」

死了以後，我就很少騎馬，除非是不得已。於是他們想盡法子來安慰我，有的把他平常贖下的捨不得抽的烟捲送給我，也有送些洋麵粉叫我做大餅吃的，也有送我白乾酒的。我一邊感激他們，一邊想着我自己的責任，真捨不得離開他們，連他們的生死也不得而知！

過了幾天，遠處山頭又發現了兩個黑影。老鄧同牛工頭回來了，我忙着騎馬去接。不錯！他們真膽大的偷運盒子礮。原來他們一到城裏，便把埋在公司地底下的盒子礮取出，連夜運到車站，買通了護路的巡警，讓他們一人背上一枝，到了終點又借名喝茶一起齊集下來，立刻往村裏走。一百里的旱路，老鄧同牛工頭僱了一輛蒙古的「拉拉車」，棉花包裹也裝着鎗，車在山叻裏走，他們兩人各自背上兩枝盒子礮壓着兩邊的山頭護送。那天要遇着大幫鬍子，他們準會捋一捋頭髮（因為鬍子大半是沒有鬍子的）說：「多好的運氣，招財進寶！」幸而我的朋友沒有遇着！

老鄧告訴我，公司是很平安，就有一個衛隊長姓劉的，看着我那同事膽怯，常常嚇唬他，要錢出去抽大烟，玩姑娘。

當下我知道鐵路一帶的義勇軍已發動了，我要不趁早

到天津走一趟，就怕回不來，因為鐵軌是常被弄斷。我希望他們越幹越凶。是的，我村子裏能有五千担糧，能給七八千義勇軍過冬。

當下老鄧兩次的冒險，我已覺得他有代我支持村子的能力，況且他的勇敢也已經得到衛士們的佩服和工人佃戶的讚許；就是他年紀輕些，對於「體恤」之工夫，沒有到家。

有一天晚上，九月的初頭，我同老鄧閑談的時候，我告訴他我要出去一次，要他代我維持村子。同時我也警告他，這種工作並不靠一時的勇氣，却是長時間的磨折，要不預先防着一步，神經上會慢慢的起劇力變化。我是要打破他的「下意識」的恐怕心，使他能常常提防着自己。我把一切事情在兩天裏頭交代清楚。第三天下午，我召齊了全村的人，告誡了一番，叫他們要「服從老鄧，遇事不要大驚小怪，倘使有人不守秩序，勾引鬍子，我回來——斃他」。講完了一番大道理，穿上便衣，把我兩支手槍交給了老鄧，我就上馬出發到城裏去。老鄧同一半的衛士默默的送我一陣。可憐可敬的牛工頭又得跟着我走一趟！頭一晚便在離村四十里地一個小窩堡裏歇着。

我爲着要到天津交涉款子，從村裏出來，冒着兩種危

險。第一，要是我在村裏，別人被鬍子綁去，我可以設法去贖；而我要是綁去了，（他們也都想綁我，好發一批大財）公司的款子不够贖，而且他們准把我做擋頭陣去破我的村子，所以村子的安全，有極大的危險。第二呢，我自己的身子，經過了五六個月的滋養缺乏，要綁去了一定受不住鬍子的待遇，兩星期便可不起。這些事情，天津的北京的大人們何曾想到！

隔了一晚，我同牛工頭便起早前行，預備遇事便做無抵抗的勾當，因爲兩個人走荒道，又不騎馬，是不能帶鎗，也帶不得鎗的。那時，夏天的大水已慢慢的退去，不過你還能見一片一片小湖似的淤積，鐵路橋樑也缺腿斷手似的靜靜躺着。當天走了一百里地左右，路上經過幾次蒙古兵的盤詰，天黑便到了一座大喇嘛廟，離火車站也不過七里多地，我們便在喇嘛廟住下了。

那一座大喇嘛廟，裏頭的佛爺大喇嘛，管着六七旗的蒙古，在內蒙是很有勢力的。幾百里地以內，連王爺府也是土房子，可是這廟却用石塊蓋造，遠遠的看去，好似美國列萊堡（Fort Riley）的大兵房，踞在山上好不威嚴！他的建築也很奇特，深紅色的牆同黃色的頂，嵌在半沙漠裏真好看。大喇嘛是我的朋友，可是那晚他不能陪我（反

正我們也講不通話），因為剛有三百多人一幫鬍子在廟下鎮邊搶掠，所以他晚上得親自去查夜。好，我心裏想着好笑，我幹了三個月這種勾當，我今晚看人家來做這把戲。同時我也担心，因為我知道這三千多喇嘛，不過有二百多桿雜牌鎗支，子彈也是不足。不過是「既來之則安之」，我也好好睡一晚。

我睡到兩點多鐘，醒了。聽着廟裏的鐘聲，被風送得遠遠底散遍了曠野。又聽得巡夜的在各處山頭呼喚。我睡不着，起來到廟中空庭散步。幾百里地很少看見樹，而這庭中却有兩株蒼翠的孤松，新月從松際偷射到石砌的空庭，外邊斷續的聲音更顯到廟中的靜默。我獨自散步，一時萬念齊來，想到祖國的烽烟，自己的身世，感覺着一個人求了比較高深的學問，有了些經歷，想要為國家出一份力，却埋葬到這步田地；又迴想到在美國時候的快樂，去年今日，正同着一個人在真石公園釣鱸魚，而今真是天南地北，情愛的絲也牽不到那樣長！我走來走去，越走越覺得這喇嘛廟空庭，孤松，石塊，和月色的可愛。當時我真羨慕着靜，羨慕着做和尚。我想着，要是我有回到關裏的那一天，我一定到戒壇寺去住一下，就是臥佛寺也不差！天亮了，我告別了倦眼矇矓的佛爺喇嘛，同牛工頭浸着北

風去趕火車。

一到了城裏，公司是並沒有危險，可是這城市的周圍已滿是鬍子，出城三里地便有危險。當下我拜訪了當地幾位熟人，知道城裏除了幾十個兵以外，是毫無防禦工作，連一個保安隊的影子也沒有。當下我打定主意，明天就得動身到天津去，因為義勇軍太活躍了，我恐怕一到了天津，要是多住幾天，鐵路都被義軍拔完了，就回不來。

我臨走的那一天，地方上的人都知道我已回到城裏，所以非常之忙。下午四點多鐘的車子往南去，在三十幾里外頭的一個城鎮還得住一宵。那天還有幾個「滿洲國」的官吏定要我吃飯，我一面把幾件衣服放在小提箱裏，叫人到時候送上車站，一面還得穿上馬褂去敷衍飯局，整整坐到三點半鐘，我便告辭上了車站。我回來的那一位助手，因為太膽小了，又一定要跟我回來，他把東西早歸得舒齊，一個月前就想南返的，他在公司等我還不歸來，急得真像螞蟻在熱鍋上盤轉，照他的意思，恨不得一脚就跨到天津租界上。

去四平街的旅途，當時通遼一帶正為義軍佔領，路上很不好走。鐵路的兩旁，左一個倒着的火車頭，右一個碎了的車軸，我臉上雖不顯出來，心裏可十二分的高興。從

燒燬的車站，橋樑，電桿我都感覺到忠心，勇氣，犧牲的大精神，我真想跟着去。

我回來除了一個助手以外，還有兩個初次見面的同伴，都是南方人，所以我非但不寂寞，而反覺得異鄉逢知己。況且他們的局子，對於我真是十二分的幫忙，我感激他們幾位，真是難於筆述。到了四平街的時候，我助手又因為驚顛過甚，受了日兵的查詰，幸虧這兩位同伴中的一個，能講日本話，挺身出來替他解說，才算沒有出亂子。

在南滿車上一夜，清早便到了大連，可巧又碰上北來時遇見的熟人，所以又免了一切檢查，登輪到津。

天津的公司，正在改動，舊人都裁去了，而新到的支持人年紀又輕，經驗又少，他一來就問我為什麼我的公司不能造火犁，而每月還要有許多化費；一方面他要省錢，一方面又要多開荒地。還有一位竟問我那兒有沒有海參吃。他們在天津招待我吃飯是好極了，不過我一方面看着珍羞滿桌，一方面想起村裏吃土豆，蕎麥，我不能下咽。當下我左思右想，他們既然難於合作，而且我在滿洲的時候，還有人私下將我的舉動報告到關裡，我算不得白白的拚命。要拚命也是當義勇軍的好。於是我忽然提出辭職，同

時因為想仍舊為我的工人等想個辦法，所以答應維持到底。我把天津那批人駭了一跳。我告訴他們老鄧是很有才幹而能維持下去的人，他們非但不聽，還要把他取消職務，就此一點，就可以知道他們雖然鞭長莫及，還想自做主張，把許多人的生命當兒戲，反正自己是遠在平津，沒有危險的！

我辭職之後，想當義勇軍，於是先在北平各方面打聽了一下，覺得關外同關內的情形很有不同，我非常的悲觀。那時聽說以前東北很有頭腦的一個領袖，住在上海，他要是能去（而且他以前是講去的），能號召好幾萬人，我跑到上海，才知道他正在花天酒地，於是我拋棄了滿肚子的熱望，再回到北平。

投稿注意！

投稿是本社極歡迎的，但請莫忘了寫明通信地址。
用「筆名」者，也請寫明真姓名。

全國震驚以後

胡適

當十九路軍因瀏河受迫脅從上海退兵的第三夜，（卅一年三月四夜），我還在北平協和醫院裏，忽然有幾個護士特別跑進我病室裏來，手裏拿着各種晚報，十分高興的說：「胡先生，十九路軍又打回去了！日本人大敗了！」我細細看了報紙，搖頭對她們說：「這個消息靠不住。恐怕沒有這樣好的事。」她們見我不相信，臉上都很失望；我很不願意掃她們的興，可是我知道她們到了明天失望還得更大。果然，到了第二天，每個護士都是很懊喪的樣子；我回想她們昨晚狂喜的祝氣，我幾乎忍不住要掉眼淚了，——因為她們的狂喜真是從心坎裏出來的對國家的熱望。

過了一年，我到上海，聽我的朋友們談起那一夜上海的人民爲了一句謠言，人人都發了瘋狂，滿街上爆竹的殘紙堆到幾寸厚；還有幾個人在那隆冬天氣赤裸着半截身體，開着汽車，吹着喇叭，滿市狂走！我聽了兩眼都噙着熱淚，抬不起頭來，因爲我能了解那狂喜的意義，也能想像那第二天失望的奇慘。

在那狂喜裏，在那失望的奇慘裏，我們經驗了整個民

族的精神的悲哀！

現在——在那狂喜與奇慘的一夜的一週年紀念的時候——我們全國的人民得着熱河全省陷落的警報。南方同胞派來的慰勞抗日將士團的代表還在津浦車上，帶着一百五十箱的慰勞品，每箱裏裝着無數男女同胞的熱烈的期望！他們夢裏也想不到熱河六十萬方里的土地已在十天之內完全被我們的敵人不戰而得去了！他們夢裏也想不到孤軍深入的敵軍，一百二十八人，四輛鐵甲車，可以爬山越嶺，直入承德，如入無人之境！他們夢裏也想不到熱河境內的中國軍隊已開始總退却，退入長城以內了！

這一天的全國國民所受的精神上的慘痛，只有去年今天（三月五日）的全國狂喜之後的大慘痛可以比擬。所不同的是去年十九路軍與第五軍在淞滬苦戰的成績確有引起全國熱望勝利的理由，而今天的慘痛只是我們雖然不會期望張學良湯玉麟的軍隊會打勝仗，然而也決不會想到失敗的如此神速！

我們初受着這種慘痛的刺激，都感覺到慚愧，失望，

痛恨：慚愧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如何能抬頭見世人，失望的是我們本不應該希望這種軍隊有守土的能力，痛恨的是國家的大事真如同兒戲。

在這猛烈的刺激之下，我們應該鎮靜我們自己，回頭想想這件事的教訓。這回熱河的事件給我們的第一個教訓是敵人的勝利真是疾風掃落葉，絲毫不費勁；我們的失敗是摧枯拉朽的失敗。

第二，從這回的熱河事件，我們可以證明一件歷史事實：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敗，也不是有計畫的「無抵抗」，其實也是一種摧枯拉朽的崩潰。幾百個決死攻城的日本兵眼裏就沒有看見那二十萬的東北大兵。即使沒有那九月六日張學良將軍「不准衝突」的密令（見李頓報告書頁一一〇），即使沒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見同書頁一一一），那二十萬大兵也不會抵抗的，也會在很短的時間就崩潰的。當時變起倉猝，來不及抵抗，還可以說是有主張的避免衝突。但我們看後來錦州的退却，北滿的潰敗，這都是有了相當準備時期以後的情形，都够證明當日的不抵抗只是無有抵抗的能力。今年元旦的山海關事件又是「九一八」事件的縮影，少數的敵兵黑夜爬城，也就可以使中國軍隊驚惶失措，一晝夜的接觸，「天下第

一關」就入敵人之手！元旦以來，重兵十幾萬雲集灤河東西，熱河的必被侵攻是人人皆知的，然而榆關方面毫無反攻計畫；直到日兵已大舉進攻熱河了，榆關方面的十萬大兵也始終沒有反攻榆關進兵綏中以牽掣日軍後路的計畫。日軍孤軍深入，絲毫沒有顧忌，正因為敵人眼裏早已不看見那十幾萬的正式軍隊，更不看見那號稱十幾萬的義勇軍。日軍一晝夜衝鋒五十英里，因為他們經過的是雖有人而等於無人的土地！一百二十八個日本先鋒衝進了承德，十幾萬的中國大兵就總退却了！這不但是湯玉麟的軍隊的潰滅，也不但是義勇軍的消滅，這是東北軍隊的第二次大潰敗，這也是華北軍隊的整個失敗。所以我說，這回的事件足够證明前年東三省二十萬大兵的不抵抗是實在沒有能力抵抗。一年零五個月的整理與補充還不能抵抗，熱河的絕好的天險地利還不能抵抗，可以證明這種腐敗軍隊遇着現代的敵軍勢必如枯葉之遇勁風，朽木之遇利斧，無有不能崩潰之理。

第三個教訓是我們從這回的大敗可以看出這樣摧枯拉朽式的崩潰究竟原因在什麼地方。三月五日北平世界日報列舉熱戰失敗的四個主因：

（1）指揮缺乏統一

(2) 溝壕工事太不堅固

(3) 全線未能一致動作

(4) 民衆之不合作

同日大公報也提出四個結論：

(1) 中央地方當局者自始未曾盡力布置熱河之防禦。

(2) 如此重大之軍事而無作戰的計畫。

(3) 將帥未融爲一體，呼應不靈，指揮亦不當。

(4) 賞罰不明，軍紀不整，棄土喪軍者罰不及身，無以資勇士而勵怯懦。

這些評論自然都是事實。但依我們的觀察，此次大潰敗的主要原因有這些：

(1) 軍隊全沒有科學的設備，沒有現代的訓練。三

月五日宋子文院長發表談話，敘述熱河的情形，「

我國守熱河之軍隊絕無所謂參謀工作。軍事長官道

遙後方，遲遲共行。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自北

平至前方用駱駝須數星期方能運達。最前線各部軍

隊一無聯絡，高射砲及排壕工具絲毫未備。軍士所

受者僅操場之訓練。」他又泛論吾國「養兵數百萬

，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幾等烏合」。這是政府

最高官吏的評語。丁文江先生在本刊第三十七號「

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一篇裏曾痛論中國軍隊

的缺乏現代科學的設備，及中國軍官教育的落後。

他屢次對我說，中國軍官都不會看地圖。我起先還

不相信，近日我才相信了。前幾日北平一個機關負

責的人對我說，「此次軍隊出發，都沒有地圖，都

來問我們要地圖。我們半價買了許多幅蘇甲榮編印

的東三省熱河地圖送給他們。」我聽了真不勝詫異

。蘇甲榮先生的地圖只可供我們平常人看報時的幫

助而已，豈能用作軍事地圖！何況各軍連這種簡單

的地圖都沒有呢？舉此一端，可見中國軍隊完全是

太古式的軍隊。此種軍官與此種軍隊，即使擁有貴

重的新式設備，也只是「齋寇兵，資盜糧」，拱手

送給敵人，如瀋陽的飛機與兵工廠一樣而已。

(2) 軍官的貪污墮落。朱慶瀾將軍曾說，「軍官有

了兩萬塊錢以上的財產，決不能打仗了。」東北軍

隊從前曾有能戰的名譽，近年所以一蹶不振，都由

于軍官積產太豐厚，生活太奢侈，久已無鬥志了。

石友三一役，能勉強一戰的已不是東北嫡系的軍隊

了。「九一八」以後，東北軍人雖遭絕大恥辱，而

他們在關內的行爲無一不是存了日暮途遠的頹廢心理，只想快發財，毫不體恤士卒，更不繫念國家。拿這種頹廢墮落的軍官來抵抗那抱着併吞東亞的野心的日本軍人，豈非以卵投石嗎？

3) 地方政治的貪污腐敗。熱河政治之腐敗，人民之怨毒，是人人知道的。錦州失守後，北票朝陽已成了前線，而湯玉麟父子叔姪們還只用種種苛法剝掠這地方的人民，使人民天天盼望有人來解救他們的迫切的苦痛。關內民衆團體的代表，如朱慶瀾熊希齡諸先生都曾向湯玉麟呼籲過，勸他解除苛捐雜稅，并且替他籌畫補充餉源的方法。但中央與北平的當局都索了耳朵，不肯協助餉源，使湯玉麟一羣人有所藉口繼續敲剝人民的脂膏。開陽一帶的人民，本有自衛的組織，抗捐至一年之久；後來因抗日救國的民衆團體的勸告，自動的把一年的抗捐全數補繳給政府！這可見人民真是好人民。但這種可愛敬的舉動絲毫不能感動那一羣貪官污吏的天良；苛政苛稅借軍事而更加嚴重，竟使人民不能不暫時投入仇敵的懷抱裏以求避免當前水深火熱的暴政。張學良將軍前幾天親對我們說，熱河人民因痛恨湯

玉麟而痛恨一切抗日軍隊，所以丁春喜旅進入熱河，途中丟了兩個營長，大概是被老百姓殺害了。是的，熱河人民因痛恨虐政而痛恨一切會庇護這虐政的更高當局，這是這回失敗的大原因。

(4) 張學良應負絕大的責任。張學良將軍自從民國十七年以來負了東北四省軍政全權的責任；自從十八年以來更負了華北的軍政領袖的大責任。東三省之淪陷，他應負最大的責任，這是他去年八月七日自己曾承認的。他的體力與精神，智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够擔負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倘使他在前年引咎辭職了，中央還可以有一年多的時間來布置熱河與華北的防務。倘使他去年八月初真能實行了他辭職去國的決心，中央也還有半年多的時間可以計畫布置。不幸他受了他的部下的包圍，變更了去職的決心，又不能振作起精神來積極準備。惡惡而終不能去，善善而終不能用。湯玉麟高紀毅沈能毅周大文張學銘一班人的飯碗雖然保全至今，然而六十萬方里的熱河全省終於在他統治之下送在敵人的手裏！他的罪過，綜括說來，至少有五點

(一) 自己以叢谷叢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

偏要戀棧，貽誤國家，其罪一；（二）庇護湯玉麟，縱容他禍害人民，斷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時間而對於熱河榆關不作充分的準備，其罪三；（四）事機已急，而不親赴前線督師，又至今還不引咎自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無一個敢負責作事的人才，亦無一部能負責自爲戰的軍隊；事必躬親，而精力又不容許；部下之不統一，指揮之無人，聯絡之缺乏，設備之不周，都由于無一個人敢替他負責任；其罪五。

（5）中央政府也應負絕大的責任。湯玉麟的責任應由張學良擔負；張學良的責任至少有一大部分是應由中央政府擔負的。要而言之，中央政府對於此次事件，至少有四層罪過：（一）容留湯玉麟在熱河，其罪一。（二）容許張學良在華北，又不督責他作有效的準備，其罪二。（三）當此強敵壓境之日，中央不責成軍事領袖蔣中正北上坐鎮指揮，乃容許他逗留在長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輕重失宜，誤國不淺，其罪三。（四）如宋子文三月五日的談話，他明知熱河不能守至「一星期至十日」，此言如果確實，則是中央最高行政當局明知熱河必不能

守而靜待這六十萬方里土地的淪失了！既明知不能守，宋院長何必在承德發那大言的通電來欺騙國人與世人？何不電召蔣中正委員長飛來指揮挽救？何不徵召全國最精良軍隊出關補救？何不明告政府全體，早日籌畫軍事以外的救濟方法？此種罪過豈但如宋院長所謂「驅市人而戰」？簡直是他自己說的「拱手讓人」了！其罪四。

以上三個大教訓，我想全國人都不會不承認的。最後又最重要的教訓，是我們應該深刻的反省我們爲什麼這樣的不中用？爲什麼只是這樣做勁風裏的枯葉，利斧下的朽木，做人刀俎上的魚肉？

是不是因爲這個國家上上下下整個的沒有現代化，整個的沒有走上科學工業的路？是不是因爲在這個現代世界裏我們還不肯低頭做小學生的苦學，所以不能抵抗一個受過現代科學工業文化的洗禮的民族？

是不是因爲我們的老祖宗和我們自己都是罪孽深重，腐化太深，所以鬧了三四十年的維新至今還是不可雕的朽木，禁不起風吹的敗葉？

是不是因爲我們自從庚子以後，受了國際均勢之下的

苟安局勢的麻醉，誤認「彼入我京師而不能滅我」（王壬秋語）的形勢可以長久存在，誤認中國真是亡不了的，所以又陷入了醉生夢死的昏迷狀態裏，既不能自立又不肯埋頭學人家自立的本領，既不能吸收他人的新把戲又不肯刮除自己的腐肉臭膿，就成了這樣一個禁不起風吹草動的無用民族？

現在到了這個大試驗的日子了。在全世界人的眼光注視之下，我們的一切法寶——口號標語，精神文明，寶華山念經，金剛時輪法會，「太古式」的軍備與運輸，等等——都不靈了，我們方才明白我們原來至今還只是一個束手坐待強人宰割的國家！

這就是說，世界儘管變了，我們這個國家的危機還和十九世紀末年的情勢相差不遠。也許比那時代還更危急，因為那時代遠東的一點均勢局面現在久已不存在了，我們的近鄰還是我們最可怕的侵略者，而全世界沒有能力也沒有決心制裁她的暴行。我們絲毫沒有準備怎樣在這個現代世界裏求民族之自由平等，所以幾百噸的大言空談，抵不過「九一八」夜的一炮，也抵不過今天朝陽承德之間橫衝直撞的敵軍。

古人說的，「多難所以興邦」，這不是欺人之談，這

是人類歷史的教訓。我們這個民族在甲午以後，歐戰以前那二十年中，屢經大難，所以確有一點自己悔悟的態度，有譴責自己的雅量，有冒險出國求學的少年精神，——這都是「興邦」的氣象。歐戰至今，二十年中，國外有形的壓迫稍稍鬆懈了一點（雖然無形的經濟的壓迫只有加重而無輕鬆），我們的虛驕與誇大狂又都回來了，那二十年前剛萌芽的一點自責與願學的虛心都銷滅了。不先整頓自己的國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強敵；不先學一點自立的本領，而狂妄的藐視一切先進國家的文化與武備；不肯拚命去謀自身的現代化，而妄想在這個冷酷的現代世界裏爭一個自由平等的地位：這都是亡國的徵象。

這種迷夢，今日應該醒醒了！「養兵數百萬，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幾等烏合」，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于這個現代世界的。沒有科學，沒有工業，「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于這個現代世界的。貧到這樣地步，鴉片白麵害到這樣地步，貪污到這樣地步，人民愚昧到最高官吏至今還信念經誦咒可以救國的地步，這國家是不能自存于這個現代世界的。

二千五百年前，一個哲人曾說：「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我們今天的最大教訓是要認清我們的地

位，要學到「能弱」，要承認我們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虛驕誇大的狂妄心理，要養成虛懷願學的雅量，要準備使這個民族低頭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學生。這才不辜負這十

八個月（也許還更長）的慘痛的教訓。

除此一條活路之外，我看不出別的什麼自救的路子。

廿二，三，六夜寫完。

給張學良將軍一封公開的信

丁文江

漢卿先生：

最近這幾次見面有許多話要想詳細的對您談談。始終因為在座人太多了，不能容我一個人演說，不能暢所欲言。我現在索性把我要說的話寫了下來，請您考慮。

我認識您到今天差不多十一年了。從民國十一年到十五年，我當北票公司的總經理，常常因為公司的事和您見面。您對於公司的幫忙和對於我個人的好意，我至今沒有忘却。到了今天，不但是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時會，而且是您個人遺臭流芳的關鍵。在這個時候，您很需要幾個朋友忠實的對您說兩句真話。我下面所說的話，我知道都是您的朋友心底裡的話，但是因為種種關係他們不肯說或是不敢說。以我的觀察，您不是一個拒諫飾非的人。友誼的忠告您未必即以爲忤。萬一我這封信能夠增加您幾分的決心和勇氣，就是使您感覺一時的不痛快，也是值得的。

熱河的戰事是二月廿一日開始接觸的。廿二早上八點

鐘日軍已經由南嶺開進北票。廿五日就到了朝陽。廿四開魯失守，廿六日軍佔領下窪子。以後三月一日失凌南，二日失凌源，三日失赤峯平泉，四日失承德。據東京的路透電四日上午日軍已經佔領冷口。自今以後不但我們的國境只能到長城，而且長城上的要隘都在日本人的手裏。朝陽到承德一共有六百四十多里，日軍七天就佔領了承德。昔人說：「日蹙國百里」。這真是這一次戰事的結論了！

不錯，把這一次戰敗的責任完全放在您一個人身上是不公道的。湯玉麟這幾年在熱河無惡不作，弄得十室九空，天怒人怨，是這一回悲劇的背影。不過湯玉麟是誰用的？他的行爲是從今日纔變壞了的嗎？九一八以後您對他不能沒有顧忌，我們可以有相當的原諒。從民國十七年到二十年，您完全主持四省的軍政。那時候您豈不能早爲之地

？您前幾天對我們說熱河的老百姓並不知道東北軍和湯軍的區別，把東北軍當湯軍一樣的看法。老實說，這種心理並不限于熱河的人民。我敢說今天大多數的人都是如此觀察。就是知道最近事實的人至少也不能不承認湯玉麟是張家的人，張某人應該負相當的責任。

這一次作戰計畫最大的錯誤是把朝陽建平，和開魯赤峯兩路交給湯軍。董福亭沒有打傷一個日本兵就放棄了朝陽，崔興武沒有抵抗到一天就退出了開魯。從純粹軍事上看起來，開魯是不容易守的，朝陽是不容易接濟的。但是一點沒有犧牲就把這兩個地方喪失了，對於我們的人心士氣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何況建平赤峯又絲毫沒有準備。日軍到了開魯，孫殿英的隊伍還沒有完全達到圍場！因此在凌源的主力軍隊左翼受了威脅，軍心因之慌亂。您是總司令。去年十二月初已經向熱河進兵。這三個月中難道不可以從容佈置？如果早把孫殿英放在赤峯，宋哲元放在建平，戰爭的結果何至于如此的不堪？不錯，這種計畫湯玉麟未必同意的。但是他一共不過二萬桿槍，而且分散在各處。您如果有決心，他就是阻撓，也不會發生效力的。

就是您自己親信的軍隊在凌南凌源作戰的，也沒有給國家爭得絲毫的人格。我們知道因為朝陽開魯失守，建平

赤峯空虛，凌源的左翼受敵人的威脅原是事實。但是日軍的佔領凌南和凌源都是從正面攻擊的。我們沒有等到左翼發生危險，先就崩潰了。凌南凌源，兩處的軍隊一共在六旅以上，何以日軍用三旅人不到幾天就輕易的攻下？我們原不肯相信日本人的宣傳說，攻凌源的時候他們只損失了九個兵士，或是說凌源的戰壕裏面不但拋棄了無數的輜重糧秣，而且還掉下了許多現款。但是川原的隊伍一日纔用汽車由朝陽出發當日就到葉柏壽，二日就佔了凌源，三日就佔了平泉。白石咀，紗帽山都是天險。何以綏中的日軍二十七出發，當天就佔了白石咀，廿八就佔了紗帽山，一日就佔了凌口？凌南凌源的地勢比吳淞江灣如何？閩北倉卒作戰比這次有三個月的預備何如？何以十九路軍能支持一個月，您的軍隊抵抗不到半天呢？

不錯，您有您的許多困難。您所直轄的軍隊三十幾萬，有一半是雜牌，因此號令不能統一，指揮不能如意。加之兵多餉少，部下不免都有怨言。但是去年夏天以前您是國軍的副司令，現在是軍分會的代理委員長。這一年以來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熱河免不了要有戰事。敝頓淘汰軍隊是您惟一的責任。日本的經常陸軍預算每年不到二萬萬元。您的軍費每月是四百多萬元。為甚麼我們每年化五千萬

元錢，得到了今天喪師辱國的結果？

您知道國民的憤激痛恨到如何程度嗎？中國的人民不是不愛國的。東北熱河後援會幾日內已經收到廿五萬捐款。其中的八百多元是一個山東的農民傾家破產寄來的。自今以後要想捐一個錢都做不到了。我有一個朋友從上海來的，他並不是有錢的人，這一次在上海籌了一千二百元，預備捐給我們的。昨天他遇見了我，氣得要死，說，「我的錢是捐給他們打仗的。他們既然望風而逃，我不再捐錢了」。今天我僱一輛洋車到西城。洋車夫對我說，「這兩天抓車，昨天不敢出門，一家子挨餓。今天受不了了，只好出來。先生！不要說公家一天還給八毛錢。就是不給錢，只要有得吃，我也願意幫着打日本人。現在兵不肯打仗，只知道叫我們吃苦！」大公報是最負責任的。主筆都是您的熟人。今天社論的題目是「當局誤國至何地步？」

到了今天，爲您個人計，自己立刻跑到前線去，把畏縮不前的將領槍斃幾個，趁日本兵還沒有完全集中，親自帶着比較精銳的軍隊，不顧死活，不計成敗，一直向承德衝過去，使天下人都知道您是真愛國的，不怕死的——凡是真正爲國効死的人，以前的事都可以不提。這是上策。立刻引咎辭職，束身待罪，這是中策。若是還要保全所謂實力（？），所謂地盤，坐等着您的政敵紛紛起來攻擊您，惹起極大的內爭，搖動全國的政局，使中央幫您忙的朋友一個個受累，這是最下的下策！

我知道您也是愛國的，是有血性的。不過是因爲環境的關係，愛國心和血性都發作不出來。所以公開寫封信，希望所有您的朋友看見牠都一致的主張，完成您的晚節。文天祥說的好，「人生千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希望您猛省！

二十二、三、五。

國難與智識界的婦女

衡哲

在情感緊張的時候，比如賭博到緊要關頭時，飢寒到不能忍受時，一個人最容易把他的真人格暴露出來。同樣

患難之中表現出真象來的。所以古人說，盤根錯節，乃見利器，正是這個道理。

，一個國民的人格，或是一個階級的人格，也是最容易在

自從山海關失守以後，中華民族的命運已是到了火燒

眉毛的程度了。在這個惶惑憂忿的空氣之中，我却靠了種種的接觸，對於北方智識界的婦女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印象。我覺得在大體上說來，她們是有沉着的意志，和犧牲一切以共赴國難的精神的。但在這樣國危家破的時候，單單靠了意志與精神，是不够的。我們必須知道，應該做點什麼。不，單單知道應該做的什麼，還是不够的，因為一個人可做的事太多了。曾經受過教育與訓練的婦女們，還應該知道在救國工作之中，什麼是最根本的，更應該問一問自己，有沒有擔負這些工作的能力。我現在且根據了這兩個問題，來同受過教育的姊妹們，討論討論我們在國難期中所應該注意的幾件事。

第一，講到救國的工作。依我看來，在智識界的婦女們所能做的事業中，實在沒有比為中華民族保留一點元氣為更緊要，更基本的了。因為現在中日的局勢，決不是一個無因的現象，這是誰也能知道的。故我們着眼之處，亦當在他的原因上，而不當在他的外表上。雖然前方的敵愾與後方的援助，也是不容忽視的一種工作，但僅僅靠了慰勞與開會，鼓勵與供養，也是決不能打倒日本的。再讓一步說，即使真能靠了一班志士仁人們的救國工作，把日本打倒了，而中國的外侮，又豈僅僅一個日本？中國的國難

，又豈僅在外侮？國難的癥結不除，即使沒有外侮，中國也難立國。外侮的根源不去，即使日本陸沉，又豈沒有第二個強者，來繼木屐兒的後塵？

所謂國難的癥結，與外侮的根源，細分起來，雖是千頭萬緒，但扼要說來，也不過兩三件。其一是民生的窮苦，其二是民智的閉塞，其三是全民族體力的衰落。此外如貪很，如無恥，如做匪做盜，如自相殘殺，如毒品的吸食，如低能兒童的無限止的製造，却都不過是上面三個情形的產品，或是與他們互為因果，而不是獨立的症候。故我以為救國的基本工作，仍當在此三方面着眼。至于我們下手的地方，亦有兩處。其一是救濟農村，其二是救濟兒童。此二者雖同屬於保留中華民族元氣的事業，但救濟農村的責任不是婦女們單獨所能負的，也不是外行如我者現在所敢討論的，故此處不去細說。救濟兒童却是婦女們的事責；雖然男子們也應當盡其幫助之責。故我以為在這個時期中，智識界的婦女們若不欲做一點基本的救國事業則已。假如她們能把她們的眼光，超出『現在』與『此地』之外，向高處遠遠看一看，她們便應當立刻明白，她們救國工作中的最切要處，乃在此而不在彼了。

救濟兒童的工作雖是一言難盡，但在現在教育及社會

狀況之下，我們應該注意的，亦不外下列的幾事。其一，是我們應該覺悟；兒童教育的根本，不單在書本的呀唔，而更在身體的鍛鍊，不單在智識的加進，而更在人格的熏陶。而這兩件基本教育的事業，却又非有康健優良的環境，以及父母師長人格的感化，是不行的。其二，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兒童的思想與人生觀，使他們對於內憂外侮，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使他們對於自己將來的責任，有一種任重道遠的自期。不然，那一個學校不唱愛國歌？那一個集會不高呼打倒日本與帝國主義？若我們不能啓發這羣兒童，使他們知道譏責于他人的可恥，使他們知道，凡是就易避難的救國行爲，都是虛偽的，愚懦的，都是沽名釣譽的，若我們連這一點也做不到，那麼，我們還不如乾脆把中華民族的未來王人翁，一概交與那班以盲導盲者的手中好了，何必再來講什麼救國，什麼兒童的救濟？

再從救濟農村的目光看來，我覺得我們應該大規模的聯合起來，把兒童遷離了那腐敗化和衰弱化的城市，使他們到鄉下去住，爲他們建設一個工作與遊戲的學園。這樣，不但兒童們可以靠了與自然的接近，得到一個較優良較康健的環境；并且靠了與鄉村的接觸，我們可以更容易的與農村的救濟合作。因爲一方面我們可以使兒童的生活樸

素化，使他們的身體與人格日見康健，使他們對於平民能發了解與同情，發生他日爲他們工作的願望；他方面又可以靠了鄉村兒童與自己兒童的接觸，使後者的智識提高，生活改良。這樣，頭大身小的城市兒童，與腳大頭小的鄉村兒童，乃可以漸趨于平等與合作的途徑，以爲復興中華民族的一個基本勢力。

這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他的能否實現，全視都市中負有教育兒童責任的智識界的婦女們，有無高遠的眼光，犧牲的精神，與偉大的人格，來担负這個救國的根本事業。

除了兒童的教育與熏陶之外，婦女們可做的救國事業也不是沒有，并且還有那些學有專長的職業婦女，她們活動的範圍當然也不能以此爲限。故我雖深信，這件保留民族元氣的事業，是婦女們的最神聖的担負；但對於有專長，有職業的婦女們，我也希望她們能堅守着她們的職務，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去求救國的真確意義。具體說來，即是，我們學的是什麼，我們便做什麼。比如有幾位受過教育的女子，甲是教授，乙是銀行家，丙是模範的母親，丁是醫生，戊是律師，己是看護婦，庚是大學學生，辛是工程師……在平時，這幾位女士當然是各在各的範圍

，各盡各的職務的。但一旦國難來臨，她們的情感不免便要立時緊張到了極點，覺得非做一點難做的事業，是不足以表現她們的愛國心的了。于是銀行家便去學做看護婦，大學生便去做前方的工程師，母親又拋棄了她的兒童去代替銀行家的職務，醫生便不得不去征做母親了，……。

這樣一來，各位的職業是交換交得團團轉，忙是極忙了，難是難透了，苦也是苦够了，而結果却不過消滅了一個『專長』，減低了各種專業的效率。這那是救國？這簡直是喜劇。不，他是一個大悲劇，因為劇中人的高尚的犧牲精神，不幸都變成破壞勢力了。所以我希望，在國難期中，我們最愛國的行爲，便是去做我們最能做的事，把他們做得好，把他們的效率提高，如此而已。這一層我們女子是尤當注意的，因為從全體上說來，我們的智識根究竟不甚牢固，而我們又是最易受情感的衝動的，即使那衝動是純潔的，是沒有卑污的虛榮心夾在其中的。

第二我們要問自己的，是我們有沒有担負這件偉大工作的能力。這問題含有體力，才能，與人格的三方面。我們第一當問一問自己，我們的身體能够吃苦嗎？他們受得起磨折，經得起風波嗎？我有幾個青年的朋友，她們自九一八之後，便立志不吃飽，不穿暖。我便對她們說，『這

是愚忠，不是救國。你們要救國，先須把你們自己的身體煅鍊好。吃飽與穿暖，不是奢侈的生活，乃是生活必需的條件。你們何必先把自己弄成病夫呢？幾會聽見過病夫能救國的？』她們聽了也不能不失笑，不能不承認是走錯了路了。

關於青年的才能與智識的修養，近來教育界的領袖們，已經發表過不少意見與忠告了，似乎用不著我來再講。若必欲簡說一句呢，則我可以對青年的姊妹們說，『沒有工具不良，而能善其事的。智識與才能，是你們救國的基本工具。缺少了他們，即是等于以盲導盲，雖然有時可以僥倖成功，也不過是築屋于沙灘之上，他是經不起風雨波濤的。所以我勸你們，即使火燒到了眉毛，也不要忘了這個修治工具的工作吧。』

至于女子們在人格方面的修養，却更是根本中的根本了。我希望我們能憬然于我們所處地位的危險，與我們所負責任的重大，至少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做一個人。我們應該先屏棄一切的虛榮心——下自裝飾，上至報紙上的玉照，都包含在內——。他是女子們的附骨疽，我們若不能忍痛把他割除，那麼，即使毀容紓難，做出一點粉淚嬌啼的動作，也就不免有自欺欺人的嫌疑，那還能說到救

國的真實效果？其次，我們應該與男子們去分負一點救國的責任。在一方面，我們是不應該再做什麼小鳥兒，小松鼠兒，小白菜兒，聽見了鞭聲便投到男子的懷裡去求保護的了。我們應該反過來，自己去做一個保護者，去保護家庭中與社會上的兒童與老弱。在他方面，我們也不必再雄糾糾氣昂昂的，去與男子們爭什麼參政權，開什麼財產平均權。我們應該看清了這個同舟遇難的情形，且讓他們去應付眼前的國難，而由我們自己來教養與訓練那未來的中華民族，來做一點未雨綢繆的工作。最後，我們還應該去學着過一點刻苦的生活。酒食賭博，醉生夢死的毛病，

識了字幹嗎？

希聲

近代最凶的利器，並不是重砲，也不是飛機，是字。字得了報紙的流通，有線無線電的傳播，標語傳單的張貼，它早已不是像在過去只供少數文人的吟哦與少數藝術家的描畫了。這也是近代的重要變遷之一吧？所以，它雖沒有飛機的翅膀，而飛的比飛機快；它雖沒有重砲的口徑，而叫的比重砲響。在時間上它能把過去變為現在，在空間上它能把地球縮於一室。在它的立場看，好似一切的聲光

智識界的婦女們，大概是能不常犯了。但我們豈不仍犯了愛舒服，求安全的毛病？我們中間有幾個人是在實行「鵝鵝巢林，不過一枝」的人生哲學？內亂了二十餘年了，因此毀家滅身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了；而我們却仍是髮膚不毀，衣食安全，過着舒適的生活，這實在已是非分的享用。故我說，自此以後，我們不但要學着過一點刻苦的生活，並且還應該抱一個不怕死的決心。這個決心是我們人格的火洗禮，受過這個洗禮的人，還有什麼工作不能做，什麼重任不能負，什麼精神與身體上的享樂不能犧牲？

電化，都是為它發明而助長其權威。明白這一層，我們就知道在近代的國家裏，無論是澈底改造，或是要實行一種新的政策，都必以識字運動為其最基本的政策，其手段比之焚書坑儒以愚黔首者，真不知高出幾百倍了。但，它雖能利用一切的發明，它的本身是無意識，無成見，無自動能力；換句話說，它還得受識字運動的人們的利用。所以，促成民族自覺者利用它，增進人類文化者

利用它，造成軍國民主主義者利用它，造成共產政策者也利用它，甚至挑撥人類相仇殺者利用它，促成民族的頹廢與自盡者也是利用它！那就要看，利用它所作成的讀品。

在中國，似乎并不如旁的國家一樣，一切事只有表面價值。識字運動就是識字運動。運動一成功，便一切解決，關門大吉了。殊不知識字運動成功的話——假如能，那問題便更嚴重了。我只問一句，大家識字後讀些什麼呢？讀點普通科學，增進大家認識及和用環境的能力罷？咱們沒有這些書。讀點較好的文學作品，增進人生的了解與興趣罷？這些書也是「君家所寡有者」。咱們頂多的還是黑幕大觀，神怪妖俠之類；大家儘可放心讀，舊有的已經不少，新添的還在層出不窮，日新月異呢！咱們真是個進化的民族呀！不見火線上的戰士，需求供給；遍中國的飢民，鬻妻賣子；還有人拿二十萬去重修白馬寺嗎？假使沒有這些妖書，去造就妖僧妖道與一般善男信女，這寺如何修得起？修起又有誰去守廟呢？所以，我們只有祝禱他們的靈魂得救罷！

真的，假使一般讀品只這貧相，我們還吵着大家識字，識字後去看妖書，那才是自速滅亡呢！

不信嗎？義和團若不是封神演義，西遊記，七俠五義

等等的產品，那團中的哪吒，孫悟空，黃天霸是那裏來的？剛剛識幾個字的人若不是受了妖書的影響，去年那上海報上載的兩個學徒棄家逃走，要到峨嵋山上修道，又是那來的觀念？開天闢地，火燒紅蓮寺一流的電影，又是何處的取材？遍中國都城市鎮，甚至于很少的村落，沿街上都有算命問卦的坐攤，一羣民衆圍着一頭妖道，又是誰傳的本領？上海近幾年的綁票，愈多而方法也愈奇，說是包探案與黑幕大觀的影響，不算冤枉吧？自然還得算上經什麼機關審察過的電影！

在中國奇怪的事情也太多了！譬如說，刑具，人家用它懲罪犯，咱們用它催租稅；軍隊，人家用它對敵人，咱們用它殺自己；識字，人家用它造國民，咱們當然也可以用它來畫符！

就不說那些妖書會製造許多的妖人，只單講中國一般人與一般讀品，也足設希奇的了。吃過黃油麵包的人，會讀他們曾經在某國讀過的外國書，講起中國書與中國事，則一問搖頭三不知。他們都是某一國很好的國民，但不是中國的。「稿項黃馘」讀線裝書的大國民，講起國家與社會來，則又大發其「懷古之幽情」，他們是古三代很好的國民，而不是民國的。至于一般青年學生呢？除了教科

書之外，很少數的能利用中國舊書，更少數的能利用外國參考書，並非少數的喜讀馬克思，最大多數的喜讀石頭記，也許還有性史！商人呢，總是三國演義，金瓶梅；一般的民衆呢，則是五鼠鬧東京，狸貓換太子；兒童呢？則是貓小姐與豬奶奶。假若我們相信讀品能影響讀者的思想與行爲的時候，我們似乎不用再懷疑中國國民是走向那裡去，也更不便希望中國會有一種整個的民族意識！這樣下去，縱使識字運動成功，中國人民也終于各有其讀品而分爲若干階級。智識份子終不會與民衆接頭的，因爲他們沒有接頭的媒介。

智識份子經營奔走的也有，但不是爲了民衆；作官的鞠躬盡瘁的也有，但也不是爲了民衆；真爲民衆的是那一般殺人不見血的「小人書」的作者，他們才真是民衆的領袖呵！

我并不主張利用識字，就必定宣傳給人民一種什麼主義，如中世紀教會之辦學校是爲傳教，今日蘇俄識字運動是爲宣傳共產。我也知道禁止一種讀物等于替它作宣傳，也更知道以主義爲識字運動的動機是天下第一號的愚民政策。但是，我要求我們的民衆應當有一點好的書讀，特別是我們運動他們識字以後，得供給他們讀品。

中國民間文學裏，並不絕對都是壞的，得有眼力的人去搜集，選擇及批評。中國古書裏也不是沒有可讀的，得有學力的人去整理，選擇及翻成白話。中國今日不是多的文學家嗎？與其作許多文不文學不學的玩意兒，何如多作些這一類的事，反倒可以多賣錢，又賺了「到民間去」的頭銜。至於許多的文化機關，也似乎不妨降低身分多作點基本工作。中國到了今日，實在是危急萬狀了。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翻譯——大批的翻譯。我們知道不把中國造成一個近代的國家，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不先養成近代國民，是不會造成一個近代國家的；不借重近代知識，也不會養成近代國民的。欲借重近代知識，不是靠能讀外國書的少數人，而是靠不能讀外國書的多數人。我們以爲在學校加多外國文鐘點就會達到販運的目的，那是大錯。不論能受高中及大學教育的目前是少數，就使整個能，我們還沒看見？除了少數極好的之外，中國書是不值得讀，外國書是不能讀，翻着字典看書，到底不如寫標語發傳單來的得心應手些。

假如學西洋文化，只靠看外國電影，穿洋服，吃大餐，就可以成功，那日本人早已不敢來了。若還得讀書的話，咱們就得努力作上一大批的翻譯。

若只運動識字而不注意讀品，不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而且在那九十里的盡頭，就是個無底的深淵，搭個十里

的長橋過去，方是光明的大道。

國聯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中幾個基本原則的討論

(續) 蔣夢麟

(二) 回到中國文化泉源裏尋獲自己

中國本來是一個重己輕人的國家。輸入歐化，是在外患迫切中，不得已的舉動。不是外患日迫，中國人那裏肯拋棄自己的國粹和科舉的頭銜？如有外國人勸我們回到中國自己的文化上去找出路，我們聽了，能不手舞足蹈？

中國改革學制之初，張之洞本來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其學說記置中國教育，垂三十餘年。體用兩字，本採自理學成語，其意若曰，中學是根本的，西學是補充中學的不足罷了。中國的人倫道德，學術文章，是天經地義的（西洋的格致，（當時稱科學）格致，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工藝，鎗炮，是補充的。學校以教中國的人倫道德學術文章爲正宗。格致之學，不過附庸。後來留學生回國者日多，他們把從外國學來的科目，一件一件的擠進學校裏去，逐漸推廣，把張之洞所主張爲體的中學，逐漸拋到門外去了。那一方面愈擠愈多，這一方面愈擠愈少，直造成

了「用夷變夏」的局面。然而近來吳稚暉先生還嫌「用夷變夏」的不够，更進而主張焚燒線裝書，撲滅洋八股，一切以「摩托」爲帥，凡以古非今者，殺無赦！

我們把報告書裏的意思綜合起來，攷察團諸位先生雖堅決反對我們單純的模仿外國，但並不勸我們復古。他們要我們利用固有的材料，以科學的方法，和試驗的精神，來發展自己的文化。他們的用意有二，（一）從研究自己的歷史哲學文學，來認識自己，（二）從研究工夫裏所得到的知識上的訓練，爲接受近世科學之準備。

他們說，嘗聽中國人說，中國只要把外國科學和工藝的設備搬進來，中國的文化就會和歐美並駕齊驅。他們以爲這是不對的。西洋科學的發達，是經過幾百年的知識的訓練才成的。中國如要發展科學，也必須經過多少年的苦功，從自己的歷史哲學文學泉源上用功夫，和西洋文藝復興及大光明時代所經過的一樣，先有長期的知識訓練的準

備，然後才達到科學時代。中國要回到自己文化泉源裏尋獲自己。這是創造的，不是模仿的。是內部真實的發展，不是外表的模仿。

以上所說的是攷察團貢獻我們的一個意見，不是張之洞體用論，亦不是吳稚暉『摩托』論，是創造的自覺論。這種辦法，中國現在已經有相當的基礎，並且有推廣的趨勢。自然科學方面，有北平地質調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的自然科學各研究所，這都是用中國自然界的材料來做研究工作的。這兩個機關，報告書裏也會談到的。此外關於自然科學的，還有科學社及靜生生物調查所之研究中國植物。歷史及社會科學方面的，如民八前後北京大學教授們之文學革命，及繼續發生的整理國故運動，中央研究院之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北平社會調查所的工作。這都是用科學方法和試驗精神，來研究中國固有的歷史社會或天然界的材料的。其他學術機關的各種試驗或調查工作，也還不少，不過沒有普及罷了。

中國學術方面的出路，我們不是沒有找到。只要隨時改進和向前進行，並推廣到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裏，並應用於一般教課上，我們現在教育上的弊病，自然去了一部份。現在我們可以討論學校課程中國化的問題了。

(三) 學校課程要中國化

報告書裏說，中國大學裏所授的社會科學，都引用外國材料，不知道中國大學是為西洋學生留學中國而設的呢，還是為中國學生留學西洋而設的呢？這種弊病，誠是顯然的。中國大學畢業生之習社會科學者，都能粗知西洋經濟，政治，教育的大意，對於中國經濟，政治，教育的實況，恐怕比外國人還外行。我們相信現在政治上不合中國社會實際的設施，如行政，教育，司法等等，大半由於留學生和本國大學畢業生之未諳中國實情者思想和設計的，都以西洋材料為背景。我們只要留心看看報上所發表的黨政領袖對於政治設施的討論和計劃，時時可以發見這種現象。

我們應多設真能悉心工作的研究所，或在校內，或在校外，均無不可。在校外的應與學校聯絡，如地質調查所與北京大學地質系的合作，就是一個好例子。北大地質系畢業的趙亞曾，於畢業數年後，有價值的著作不下一二十種，聽說現在還有幾位的成績可以趕的上趙君的。如我們能多設此種研究機關，並與學校同性質的學系聯合進行，現在大學裏的學科，自然漸漸中國化了。

(四) 教育要社會化

我們從社會方面講教育，我們要回到報告書裏開端的幾句話去了。中國教育與社會隔離，學校的組織但能養成優越階級而教化不及於大眾。這個原因，我們在上面已經討論過了。現在我們要討論改革的方法。

第一，要把課程適合於中國社會的需要。教科材料之採取應從中國歷史，社會，自然界之有關社會實際生活者着手。使青年明瞭歷史的背境，和社會與自然界的現象。

第二，學校教課要適合學生生活。現在中小學教科，與學生生活需要太不相干，除講演與書本外，學生得不到什麼有益於日常生活的知識；且課程分量過重，使學生無自動工作之餘地。攷察團的意見，學校應使學生使用他們的官覺，與以實地觀察的機會。

據攷察團的觀察，以上所說的缺點，雖為中小學所同具，但在在中學裏較為普遍而重大，其影響亦較為嚴重。據他們說，中等教育缺點甚多，如專重形式而疎於實際工作，如倚賴講解與教本，如偏重記憶，不注意於引起求知之興趣，如忽視知識與思想之歸納的與實驗的方面，如不注意養成學生之自動與責任心。他們以為中學之最大目的

，不在造就入大學的學生，而在養成身心健全的，機警的，頭腦靈活的人們能關心其所處之環境而準備參與其應為的工作。

第三，要教育普及。這個問題。攷察團有不少的討論。他們以為於國家稅收沒有一個統盤籌劃的正當辦法以前，普及教育是不易辦到的。退一步想，他們以為只要使各地校舍使用，和教員工作分配，均經濟一點，不要增加經費而一二年內學生的數目就可增加不少。

(五) 師資訓練應以造成學科專家為目的

攷察團的意見，以為我們教育學院或師範學院的訓練，太重方法而學科的實質缺乏相當的準備。他們以為這是美國化的緣故。其實美國師資之訓練，何嘗如此。在美國大學教育學院裏研究教育史，學校行政，教育心理，各科教學法的人，是準備充當師範學校裏的教育學教員，或教育行政人員的。何嘗以研究教育方法的人，去當中學裏的數理化或史地教員呢。教某種學科的人，都是習該種學科的專家，不過兼習幾門教育法罷了。他們所說的歐川式的師資訓練（以德法為例）重學科本質，美國式的太重方法，兩種制度，或者各有所偏重，但為比較的而非絕對的，在學科與方法的比量的多少而不在性質的不同。

中國中學教員的訓練亦是如此。師範學院的畢業生，張，本亦如是。

要學過那一科專門的人，去教那一個課程。研究教育學爲

(六) 單位制

主科的人，也是預備充教育行政人員，或在師範學校任教
育學教員的。攷察團諸位先生看見中國中學教員成績不良
，便誤會爲過重教育方法而忽略學科實質所致。其實不然
。中國大學一般學科不良，實爲造成中學教課不良的原因
。(中學教員，好多是普通大學畢業生，而非由師範出身
者。)其過不在重教育方法，而在實質訓練之淺薄。

美國中學教員之程度，確不及歐洲之高，其原因在美
國中學之性質及程度與歐洲不同。歐洲(法德)之中等學
校，爲某種階級而設，故其訓練嚴而程度高。美國希望中
等教育相當的普及於大眾，故其課程自不免較爲淺略，而

中國學校向無單位制(或稱學分制)。其採用實開始
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間北京大學之改制，而南京高等
師範於創立時(民國五六年間)亦略採此制。至今爲時不
過十六七年。中等學校之採用單位制，爲時更暫，至今猶
未逾十年。推原採行此制之目的，在將當時零亂碎雜之課
程，使確定每課之份量與各課間均衡的制配。實行以後，
從前之弊，雖未盡除，而學校課程，確較以前爲系統化，
爲均衡化。中國學校課程之不良，其原因不在採取單位制
，而單位制實欲爲抹課程零亂之弊而施行。

教員之程度，自不必如歐洲之高。又美國中學教員之地位
，不如歐洲之崇高，亦是一個原因。

在單位制之下，如攷察團所主張之指導學生作研究工
作，學業終了時全部學業之綜合攷試，均可施行而無礙。

(七) 結論

攷察團之意見，以爲將來中國之中學教師，必須爲某
種學科之專家，同時對於教學法且有相當知識。這是當然
的。個人的主張以爲中國中學應略師歐洲制，將程度提
高，訓練加緊；同時師資的訓練，當注意某種學科本質的
比量加重，而旁枝末葉的化裝課目，應一律屏除。即大學
中之各項學科，均應如此，這是一問題，而攷察團之主

以上所討論的，但從報告書立論的原則上着想。其所
討論之大中小學各個的實際問題，有暇當分別另討論。現
在把上面所說的話，總合起來，(一)現在我國教育之弊
，由數百年來的科舉及三十年來的日本影響混合演化而成
。僅僅十幾年來所受的美國影響，未能搖動數十年來所造

成的狀況。(二)近十年來中國教育的趨勢，已開端向攷察團所指示我們的路上走。但他們的報告，提醒我們的地方，確乎不少。

攷察團諸位先生費了幾個月寶貴的光陰，作成有價值的報告書，指出教育上好多的缺點，並指示我們正當的出路，我們很感謝而欽佩的。但以時間太匆促，於歷史的背景，未及進一步的研究；故不得不從現狀立論，而未能追

求其根源，我們不能不引為憾事。且教育與政治循環影響，教育不能離政治現狀而邁進；若但以教育立場論教育，未及體察四週所環繞的政治勢力，其立論有時太理想化，自不能免。這是我們應當注意而原諒的。(完)

國聯的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本刊第三十九期有任叔永先生的批評，讀者可以參看。(編者)

經濟統計季刊

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出版
 每三年全閱一次
 每冊一元一角
 (郵費在內)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中國棉紡織工業及棉紡織品貿易	方顯廷
民國十六年至十七年天津手工藝工人家庭生活調查之分析	馮華年
津滬每週外匯指數修正之說明	編者
二十一年四月至六月中國經濟概況述要	編者
統計附錄	

第一卷第四期要目

宋代之荒政	華文煜
膠濟鐵路一九三〇年營業統計之分析	廖芸泉
中國之指數	馮華年
中國棉紡織業之歷史及其區域之分佈	方顯廷
二十年之中國對外貿易	編者
二十一年七月至九月中國經濟概況述要	編者
統計附錄	

藝文半月刊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三期目次

愛與仇	羅岡
孩子們	夏蒂
友誼	胡譚
獵名作家與成名作家	朱無掛
燈下談叢	劉枕濤

第四期目次

電報	夏蒂
偷走	潘小平
還願	辰仲
活財產	甘村
燈下談叢(續)	劉枕濤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定價：每期三分。
 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連郵六角；半年三角。
 國外加郵六角。

北平：訊通
 北平大學法律學院
 第二號房轉

日本人應該醒醒了！

介紹一篇日本人的談話

技術統治 (Technocracy)

權利是什麼？

(一) 英國人的權利觀念

漫遊散記 (十六)

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苦竹的土司太太

胡適

爾和

張銳

胡道維

丁文江

每期定價

四分。預

定全年五

十期，連

郵費一元

六角；半

年九角。

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

元六角。

郵票代洋

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第四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出版)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濟南 | 青島 | 安慶 | 開封 | 廣州 | 漢口 | 重慶 | 成都 | 長沙 | 蘇州 | 杭州 | 徐州 | 常州 | 南通 | 桂林 | 海口 |
| 北平圖書公司 | 天津圖書公司 | 上海圖書公司 | 南京圖書公司 | 濟南圖書公司 | 青島圖書公司 | 安慶圖書公司 | 開封圖書公司 | 廣州圖書公司 | 漢口圖書公司 | 重慶圖書公司 | 成都圖書公司 | 長沙圖書公司 | 蘇州圖書公司 | 杭州圖書公司 | 徐州圖書公司 | 常州圖書公司 | 南通圖書公司 | 桂林圖書公司 | 海口圖書公司 |

日本人應該醒醒了！

胡適

本期有爾和先生譯出的一篇日本人的談話，是三月號的東京「同仁」雜誌上發表的。這裏面開端就是這樣的問答：

K 中日問題到底怎樣才好？

L 目下沒有法子。

K 這不是說沒有法子就可以丟開的問題，到底有方法沒有？

L 也不是沒有，要之，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國就行。

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話，我們中國人要對日本人說的話，也只有這一句話：「中日問題不是沒有法子，只要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國就行。」

這樣的談話居然可以在日本出版，居然能在這個軍閥氣燄最高張的時候在東京出版，這不能不說是日本心理轉變的一個起點。雖然在這篇談話裏，那位大概代表日本自由主義者（Liberals）的L氏說的話還只能很委婉的指出一個光明的方向，還不敢提出具體的主張，然而我們在這裏已可以看出他們已公然提倡「披瀝胸襟，互相研究」一

種有「覺悟」的「國策」。

這種覺悟的表示，正因為是在那狼可怕的恐怖主義之下發出來的微弱的喊聲，是我們應該表示同情的敬意的。

這個時候，「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整整一年半了！日本的軍隊不但佔據了整個的東三省，不但捏造了一個傀儡的偽政權，居然又侵略到熱河的全省了。日本的炸彈和重炮的聲音也許不久就可以在我們的編輯室裏聽得見的了。「然而我們要問日本人：中國人屈服了沒有？中日的問題的解決有了一絲一毫的進步沒有？中日兩國的國際關係有了一分一寸的接近沒有？

沒有！絕對的沒有！

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岸線，甚至於深入到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的。中國民族排自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中日問題的解決只有越離越遠的。

即使到了最後的一日，中國的「十八九世紀之軍隊」

訪員說了。）

真個全被日本的新式武器摧毀到不復能成軍了，即使中國的政府被逼到無可奈何的時候真個接受了一種恥辱的城下之盟了，（我們還可以斷言：那也只是中國人的血與肉의 暫時屈伏，那也決不能夠減低一絲一毫中國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決不會使中日兩國的關係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爲中國的民族精神在這種血的洗禮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長強大的；也許只有在這種血的洗禮之下我們的民族才會真正猛烈的變成日本的永久的敵人！

這都是常識與歷史都能保証我們的事實。這都是日本的人民與政府不可不覺悟的事實。

是的，「這不是沒有法子就可以丟開的問題」！

是的，「法子也不是沒有。要之，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國就行」！

日本的真愛國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這個時候，真應該醒醒了！

蕭伯納先生（George Bernard Shaw）在二月二十四

日對我說：「日本人決不能征服中國的。除非日本人能準備一個警察對付每一個中國人，他們決不能征服中國的。」

（這句話，他前幾天在東京也一字不改的對日本的新聞

我那天對他說：「是的，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

。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那就是懸崖勒馬，澈底的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句話不是有意學蕭伯納先生的腔調，這是我平生屢次很誠懇的對日本朋友的忠告。這是我在這個好像最不適宜的時候重新提出忠告日本國民的話。

日本是最能學德國的，我希望這個德國好徒弟不會忘了德意志帝國創造時代的兩件富於歷史教訓的故事。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二，普魯士對奧國宣戰。在三個星期之內，奧國的軍隊大敗不能復振了。普魯士全勝之後，俾士麥主張立即停戰議和，終於接受了一個「不割地不賠款」的和議。俾士麥的政策留下了奧國作普魯士的友邦與將來的聯盟。過了四年，普魯士同法國開戰，七個星期之內，法國大敗了，法帝被俘了，巴黎被圍了。這回戰事的結果，法國賠款五十萬萬佛郎，並且割地兩省。然而這回的大勝利種下了法德兩國四十八年的不解冤仇，種下了一九一四年的大戰，種下了德國最近十五年的空前的挫辱與苦痛。這兩個不同的故事的教訓是值得日本全國人想想的。

日本軍閥在中國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難

消除的了。但這一個仇恨最烈最深的時候，也許正是心理轉變最容易的時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這一點覺悟與不覺悟的關頭上。

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已大胆的宣言了：「日本人停止不

侵略中國就行。」

我們也可以回答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只有日本人澈底懺悔侵略中國，是征服中國的唯一的方法。」

二十二，三，十二夜。

介紹一篇日本人的談話

爾和

昨天接到東京寄來本月出版的同仁雜誌，內有一篇談話，是問答體，題目叫做「K L問答」，署名「無平學人」，當然是筆名。我讀完之後，隨手把他譯成國語，借「獨立評論」的餘白，披露一下。

這篇談話的內容，很有一針見血的地方，就是：「解決中日問題，不是沒有方法，只要日本人停止侵畧中國就得啦」。他們又說：「日本向來開口就講滿洲是日本生命線，我以為這個念頭非改換不可。」又說：「日本人要有歸化中國的決心，……即使自己本身不能歸化，應該拿這種意思去教養自己的子孫，一定能與中國人同化。」都足以表現一部分日本人的情感。

瘋狂的日本軍閥，憑藉他的蠻力，一手遮天，那裏還許人民開口？但是這篇問答中，對於軍閥的摧殘資本主義

，公然表示不滿。自從事變以來，日本的幣原外交，早已被軍閥走狗罵得體無完膚，這篇談話中，竟公然稱許幣原外交，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我記得東京帝大橫田教授曾經發表過正論，也不知受了多少壓迫；新渡戶博士批評了軍閥幾句話，在鄉軍人非逼迫他謝罪不可，最近尾崎行雄氏在「改造」雜誌上發表「以代墓碑」的文章，他在二月二十一從倫敦回到神戶時，日本浪人不許他登岸，這位七十多歲的老頭子，也很強硬，終於攙着他的小孫子，走上跳板。應當時就有兩個渾人，跑上來要動手，幾乎沒把老命送掉。現在這位「無平學人」敢於說他們所不敢說的話，居然在東京出版的刊物上登載，可見日本真正民意，已漸漸擡頭，軍閥的末路，恐怕也就不遠了吧！

○ ○ ○ ○ ○

K L 問答 (三月號同仁)

K 中日問題到底怎樣才好？

L 目下沒有法子。

K 這不是說沒有法子就可以丟開的問題，到底有方法沒有？

L 也不是沒有，要之，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國就行。

K 日本人並非故意幹傷害華人感情的事件，但此外沒有方法，便怎樣呢。結局是因為日本人過多的關係，所以制限生育，現已成爲大問題，但是現在八千萬人彷彿在餓死線上，非想法處分不可。

L 這也是因各人的觀察而不同。日本向來開口就說滿洲是日本生命線，我以為這個念頭非改換不可。我對於日本的現狀，有兩種疑問，其中之一，就是財富不均。

K 這是資本主義的流弊，現已成爲問題。滿洲軍在大嚷特嚷的，就是這句話，日本的資本家，一概不許他們接近滿洲。最近在日本軍需工業，大爲活動，但完全交給民間小工場，決不交給一切資本家。這種趨勢將來或可使日本產業界覺醒。但從別一方面看來，使得日本能有今天的國勢，也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的餘澤，這是世界

大勢，不能單責日本，又中俄兩國，雖然形式不同，多少採用會有這種傾向的政策，也不能否認的。

L 這種事情，我不清楚，拿現狀來比較，日本人一般的生活狀態，已經比中國人高上數等，這是事實，還要說這樣那樣，在我們看來，不過是奢侈。

K 不錯，這也是比較問題，在別一方面，擁有過剩的富力和土地，但是一切東洋人都不許靠邊的地方很不少，由此看來，日本人的要求，也不能說是無理吧。

L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東洋人更覺得必須一致團結。這就是我的第二個疑問，日本人的愛國心，過於強烈，換句話說，就是因此失之褊狹。到中國去的日本人，小有積蓄，就想回國，這種根性如不拔去，永不能得中國人的好感。倘使真爲中國，就是爲自己所住的土地而工作，一定誰都歡迎。日本人在實際上如果覺得困難，進一步歸化了中國人民，怎麼樣？假使沒有這種決心，光說困難，那是廢話。

K 論道理確也站得住，但是實際上，我們歸化中國，與中國人競爭，能否得到生活？

L 這不是大問題，就看決心如何。有專門學識的，不必說，就是沒有，在能力上，我也想決不下於中國人。果

然在事實上確係爲中國出力，即使自己不能歸化，拿這種意思去教養小孩子，我想小孩子或者是孫子，一定能與中國人同化。如其沒有這種覺悟而講國策，大概是辦不成的吧。

K 你的話確有道理，我很了解中國，但因爲國民性的緣故，還沒有想到這一點。歸根說：日本及日本人特性的研究，恐怕比研究中國還欠充分。像你這種不客氣的話，直到如今，還沒有人和我說過，當然應該披瀝胸襟，互相研究，我希望你此後多與人講這種道理。

L 我自己就抱着這個主義在工作，中國人和我可謂毫無歧視。但是我所說的話，日本人到底不能了解，我要是強硬主張，他就說你是排日，終究無從說起，滿洲問題，也是這一套，所以沒法開談。我不很懂政治外交，但

我覺得所謂幣原外交，於這一點非常澈底。

K 幣原外交，我在主義上，也很贊成，但他光是不干涉，不能積極講親善之道，在日本立場上，終久不行。在中國不限定日本，無論何國都行，不過以日本論，與中國保持親善關係，真是絕對的必要。

L 我也這樣想，雖然中國高唱排日，但是日本對華貿易，年年發達，雖不能說絕對數，但是他那發展的比例，歐美各國到底不能與日本並論。爲什麼要用這種鹵莽滅裂的方法？你說中國不限於日本，無論何國都行，我不是這樣想。總之日本與中國有不可分的關係這是事實。

K 聽你的話，我們大爲滿意，我很望此後努力，使同樣理解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才好。

技術統治 Technocracy

張 銳

「我們根據十幾年來事實的研究，早就斷定一九三

四〇年還要有一個更大的不景氣，到那時美國的經

濟組織勢將瀕於破產。

濟組織勢將瀕於破產。

○美國經濟方面一定有個大難關。這個推測與事實只差了六個月。我們現在更豫測這難關雖能安然渡過，如生產方法和經濟制度沒有澈底的更變，一九

「如能依我們的法子來改良生產方法和變更經濟制

度，二十五歲以下的美國人可以免費入任何學校，四十五歲以上的美國人可以怡然自得的養老。只要二十五歲以上四十五以下的美國人每星期作兩天工，全美人民都可享年入萬金的福。

萬哩。

「以上的種種新發明，不能早日見諸實施，都是因為現存的生產方法經濟制度不良之故。要創造一個新的有福共享的社會，我們主張技術統治！」

「拿日常用品來講，我們可以製造學生不用更換的剃刀片。價錢只比現在通行的刀片貴百分之二十。我們這種刀片製造出來，現在的剃刀大王馬上要塌台，剃刀廠都得關門。如其我們將 Rannie 這種含有纖維性的植物介紹到市場，所有絲，棉，毛織，呢絨等工業都得受極大的打擊。Rannie 絲長二十吋，每一英畝可種一千五百磅，在氣候好的地方，每年可種三次。棉花每英畝只能種一百五十磅。用來做衣服 Rannie 比毛織品可以經穿七倍的時間。用來製紙，比木屑價要便宜，製成的紙人手不能撕破。照他們的法子，皮鞋的壽命可以達到二年半。用美國現存的製鞋工廠做十個月的工可以供給全美十年之用。我們可以造一種汽車，走三十萬以至三十五萬哩用不着花半分錢的修理費，價錢比現在的汽車貴百分之五十。現在汽車的平均壽命不到十

上面這些話是技術統治家 Technocrats 標榜技術統治的說話。在現在銀行放假，證券跌價，闊人鬧窮，窮人失業的美國，這些話當然要特別引人注意。技術同盟 Technical Alliance 雖然不是政治的集團，也並不鼓吹直接行動，但他們的學說如真能見諸實行，華爾街的資產家將無噍類，有錢的人聽了不免害怕。所以，技術統治這名辭公開不久，便已喧傳全美。近幾月來的美國雜誌報章討論這問題的很多，例如 New Outlook, Herald Tribune 都有很詳的記載，甚至 Vanity Fair 上也有文論及。這實在是很有趣的一種學說，值得在此介紹一下。

技術同盟的中心人物是斯考提氏 Howard Scott 年紀不過四十二歲。他並不是具有博士名位的學者，但他對於一般科學和工業上的知識是一般技術統治家所公認為淵博的。技術統治理論上的始祖是已故經濟學家魏不倫氏 H.P.

orstein Veblen，魏氏在一九一九年著「工程師與價值制度」一書，攻擊資本家代表管理的工業，贊成工程師應為工業的主幹。一九二〇年時，斯考提，魏不倫，和斯坦因美茲 Charles P. Steinmetz（美國的理論上的共產主義者）會同幾位在歐戰期間對於各項工業管理有切實經驗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開始組織這個技術同盟。技術同盟的用意在研究各項工業生產的方法，謀股東利益的生產方法和謀社會全體利益的生產方法。魏不倫氏認為資產制度下的工業生產並不依照生產能力或羣衆需要而定，完全以獲利的多寡來決定出產的質量，所以有很多不必需的浪費。技術同盟既是一個研究事實的組織，這些技術統治家從一九二〇年起就用全副的精力研究美國三千種主要工業的生產事實。這個研究到現在還未完全畢事。據說不久有幾百種驚人的圖表將要公諸於世。技術同盟的基本會員不過百人，同情的人却很多。會員中有哥倫比亞大學工業工程學教授 Walter Rautenstauch 有加省理工大學教授 Richard C. Tolman 有著名電氣工程師 Bassett Jones 愛因斯坦據說也是贊助者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布特勒氏曾給同盟種種幫忙。現在同盟的大本營就在哥校工業工程部裏面。同盟的研究經費完全由會員擔任。

技術統治家認為人類的社會和物質上的享受完全是用人力或機器的力量創造出來的。這種原動力可以測量得出。通常的人以價錢來分別各種貨物，技術統治家却以原動力的數量來區別各種貨物。所有通常工商業的競爭，工作上的重複，天然物產的濫用，技術統治家都認為是不必需的浪費。在技術統治之下，這些浪費定可免除。浪費去掉，人羣的享受自會增加。

汽機發明之先，有七千年的光景，人類差不多都靠人來做原動力。最近百年來，因利用汽機電機的結果，人類的原動力，單拿美國來講，據技術統治家的估計，增加了九百多萬倍。其中八，七六六，〇〇〇倍都是一千九百年後增加的。燒磚的工人以前每人每天只能出四百五十塊，現在最新式的磚廠每個工人每天能製磚四十萬。磨麥子的工人以前每天每人只能出一袋半麵粉，現在最新的麵粉廠每天每人能出三萬袋麵粉。美國各發電廠雇工二十四萬人，可得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的力量。機器效能日增，人工需要日少，於是失業問題就發生了。現在全美失業人數將近一千四百萬人，照這樣下去，再過幾年，將要達到二千五百萬之數。同時美國人的平均負債額亦隨機器發達而俱增。現在美國人的平均負債額要比一九一五年

多十六倍。負債額的增加以前是數學律的，現在是幾何律的增加。全美工業的負債現在是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這些債額每年固定的負擔如還本付息等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這些負擔完全要靠售賣貨物來維持，而負擔增加速率比貨物製造的速率還要大。這樣繼續下去，美國的天然富源行將羅掘殆盡。自一九〇〇年來，全美開發的鐵礦比全世界有史以來所掘發的還要多。

根據這些事實的統計，技術統治家有下列的推斷：（一）在十八個月內美國經濟界將飽嘗風險，這次風險雖能安然渡過，但一九四〇年的大難關決難渡過。（二）到那時銀行工廠大破產，資產制度支持不住。技術統治家雖不願爭取政權，也會有人請他們出來救此蒼生。（三）技術統治實現之後，所有全美的債務完全作廢，前賬一筆勾銷，價格制度不復存在。所有各工廠概由技術家統治，於是人無失業之憂，貨無過多過少之弊。人人安居樂業，共享昇平。

現存的價格制度，技術統治家認為最不公平。在價格制度之下，物以稀為貴。實則貨物價格不應以金銀計而應以原動為計算。現在美國的情形是人受困於機器，實則機

器如管理得當，只有增加全民的享受。在美國，如用適當的機器，四千人便可供給全美的食料。鋼鐵工廠的工人，只需半數便已足用。舊機管理得當，新機不斷發明，生產有通盤的計劃，配置適當，人人工作的時間都可縮短，享樂的機會自可增多，而國無不足之虞。在技術統治之下，金錢完全無用。二十五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人每人每星期只要做十六小時的工作。工資不是金錢，而是政府發給的「原動力執照」。衣食住行以及娛樂等等都靠「原動力執照」購買。最初每人所得工資完全一律，將來慢慢的依職務繁簡和勞動程度再劃分出不同的工資以鼓勵上進之心。全國所發行的原動力執照與全國出產貨物所需的原動力是一樣的。所以製成的貨品決無銷不出去的危險。每個工人的享受，據技術統治家的估計，至少可以達到目前年入萬金的美國人的生活標準。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都可免費入各級學校。大學畢業後，依其性之所近及其所習的專門技術而分配於各種職業。四十五歲以後，便可依照最後一年所得工資的數目原俸退休，打球弔魚，山林隱居，隨你尊便。在海陸空軍服務的人更有特別優待，每過兩年，便有四年例假。全國人民工作時間少，娛樂時間多，所以政府竭力提倡各種公共娛樂事業，音樂美術，大有文藝再興

之勢。

以上所說，都是技術統治家「一廂情願」的話，現在固然不能十分作準。並且美國還有很多其他有權威的專家對於技術統治家提出的統計和豫測加以嚴厲的反駁。例如技術統治家聲稱在最新式的磚廠中，每人每日能造磚四十萬，有一位磚廠工程師只說每人每日至多不過造磚二千塊。至於華爾街的銀行老板和其他資產同志對於技術統治運動的懷疑與攻擊，那更不在話下。總之，技術統治運動

權利是什麼？

胡道維

刻下尙未成熟，所研究的事實和所繪製的圖表亦未完全發表，是好是壞，是對是錯，現在很難遽下斷語。無論如何，總不失爲極有意義的一種研究。如其技術統治家所研究的果然不錯，所標榜的真能實行，那共產主義見了技術統治也不免小巫見大巫了。在農村破產，工業落後，政治混亂，大部分的原動力仍舊是人力的中國看見人家這種運動，除了倒抽兩口涼氣之外，更無別的可說。

從前梁任公先生有鑒於中國人缺乏權利的思想，曾大聲疾呼的教我們都學「拔」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的楊朱；因爲他覺得「愛我」的哲學，便是權利思想的起點。梁先生的話雖是一時出於憤慨，但是中國人對於權利缺乏認識確是不可諱言却可惋惜的事實。近來蔡子民先生等發起民權保障的運動，胡適之先生在「獨立週刊」第三十八號內發表了一篇文章，站在中國哲學與習慣的立場上，來解釋中國人的權利觀念或權利觀念的缺乏，且指示了今後民權運動所應採取的幾條途徑。論到權利觀念，當然要推西

方爲先進；我們既希望我們國內一般人民對於己身權利能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介紹先進民族的權利思想，我認爲是一種必要的工作。西方人的權利觀念，可以劃分爲三個系統：（一）英國人的權利觀念，（二）美國人的權利觀念，（三）歐洲人的權利觀念。我現在就把這三種權利觀念，分別敘述於後，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英國人的權利觀念

據政治學家的公斷，英國人的權利觀念最深刻且發達亦最早。他們首先有了一種特殊的經濟與社會的環境；這種環境產生了若干不同的政治因素；這些因素不斷的互相衝突，彼此影響，經過長久時間，又纔產生了近世英國人的政治思想與權利觀念。

我們研究他們的權利觀念（其實無論研究他們任何政治制度），必須要知道英國人是世上最務實最不注重理想的一種民族。他們不管他們的政治原則是什麼，也不管他們的國體是什麼；他們所寢饋不忘的，所努力以求保存的，就是他們的權利——他們所謂「英國人的權利。」

這些權利究竟是什麼呢？有什麼方法可以保障牠們呢？對於這些問題，英國人的態度始終是實事求是的，始終是不作哲學家的玄想的。他們就根本不曾制定什麼權利的系統，不會在任何法律或法典中列舉過他們的權利。英國人的權利，大半都是首先被人加以蹂躪，然後人民纔發見有尋求保障的必要；首先有了保障，然後權利纔變為固定的，普通人也纔知道他們有這種權利。差不多任何英國人的權利，都是經過了長時期的保障運動且等待這種運動已獲有相當成功之後而始成立的。

因為這種原故，所以英國人的權利大都不是些實質的

東西，而是些特殊的審判方法或法庭程序。英國人常稱陪審制是他們的一種基本權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証。他們所以為這些司法手續力求保障的原故，當然是因為他們的經驗會明白的證明這種程序足以給他們達到他們所希望的目的。這種目的，就是要擺脫一切政治權威的武斷專制的行爲。換句話說，英國人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法治制度，就是要用一種有普遍施行效力的原則為政府舉措的根據，而排棄一切以個人武斷意志為從違的政治行爲。

因此，英國人從來不說他們有什麼自然權利；從來不說徒徒因為他們是人類，所以他們便應該享有某種權利。他們祇說按國家法律的規定他們享有某種權利，祇說非依法律這些權利是不應該被人剝削的。他們總覺得他們有方法可以使國家法律承認他們所有的權利。英國人民無時不欲擴充選舉的權利，也就是這個原故；有了選舉權利，就有了支配立法的權利，有了支配立法的權利，就有了規定權利保障權利的權利；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要考察英國人的權利是什麼，祇有國會的立法與法庭的判例可供我們的參攷。這種法律之中最早且最重要的一種，就是一二一五年國王約翰所頒佈的「大憲章」。這裏面最重要的條款，也不過是一種程序或方法的規定，對

於積極的實質的權利却并沒給以載明。最關重要的第三十九條，就是規定：「非經同等人的合法裁判，非依國家的法律，任何自由人民均不得被逮捕或禁錮，或被置於法外，或被放逐，或經用他種方法而遭毀滅，其財產亦不得被剝奪，國王亦不得對他有所判決或傳遞。」本條顯然不會承認自由人民的任何實質權利；牠并不會說自由人民有不被逮捕或禁錮，或被置於法外，或被放逐，或經用他種方法而遭毀滅」的權利。本條所云不過就是規定：非經過一定的手續，換句話說，非依法律，一個自由的人民即不能遭受某種的待遇。所以「大憲章」的着眼處，仍然在於法治。

英國關於人民權利的法律和判詞極多，我們當然不遑一一枚舉。但是有一種與我們中國人民權利演進的現階段上有密切的關係，不能不提出來加以討論：這就是在查爾斯二世的時代——十七世紀的後半季——成立的「所謂人身保護法案。」這個法案的內容，規定如何頒行「保護人身令」，所以稱爲「保護人身法案」。所謂保護人身令就是一種法院的令狀。今有人或以非法而拘禁另一人，法院乃向第一人發此令狀，令其將被拘禁者的身體提交法院，以備法院加以審訊而決定其被拘事之是否合法。

英國法院應用保護人身令狀的事實，遠在通過「人身保護法案」以前。但是，因爲十七世紀革命前的法院，都是處於國王支配的鐵蹄之下；法院的法官們業已創了一種原則，就是說：當一人經保護人身令狀提到法院來的時候，如果原來拘禁他的人能提供國王逮捕與拘禁他的諷旨的話，法院不能考察此人被拘禁的合法與否的問題，却仍應將此人送回監獄繼續拘禁。在「人身保護法案」被通過以前，國王曾以武斷的命令提拿了很多的無辜良民，并不給予審訊而將他們拘押起來。按當時法律規定，這般人非經合法手續的審訊——陪審制的審訊——不能被判爲有罪。但是這般人有什麼法子可以得着審訊呢？審判以前的拘押，實際上等於監禁。一個人因爲被人控告或被國王命令捕拘，既未經審訊，又未經判決——或則經過合法的審訊以後，根本就不會被判爲有罪。現在就似這般馬馬虎虎的受實際的監禁，豈不冤枉嗎？

所以這「人身保護法案」的用意，可以分爲三種：第一，使各法院得以用人身保護令而考察一種捕拘命令的是否合法，無論此項捕拘命令係出於國王抑係出於他人；并且如果法院發見此項命令爲非法的話，使法院得以開釋被捕的人。第二，使被捕的人有立即獲得審判的機會。第三，

詳細規定發給與答復人身保護令狀的手續，藉以保證本法案的根本用意得以形諸事實。

所以按此種法案的規定，被拘人或其代理人均得向法院請求發給此項令狀；被請求的法官必須頒給此項令狀；如該法官疎忽或拒絕發給令狀，他便要被判以罰金，並且任何人均得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索取此種罰金；接收令狀的人必須於限定期內將被拘人的身體提交法院，否則須以誓言作答復，呈稱該被拘人於彼接到令狀時——不是於彼作答復時——實屬不在彼拘禁之下。這個法案的規定可謂極週密詳盡之能事，其目的也不外力求免除不經審判的武斷拘禁罷了。

我們對於這件法案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牠并不曾說英國人民有不被拘禁的權利，只是說拘禁須在相當條件之下舉行而已。牠不會對任何權利作籠統的承認，牠的規定仍然只是關於一些詳細的工具方法某種與司法補救策略而已。英國人認為政府應予保障的個人權利，內容就祇包括有這些工具方法與策略。

英國人在十八世紀終局以先，便已達到了這種權利觀念；至今他們還是克勤克儉勿怠勿荒的極力保存這種祖緒。亞謀斯謝爾頓（Sheldon Amos）在評議英國憲法一書

中，對於英人的權利思想，有一段極扼要的概括的敘述。我且把牠譯錄在下面：

「所謂臣民的自由權利，當然不是說任何國民有任意行事的權利，或是不受法律節制的權利。牠的意義不過是說：法律的制定和執行的方法（如果在憲法原則範圍以內行動的話）不應侵蝕任何個人的自由權利；即令有犧牲個人權利的必要，亦應以企增進全國人民最大可能的自由與幸福時所絕對必需的個人犧牲為限制。……

「臣民自由權利的主要保障，與下列諸項的一項總有關係：（一）立法的方法；（二）法院執行法律的方法，就是審判被告人的方法；（三）非法拘禁的一般的禁止；與（四）警察職權的規定與限制，特別是關於嫌疑犯的初步審訊的職權一方面。

「第一類的保障，完全在下議院——國會之代表人民的一部分——的存在與組織方式。……

「第二類的保障，包括有處理比較重要刑事案時須用陪審制的規定。……陪審員享有的各種保障，例如他們關於他們的判決不負民事或刑事上的責任等——亦同屬於這一類。……高等法院法官的獨立，也是這一類的保障。……

「第三類保障，概係制止非法拘禁或幽囚一類的規定

。按此類保障，人民遇有自由權利受官廳束縛時，得請求法院對其受拘理由予以審察（請求發給人身保護令狀，即其一例）；受拘人如係被人控告，得請求迅予審訊；得請求法院對於拘禁地點加以限制；如係非法被拘，并得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損失賠償。「不應強索過分的保釋金」一類的普通原則，也是大家公認為屬於這一種的保障；不過牠的價值比較的輕微罷了。

「第四類保障，係關於警察職權的規定與限制，特別是關於給予嫌疑犯以司法形式的初審這一方面的職權。：「拘票」的用意，就是要在審判程序最初階段上取得一種法官的負責的許可與合作。：：「英國人以住宅為衛城」，這句話已成爲很普通的格言了；但是牠的意思也不過是說：警察人員若非爲貫徹幾種法律明定的宗旨或爲達到重要公共的目的起見，不得擅自闖進任何英國人民的私宅或住房」。

英國人的權利觀念，至十八世紀末年便已完全成熟；現在的英國人還是秉承十八世紀的遺緒，這是我在上面已經說明過的。他們在當時的觀念，絕不是一種實質的自然

的權利觀念。他們并不曾僭妄的說：他們有什麼在任何環境之下并用任何方式都不可以剝奪的權利。他們的基本意思不過是說：按他們國家法律的規定，他們的生命，他們在法律以內的行動自由，以及他們業經被法律承認的財產所有權，除非經過法律所規定的手續，一概是不能任人加以損害或侵佔的。

個人權利的總數，便是所謂公民自由。英國人公民自由的觀念，著重在司法的程序與方法；祇有按照這種程序與方法，他們纔能容許別人剝削他們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他們沒有純理想的積極權利的思想，却祇在實際方面講求救濟的方略；他們不喜作關於人權的空洞哲學式的討論，却祇努力對於立法司法的詳細程序作切實的研究。

從政治學說一方面看，他們是否已獲得他們所應有的一切權利：這是他們漠不關心的問題。他們認爲理想的哲學的問題，殊不值識「寔」務者的一顧。數百年來，英國人在保障民權運動一方面所收的效力，比任何其他國家也要強，恐怕也就是這個原故呢。

漫遊散記 (十六)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人士著人種

苦竹的土司太太祿方氏

我于六月十四日回到會理縣城。預備東行過金沙江去看東川的銅鑛，就請縣裏派人鄉導。蕭縣長對我說過，「你要走的這條路現在很不太平。聽說大路要經過魯南山。」

山附近都是獾獠。近來常常出來搶人。我到任沒有兩個月，已經出了十多起搶案，並且殺傷了好幾個人。這還是報到縣署裡來的。沒有報的更無從查攷了。我要派人保護，多了我派不出；少了不但不中用，反因為有槍，做了獾獠的目標。我勸你還是繞回雲南再到東川去罷。」繞回雲南！說起來很容易，一繞就要二十幾天。不但路遠了一半，而且要走回頭路，極不經濟。我又知道魯南山是大涼山的南尾，地質上一定極有趣味，極不願意放棄了。

我初起疑心這位縣長圖省事，不肯派人送我。以後遇見地方的一位馬團總，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說，「蕭縣長的話完全是真的。不要說他沒有兵可派。就是有兵，也派不得的。你要不信，只要向郵政局打聽就知道了。因為

這原來是東川通會理的郵道。近幾年來因為不太平，郵政局久已不敢寄包裹，只是信件還是可通。這幾個月來連空身的郵差都不敢走了。聽說最後一次，郵差的衣服都被獾獠剝光了。你千萬不可冒險。」

我聽了這一番話只好發悶。恰巧一位內地會的牧師來拜我。他是愛爾蘭人，在會理好多年，地方情形很熟悉。談起我的路程問題來，他告訴我道，「蕭縣長馬團總的話都是真的。但是我給你出一個主意。從城裏到魯南山要經過姜州和昌意壩。這兩個地方中間有一個苦竹土司。雖大路不過一里多路。目前的土司是一位婦人。人極其能幹。家裏有幾百桿槍。涼山的獾獠沒有不怕她的。你何妨順路去見她，請他派兩個獾獠送你過山。只要她肯負責任，你一定可以安全通過」。

于是我與蕭縣長說好了，請他派兩個穿號褂子的徒手差役給我做鄉導，先到苦竹土司衙門。如果土司太太不肯保護，再想法子繞回雲南。

我于六月十六日從會理出發。縣裏派的鄉導，倒也一

早就來了。但是一個是十六歲的後生，一個是六十歲的老漢！我很生氣，要到縣裏去請他另派兩個精壯點的差役。那一個老差人對我說道，委員，請你將就點罷。昨天縣長本來說是派兩個精壯點的。但是全衙門百十個差人，沒有一個肯去，大家都怕吃獾猓的虧。最後纔推到我兩個身上。我是個苦人，甚麼都不怕了。他是新進衙門當差夥的，沒法推却。委員要請縣裏另外派人，今天一定走不成了，因為他們寧可挨打板子，也不肯去的，況且我年紀雖是大點，路却是很熟；土司衙門我也去過，倒不會誤委員的事。」我聽他說得有理，只好罷了。

從會理縣城到苦竹不過五十公里（九十華里）。雖然是山路，兩天可以趕到，我因為要沿途測量，分作三天走。第一天十四公里宿彈冠驛（又作淡罐驛），是一個三十多戶的野店。第二天二十三公里宿姜州，是明朝洪武初年所設的七州之一——會理在明初是會川府，領七州一縣。我住在貴州會館，是一個極其高大的建築。大殿上中間供的是南霽雲，右邊是黑神，左邊是觀音。南霽雲的侍從，却穿着馬褂，掛着辮子！會館是道光七年建的。當時貴州人一定很多。經過咸豐年間的回亂，地方極其殘破，到如今只賸有兩家貴州人了。

我每天的習慣：一天亮起來就吃早飯；吃完了就先帶着一個鄉導，一個揹夫，獨自一個上路。鋪蓋，帳棚，書籍，標本用八個牲口駝着，慢慢在後面走來。到中午的時候趕上了我，再決定晚間住宿的地方，趕上前去，預備一切。等到天將晚了，我纔走到，屋子或是帳棚已經收拾好了，箱子打開了，床鋪鋪好了，飯也燒熟了。我一到就吃晚飯，一點時間都不白費。那一天從姜州起身我打聽明白：姜州到苦竹十三公里，苦竹到昌意壩五公里半，昌意壩到波羅塘四公里半。一過了波羅塘，就上魯南山，一直要走二十八公里半（約五十七里）到山東北坡的岔河，纔有地方可以投宿。波羅塘岔河之間，只有距波羅塘十公里，在魯南山的半坡上有一個村子叫做李子樹，但是這是獾猓的巢穴，每次搶人殺人都是這村子人幹的，萬不可住。於是決定第一天走二十三公里，宿波羅塘，第二天走二十八公里半，宿岔河。我自己半路上到苦竹土司衙門去請土司太太派人保護，當天趕到波羅塘過夜。預備好了我一個人先走。沿路加緊的工作，不到十二點，已經到了離苦竹二里多路的腰店子。駝行李的牲口也從後面趕到。大家吃了午飯，駝馬由大路一直向昌意壩。我帶着一個老差人，一個揹夫，繞道向苦竹走去。

我在腰店子吃飯，向飯店裏的人打聽這位土司太太的爲人，方知道土司姓祿，她娘家姓方，原是成都的漢人，幾歲的時候就被祿土司買來，以後做了土司的姨太太。祿土司死了，留下了一妻一妾。妻姓自氏，住在苦竹，妾方氏，住在披沙，相距有一百五六十里路。本年陰曆二月十四日（距我到那裏的三個月以前），自氏太太被手下殺死了。方姨太太得了凶信，從披沙騎着馬，帶了一百多人，一夜半天工夫趕到苦竹，出其不意，圍住衙門，把凶手拿住當場槍斃了。據店裏人說，自氏太太太老實，不能管束下人。這位方姨太太人極其能幹，但是到這裏不久，又經過亂後，所以秩序還沒有恢復。

我從腰店子走，二十分鐘就到了苦竹。村子四圍有土築的城牆，牆上站着有拿槍的士兵。但是我並沒有受任何的盤詰就一直走到衙門前面。老差人指着對我說道，「委員，你看這座衙門，多們闊綽。房子都砌在山上；從大門到後門，一共九進，一進比一進高。聽說是仿照九重金闕殿砌的！」我抬頭一看，果然是一個絕大的衙門，比會理縣署雄壯得多。于是找着號房，拿了我的官銜名片，和雲南都督府給我的護照，一齊拿了進去。不一刻他跑了出

來，說聲，「請！」一面把正門一齊開了，從大門，走上大堂，二堂，穿過中門，到了第四重的廳上，看見一位二十多歲的婦人，前後十幾個差役簇擁着，迎將出來。見了面作一個揖道：「委員從京城裏來，很不容易！恕我不知，沒有出城迎接。」一面讓我到客廳東房坐下。我再細看她：頭上戴着青色的「錫帽」，身上着一件青布的大袖長襖，下邊束着百摺裙子，身材在五尺一寸左右，一雙天足，鵝蛋式的臉，雪白皮膚，眉毛雖不很細，却是灣長，眼睛雖不很大，却是橢圓；鼻梁雖不很高，却是端正；嘴雖不很小，嘴唇却是很薄很紅，加上一口很整齊的白牙，不擦粉，不擦胭脂，是我生平所見東方人中少有的美人。她一面拿我的護照看着，一面說道，「委員原來是要到東川看銅礦去的。從此地到東川，要經過魯南山。我們夷家的孩子們不知道委員是甚麼人，也許要得罪委員呢！」「我正是因爲如此，所以纔來見太太，請你幫忙。」她笑着說道，「不要緊的。我派幾個人送送；就沒有事了。」她又看了我幾眼，再向外邊一望道，「委員走這們遠的路，怎麼只帶着兩個空身人，難道沒有行李嗎？」「我的行李上前先走了。我今天要住波羅塘。請太太立刻派兩個人和我同走罷。」她答我道：「那有這樣的道理。委員是貴

客，好容易到我們這裏來。我無論如何，也要請委員住一天。我還有許多話要告訴委員呢。」她也不等我回答，就喊着道，「派人向前去把丁大人的行李追回來！」我眼看見走不成了，就拿我的片子，寫了幾句，叫他們把隨身要用的東西拿幾件來，其餘的行李留在波羅塘等我。

她于是告訴我道，「這幾年來，我們吃盡苦頭了。委員從京城裏來，我正好訴我們的冤枉。會理原來有六大土司：普隆土司姓沙，黎溪土司姓自，其餘的苦竹，披沙，者保，通安四處，南到金沙江，雲南祿勸縣界，北到西昌縣阿都界，東到窪烏，雲南東川巧家界，西到姜州，南北六百多里，東西三百多里，夷家一萬多戶，都是我們祿家的地方。這四個土司衙門原來是四房分管的。光緒年間，三房都絕了後，一齊歸併到我們通安這一家來。先夫祿少吾在的時候，收租要收一萬多石糧食。委員只要打聽，他是極其奉公守法的土官。光緒末年，大涼山夷家造反，先夫奉調去打了三年的仗，先後折去一千多兵，墊了三十萬兩銀子的餉，因功陞為副將。不幸在涼山受了潮濕，得病回來，于光緒三十一年死了。只留下我們兩個寡婦，一個一歲的女兒。照我們土司家的規矩，女兒也不是不可以襲職的。後來因為有貴州威甯稻田壩的遠房本家出來爭了承繼

，我們纔早報會理州，請州官替我們做主。州裏批了下來，叫我們母女三個，帶了土司的印，到城裏去襲職。那知到了城裏，州官就把我們送到甯遠府監裏！那時候甯遠府是陳廷緒，會理州是王香余。他們兩個迎合趙帥的意思，把四個土司一齊改土歸流。同時派了曹永錫帶兵來佔據我們的地方。這些兵一到，把我們的衙門裏所有的東西一齊搶的精光，並且還要虐待夷民，強奸夷女。于是披沙衙門的土兵為首抵抗，把官兵打退了，還奪下了五十多桿快槍。一直等到宣統三年革命，會理地方上的紳士出來講和，把者保，通安兩處歸流，只留披沙，若竹兩處給我和自氏太太分住。只纔把我們放了回來！

最可恨的是會理知州王香余。他三番兩次逼我改嫁。委員，請你等一等，我拿一件東西給你看。」她說着就走進裏面去。不一刻拿了一封信出來交給我。信是三張八行書。頭上說改土歸流是已決定的政策，不能變更。接着說她狠年輕，很可憐，不能沒有歸宿。現在有一個馬燦奎參將，「雖已有妻室，而兩房兼祧，禮可再娶……行將由本州為媒，甯府主婚，不勝于為土司之妻萬萬哉！」下面簽名「王香余」。方太太又說道，「我雖是成都的漢人，但是從小就到夷地，和夷家相處的極好。又豈肯改嫁？改嫁又

豈是地方長官所能逼勸的？何況他們害得我們破家蕩產，又是我們的仇人呢？王知州也知道自己不對，後來幾次向我要回這封信。可是我始終不肯給他，要留着做個証據！」

我安慰她道，「這都是前清的事，與民國無干。現在五族共和，一律平等，決不致再有這種不幸的情事發生。還有一件我不甚明白。你不是說會理州紳士講和的條件是把通安，者保兩處改土歸流嗎？何以我上月到通安，土司衙門仍舊存在？難道你們放回來了，就不肯實行這項條件？那麼，不是你失信了麼？」她答我道，「委員，你到過我們夷家地方的，應該知道土司衙門的情形。每個衙門養活着一百多戶到二百戶人。每年要多少糧食？講和的時候我們以為家裏存着有幾萬石糧食。靠通安，者保兩個衙門的人家可以安插的，不妨答應把這兩個地方改土歸流。回到家來纔知道家裏的糧食早已搶光了。豈但糧食？委員，你看我們這樣大的房子，裏面家具都沒有幾件，就知道我們受了多大的害了。如果立刻把通安，者保兩個土司衙門撤了，手下人沒有法安插，一定要出事的。所以我沒有法子，只好叫小女孩子向會理縣長磕頭求情，暫時把這兩個衙門留着，等到我們休養幾年，恢復了元氣，再實行撤消

不遲」。

我問她自氏太太死的情形。她說是因為小女孩子的奶媽妄想扶助幼主來篡位，勾通了幾個下人下這毒手。

說了大半天話，她纔站起來，進裏面去。最後又說道，「家裏甚麼都不方便，簡慢的很。自己不便出來陪客，又沒有傍人可以和委員同坐。晚上用飯只好請委員一個人獨吃。請委員原諒」。

等她進去了我纔想起要給她照相。叫她下人傳話進去。她慨然應允了，就傳令排隊伍一齊照在相裏面。等了一刻，她忽然差人出來說，「太太想自氏太太死了纔三個月，現在服中，照相恐怕不方便，請委員原諒。」

天沒有黑，晚飯已經開了出來，原來是一棹「全羊席」。放得滿滿一棹子的羊肉，羊肝，羊肚，羊肺，羊腦等等。我一個人吃了幾口，就咽不下去。我正吃着飯，忽然看見十幾個揹着槍的士兵和幾個吹鼓手一直跑了進去。問起來，說是太太吃晚飯，照例要站班奏樂。不一刻裏面果然吹打起來。我方纔知道土皇帝的尊嚴！

晚間我又把她的巫師叫了來問他羅裸的風俗。他所說的和我在環州所聽見差不多。語言也是一樣。他的程度比環州的那一位是要高明點。我拿我在環州所得的書給他看

熱河失守以後

蔣廷黻

遠東問題鬧到如此田地，原由固多，其中最要的莫過於中日兩國國情之相左。在日本，武人主戰，文人主和而不敢言和；在中國呢，文人主戰而首當其衝的武人則不主戰，其是否主和無人知之。不幸兩國都是武人當政。武人的日本只論勢而不論理；文人的中國只論理而不論勢。目前日本得着了意外的勝利；終久這種局面只能演到兩敗俱傷。

自明治維新以後，倘日本武人是時常主政的，則日本的戰爭尙不只中日，日俄及日德三役。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的時候，因高麗拒絕與日本往來，西鄉隆盛，江藤新平，及副島種田諸人主張與高麗宣戰。適是時巖倉，伊藤，及大久保新自歐美歸來，看見西洋文化的進步及日本的落後，力主日本的第一要務是在於速圖西洋化的推展。那一次靠了巖倉諸政治家的遠見及明治帝的果斷，主戰的運動總算壓下去了。後江藤新平雖以武力反對政府，當局者不但想借外戰來平內爭，反以叛逆處置江藤而加以討伐。明治十年的時候，反文治的領袖西鄉，又想以武力

來貫徹他的政策。文治派毫不顧惜遷就，致雙方鏖戰七月之久，兵士加入者幾及十萬人。這役以後，直到近年，武人反文治者沒有敢作到西鄉隆盛那個地步的。明治十七八年之際，因中日在高麗駐兵的衝突，武人的領袖黑田清隆一方面憤日兵在漢城的被迫而退，一方面以爲中國自中法戰爭以後將勵精圖治，就主張先發制人，對中國宣戰。那時首相伊藤的議論極值得我們的回憶：

我國現當無事之時，每年國庫尙短一千萬元左右。若遽與中國朝鮮交戰，欸更不敷。此時萬難冒昧。至云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爲變更，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於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現當法事（中法戰爭）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爲，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倘此時我與之戰，是催其速強也。諸君不看中國自俄之役（光緒六年伊犁問題）始設電線，自法之役始

設海軍。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中國執權大官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爲治國要典。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造海軍。今年我國鈔票已與銀錢一樣通行。三五年後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至黑田云，我國非開闢新地實難自強，亦係確論，惟現時則不可妄動。伊藤攷慮中日兩國內情以爲不必即時宣戰以後，井上馨外相又繼續說明當時的國際形勢如何不宜於戰：

使我與中高構兵，俄人勢必乘機占取朝地。彼時朝未取得，餉已花去，俄反增地，非特中國之憂，我日本與俄更近，東方更無日寧靜矣。

黑田雖不服輸，但明治帝裁奪以後，也就算了。

日本文治派並不是酷愛和平者；伊藤也承認「我國非開闢新地實難自強」。文治派與武人的不同不過是文治派主張戰前應有充分的內政與外交的預備，戰後應守分寸，所希望者不可超越局勢所許可者。中日，日俄，及日德三役均是如此佈置的。此日本之所以成爲世界大國之一；此日本政治家之所以能成大業。國人當能記得馬關條約以後，中國已割讓遼東半島予日本，俄法德三國聯合出而強迫

日本放棄。三國的行動不爲日本留餘地十倍於國聯的報告書。彼時明治帝，伊藤，陸奧諸人反能鎮壓輿情，接收三國的勸告。現在國聯對日本可謂盡情盡理了，而日本不但接收報告書，反而擴大事件的嚴重，加增自己的罪惡。

此無他：因日本近年的內政及世界近年的局勢有以致之。我們若不把這兩點看清楚，我們不能決定熱河失守以後的步驟。近年日本經濟的困難；政黨政治的腐化；世界法西斯底的潮流；加上日本民族離封建時代之近：這是在日本造成武人主政的根因。荒木也是時代所造的英雄。九一八以前，日本人心已離文治派而附於武人了。九一八以後，武人節節得勝。戰爭僅十日又得了熱河。此時想要日人悔禍，要日人屈服於國聯一紙決議之下，這是斷不可能的。

自大戰以後，歐美人民怕戰過於怕虎。元氣尙未恢復以前，又來了這三年的空前經濟恐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戰債、軍縮、關稅，法意，法德諸問題使得西洋絕難有兩國或三國聯合對日的可能。而這種聯合是制裁日本必須的條件。歐戰以前，日本對中國的進攻已有餘；所可慮者，日本對西洋的防守力不足。歐戰以後，這一點的不足也就補上了。現在日本對中國的進攻有餘，對西洋任何一

國的防守也有餘。日本因此就肆行無忌。在這種形勢之下，日本原能佔相當便宜；這是日本的一個好機會。但所能佔的便宜也不能毫無止境。他不能全不知分寸，把華府會議所造的均勢根本推反。全世界受了這種壓迫之後，難聯合的亦必設法聯合。在十九世紀，英俄原爲世仇。德國外交的一個基本前題就是英俄絕不能合作。等到英俄感覺德國的威迫太甚的時候，這個德國所逆料不能發生的聯合居然於一九〇七年發生了。日本之進佔熱河並沒有減少，實大加增，日本對全世界的壓迫。熱河的失守，雖然在我們看來是可萬分痛心的，並沒有基本改變世界的形式。

不過熱河的失守，尤其是這樣可憐可恥的失守，當然是有其影響的。精神的損失比土地的損失還要大。自從九一八事情發生以後，歐美一般人民（政府當然別有打算）以爲日本之侵畧中國有如一個兇漢欺負一個老婆婆。他們旁觀者很忍不住，要打抱不平。但是仔細一想，如出來干涉，這個老婆婆不但毫無能力，且須人負荷。旁觀者認爲一面要背着老婆婆，一面又要與那兇漢對抗，這是不可幹的事。淞滬戰爭以後，旁觀者知道了這個老婆婆並不是老婆婆，不過是一個無訓練無器械的不幸人；而訓練和器械都是可以設法得到的。淞滬之戰的影響是全國上下都知道

的。國聯大會通過報告書以後，熱河戰爭將起之際，我們都以爲這又是一個好機會。顏顧郭三代表之所以力主抵抗，宋院長的北上，宋張湯三人的通電，以及全國人民對此通電的鼓掌無非是要利用這個機會來促進世界對日本的制裁。原來事在人爲；倘熱河的戰爭能作到淞滬戰爭那種程度，我雖不敢說國聯就會引用十六條，我敢說國聯必須向十六條進一步。

經過這一次的大失望以後，我以爲我們應須認清這個基本事實。第一，武力的收復失地是絕不可能的。第二，我們須承認湯玉麟雖不足代表中國的軍人，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也不能代表中國的軍人。我們以後未必能希望淞滬之戰那樣的精神勝利。這次熱河之戰，如我們無這種太樂觀的奢望，宋子文也不與張學良湯玉麟聯名發通電了。熱河這樣的失敗其精神上的損失遠過於東北三省不抵抗而失敗，我們要看清楚就是我們能在平津作淞滬的戰爭，其收穫尙不能墊補熱河這一戰的損失，何況我們在平津絕不能作淞滬之戰呢？第三，我們喪失熱河這個機會以後，我們很難促進世界對日制裁的發生。原來我們絕無左右世界大勢的能力；充其量不過促進已成的趨勢。現在連這一點促進的能力都沒有了。倘國聯於某年月日決定制裁，那必不是

因為我們作了什麼事，必是因為國聯自有其理由。

有了以上這些事實，我們不能不承認中日問題現在已到了一個很嚴重的新階段。我們應該認清局勢，決定我們的策略。我們至今還未認清中日問題的嚴重；因為如此，我們在已往的一年多內，還常常想找解決的捷徑。這種野夢，我們現在必須放棄，而下決心來作長期的準備。

第一，中國自今以後，無論因何原故，假何名義，不可再有內戰。第二，中俄復交我們應當看為一個外交的種子，要多費力氣來培養牠，使牠將來能結好好的果子。我們外交的大毛病是在只圖收穫，不事培植。私人的交情尚須時日，何況邦交？第三，無論國聯作何處置，即使有令我們失望的處置，我們絕不可放鬆牠。黎頓報告書豈不是替我們作了無價的宣傳？國聯大會所通過的報告書豈不是為我們作了聯合世界一致對日的預備工作？最低限度，國聯不但是我們的代表宣傳的好講壇，且是最有效的宣傳工具。

倘兩個報告書不是出自國聯，是出中國政府，或美國政府，或俄國政府，其效力能有如此之大麼？對國聯，如同對

蘇俄，我們不可期望收穫太早，我們尚須繼續作培植的功夫。第四，我用不着說，我們應十分努力於內政的改良。急進者應拿犧牲於疆場的精神來與衙門中各種惡鬼去奮鬥。就是我們暫時喪失了東北，我們的國永還是比伊藤博文的日本大好幾倍。事全在人為。

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我常和外國朋友講笑話，說：上帝造日本的時候，原只造了一個三等國，日本人擅改為一個一等國；上帝造中國的時候，原造了一個一等國，中國人自改為一個三等國；但是我還信上帝。

總之，目前論中國的內情及國際的形勢，我們都談不到收復失地。目前我們的工作惟有在國內造成有收復失地的能力和資格，在國際上造成有收復失地可能的形勢。

二十二年三月十二

編者附注：此文送到時，上期的稿子已付排印了，編者又不在北平，所以這一篇文字壓到這一期才發表，這是編者應向作者告罪的。

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

陳序經

教育，那麼新的時代的中國，也要有新的教育。換句話來說，就是中國的教育的新時代化，或是現代化。

從獨立評論第十一號登載邱椿先生討論關於教育崩潰

的一個責任問題的通訊裏，我們找出下面一段話：

中國新的教育，最初抄襲日本，……後來模仿法國，……近三四年來，他們都覺悟純粹抄襲的錯誤，而提倡中國化的教育。關於這類文字，已發表了好多，差不多成爲爛調了。

新教育的中國化，的確是數年來一般教育家的時興口號，而且是國內一種很普遍的思想。這種思想的動機，也許會像邱椿先生所說，是由於他們覺悟純粹抄襲的錯誤，然其結果，——據我個人的意見，——是很有中國教育再趨向於復古運動的危險。

原來新教育，既像從事這種運動的人們所說，不是中國固有的教育，而是從外面輸運過來的東西，那麼中國固有的教育，當然是舊的教育。舊的教育，是舊時代的產兒。新的教育，是新時代的產兒。要是新的時代是要有新的

除非我們把這個「中國化」的中國，叫做舊的中國，那麼「新的」教育這回事，是無從發生的。因爲使中國而新了，則中國變爲現代化的中國，並非現代的中國化。同樣，使中國的教育而新了，那是中國的教育的新化，或現代化，並非新教育的中國化。所以把中國和新教育來相提並論而要新教育的中國化，顯然是想把沒有經過現代化的中國，來化新的教育。

但是所謂沒有經過現代化的中國，不外是舊的中國。舊的中國，是舊時代的產兒。從新的時代或現代看去，舊的中國，若不是落後的中國，至少也是「古董」的中國。因爲她若不是落後或古董的中國，他必定是適合現代的中國。適合現代的中國，就是新的中國。要是整個中國是新的了，是現代化了，那麼教育也必定是現代化了，也是新了。同時，這一個中國是用不着現代化的，而這一種教育，也用不着新化，更沒有所謂中國化的可能。所以要使新教

育中國化，其結果若不是新教育的退化，至少也有新教育的古董化的危險。

既是古董，必不能適合時代。既是新的，必非古董。新教育的中國化這句話，本來是自相矛盾的。新教育既不能而且不應該退化，古董化，——中國化，而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又恐怕是掛起新教育的招牌，骨子裏還是以前屢屢發現的復返舊的教育的主張。而所謂復返舊的教育的主張，就是復古運動。

明明白白是復古運動，偏偏又要加上一個「新」字，這簡直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故智。一方面把起一個新教育的招牌，來號召一般所謂喜歡於新的人。一方面又掛起「中國化」的招牌，來籠絡一般的留戀於舊的人。在這青黃不接，新舊過渡的時代，一般所謂喜歡於新的人，既看不出這個運動是復古，而一般留戀於舊的人，當然是快快活活的以爲溫故知「新」，吾道而西。爲了這個原故，怪不得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的運動，能够這麼行時。怪不得關於這類文字的發表，多到要成爛調。

我們忍不住這種似是而非，而最易迎合一般中國人的心理而有開倒車的危險的言論，因在這裏稍事批評。

二

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的最大理由，大約不外以爲專從西洋販來的教育，總不免有了不合於中國的國情和需要的地方。假使能合中國的需要和國情，就是叫做中國化。這種議論，驟然看起來，好像非沒有她的道理；然詳細的去考察，實在是一種很大的錯誤。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新的時代是要新的教育。中國既是要在這新的時代過日子，中國就不能不提倡，而且不能不特別的提倡新的教育。所以從中國目下的需要方面來看，中國之應當新教育化，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至說新教育要合中國的國情，我們首先要問，什麼叫做國情？國情這兩個字，雖可以包括一切的天然，氣候，地理，物產，人種，——以及文化的情況，然而事實上所指明的，却只能說是文化一方面。我們承認天然，氣候，地理，物產上的不同，固然可以影響到教育的制度，然在文化進步的社會，這些東西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而且事實上中國的天然，氣候，地理，物產，和西洋文化先進的各國，並沒有多大的差別。此外若說中國人種的聰明和腦力，沒有像西洋人這麼高超，所以說不到來模仿新教育，配不上來享受新教育，這是無論何人，都會不承認

的。

國情既是專指文化方面來說，教育又不外是文化的很多部分當中的一部分。因為她是文化的一部分，或是一方面，她不只和文化有密切的關係，而且還受文化的支配。因此之故，想對於教育上有相當和充分的了解，應當明白文化之對於教育的關係，以及教育之受文化的支配。

在文化沒有或是很不發達的社會裏，本沒有所謂教育，政治，經濟，宗教的分門別類。這些分門別類，是在文化較高的社會纔有的。因為文化愈進步，則分工愈繁複。人們因為精神時間的有限，不得不把文化來分門別類，使能對於某一門，或一類上，能够專精。於是有的叫做教育

，有的叫做政治，有的叫做宗教，經濟等等，然文化本身上，並沒有這樣的分門別類。她是一種複雜的總體，而分開不來的。所謂分開，不外是我們對於事物認識上的一種主觀作用。文化本身既不能分開，一方面的波動，必引起他方面的影響。因為了這個原故，新教育的中國化，或是中國教育的現代化，都和文化其他的方面，有了密切的關係。

固有的中國文化，是自成一個系統的，自成一個圈圍的。所以固有的中國的教育，和固有的中國的文化，像政

治，經濟等，有了密切的關係。自東西文化接觸以後，中國人感覺到事事物樣都不如人，同時又不能閉關自守，而保存自己固有的文化，結果是固有的中國的國情，已不適合新的時代。整個文化既是不合現代的环境，則整個文化也要現代化了，何況文化之一部分的教育呢？若說中國的國情，或文化的某一部分，或好多部分，是合乎新時代，那麼這一部分或好多部分，已變為現代的需要，而非中國的獨有的，或固有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沒有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的可能，因為除了教育外，文化的其他方面，已經新了，那裏還有新教育的中國的國情化呢？

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的前提，必定把現在目下的中國，當作還未達到現代化的地位。但是中國而若尚未達到現代化的地位，則今後的中國，愈要趕緊的現代化。同樣，今後的中國的教育，也當然要加緊的現代化。把新教育來中國化，又豈不是變成中國及中國的教育現代化的歷程中的大大的窒礙物嗎？

我們以為所謂新教育中國化的最大錯誤，正是以為現在的中國的國情，還是中國的固有的國情。他們忘記了現在的中國，已和六十年前的中國，很不相同。現在的中國的國情，事實上也非中國的固有國情。而且這些國情，正

是朝着新時代化的途中。我們可以說，固有的中國的國情，不過是從舊的中國的國情，到新時代的中國的國情的過程中，逐漸的已成以及將成爲過去的陳迹罷。

同時他們又必以爲除了文化的教育一部分外，其他的部分像政治，經濟等，還是依舊的不變。他們忘記了不但教育，就是經濟政治等，也是趨向着現代化的歷程中。要是教育家不願努力來求教育的現代化，而反要使新的教育，來適合正在變換歷程中的舊的政治，經濟，或禮教等，以及這些東西所產出的結果，或是所傳下來的遺毒，試問我們何不專心去保存舊的教育，以及文化的其他的方面，來維持我們的固有的國情，却要多生枝節的，去採納新的教育，而致徒勞無益呢？若說因爲了除了教育以外的他方面的文化，已非固有的，所以教育也要變換來適合這一個國情，那麼這一個國情，顯明非中國固有的國情，而是現代化的國情。現代化的國情是現代的环境，並非中國所獨有的，更非中國所固有的。這麼一來，中國教育之要現代化，不但是理論上所必然的，而且是事實上所不免的。

三

平心來說，從數十年來的新教育史上看去，新教育並

非完全沒有成績。她不過是進步太緩罷。我們當然可以說，這麼遲慢的進步，是不能夠適應我們的需要，而叫做失敗。但是與其說這種失敗，是由於新教育之不能完全和澈底中國化，還不如說是由於中國教育之不能完全和澈底現代化。

我們已經說過，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的澈底現代化，當然是和全部文化的澈底現代化，有很密切的關係。關於全部文化的澈底現代化的問題，我們不能在這裡討論。單從教育的現代化的歷史來看，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六十年來所謂教育現代化的運動，是陷於皮相淺薄的現代化的危險。而這種危險的主因，又不外是由於教育上的中國化的運動，——復古的運動。

中國之採納新教育的制度，固不過是三十年左右的事情，然感覺到新教育的必要，却在六十年前。是一八七二年，第一批學生在容純甫先生的指導之下，起始赴美留學。這一次所派的學生數目是三十人。到了一八七三，及一八七五，又繼續遣派。然自一八七六年，陳蘭彬被派爲美國公使，吳子登爲留學監督以後，留學生之命運，也因此而中止。純甫先生自傳裏說：

蓋陳之爲人，當未到美國以前，足跡不出國門一步

。故於揣度物情，評衡事理，其心所依據爲標準者，乃完全爲中國人之見解。……推彼之理想，必以的。

爲一己所受純潔無瑕之中國教育，自經來美與外國教育接觸，亦幾爲所污染。蓋陳對於外國教育之觀念，實有一極端鄙夷之思也。（西學東漸記頁一二〇——一二一）

陳蘭彬之爲人既是如此，而吳子登更是冥頑固塞。結果正是像耶路大學校長樸德Porter一般所說，這般的中國留學生，還未受有相當的教育，而遣之回國，能不痛心？然則這一次所派的留學生之未能澈底西化，而僅拾其皮毛，可以概見。

不但這樣。這一羣留學生之在美國，因爲當局要使其不忘祖國的文化，於是特造一堅固壯麗的特別房子，來安置他們。他們除了在美國學校上課和特別情形之下，所謂讀經文，談天地，相交友，相習染，他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像在中國一樣。我們簡直可以叫這地方做中國城（China Town）。結果是一方面少有機會來審察西洋人的教育和生活的真精神。一方面因爲和這般所謂頭腦頑固，成見過深的官僚監督，朝夕相處，仇恨愈多，因此澈底西化的教育固沒有法子去領受，還有中途遣回的悲劇。這一點錯誤

，事前雖爲純甫先生所意料不到，然而事後却爲他所承認的。

一直到中日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京以後——一九〇二年，中國始廢八股，設學堂，和再遣派留學生。這一次的學生之赴外國者以到日本爲最多。然其所學的，十九都是速成科。日本人爲求滿足中國學生的慾望起見，還且專替他們創設一所弘文學館來容納他們。裏面連教授時，也有人翻譯爲中文。這也正是中國城。結果是大多數留日學生，不但是直接的西洋教育，沒有法子享受，連間接的日本教育，也學不到家。因爲他們對於必要的工具的日本文，還是十九不懂。

這種不澈底的外國化，固是由於學者之只慕留外的虛名，然當時名爲維新，實是守舊的政府及士人，乃是最大的阻碍。曾國藩，李鴻章的惟務機器教育，固不待說，像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想，尤爲鑄成大錯的主因。

張氏的勸學篇，刊行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本是當時一等名流，又被辦理學務像張百熙一流人，稱爲當今第一通曉學務的人。而且他的著作，又得上諭的獎勵廣佈，一時傳誦，無不奉爲金科玉律。這本書分爲內外

兩篇，張氏說：

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

從這種理論推行下去，遂有所謂

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

一去華較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

一西書甚繁，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

。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莫過

於此。

所謂「無悖經義」，「去華較近」，「易曉畏繁」，

沒有一件不表示根本上，他們是要沿舊蹈常。他們忘記了

直接去仿効西洋，尙恐不能得到西洋教育的真諦，何況是

從東洋間接學來？他們忘記了東江人能够從西洋直接學來

，中國人安有不能的道理？何況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

信條，來提倡新教育，根本上已經不澈底，而事實上却是

趨於復古。

從一九〇二年到歐戰的時候，可以說是日本教育化最

流行的時代。然事實上這班跑去日本留學的人自己對於西

洋教育的研究，已不澈底，無怪乎尙不及日本教育化的中

國，是沒有多大的成績。我們反觀中國留學生的日本教師

們，尙終年孜孜不倦的讀西文書籍，以求直接得到西洋教育的真詮。中國好多留日學生，西文不讀，尙有可恕，連日文也不願讀，相形見拙，並非無因。

十餘年來，大家都以爲中國的教育是美國化的。我們以爲設使中國的教育而是認認真真的美國化了，那麼中國的教育，斷不會糟到這麼田地。其實：一個人若到美國讀了十餘年書，恐怕未必就能和美國人並駕齊驅。要把全國的教育，於十餘間，做徹底的美國化，或是任那一國化，恐怕是絕對不能實現的事。何況國人十餘年來的教育上的復古趨勢，層出不窮，數見不鮮呢？

歐戰以後，國人見得歐洲滿目瘡痍，於是大提倡其東方精神文化。教育——我們已說過——是受文化支配的，而又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提倡精神文化的人，對於西洋教育之澈底採納，當然存着懷疑態度，所以最近如鄒海濱陳果夫等的提倡停辦文科法科，專事發展職業教育，無非表示我們之對於現代化的不澈底。我們試想，文科法科及無論那科，纔在萌芽的時期，就要停辦，而專提倡職業教育，又豈非跑回會國藩李鴻章們那條路嗎？

我們的見解是：全部的中國文化是要徹底的現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現代化，而且要徹底的現代化。職業教育固是要如此，普通教育也是要如此。低級教育固是要如此，高等教育也是要如此。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農村教育也是要如此。惟有現代化的教育，纔能叫做活的教育。惟有現代化的教育，纔能叫做新的教育。中國人而不要新生活的教育，也算罷了，要是罷了，那麼只有趕緊的，認真的，澈底的現代化。然而要達到這個地步，首先就要放棄和推翻這種似是而非，而最易迎合一般中國人的心理，而有開倒車的危險的言論。

這篇文章，是去年寫的。但是一路閣置到今，沒有發表。近來讀獨立評論陸續登載徐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及蔣廷黻先生譯陶因的中國的政治諸文，很覺得高興和同情。然而最近讀到第三十八號所載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的結論，和蔣譯陶因的中國的教育的見解，却生出很大的失望，因而決意把這篇文章來發表。我的意思就是假使中國教育而像旭生先生

所說的要農村化，則這個農村化，還是要現代的，或西洋的農村化；決不是，而且決不應該要中國固有的農村化。其實，近來國人所提倡的農村運動，本來還是近代西洋人對於城市的「畸形」發展的一種反響。這種農村運動，還是西洋人的農村中的事情，並非中國農村的事情。假如是了，那麼中國教育，老早已農村化了數千年，用不着我們來吶喊，來提倡。末了，這篇文章既草成於去年，對於徐先生和陶因氏的見解的批評，當然不是她的主旨。但是裏面所說的先要中國教育現代化的見解，我以為是中國教育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假使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有了充分的認識，那麼其他的枝節問題都可迎刃以解。

著者附誌

編者附記：陳先生此跋是他讀了本刊第三十八期之後寫的。本刊第四十期有吳景超先生論「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一篇，又有蔣夢麟先生討論國聯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一篇，都可以同陳先生此篇比較參看。

(適)

權利是什麼？

(二)

胡道維

美國人的權利觀念

美國人的權利思想，一方面是承襲英國人的觀念，一方面也受了歐洲大陸極深刻的影響。

歐洲大陸各國在十八世紀的後半季，因為商業發達與實業振興的結果，社會環境爲之大變；一般思想家爲適應

這種新環境起見，風起雲湧的羣起對於舊有學說予以修正，或竟從事於闡發完全新穎的學說；並且他們還認爲他們的哲學有不分畛域的普遍的效力。盧梭的社會契約，孟德斯鳩的三權鼎立，都是這類哲學的表徵。不過最關緊要的，還是要推一般法律思想派的「自然法」說。這種自然法說的基本觀念，就是所謂人類自然權利的思想。他們說，凡爲圓顛方趾的人類，秉承自然的賦予就握有種種私人權利，并且這些權利非經個人同意是不容任何人予以剝奪的。

他們假定社會是靜止的不變的，不是活動的進化的。他們相信有一種社會的情狀，是絕對的合於理想的，是處於任何環境任何時代而不失其爲理想的。他們在哲學上的目的，就是要發見這種絕對理想的社會。到了十八世紀的

末年，這班哥倫布都相信他們已經發見了到達這個西方極樂世界的航路，這條航路就是社會契約與自然權利的學說。所以他們很虔誠的接受了這種學說，異口同聲的奉爲絕對基本的天經地義般的信條。

據這種學說的理論，國家是建設在一種約契的基礎上，這種約契是治人者與被治者兩造互爲結訂的；不過契約內容的一般詳情，與結訂的時間和手續，他們并不曾加以準確的解釋罷了。被治者的人類集團，已由這種協定而舉某某種的治權授予政府；不過在此項契約裡，被治者還保留有相當的自然權利；這些權利都是人權，都是人格上附帶的權利，絕對的不容統治者予以剝削。

這種學說在西歐的政治法律哲學上，握有極雄厚的勢力，至十九世紀猶綿延未絕。實事求是的英國人民，也未免爲這種潮流所波及。不過我們所最應注意的一件事實，就是美國人民因環境所迫由革命而宣布獨立而改組政治制度的時代，也正當上述的思想潮流洶湧澎湃瀾漫全歐的時代。結果他們就把社會契約自然權利及政府分權諸

學說，一一都拿來作了他們憲政的基礎。在他們的憲法上，分權說就產生了極精密的三權鼎立的制度；社會契約說就產生了具體的主權屬民的觀念；但是自然權利的學說，對於他們秉承於英國人的權利觀念，又有什麼影響呢？

美國人對於英國人的權利觀念，有兩個極重要的修改點：第一，他們認爲人權就是自然權利——對於國家法律有相當的獨立性。英國人的權利是民權，是以法律爲根據的；美國人的權利是人權，是脫離法律而獨立的。這些權利都一一規定在權利法案裏面，權利法案便是美國人所成立的各種憲法的一部分。這種憲法既爲有主權的人民所設置，代表他們至高無上的意志，所以在地位上要遠過於立法機關裏的人民代表所通過的普通法律。如果成文憲法明白規定人民有某種權利，立法部便顯然不能剝奪他這種權利。美國的法院有權將違憲的法律宣佈無效，就是因爲他們認爲憲法是最高的法律，凡與這憲法相衝突的議會通過的議案便不能稱爲法律，不能予以執行。

美國原有各憲法裏的權利法案，就是由當日流行的自然權利觀念具體而成的。所以照這樣看，自然權利是脫離法律——至少是脫離普通人之所謂法律——而另有其生命的。並且這種權利還有司法制度上的特殊保障，任何政治權威

也不能加以蹂躪。美國聯邦憲法原來並沒有作自然權利的具體規定，後來各州人民僉主非列舉此項權利不能予以通過；結果纔又加進去第一至第九條修正案，這九條修正案就是一種權利法案的性質；美人重視自然權利的觀念，於此可見一斑了。第九條修正案極能代表美國人民當時的心理，他們總覺得這些權利是脫離一切法律而獨立存在的。該修正案規定說：「本憲法內關於權利的列舉，不得認爲有拒絕或剝奪人民保留的其他權利的意義」。由此可見憲法中列舉的權利，不過是幾種例子；此外還有其他種種權利，雖未經規定，却仍然有同樣的存在。

第二，美國人會努力於憲法中列舉人民個人權利。在聯邦憲法中，列舉的權利幾全部包括在頭八條修正案裏面，不過還有少數權利是散佈在憲法的本部中。他們首先假定人民方面有這些權利，纔予以有系統的列舉；這種列舉並沒有以明文頒給權利的意味，因爲這樣頒給是與自然權利的觀念不相符合的；他們假定人民本有種種權利，然後列舉以略示其範圍而禁止政府有破壞牠們的舉動。所以依照憲法的規定，政府的行動是受有層層節制的：比如說政府便不得通過法律，來創設國教或禁止信仰自由；或干涉人民的出版自由，和平的集會自由，或請願政府以申訴冤

情的自由；或侵害人民的備置軍器與服務兵役的自由；或在平時不經房主同意而擅於民房駐屯軍旅，或在戰時不依法定手續而發生此種舉動；或侵犯人民身體房屋文件與財物的安全權利而擅行無理的搜索或佔領；或頒行拘票，而無須經人以誓言或口供證明的相當的原由，或無須對於被搜的房屋與被拘領的人物加以特殊的說明；最後，或通過任何撤消公權的法案或釐定任何反效法律。上述各條概是對於中央政府所下的禁例。各邦亦有聯邦憲法所不容許的行動：這一方面的禁例，用意有一部分是要規定中央與各邦間的關係；另有一部分禁例却是爲保護個人權利而設置的。例如各邦均不得通過任何撤消公權的法案，或釐訂任何反效的法律，或制定法律以損害契約的義務：這都是統屬於後一部分的禁例。

這些根據假定而加以保護的權利，大都爲實質的權利；那就是說，政府不能採用任何手續或方法以剝削人民這種私人的權利。英國人說：「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採用相當手續，以資保護人民，否則我們的民權等於烏有」。美國人說：「我們必須禁止政府採用某某手續，以免他們侵奪我們固有的人權」。所以照這樣看來，個人在美國有種種絕對的權利，如信仰自由集會自由等權利是。不過這些

實質權利因爲不是個個有明確的意義而有須仰賴法庭判例予以解釋的地方罷了。但是祇要這種個人權利一旦有了明確的意義與範圍，牠便成爲在那種範圍中的一種絕對權利，政府方面無論用何方法亦不能予以剝奪。這就是英美兩國人民在權利觀念上最大的差別。在英國就是一種已被社會共認的權利，也還要靠法律——那便是要靠立法的議會——去酌定牠的意義。在美國這些權利是經憲法給予承認，而由各法院隨時決定其意義的。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美國人民原來也是盎格魯撒遜的子孫，他們的思想制度根本上還脫不了英國人的窠臼。除開上述各項所謂實質的權利以外，美國人的公民自由的觀念內容，還包括有許多關於司法程序手續方法的權利。他們很明瞭英國人的觀念，羨慕他們的經驗，并領悟他們的方法的價值；他們豈肯輕易放棄這種好經驗的收穫？所以美國聯邦憲法爲民刑兩種訴訟俱規定有陪審的審判制，并規定法院不得勒索過分的保釋金或施用暴戾非常的刑罰。憲法并禁止人身保護法令的停止發給，除非因內憂外患的發生欲維持公共治安而不得不予以暫停；并且非經二人證明有某種公然舉動，或經本人在公開法庭自行承認，任何人亦不得被判爲有叛逆國家的罪名。憲法中對於叛逆國家罪

，亦定有詳確的定義：「祇有對他們（美國）舉行戰鬥，或附和他們的仇敵，供給他們以援助與方便」，纔算是叛逆或危害國家罪。并且國家議會的懲制叛逆權，也受有憲法中規定的限制：「懲罰叛逆時損害血肉或剝奪財物，不得超出被懲罰者在生時期以外」。換句話說，父親的罪惡，不應由子孫負責任。

最後，按美國憲法的規定，任何人不得為同一犯罪而受兩次審訊，不得在刑事案內因受強迫而提供危害自己的證據，非經法律相當手續不得受生命自由或財產的剝削；並且私人財產非經酌給公平的代價，亦不得奪取以作公用。在一切刑事檢舉方面，應將控告的性質與原由通知被告人，應給被告人以與反對他的証人面質的機會，應使他得以強迫方法而尋求贊助他的証人，並應給他以律師顧問的援助以便為他辯護。

這般程序上的權利，有與實質權利相同的一點：牠們的真諦，也是不歸國會立法所決定，而全由法院的判詞加以詮釋。這種判詞極多，我們當然不能一一詳述；但是我們要知道：美國法院所持的觀念，乃是一種實質權利的觀念。實際上，憲法內所頒給的權利，依正確歷史的眼光來觀察，並不是一種在任何境遇下都能享有的自由權或財產

權，而祇是一種非用某種方法——非經相當法定手續——不能剝奪的自由權或財產權。美國各法院似乎完全漠視了這種事實。立法機關所通過的任何議案，英國人都認為是法律；如果這種法律有剝削某項權利的規定，這種規定便是相當的法定手續，便可以無阻礙的剝削該項權利。美國法院的觀念，却不以此為然；僅僅議會通過的議案，還算不得是法律；牠的規定也不能構成相當的法定手續，所以也不能擅自剝削人民的權利。但是什麼纔算是法律呢？什麼纔是相當的法定手續呢？據法理上說，祇有議會議案之合於憲法者，方得謂之法律；祇有牠的規定，方得謂之相當法定手續，纔有剝削權利的威權。究竟一種法律是否合於憲法祇在法院口裡一句話；結果所謂法律，所謂相當法定手續，也不過就是一般合於法院口味的國會議案罷了。因為法院口味不固定，所以「相當法定手續」也就不固定。換句話說，美國各法院並不會規定可以剝削權利的相當法定手續是什麼；他們實際上的主張，不啻直認各個私人的權利是絕對的實質的固有的自然權利，沒有任何相當法定手續可以予以剝削的。

總之，美國人因受了自然權利主義的影響，所以趨重於權利的實質性；英國人專從法律上找權利，美國人則從

哲學理論上找權利。美國各法院緊抱着一種靜止不動的社會觀念，所以他們頗有假定個人權利不爲任何時代與任何環境所影響的傾向。

由此可知美國人的公民自由觀念，範圍比英國人的觀念爲寬廣；除了英國人認爲重要的關於司法程序一方面的各種權利以外，美國人還有許多實質的權利，是任何方法亦均不能予以剝削的。美國人的觀念在權利保障的工作上，亦有極大的效力；但這却是因爲他們效法英國人的原故，因爲他們把英國人保障與補救的辦法完全採取過到大西

洋的西岸來了。

美國人在思想上對於個人權利範圍的變遷——由於經濟與社會情狀變遷而發生的變遷——却不曾留有相當的餘地。這種保守觀念直可以說是一種進步途徑上的阻礙。但是這種弱點與其說是來自美國人的權利觀念，勿寧說是來自美國法庭爲此項觀念所定的一種特殊的形式。這般法庭近若干年來已發見了他們自身的錯誤，正於國家最高法院的指導之下講求改進呢。

○ ○ ○ ○ ○

最近獨立評論上引起的兩個問題

董時進

讀了最近兩期獨立評論上的兩篇文章，使我要對於這兩個問題發表一點意見，茲分別討論如後。

(一) 計劃與實行

丁文江先生在獨立評論第三十九號「我所認識的朱慶

瀾將軍」一文中引了朱將軍對丁先生說的幾句話：「丁先

生你是講科學的，凡事都要講計劃，講預備。我們只曉得

胡幹。想到什麼就幹什麼，幹到那裏是那裏。等你計劃預備好了再幹，人民都餓死了，國家也亡掉了。」丁先生對於這幾句話，雖未置可否，但是我們從全篇的義意看來，知道他一定是不言而喻的贊成。

朱將軍的話對於目下一般祇管空談，不真幹的人們，下了一個針砭，不過也很有流弊，因爲他明明是說，祇要幹，不必講計劃，講預備，甚至於計劃預備好了去幹都不必。

說而不幹，是中國人的通病，特別是近年來政府要人的通病。但是無計劃，無目的，無準備的胡幹，也是大家常犯的毛病。熱河的戰事便是最近的一個好例子。他們何嘗不是在打，但祇是在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對付，沒好好的計劃，組織，準備，所以打不到幾天就敗退了。北平的古物南遷，又是另一個好例子。東西到了浦口，還沒有決定存放的地點，於是就在火車上擱了好幾宿——幸而沒有損失！等到各方面追急了，纔臨時找地方；我們相信，那些古物匆忙間一定沒得到舒服的住所。無論幹什麼事體，倘使沒有計劃，都會得同樣的結果——起初未常不可行，但是不久就行不通。

有計劃而不幹，不過計劃白做；無計劃的幹，還可生出危險。一個人忽然得了一個新奇思想，他不暇而且不願去同別人研究一下，他「想到什麼就幹什麼」，那末結果很可以惹起糾紛，貽害別人。革命便是一個好例子。假使革命理論能够公諸衆人研究批評，不要急忙拿去實行，那末結果一定會圓滿些，不致弄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們要知道，開會講廢話，並非計劃；一個人忽亂想一頓，打一些不切實際的主意，也非計劃。說中國人是祇計劃而不幹，還太恭維了他們，他們是既不肯幹，也沒計

劃。要做事體，計劃與幹是一樣要緊，而且是不可分離的，計劃而不幹固成不了事，幹而無計劃也幹不到那裏去。

(二) 中國的農民何以這樣多？

吳景超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四十號「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裏面談到這問題，他說靠農業爲生的人多，「只是證明中國的農業生產方法落後，要多數人在農業中勞碌，才可維持全國人的衣食。」又說，「……我們最好努力改良農業的技術，使少數人耕之，多數人便可食之。如此便可使很多的人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從事於別種實業」。吳先生的話和許多美國經濟學家的口吻相似。他認爲一國裡頭要這許多人去做農業，是一件可憐的事實。這話確是對的，很可將一般以農民人數多自豪的人們，從夢中驚醒。從農民的利益上說，尤其是種地的人越少越好。假使三萬萬多人的事體，能够讓一千萬人做了，豈不是都可以發財嗎？

不過吳先生以爲農民多是由於農業生產方法落後一層，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我以爲農民多是因爲大家沒別種事體可幹，祇好擠在鄉間種田。吳先生以爲要農業技術進步，把農民從農業中解放出來，纔好從事別種事業。我認

為祇要別種實業發達，農民便會從農業中踴躍的跑出來，同時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變，也會不成問題。

中國農民耕地的法子誠然是很笨，然而即使使用這樣笨的耕種方法，中國的田地也並不需要這麼許多人去耕種。不看鄉間到處是閑人嗎？不看許多農民一年有許多日子閑空嗎？假使能利用這許多閑人和閑日去辦實業，就不知可以辦多少。

農民祇要能多用牲口耕種，他們工作的效果便可增加許多倍，但是許多農民完全是用人力，連牲口也不用。本人曾在河北省調查過二萬數千戶農家，其中養驢馬的祇佔百分之十三，總共纔養五千二百餘頭，養牛的佔百分之二十四，總共所養的頭數不過六千。但他們並非不知牲口耕種的利益大，也不是不會用牲口耕種，然而他們不能用，不肯用，因為他們祇有那麼大一塊地，連他們自己的勞力還用不了，那裏還有事體給牲口做。假使他們的勞力有好

買主，他們可以馬上丟下鋤頭去幹別的事，同時其他的農民便可以用牲口和有效的器具代替他們的手。

中國的情形和美國當年的情形大不相同，美國當年是人少事多，所以每件事體，頂好能以最少數的人幹了，纔好有人去幹別種事業。中國是事少人多，祇怕有人沒事幹，所以凡是能够多容納一些人的事體，都會被人重視。我們與其說中國實業不發達是因為勞力被農業束縛住了，不如說因為實業不發達，大家都不得不在農業上找棲身之處。要如吳先生所說，將農民從農業中解放出來，是很容易辦到的，然而問題是，解放之後教他們上那兒去？他們既無實業之路可走，恐怕只有走苦力，乞丐，盜匪之路了。

三月十日

編者按：丁先生絕不贊成朱將軍的話。他只承認這句話很可以代表朱將軍的精神。（適）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新聞」每月一元
「日本及其通商地」每月一元
「香港澳門」每月二元
「南洋」每月二元
「歐美」每月一元

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

胡適

熱河失陷以後，日本的軍部與政客都表示希望中日兩國開始直接交涉。從這一點謬妄的希望上就生出了許多見神見鬼的謠言，到今天還有人宣傳中國政府裏有某某人主張這種直接交涉。

我在這一年半之中，曾經主張在某種條件之下中國政府應該表示可以和日本開始交涉。（獨立評論第五期，論對日外交方針）但我曾明白的說：「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偽國，恢復中國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

在最近幾個月之中，事實的昭示使我們明白這種交涉的原則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最明顯又最正式表示是二月十四日日本出席國聯代表團答復國聯秘書長的書信。先是二月九日國聯秘書長代表十九國特委會致書於日本代表團，請他們明白答復：日本政府究竟是否承認「滿洲國」的繼續存在不能解決現前的爭端；究竟是否接受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中的第七項原則。二月十四日日本代表的答書有許多強辯的遁辭，但有一句話是很明白的：「日本政府深信「滿洲國」獨立的維持與承認是遠東和平的唯一的保障

」。國聯十九國特委會接到這封答書之後，當日即回答日本代表團，說，「在這種情形之下，討論日本代表提出的各點是不會有結果的。」

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時中國全國的人民都應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偽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

理由是很簡單的。第一，我們要對得住國聯和美國的「不承認主義」。美國政府去年一月七日曾正式宣布：

凡用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非戰）公約的規定與義務的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條約，或協定，美國均不承認。

去年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的五十個國家也通過了這樣的決議案：

凡因違反國聯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條約，或協定，國聯會員國有不予承認之義務。

這就是所謂「不承認」主義，有時也叫做司汀生主義。司汀生去年八月曾說：

當一月七日美國政府單獨表示決不承認侵略所得的結果，侵略者見了也許不放在心上；可是當整個的文明世界都表示贊成美國政府的主張時，這局面可就顯出他的真意義了。道德的貶議，一旦成了全世界的貶議，他的意義的重大是國際公法從來不會有過的。（參看獨立評論十九號，「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司汀生的話，有許多中國人和日本人也許至今還很懷疑。這種懷疑也很自然，因為現在已有「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了，然而侵略者的暴行並沒有因此減輕了一分一毫！可是我們不能這樣性急。向來國際的關係總是承認一個已成局面的。這一回的司汀生主義確是開了一個「國際公法從來未曾有過的」的新局面：就是不承認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這是一種新的政治理想，牠的成功與失敗是關係全世界人類的前途的。這種新的政治理想的第一次試驗的場所就是我們的東北四省。我們對於這種理想主義儘管懷疑，可是無論如何我們決不應該自己首先跪下來承認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個世界拒絕承認的局面。

第二，我們不應該拋棄國聯。中國在這個中日衝突開始的時候就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提出國聯行政院。在這十八個月之中，國聯的行動雖然引起了我們中國人不少的失望，但是平心論之，國聯在這一年半之中對中日衝突案的努力是值得我們全國人的深刻的感謝的。假如沒有國聯的受理，這個衝突在舊日國際公法的原則之下只是中日兩國之間的衝突，別的国家儘可以趁火打劫，或者宣告中立，都沒有參預評判或調解的義務。這個問題所以成爲一個全世界的大問題，使侵略者不能不有所瞻望顧忌，還是國聯的第一貢獻。國聯派出的李頓調查團，發表了他們的公正的報告書，指出「九一八」夜的日本軍事行動不能視爲合法的自衛辦法；指出「滿洲國」的成立是由於日本軍隊的存在及日本官吏的活動，而不是由於真正自然發生的獨立運動；指出滿洲僞國之維持決不能解決中日兩國的衝突。這個報告書的公布使得此次爭執的真是非大白於全世界，這是國聯的第二貢獻。最後，國聯在本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大會，通過了十九國特委會的報告書與建議案，在那報告書裡整個接收了李頓報告書的公正的結論，正式判定東二省的主權無疑的屬于中國，正式判定日本軍隊在九一八夜以及後來的軍事行動均不能認爲自衛的動作；正式

判定滿洲偽國是一羣日本文武官吏在滿洲境內計劃組織起來的傀儡，是「滿洲境內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都不贊成的」；正式判定雖然九一八以前中日兩國都有錯處，九一八以後，日本應負完全責任；正式判定九一八以後中國抵制日貨是屬於國際報復的行爲。這種種的判斷使我們的申訴得着整個文明世界的正誼的判決，得着國際公法上的法律根據，得着了蔣廷黻先生（本刊四十三號）所謂「聯合全世界一致對日的預備工作」。這種判斷使日本成爲全世界道德的貶議之下的大罪人。這是國聯的第三貢獻。——在國聯給了我們這種種援助之後，我們至少的限度的義務是必須做一個忠實的國聯會員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遵守去年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通過不承認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的決議；必須遵守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大會通過的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規定，解決爭執的辦法必須不違反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十項原則，必須與其他會員國一致在法律上或在事實上繼續不承認滿洲偽政權。

這兩個理由完全是從中國的國際的局面着想。至於國中輿論的道德上的制裁決不容許政府當局作今日之李鴻章，這是國中各報紙都已詳細發揮的了，不用我再來申說。

總而言之，國家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生命，我們不可

因爲眼前的迫害就完全犧牲了我們將來在這世界上抬頭做人的資格。國家的生命是國際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們不可因爲怕一個強暴的敵人就完全拋棄了全世界五六十個同情於我們的友邦。

我們此時也許無力收復失地，但我們決不可在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贊助我們的時候先就把失地簽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也許還要受更大更慘的侵略，但我們此時已被「逼上梁山」，已是義無反顧的了。我們此時對自己，對世界，都不能不堅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認主義」，就是決不承認侵略者在中國領土內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條約，或協定。

我們要準備犧牲，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同時我們要保存一點信心。沒有一點信心，我們是受不起大犧牲的。我們現在至少要有這樣的信心：「現在全世界的正誼的贊助是在我們的方面，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是在我們敵人的頭上，我們的最後的勝利是絲毫無可疑的！」

一九一四年比利時全國被德國軍隊佔據蹂躪之後，過了四年，才有光榮的復國。一八七一年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

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候四年，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候

四十八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麼？

一九三三，三，二十七。

熱河失敗的教訓

叔永

熱河戰事的發生，迄今不過一月，熱河全省的淪陷，

最後的責任，自然還是中央當局負的。

迄今也二十餘天了。在這二十幾天之中，全國人心震動激昂，對於守土有責抵抗不力的將領們，幾有欲得而甘心之勢。但是這樣的事後的激昂慷慨，雖然可以表示我們人心不死，民氣可用，設如我們不能在失敗之中得到一點教訓，結果還是於事無補。不但如此，設如我們不能找到此次失敗的癥結，力圖補救，不但於事無補，恐怕此次的失敗還有重演的可能。

熱河軍事失敗以後，第一要問的自然就是責任問題。此次喪師失地，直接負責任的，自然第一是守土有責的湯玉麟，第二是坐鎮華北的張學良。目下湯玉麟既已褫職拿辦，張學良也退職出洋了，雖然在一般人心目中，還以為張

思，是說此次的失敗，是我國軍制不良應有的結果，軍事當局或政府當局都不能負其責。若是這種言論可以代表中央當局的意見，我們不能不為國家前途抱絕大的悲觀。我們的理由如下：

湯的罰太輕，不足以蔽其辜。不過張湯的罰輕罰重，對於已失的土地和未來的局面，是不發生多大關係的。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是中央當局對於此次戰事責任的表示，因為

這當然也是事實。但是要問：我們能够等到軍制完全改良了再談抵抗嗎？如其不能，我們唯一的希望，便是要用人

的精神與能力來充補我們器械的不足。照這樣說來，因為我們軍制的不良，帶兵的將領和兵士的責任乃愈重大，不能說因為軍制不良，我們對於軍事失敗便不負責。試看目下長城一帶的戰事，那一次不是用劣等的軍器來抵抗優良的機械？我們沒有以身許國，誓死不顧的決心，大可以不必高談抵抗。失敗之前，不設法改良軍制與人事，失敗之後，方諉過於軍制的不良，而人事不負其責，絕對不是抵抗的方法。

第二，所謂『以文電口頭為勝利之宣傳，極少真正之接觸』，這大概是事實。不過我們要看清楚的，這種事實，不是軍制的不良，乃是全體的腐敗。文電宣傳，不必有真正的事實，這不是我們今日上下相承的衣鉢真傳嗎？政治可以用宣傳成功，軍事又何嘗不可用宣傳制勝？祇可惜的，在內戰的時候，大家都用宣傳作武器，倒也勢均力敵；一到外戰，一邊用的是飛機大炮，一邊用的是文電宣傳，那就不戰而勝負之數早已定了。我們戰術的腐敗，到了如此地步，宋先生言之不免也有餘慨。不過我們看見宋先生於三月六日發表談話，說他明知熱河不能守到一星期至十日，但半個月前他在承德，還發出『觀察形勢，更感熱河之重要，而前方士氣之壯盛，後方民氣之憤激，足使

子文感奮有加』的話。同時張學良等『舍奮鬥無以求生，舍犧牲無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厲』的通電，也和宋先生的談話一齊發布，這豈不是單靠文電的宣傳嗎？我們的軍器不如人，打起仗來，不能操必勝之權，這是人人所能明白諒解的。獨是到了大事臨頭，我們負責當局的真正態度與主張，常常不免受了宣傳的作用，使一般國民如墮五里霧中，迷離徬恍，不能置信，國事的前途，就根本沒有辦法了。

這種專靠宣傳，不求實際政策的結果，是使國民對於政府失其信仰心。這個話不是隨便說來與政府為難，我們隨處都可以看見這樣的傾向。例如現在一般熱心救國的國民，風起雲湧的起來捐款購買飛機。這本來是國民於無可如何中共同自救的一個方法，誰也不能說他不對。不過要圖航空救國，決不是單有幾架飛機就可以成功。那駕駛人才的訓練，軍械的設備，部隊的組織，都非由政府通盤籌算不可。可是現在在那裏捐款購機的團體，似乎人人都打算自購自辦，沒有一個願意把他們的捐款交給政府統籌共辦的。這件事情倘長此這樣下去，我敢說牠決計不會發生相當的效果。又如各處捐給軍士們的慰勞品。按最好的辦法，自然應該把物品或捐款，一起交給軍部的後方兵站或

軍需課，讓他們去斟酌需要，平均購置與分配。但是因爲軍隊中的糧台或軍需，早已失了這種信用，捐款的人也就情願枝枝節節，直接去送手套鋼盔了。這些事情，本來沒有多大的關係，但很可以表示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到如何程度。如其這樣的小事、人民與政府尚不能合作以期收到較大的效果，其餘的事更不必說了。

此次熱河的失敗，損失固然很大，尤其是精神方面的

損失，比物質方面的損失更大。不過我們從另一方面看，物質的損失雖然一時不易恢復，精神的損失，則不可不急圖恢復，而且恢復也比較的容易。那便是政府當局須要認清事實，積極負責，不可再拿宣傳手段，來麻醉自己，蒙蔽國民。必須恢復國民對於政府的信心，然後可以說集中實力，長期抵抗。

二十二，三，二十六

美國銀行風潮之回顧

陳君慧

(一) 風潮的成因

銀行倒閉是美國金融史上一個不斷的現象。這次銀行風潮，據作者的觀察，一方面爲累積倒閉的結果，一方面爲信用喪失(Loss of confidence)的擴大。前者——累積倒閉——形成失信銀行的基礎概念，而後者又爲前者之傳播。二者合併是爲這次風潮之前身後尾。

先讓我們談談這次信用喪失擴大的原因。爲研究的利便起見，作者把它分爲助成的與完成的兩類。第一類之顯著的，作者以爲有下列二項。1. 在經濟復興一再

失望的過程中，政權交代釀成一個不安定的局面。2. 在上述情形下，美國會有信用膨漲的運動，金融局面爲之搖動。如現金流出與金貨流通額增加即爲它的象徵。

其次，這次不信用擴大的完成的原因，重要的，也有兩個：(1)一般人心理之易於動搖；(2)銀行資產僵結過多，尤以中南部銀行的資產爲甚。至於資產之所以僵結又可以歸結到三個大原因：(1)近年經濟衰落果進；(2)政府的農業金融政策失當；(3)銀行制度多端缺陷。第一，經濟衰落影響借款人的償還力量，和銀行的資產的價值。第二，農區銀行會幾度仰承政府的意旨

維持農民合作社，但結果它們自身也不能保。第三，銀行制度不完備自然影響銀行資產之變動。

(一) 美國銀行倒閉的觀察

近年美國銀行倒閉可分為兩個時期：(1) 從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平均每年銀行「停業」數目在六百左右；自一九二九年以後，每年平均數目超過千數以上。近三年數目之激增顯然受着經濟衰落的影響。由此可見歷年倒閉是一種常態，而近年增加則為特別原因所致。

其次，從國別比較上來觀察我們可以引用加拿大為例。這次經濟衰落不只限於美國，人所共知；而受影響的當首推農業國家。假如別的情形相同，農業國如加拿大為着這次經濟衰落，照理應該有同美國一樣或更要利害的銀行倒閉。然而事實上却不是這樣。加拿大只在十年前發生過銀行倒閉一件。該銀行的負債額只合美金一千九百萬元（約），較諸美國近四年來倒閉的負債額為三十五億元美金（約），有天淵之別。這樣比較起來，我們又可以說：銀行倒閉雖與商業衰落有連帶的關係，但經濟衰落不一定使銀行倒閉。

又其次，從倒閉的情形來觀察，我們應該先得一個

概念：即美國銀行倒閉並沒有普遍性存在；反之根據

Spahr 氏之統計（1921—1930），有下列三種特殊情形之

發現。1. 把銀行依資本額之大小分為數種，「停業」數

目依資本之大小而消長；總數百分之六一為資本額及或不

及二萬五千元美金之銀行，百分之八八為資本額不及十萬

元之銀行。2. 把地方依人口之多少分為數類，「停業」

銀行數目依人口額之多寡而消長；總數百分之四十在人口

額不及五百之鄉村發現；百分之六十在人口額不及一千之

鄉村發現；百分之九二在人口額及或不及一萬之地方發現

。3. 把銀行分為聯合準備制會員銀行與非會員銀行，前

者占倒閉總數較少，後者占總數較多，——為百分一三與

百分八三之比。這樣，我們可以明白：美國已倒閉的銀

行，五分四以上是在鄉村或小城市的小資本的非會員銀

行。

上述三種事實是美國歷年銀行倒閉的特徵。我們

可以說美國銀行的倒閉是常態的，而不是普遍的，與經濟

衰落有關係而不全是原因於經濟衰落的。作者從歷來美國

銀行倒閉的情形觀察，以為他的根本原因在美國銀行制度

的不完善。此點於下節略論之。

(三) 美國銀行的缺點

1. 銀行法制不統一。美國銀行分國制銀行與州制銀行；前者受聯邦政府之監督制；後者受各州獨立之制裁。因此之故美國銀行法制有四十九種，而國制又和州制相對峙。結果便是，(1) 銀行設立易於超過經濟上的供求原則的範圍；(2) 銀行營業標準不特不一致，並且因之而降低；(3) 銀行監察不周密。就第一項而言，因為兩制互相競爭，資本法定額減到過低。(國制銀行現行法定資本額至少為二萬五千元美金；州制銀行法定資本額，更低過此數。同時各州對新銀行設立，有一部份不特不經過嚴格的調查然後批准，並且採納鼓勵政策，以增稅源。結果銀行林立，以一九二九年為例，全國銀行總數達二四六三〇家之多，誠為別的国家所望塵不及。再把加拿大來比較，全國只有銀行十家支行三九七〇家。可見美國銀行太多，超過經濟上的供求原則的範圍，無疑。就第二項而言，大部份因為兩制競爭，近數十年來，銀行現金準備曾經減低，投資限制曾經縮少，營業範圍曾經擴大。最後，就第三項而言，兩制競爭足使州的銀行立法機關敷衍了事；加

以司法不嚴，於是銀行法制上之缺陷更要擴大。

2. 單位銀行制與資力之不均分。美國銀行制度根本上是單位制——設立支行俱有區域上的限制。全國銀行數目既如上述之多，則每銀行的平均資本額，一定比較在支行制度下的平均額特別薄弱。還有一層，就是資力分配之不均。根據統計，全國銀行資產總額百分之五十為全國銀行總數百分之二的小部份佔有；二十四家紐約銀行的資產總額等於二萬家鄉村銀行的資產額之和。由此可見銀行資力的偏而集中和單位制的畸形發達的程度。他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結果如下。1. 全國銀行區域分為不貫通的段落；資力大的銀行集中大城市；資力小的散佈於農業區域。2. 佔多數的鄉村銀行與該地結不解之緣。它們的放款和投資沒有相當的安排，而資產直接受着地方經濟變動的影響。3. 小資本銀行缺乏深於銀行學識者之主持；因而管理不良，弊病叢生。據聯邦政府銀行司一九三十年之報告，國制銀行倒閉案件總數百分之三八為管理不良所致，百分之五十為地方上農業或工業衰落的影响所致。上述二項倒閉原因實為重要而為研究美國銀行倒閉所不能忽略的。4. 小資本銀行歷年有收入不敷支出之勢。就在一九二七年（是年乃平常年）國制銀行之虧本的有九六六家，溢利不及五分的

有二千家；兩項銀行佔該年國制銀行總數百分之三八。近年情形，較此尤劣。

3. 聯合準備制的範圍過小。據聯合準備局統計，一九二八年全國銀行總數爲二五，五七六家；會員銀行僅佔八，八三七家，非會員銀行佔一六，七三九家。又一九三二年全國銀行總數爲一八，七九四家；會員銀行僅佔六，九〇四家，非會員銀行佔一一，八九〇家。由這些數目可見聯合準備制還沒有充分發達。結果：（1）銀行政策的設施只及於一部份銀行，效力有限。（2）大部份銀行不能直接得聯合準備銀行之應援，到緊急時只有束手待斃。（現有改造投資公司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之後援，情形較好一點。）

4. 證券投資累增與附設證券公司之危機。又據聯合準備局統計，國制銀行的證券投資（證券抵押借款在內）有如下述情形：一九二一年佔放款與投資總額百分之四六；一九二九年，百分之五六；一九三〇年，百分之五九。

國制銀行情形如此，州制銀行情形更不可言而喻。由此可見十年間，銀行流動放款減少而不流動投資增長，這情形完全違背銀行原則。再進一層，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大資本銀行紛紛附設證券公司。他的危險就是：（1）商業銀行侵入非商業的投資範圍；（2）附設公司可免銀行法律之制裁；（3）銀行實在情形可以隨便掩飾和搗把。

上述美國銀行制度的缺點雖欠詳盡，但已指出美國銀行制度若干根本的缺點。因此之故美國銀行在過去已繼續地發生搖動，在近年經濟衰落的過程中更要失掉它的健全的效能。所以在銀行倒閉的諸種原因之中，美國銀行制度的缺陷實在是根本的。

假如上述的觀點與所引的事實是不错的，我們相信，我們的結論也不會大錯。這次風潮可以說實在給美國人一個教訓。因此之故，國會議員格拉斯 Glass 氏的銀行建議或者可以實現。

三月二十二日於社會調查所。

皖 贛 農 賑

章元善

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協助政府辦理民國二十年之水

災賑務，其方式有二：

從二十年八月間水災發生之時起，至二十年之年底，義賑會派員參加政府之賑務。所有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之賑務方針，事業計畫，以及其他關於賑務實施之種種規畫，義賑會人員均曾參加意見，並加入工作。

從二十一年一月起，義賑會担任政府賑務計畫中幾部工作之實施。一爲修復江西境內江堤之工程；一爲皖贛兩省內應辦之「農賑」。爲辦這兩樁事，國府水委會撥給美麥，義賑會自籌經費。兩省農賑計先後撥定美麥一萬六千八百噸。這些美麥，約二千噸是用原物散放的，其餘的麥子，均經水委會按每噸七十四元之代價，折合現金。

「農賑」雖然是水委會賑務三種（急賑；工賑；農賑）方式之一，究竟是一個新名詞。農賑究竟應辦些什麼事？「農」是如何「賑」法？這些問題，自從水委會決定交給義賑會承辦之後，急待解決。否則無從下手。對於農賑的一般觀念，在二十年九月九日水委會委員會接受的賑務方針及農賑計畫二件文字內，可見一些大概。原文有下列諸端：

「此次賑務，是恢復人民物質上及健康的能力，以增加人民生產力爲目標。：將舉辦各種防災事業，：剷除未來災荒之成因，：並引起人民對於農業

復興之興趣與決心」。——賑務方針

「：非另有補充辦法，不足以增進人民之購買力。：應仿照合作法，放給低利借款。：本會應設法組織極簡單之農民團體：凡有真正需要的農人，均應入會。：如能嚴密剔除需要不急之村鎮，這種用合作方法來救濟農業的工作，可以集中于需要最急的區域之內。：這種農村組織，將來都應改組爲合作社。」——農賑計畫

水委會對於農賑的辦法等等，並無詳細的規定。該會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義賑會公函中，明白申明，義賑會得在「原訂計畫」範圍內，全權主持辦理。因此農賑之解釋，及其實施方法，均須義賑會自行規定。義賑會特爲此事，指定一個委員會，並在上海設立一個事務所，于十二月十六日同時開辦工作。

這委員會所規定的原則及辦法之中，最要者便是解釋農賑的目標，他們認定農賑是協助被災農民在最短時期內恢復農事的工作，所有種種設施，都是以這目標爲根據的。凡是要得到農賑的農民，均須組織互助社，農賑是專對互助社放借的。修理民堤一事，義賑會認爲是先決問題，因爲民堤如不修復，其他一切復興工作，都說不上。此外並

將互助社的組織及工作，定出章程來規定明白。義賑會本身的布置，賑款會計規則，工作人員的召集及訓練，各種簿冊的設計，印製，試用等等，均經籌備妥貼。雖在「一二八」事件發生後，炮火連天之下義賑會居然能於一個月之中，籌備完成。二月初間，工作人員，分批出發，到民間去實地辦事，與水委會原訂計畫中，時間之支配，適相符合。

賑款來源是受限制的。安徽只有一萬噸麥子，（以後增至一萬一千八百噸），江西只有五千噸，時間又極短，——要想協助被災農民上忙有收成，——農賑的散放，不得不先儘被災最重的區域內辦理。因此之故義賑會感覺着許多的困難。「官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是深入民間的了。義賑會為圖增進辦事的效率起見，本着大無畏的精神，硬着頭皮做去，不聽那一套，在安徽揀定二十縣，（以後增至二十五縣）江西十二縣，嚴格的照着計畫，切實去辦。這些縣分，按着義賑會的組織，分配如下：

- 義賑會農賑區 服務縣分
- 安慶區 懷寧，桐城，貴池，東流，望江
 - 蕪湖區 蕪湖，宣城，合縣，當塗，無為，桐陵
 - 蚌埠（二）區 鳳陽，懷遠，五河，靈璧，壽縣（三），鳳台（三），霍邱（四），阜陽（三）

南昌區 南昌，新建，進賢，永修，鄱陽，九江區 德安，星子，瑞昌，都昌，湖口，彭澤，宿松（一），九江，（附註）（一）宿松屬安徽，但為實施便利起見，劃歸九江區辦理。（二）四月二十八日始開辦。（三）因為地方不靖，七月中旬始開辦。（四）二十一年年底始能開辦。

六月間，水委會決定擴大農賑區域，加撥美麥一千八百噸，交給義賑會，請在安徽加辦五縣。因此安慶區工作添了繁昌，向陵，全椒三縣；蚌埠區加添宿縣，泗縣二縣。

除了水委會所撥的美麥外，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以所募賑款三萬元，委托義賑會在蕪湖附近代為辦理農賑。義賑會辦理二省農賑的經費，共支六萬六千六百零五元六角九分，（代表放出賑款總數的百分之五·四七），此款是由美國華災協濟會，轉由該會駐滬委辦捐助的。該會共捐之數為十五萬元，所餘之數，即以之辦農賑後應辦之合作事業。前項經費之中有二千六百六十四元，是水委會撥來的。即係一千八百噸「加賑」美麥換價十三萬三千二百元的百分之二。

本篇所記皖贛兩省工作之外，還有湖南省內之農賑，亦由義賑會的湖南分會承辦的。湖南農賑起手極晚，七月

間水委會方始交出。義賑會即以皖贛成規，應用於湖南。放款于互助社。湖南情形，較皖贛為良好，農間原有比較健全的組織。義賑會辦農賑的時候，在可能範圍內，就利用這種原有組織。因此之故，工作較為容易，時間省去不少。起手雖較晚，十月間即已辦完。水委會撥給義賑會辦湖南農賑的款共洋五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八元一角二分。義賑會放給一千九百三十二處（社員總數為十六萬六千四百七十六人）互助社，五十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七元三角九分。

農民入了互助社，義賑會就拿以下所說的單簡易明的基本觀念，灌輸給他們：農賑是協助有自助決心的農人的；農賑只能補充農民力之所不及；（農人們不可希望農賑來供給他們整個的需要，）借去的款，務必用於生產的用途，修理民堤更為重要，農賑充其量只可幫助農人種他們水災後第一次莊稼，其他改良農田的計畫，一時談不到；農人們如能遵守規章，相見以誠，農賑後接着就辦合作，幫助他們的日子還多着呢；義賑會喜歡同農人直接辦事，向來用「紳士」們來代表的辦法，不能適用；農人們不認字，不會寫，毫無關係，但一個互助社之中，至少要有會記帳的社員。

實際放出去的農賑，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共借共用的

，例如堤工會借去修民堤；一種是共借分用的，例如互助社借去分給各社員，由各人自由去應用，例如購買籽種。

皖北的工作，因受匪患的影響，以及交通的困難，——起初希望用麥子及麵粉去放農賑，——以後又為出賣美麥，時間上受了些損失。但皖北以外各區的工作，大部是在四月底以前趕辦完成。扣至五月十五日手續完全清楚的放款，共計現款三十五萬零九百二十五元四角八分；麥子一千二百三十七噸二；麵粉七百四十七噸九三。這些農賑是由一千七百三十七處互助社承借。到二十一年底，除霍邱一縣外，全部辦竣。計放出一百二十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元三角二分，承借社數為三千六百六十八社，這些社的社員總數，為二十萬零二千三百零二人。此次工作，不但辦得極快，十一月底已有二十五萬元到期歸還了。二十一年年底到期應還之款，十分之七已經按期收還。其餘的十分之三，代表手續未辦清及請求展期中的借款。

農賑放款，一概沒有抵押品，利率是年息四厘。（即每百元每年收息四元。）定章農賑借款，可以長至五年。但是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借款中百分之六二·五是在當年內到期。（夏季以前放出八十四萬六千零九十八元三角二分之中，倒有七十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元一角九分，即是

百分之八六·五當年到期。)平均每一農戶，(社員都是戶主)只借六元。足見承借農賑者，俱係資本極為缺乏之農人。至于用途，吾們起初的觀念是錯了。最普通的需要，並不是修復民堤工程費，而是籽種的購買費。這種用途，代表全部百分之六十；買耕畜一項，占百分之二十五；其餘是用在農具及肥料上的。

到 期	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交辦 皖北外各區 皖 北 「加 賑」				青 年 會 共 計
二十一年	七三、四二、一九	七、九六九、〇〇	五、八六五、〇〇	一六、八三五、八一	七六三、〇八一、〇〇
二十二年	一〇一、六六〇、九〇	一九四、〇五四、〇〇	一〇七、八八八、〇〇	一一、四八〇、一九	四一五、〇三三、〇九
二十三年	一三、八二九、七三	一三、〇一〇、〇〇	一五、七一〇、〇〇	一、三六五、〇〇	四一、九三三、七三
二十四年	九八、三五	—	—	三三〇、〇〇	四八、三五
二十五年	九八、三五	—	—	—	九八、三五
共 計	八四六、〇九八、三三	二二五、〇四三、〇〇	一三八、三九三、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二九、五三四、三三
餘 額	一五、一三三、一〇	△ 四三、九五七、〇〇	二、二四三、〇〇	—	六二、二二三、一〇
經 費	—	—	二、六六四、〇〇	—	二、六六四、〇〇
總 計	八六一、三二一、四二 元	三五九、〇〇〇、〇〇 元	一三三、二〇〇、〇〇 元	三〇、〇〇〇、〇〇 元	一、二八三、四一一、四二 元

△ 內有霍邱賑款三萬七千元，該縣匪患新近方始略清，工作尚在進行中。

承借農賑的各互助社，都能利用農賑于適宜的用途。借款到期，都按期歸還。上年到期之款十分之七，完全依期清償，毫無糾葛。即未及清償之各戶，大部亦在籌劃或請求展限中。

農賑大部辦完以前，合作工作早有籌備，——農賑後接着辦合作，是原定的計畫，——基本合作觀念，隨時灌輸到承借農賑的農村裏去。在辦農賑的時期內，義賑會的辦事人，時常到各村裏去，他們就口頭宣傳合作。簡易的合作文字，隨時流傳到農間去。二月以後，並專爲此事，編印一種月刊，——合作訊附刊——散給各互助社。從十一月起，又辦了二十八處講習會，召集各社的社員，到會聽講三天。合作的理論及實施方法，即于此時傳授給他們。扣至本文脫稿時已有二十處辦完。每處聽講的人，多至一百二十人，少亦五十人。預計因有此番講習，在皖贛兩省四十縣內（除前列之安徽原辦二十縣加辦五縣，江西十二縣外還有豐城安義清江等三縣經江西省政府撥款委托義賑會代爲提倡合作，共四十縣）至少有二千人可以得到初步的合作教育。

此外還用其他方法，在農村中宣傳合作，希望時機成熟之後，互助社全可以改組爲合作社。義賑會認定合作是

要人民自己去辦的，始終自處于第三者的地位，是一個美意的旁觀者，以爲非如此，不能保持各社自立的精神，而自立精神，爲合作運動的要件。雖然如此，義賑會努力協助，扶持合作的萌芽以至于枝葉茂盛之時期。所以凡是力所能辦的事，義賑會是不辭勞苦的幫忙。譬如合作社在縣政府登記一事，爲鄉農不習爲之事，義賑會就力謀各社的便利，減少他們的困難。

限期修復洪水沖刷之江淮運湖蔓延數千里之長堤，使得七省農人得于次年春夏間收穫災後第一次農產物，實係一樁偉大的工作。現在此項工作已告成功，凡曾參與其事之人士，都值得吾人的欽仰。此工之成，不但可以代表人力集中的力量，且可表現組織之精密，紀律之嚴整。修成之堤，不啻是堤工工程師愛國之紀念碑，結晶品。

規模較小，但是效用亦相同的工作，可以說是農賑。同修成的堤一樣，農賑工作，亦是爲將來農民的福利建立了一個堅固的基礎。凡是辦農賑的地方，第一件好事，就是人民得了災後第一次的收成。這次收成非常的好，且有生產過剩之光景！假使不辦農賑，或是辦得太晚，災區內的情形，惡化到什麼程度，吾人是無法揣想的了。農人們借去的錢是買籽種的。吾人不難想到假使沒有籽種，災區

內收成，決然要減少，經濟狀況，當然要大大的不景氣，這是可以斷言的。這次受水災的區域，如此之大，因為民間多少有些積蓄；人民復興的能力，又非常雄厚；加上工賑等有效而充量的賑濟，水區內未尚絕糧。這就是就大體而言，間或有一二處，因為天災人禍，種種原因，民間經濟狀況亦曾達到饑饉的程度。

因為農賑，人民們的責任心及自立心得到了一番興奮與提醒。他們受歷來經濟的壓迫，差不多喪失了人生的樂趣與希望，沒有勇氣去改善他們自己的環境，等着共產主義來利用。水災之後，情形更加惡劣，危機四伏，隨時可以爆發。修堤固然是一件要事，但完全是實質的，缺乏精神治療的效用，不能鼓勵人民們的新希望，不能引導他們向一條新的途徑上走去。農賑不但使得人民們可以恢復已有的損失，並且改造整個的農業經濟統系，有了起點。合作將來的功效如何，現在還難預料。但從合作在相類狀況之下，在世界上已往的成績看來，吾人可以敢說，他在農間的影響，一定是不會使人失望的。水災使得吾們在這幾方面努力，使得吾們集中心力，教吾們組織，使得合作在一個重要的區域內發生了萌芽。如說這次水災，中國因

禍得福，似非過甚之辭。

辦農賑得到的經驗指示給他們：中國農人富有合作的情緒，他們都是誠實無欺的良民。這次借款到期歸還，是一個表徵。略加訓練，他們亦有組織的能力。當領袖的都能負責，不輕視他們的責任。至于錢的用途，他們亦能斟酌適宜，應用有限的力量于有效的用途。對於他們有益的運動，他們是竭誠接受，而能感覺到深刻的興趣。

這回農賑工作，總算是成功。要根究此次成功的原因，其一就是事前的充分籌備。籌備的時期多費些時間，實施的時候，進行就能順利省工。還有避免「土劣」，直接向農人接洽，亦是成功的一個要素。義賑會以同情的態度對農民，引起他們的好感與協助。義賑會對於合作一事，幸有充分的經驗，這次均能充量的應用。義賑會徵集了幾十個河北省合作社的社員，南來幫助農賑工作。農賑得他們的助力，不在少處。北省農人，因此一事，與南省農人發生友誼，將來的影響當必甚佳。這又可說是農賑的一個良好副產。

居里夫人

Madame Curie

衡哲

——一個新女子的模型——

居里夫人是鑄質的發明者，也是近代一個第一等的科學家。關於她在科學上的貢獻與地位，國內的科學雜誌上已經有過專門的介紹，不用我多說了。我現在要說的，是她的身世與人格。

夫人原名Marie Sklodowska，於一八六七年的十一月七日，生於波蘭的華沙城（Warsaw）。父親是一位中產的地主，但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喜愛文學，擅長數學物理，曾做過大學的教授及校長。母親也是一位奇女子，是一個著名女校的校長。在家庭中，她又是兒女的良師，丈夫的益友。夫人生長在這樣優美高明的環境之下，在智識和人格的兩方面，便早已得到了一個良好堅固的根基。

在兒童的時代，夫人的嗜好是傾向於文藝音樂的，但對於數學物理，也有同樣的欣悅與了解。後來她的母親死了，她修養音樂的機會便減少了。在十七歲的時候，她離開了華沙，別了她的老父與家庭，到一個富農的家裏去教書，以求去分一點老父在經濟上的担負。在這個時期之內

，她決定了她求學的宗旨——她要到巴黎去專修數學與物理——於是她便開始積蓄她求學時的費用。

在離開波蘭之前，她會回到華沙，同她的老父過了一年快樂的生活。同時，她也在這時去參加了一點波蘭青年們的秘密救國工作。這些青年志士們，與夫人一樣，都相信復興波蘭的事業，是應該建築在學問與人格的基礎之上的。故他們都願砥志礪行，到異國去做苦學生。在一八九一年的初冬，夫人乃別了老父，到了巴黎，開始她的苦學的生活。在巴黎的波蘭學生是很多的，夫人初去之時，也常常參加他們的工作與聚會，但後來因專心研究科學，便無暇再及此類的活動了。

到巴黎的第三年，夫人在一個家庭宴會上，遇到了一位青年科學家。「我一進客廳」，夫人在她的自述中這樣說，「便見一位高高的少年，站在窗前。他有琥珀色的頭髮，大而清明的眼睛，莊嚴和靄的態度，以及一個夢想家的神情。我們談話之後，他便要求我，允許他常來看我，因為我們的志趣很相同，意見也很一致。」這位青年科學

家不是別人，乃是因為研究科學而不願結婚的居里先生。後來居里先生告訴她，他並不是一個忘情戀愛的人，但他怕女人，因為「女人常用生命與自然的力量，來引導我們向後走。」夫人在寫她丈夫的行述時，也說，「我常常對我說，他到三十六歲還不會結婚的緣故，是因為他不易得到那位夢中的同志，那位能與他同做科學之夢的伴侶。」但在那一夕的宴會上，居里先生居然把他的夢中的伴侶找到了，而且這位伴侶也真能不使他失望。

相識一年以後，這一對科學上的情人，彼此便都明白了，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是沒有第二個人能代替眼前這一位的了。於是他們便在一個簡單的儀節之下，結為夫婦。在普通女人的生命中，結婚雖不必一定是戀愛的墳墓，但却沒有不成為學問或事業的墳墓的。但在居里夫人的生命中，結婚却是她生命與學問的開始。這固然是由於他們夫婦的志同道合，但也未嘗不由於那所志所道的能超乎平凡。不然，跳舞場中，賭博台上，飲食柈席之間，一個男的或是一個女的，又豈不能一樣的覓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伴侶？

自此以後，居里夫婦便開始去做他們的科學的夢了。關於這夢的奇偉成績——鐘質的發明及其他——我已說過

，不在此處記述了。此處且讓我來述一下他們兩人的夢中生活。

第一，他們所做的，並不是一個柔軟的，玫瑰色的夢，乃是一個與環境奮鬥的壯健的夢。他們兩人都不是有錢的人，而在結婚的第三年，夫人又生了一個女孩子，於是這位未來的女發明家，除去烹調及家事之外，又須兼做保姆了。但她絕不以此為苦。他們夫婦間的高超情感，能使她享樂一切的工作，無論是科學的或是廚房的，雖然她也未嘗不惋惜她的精力與光陰。當他們結婚的時候，有人送了他們一點金錢，作為禮物。他們便把那錢買了二輛自行車，每逢星期日或是假日，便雙雙的騎着車子到郊外去，作一天或是數天的旅行。他們常常採集了許多野花，回來供在瓶中。居里死後的一晚，夫人有這樣的幾句記載，「在那書室中，他親自從鄉間折來的野花，是仍舊新鮮的開放著，但人是沒有了。」這寥寥數語酸楚的回憶，反襯出了多少他們生活的恬淡與和諧！

第二，在學校的設備上，他們兩位也是得不到什麼便利的。他們沒有自己的試驗室。最初居里先生的工作室，是在一個課室外的過道上。後來學校給了他們一間破屋，作為他們試驗鐘質的場所。那屋遮不住風雨，趕不出暑熱

，「在寒冷的冬天，一個舊而小的火爐，只烘暖了圍近他的那一點面積。」他們沒有儀器，除了幾件簡陋的管子與量杯。這時他們對於鐳質的研究，已經不能不分工了。居里先生研究的，是鐳的性質，而夫人研究的，却是採取鐳質的方法。她終日用極細的頭腦，做著極笨重的工作。有時她須用一個和她一樣長的大鐵棍，不住手的攪動那燒着的流質，至于數小時。有時又須把那試驗過的物質，大量的往屋外傾倒。他們沒有助手，也沒有下人，但他們絕不以爲苦。他們不會嚷着，「設備不周，供給陋劣，我們不能工作，」這一類的話。他們一天一天的做去，一步一步的試驗，終在一八九八年，獲到了那個驚人的發見。

我們看了這兩位天才夫婦在這時期的生活，第一個感想是，天才是不受環境支配的。有天才的人，即使在陋屋破桌間，也能作驚人的科學發明；即使在黑暗囚室中，也能有奇偉的文藝創作。雖然優良的環境，比了惡劣的環境，有時更能幫助天才的成功，但環境的惡劣，也決不能作爲一個人人生失敗的藉口與推諉。

我們的第二個感想是，天才雖然不受物質環境的支配，但精神上的恬靜與歡樂，尤其是夫婦間的契合與協作，

却是成就天才的一個重要條件。居里夫婦的簡陋的物質環境，與他們的偉大發明，即是一個證明。假使在他們中間，缺少了一個精神上的和諧——從興趣、人格，及天才的相同而得到的和諧——這個霉壞懸殊的環境與發明，是很容易發生關係的。不信，且看居里夫人自述的一段。

「我們終日在試驗室作工，吃的是學生們所吃的簡單飲食。在我們那個破陋的棚子中，照臨着一個偉大的安靜。有時在看守一個試驗的時候，我們兩人便來回的走着，談談現在，又談談將來。有時我們覺得冷了，便在小火爐的旁邊，飲一杯熱茶，這便能使我們重新振起精神來。我們在這樣的遐想中生活着，像做一個完美的夢一樣。」

我看到這裏，不由得想起了那位八百餘年前的大詩人，李易安居士的結婚生活。我們且看她的自述。

「候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錢半千，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後屏居鄉里十年，……每獲一書，即共同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

夜盡一闌爲幸。……余性懶，每觀罷，坐歸

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弟幾葉·弟幾行，以中否決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見李著金石錄後序）

這兩位天才女子，生時不同，國籍不同，教育與志趣，也各不相同，而兩人在學問上及家庭中的生活，却有這樣一個極相似的精神。她們像顯示奇蹟一樣，給我們看到一個完美的人生，看到一個夫婦結合的最高意義。

我們的第三個感想是，一個人若欲成就他的天才，他對於他的事業與學問，必須先有一個虔誠與專一的信心。社會的浮華與虛榮，乃是擾亂這個信心的最強仇敵，故他們是很可厭的。關於這一個意思，居里先生說得最痛快。他說：

「最痛苦的是，我們不得不在我們所生活的偏狹社會中，作種種的讓步。要是一個人的讓步太少了，他必得受到摧殘；要是讓步太多了，他又成爲一個沒有骨氣之人，他將看不起他自己。我現在已不能如十年前的堅定了。在那時候，我以爲……一個人是不應

該對於他的環境讓一步的。我甚至相信，一個人不妨發展他的過失，猶之發展他的美德一樣」（見夫人著居里傳）

在一般人的眼光看來，這豈不是一個怪物的口吻？但這個意見却是與居里夫人的意見完全一致的。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有科學是最神聖的，是最值得尊敬崇拜的。他們的愛情，也是因爲能建築在這個聖壇之上，方才有了價值的。假使他們但知道趨承社會的意嚮，或是應付社會的膚淺要求，他們還能有偉大的成功嗎？後來他們的發明爲一般人士接受之後，他們的名譽更一天高似一天，而他們的痛苦也就隨着來了。居里夫人對於這個情形，有這樣的幾句記載。

「因爲我們的發見，可厭的聲名便起來了。他擾亂了我們在試驗室的安靜工作。後來我們同 Becquerel 三人，分得到了諾貝爾獎金之後，我們的工作便更爲人所注目了。有時竟至絕對沒有平安。訪問的，要求寫文章與講演的，每天都來打斷（我們的工作。」）（見夫人自述）

但除去誠意的不願枉費時間與精神于無謂的酬酢之外，這兩位夫婦却並不是什麼怪物。他們敬愛道義的朋友，

喜歡恬淡簡樸的生活，愛樂天然的景物。對於社會與國家的事業，他們也能盡力相助，絕不漠視。故他們對於鐳質的採取與施用的方法，完全公開，遂使鐳質的製造與治療，成爲一件對於社會的重大貢獻。而在歐戰初起之時，巴黎的危亡迫于旦夕，夫人却又隻身來往巴黎，把鐳質遷移到安全之地。又親到前線去，爲傷兵施用鐳質的治療，爲醫生看護講解施用那治療的方法與手續。但這都是後話了。

在一九〇六年，居里先生的名望正如日到中天的時候，一夕在朋友處走回家的途中，他突然的爲一個汽車壓死了。這晴天的霹靂打在夫人的身上，最初是但見全世界都變爲黑暗。但慢慢的，她記起她的兩個女兒，和他們夫婦兩人同做的夢了。她又記起了他丈夫常常對她說的話，「即使他死了，我還當繼續的做我的工作。」這一句話給了她一個再與生命奮鬥的勇氣。後來巴黎的科學院，又決議使她補充了她丈夫在巴黎大學的教授席。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因爲那神是從來不會有過女教授的。在一九一一年，夫人又獨自受到了一個諾貝爾的化學獎金。一九一二年，巴黎大學又創立了一個鐳質研究所，請夫人做了那裏的主任。

在這樣繁忙，這樣艱巨的工作中，夫人却不會忘了她的兩個女兒的教育，和她對於她們的責任。那時居里的母親是早已去世了，故他的老父久已搬來和他們同住，並且幫助他們撫育這兩個女孩子。居里死後，夫人的研究及教授的工作，便更加繁重起來，她的女孩子的教養責任，也就更加移到了那位老翁的肩上。夫人對於兒童教育的見解，是很不平凡的。她主張兒童不必多讀書，但却應該注重科學的觀察，與文藝的嗜好，尤應該煅鍊身體，與天然接近。她因老翁喜愛鄉居，故他們不久便全家遷到巴黎的郊外去住。不幸老翁又在一九一〇年死了，于是夫人便與同志們組織了一個試驗學校，大家親自參加教授的工作，使兒童們能在文藝與科學兩方面，得到平衡的發展。經過了二年的這樣的訓育，她的兩個女孩子便居然很年輕的進入了大學。她的大女兒對於科學尤有興趣，故她不但得到了一個好助手，還得到了一個青年的同志與伴侶。

一九一四年，歐戰突然開始。德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侵入中立的比利時，不到幾個星期，巴黎便可以聞到敵人的砲聲。於是夫人奉了政府的命令，把她試驗室中的鐳質，親自攜帶到法國的臨時都會 *Bordeaux* 去。但她並不願離開她的職守，她把鐳質放到安全地點之後，

仍即日回到了危在旦夕的巴黎城。此後三年之中，她的生活便大半消磨在傷兵的醫院中，如我上面所說的了。

現在夫人是已經六十五歲了，却仍在做着那鋪質研究所的主任，不斷的為一班青年科學家做着領路的工作。她受到了全世界的敬仰，為地球上所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偉大女

科學家。但她却仍是那樣的簡樸，那樣的謙和，那樣的恬淡。我們因此明白，她的成就已是超出了她丈夫的期望，她所做的夢，也已不是科學所專有的榮光。因為她所給我們的，不但是是一個科學上的偉大貢獻，并且是一個更為偉大的人格，一個完美高尚的人生模型。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主編者：陶孟和 湯象龍
出版者：社會調查所
定價：第一期每冊五角，第二期每冊七角，定閱全年二冊大洋一元。

第一期要目	第二期預告
厘金制度的起源及其理論 道光以後中琉貿易的統計 清總理衙門及其經費 胡夏米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 道光朝兩淮廢引改票始末 光緒朝補救財政之方策 清季使領經費	羅玉東 周益湘 陳文進 張德昌 劉篤 羅玉東 陳文進

第十卷 國聞週報

第十一期出版

本週要目
世界戰爭爆發性
今後中國政治制度商榷
幾個應研究的實用問題
關於竹書紀年詩書春秋左傳的幾樁公案(續)
鄉舍一夜(小說)

大炎譯 楊玉清 翁文灝 陳振先 翁文灝 翁文灝
▲每週一冊全 租界三十
年五十冊▲定 號路一百
閱連郵費五元 售一角五分

第一期特要

清華週刊大號
第三九卷

楊朱之學 蕭伯納的巫風 蕭伯納的生平及其社會主義的檢討 紅樓夢批判 乾燥的蘋果 水面上油之試驗 領事的特權與特免權	錢稻孫 張露薇 李長之 李景範 一雋譯 芷
---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新聞」每月五角
「體育」每月五角
「學園」每月五角
「藝園」每月五角
「社會新聞」每月五角
「外埠通訊」每月五角
「經濟界」每月五角
「教育界」每月五角

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

蔣廷黻

中國近代的厄運之主要原因，無疑的，是現代化的遲緩。換言之，就是內政改革的失敗。所以對於靠國聯不靠自己的主張，我是十分同情的。但是立國於現代的世界，不僅一般弱小國家，即少數所謂大強權，都不能一日忽略國際的關係。內政與外交好像左右兩腿：左腿向前進一步，右腿必須跟上；不然，全體就不能有進步。內政辦得有起色，外交因之容易辦；外交應付得宜，內政的進步亦因之更加順利。我們要記得：我們統一的遲早和程度，工商業發達的快慢，鐵路幹線完成的早晚處處都受外國政府和人民的態度的影響。我在這裏要討論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和國際，不是因為我想國聯和國際，不問我們奮鬥與否，犧牲與否，就會把東北四省送回給我們；正是因為我深信現在惟一促進國聯和國際幫助我們收復失地的方法在於速圖內政的改革——或國家的現代化。

日內瓦日報 *Journal de Genève* 的前主筆馬丁教授

近在北平政治學會講演的時候，說了一句很使我傷心的話。他說：中國與國聯的關係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

中國無所求於國聯因而冷淡的時期，第二時期是中國有所求於國聯因而熱烈的時期。馬丁教授說這話的時候一定也是很傷心的，因為他是國聯的忠實信徒，曾為國聯的原故而替我們在日內瓦奮鬥的。他這句話最足以形容我們全盤的外交。我們是精於打小算盤的；不見利就不為義。我們是天生的物質主義者：政治上的精神力量——政治的不能測量的元素是我們所看不起的。國聯盟約這個東西我們平日——或者甚至於現在——不是把牠當個「好好先生」看嗎？國聯在國際的重要及其所以然，我們看不清楚，因為我們想這根本值不得我們的注意。國聯不是個理想的東西嗎？有人這樣的疑問。牠不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和假面具嗎？還有人這樣的判斷。

國聯在現今的國際上有兩種重要。第一：牠是世界的公安局。在歐戰以前，各國是各自圖安全的保障的。各國各自圖安全好像各人各自圖安全一樣——一樣的不經濟，一樣的危險。我帶一枝槍，你也帶一枝；我疑你的槍是對付我的，你疑我的槍是對付你的；為先發制人，戰爭就爆

發了。我怕你的槍比我的利害，你也怕我的比你的好；於

又是他們國家的公安局。

是你我都節衣縮食以求槍桿——軍備——的精良。有一天，我想我的努力得到了相當的成績，我相信我的槍實在比你的好，我就趁早向你開放起來。上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的打起來的。你我現在不帶槍，不各自圖安全，因為我們有公安局。上次大戰只有戰敗者，沒有戰勝者；因為就是號稱戰勝的英法在戰後的富庶和安樂不但不及戰前，並且十五年的努力尚不足以復元。拿現在的軍器來演第二次的大戰，其結果不是人類的末日，也會是文化的末日。所以戰後有許多遠見的人——在大國的不少於在小國的——一致的主張組織一個國聯，一個世界的公安局。牠是小國的必需品，這是很明顯的，全無疑問的。同時因為以上所說的原故，牠也是大國所需要的，不過大國的需要國聯究竟不如小國那樣的迫切。我們拿英國來作個例子。現在在英國的國聯同志會的會員有三百萬以上之多。那一個英國政治家敢公開的藐視國聯？儘管有些是口是心非，他們不敢不「口是」已經表現國聯在英國的勢力。這次為國聯報告書的通過而奮鬥的捷克，瑞士，瑞典，哀耳蘭諸國的代表，我們要認清，與其說是為中國奮鬥，不如說是為國聯的前途而奮鬥。他們覺得中日問題是國聯的試金石，而國聯

第二，國聯是現代世界的公益局。有許多事業是各國

的公益而非一國所能單獨舉行的，如勞工待遇的改良，麻醉品的取締。還有許多問題雖發生在一國而其影響則牽連許多國，如數年之前奧國的經濟破產。實際上，現代一國的貧窮能使全世界均減富；所謂局部的問題都是全世界的問題。

第三，國際的形勢大部份在國聯之內表演。國聯和國際已到了一個不可分離的狀態。日本除外，其他列強均將假國聯的名義以貫徹其政策。當然各國的外交都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為第一目標，但其主要的活動場是日內瓦。

國聯現在固然沒有海陸軍，固然無制裁能力，固然不是太上政府，固是幼稚的，但牠的目標是對的，所走的路是對的，說牠是資本主義的工具的人並不承認軍備是不應該裁的，仗是應該打的，大國是應該併吞小國的；他們也不過說國聯的毛病在於不能實行盟約的條款。就中國說，我們所患的不是國聯盟約之不利於我們，也是國聯的力量薄弱。那末，我們運用國聯的第一個方法就是要培養國聯的力量。別國不信任國聯的時候，我們要特別信任牠。別國事事處處要破壞國聯的威信的時候，我們一舉一動都

要尊崇，要提高國聯的威信。別國的人如說國聯盟約是廢紙，我們就要說盟約是天經地義。別國的人如說國聯只能管歐洲的事，我們就要說國聯是全世界的仲裁者。別國的國聯同志會會員如有三百萬，我們就應該有三千萬。別國如把國聯作爲外交家專門研究的題目，我們就應把國聯的歷史，組織，目的作爲中小學的必修課。無論國聯提倡甚麼，我們都竭力合作。無論國聯召集甚麼會，我們必派代表出席，且派國內最有資望的人去。

日本退出國聯了，我們在國聯活動的機會也就到了。在會員國之中，中國最有代表亞洲的資格。國聯爲維持他的世界性起見，從此以後，更將歡迎中國的合作。

國聯不但是我們聯合世界一致對目的好工具，且是幫助我們實行現代化的一個好機關。我們如要找外國的專家來幫助我們，國聯替我們去找比我們自己找的還要好些。我們如要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我們的利源，國聯能作有力的媒介。借用外資，大概現在沒有人反對；聘任外國專門家也不應有人反對。中國以往的毛病不是聘任外國人太多；是所聘任者間或不得其人。比這更要緊的，是在外國專家指導下服務的人引以爲恥而不虛心學習。甲午以前，北洋海軍的留學生如劉步蟾，林泰曾諸人就犯了這個毛病

。他們自己陞官雖然快些，但國家的損失不知幾何。

近來政府好幾次請了，或託國聯替我們請了一些外國專家來。不過作了調查報告書或計畫書，他們就回國了，而政府就把他們的計畫置之不理了。除軍隊裏的外國顧問外，別的顧問只替我們造計畫，並不得幫助我們來實行。這是不能收效的。我們奮發圖强的日子——那就是說，切實現代化的日子——已經到了。我們如能在現代化的程序中竭力圖歐美資本及技術的合作，我們的進步必可一日千里。

遠東問題，歸根起來，就是中國的無力，而無力的根由就是中國之欠缺現代化。國聯及國際對日本不能施行制裁大部份可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是國聯及國際如有機會來幫助中國改造，這是心有餘而力亦有餘的事情。一個强有力的中國是當今國際形勢的一個必需品。這是我們千載一時的機會。近幾十年來，與中國有邦交的列強可分兩種：一種是以通商爲目的的，如英美，一種是在遠東有土地野心的，如日俄。通商的國家惟恐中國自己不富強，因爲中國一富強，她們的商業就可以進步。有土地野心的則惟恐中國富強。當宣統末年英美德法組織四國銀行團的時候，日俄即起而反對之。現在我們從法國外部所發表的秘

密公文，我們知道日俄反對的理由。她們說如果中國能大借外債來修鐵路，興實業，中國就能自強起來，這是與我們的希望相反的。華府會議以後，在華只圖通商的國家切望中國的自強更加熱烈，有時比中國人只有過而無不及。我們以往沒有利用這種國際形勢，以致有今日。一誤不可再誤了。一個富強的中國出世之日就是遠東問題終止之日，此外別無出路。我們是這樣想，國聯及美國也是這樣想。從這方面看，國聯及國際的利益完全是與中國的利益相同的。

在長期抵抗中，利用國聯和國際來圖中國的富強，比利用國聯和國際來制裁日本，是更容易舉行的，更有實效的，更無流弊的。

中日兩國的对抗不是我們所求的。直到現在，我還想是兩國的大不幸。但我們是處於被動的地位，是迫不得已的。在甲午以前，日本是進步的，順世界潮流的，中國是守舊的，在內政外交上，均是反動的。日本有了局部的改革，因而富強；富強了以後，就以爲無須再改革了，再事西化了。我們的歷史正相反：甲午以前，局部的物質改革不見效，於是有戊戌的局部政治改革；又不見效，於是有

辛亥的整個革命；還不見效，於是有民四以來的思想及社會革命。我們犧牲之大及上軌道的困難當然遠過於日本，同時我們也有相當的代價。現在我們的思想解放亦遠在日本之上。日本現在的全盤外交內政都到了反動時期，我們則處於前進及後退兩可之間。日本現在無選擇的可能，因爲她的局面是已定的，我們則正在十字路上。在這個當兒，我們應該決然毅然放棄反動的路而走到歐戰後改革家所指出的新路上。不但在外交上，因爲日本是反國聯及其精神的，我們應該全心的擁護國聯及其所代表的新國際關係。就是在內政上，我們也應該如此作。日本軍閥討厭國會及政黨，我們則應大行民治的憲政。日本嚴厲的取締勞工運動，我們於勞資之間則應扶持勞工的利益。日本的工商業已歸少數財閥把持，我們不妨貫徹資本與工業的社會化。

民治主義，政治的和經濟的，是一個不可遏抑的潮流。反動只能得一時的成功。久之，天下是民衆的天下。在長期抵抗中，我們的基本政策如能順着世界的大潮，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正加日本甲午以前的努力得着甲午的收穫一樣。

四月三日

跋蔣廷黻先生的論文

胡適

蔣先生這篇「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我讀了之後，覺得這是一篇極重要的文字，所以我大胆把我讀後的感想寫在這裡做一篇短跋。

十年前（民國十一年十月），我在努力週報上發表了一篇文字，題為「國際的中國」，本意是對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倡出的「瞎說的國際形勢論」下一點批評和矯正。

當時我說：

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投資者的心，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的。：：國際投資之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為投資者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與安全。故近人說，墨西哥，中國，波斯，近東諸國，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江，國際上的亂源。」

所以我那時說：

：：：我們現在儘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噩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

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上了軌道，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際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者也就不能不在軌道上進行了。

我的結論是：

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全文見胡適文存二集卷三，頁一二八 a 以下）

十年以來，我當時所批評的「瞎說的國際形勢論」不但沒有減少勢力，竟漸漸成爲有力政黨的正統思想。所以全國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國家的政治，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動，用在口號標語式的打倒帝國主義。結果是我們糟塌了整整十年的寶貴光陰，自己國家的政治至今還不會上軌道，而在外交上反早已走上了某先生所謂「只有敵人而無與國」的孤立地位。華盛頓會議給我們的休養整理的時間，我們完全不會利用，全用在自己相殘相殺相壓迫的路上。直到國難臨頭，我們從噩夢裏跳起來，方才知道阿蒙還是十年前的腐敗阿蒙，方才知道一個殘破散漫的中

國止可以給敵人做侵略的口實，而決不能抵禦最新式的武力的侵略。十年的大錯鑄成了今日的奇恥大辱，還落得我們的敵人向全世界宣傳我們是一個沒有現代國家資格的民族。

在一年半的慘痛的經驗裏，我們的大多數政論者似乎還完全不曾了解這回事情的教訓。我們還只看見整串的名詞和口號的搬弄，全不顧到事實的局勢。即如最近一期的東方雜誌（三十卷六號）的「太平洋現勢之分析」專號的引論，開口便說：

帝國主義分割中國的悲喜劇，已從日內瓦政治外交鬥爭的場面，移轉到太平洋武裝鬥爭的場面來了。

又說：

自九一八以來，一直到最近爲止，帝國主義者想在日內瓦的綠色墳地上，用政治外交方法解決日本獨佔或國際共管的問題。……

這種議論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詞在那兒變戲法，名詞的背後若不是惡意的抹殺事實，就是無識的武斷。我們至今還沒有一點點自責的態度，還不肯用一點思考的工夫，還只知道造作名詞來抹殺青天白日的事實：這種現象真是亡國的現象。

蔣廷黻先生這一篇文章，我認爲是對於今日這種「瞎說的國際形勢論」的一種最切實的糾正。他第一勸我們要認清國聯的性質。今日的國聯已不是幾個大國所能完全操縱的了：牠一面要顧到許多小國的志願，一面又要顧到幾個非會員的強國（蘇俄與美國）的趨向；牠爲自己的生命與前途的發展，不能不維持盟約的尊嚴。這十八個月中國聯應付遠東局面的經過，至少應該可以使我們相信牠寧願得罪一個跋扈的強國而不肯失去世界公論的同情的。這是我們今日談國際政治時必須認識的第一點。

第二，蔣先生勸我們要認清國際的形勢。他指出列強（小國更不必說）之中至少有些國家對於中國除了通商之外沒有別的侵略野心：「華府會議以後，在華只圖通商的國家切望中國的自強更加熱烈，有時比中國人只有過而無不及。」在這一點上，這些國家的利益可說是和中國的利益相同的，因爲他們知道一個富強的中國必定是他們的更大又更有益的市場。這是我們今日談國際形勢應該認識的第二點。

第三，他勸我們要認清只有一個現代化成功的中國方才可以根本解決遠東問題；並且在中現代化的過程中，國聯可以給我們最可靠又最少危險的援助。我們必須充分了

解這種形勢，然後能放手放胆去利用歐美資本與技術的合
作來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這雖然很像是迂遠的路徑，然而
只要我們打定方針做去，最迂遠的路也許是最快捷的路。
這是我們今日談國際形勢應該認識的第二點。

我讀了蔣先生的文章，覺得他的主張和我十年前的主
張有不少共同之點，我忍不住要寫這幾句讀後感，表示我

權利是什麼？

(三) 歐洲人的權利觀念

歐洲大陸各國以法律的體裁敘述私人的權利，要算以
法蘭西一七八九年公布的「人權與民權宣言」為破題兒第一
遭了；這是個範圍極廣的文件，在一七九一年法國第一次
成文憲法內曾被採用而為此重要根本大法之一部分。

制定並通過這個憲法的國會明白的在這個權利宣言裏
說：「一般人對於人權素極缺乏認識，或健忘，或忽視，
這便是國家不幸與政治腐敗的唯一的原因」；所以國會才
以慎重態度敘述「人類的自然的不可讓渡的神聖的權利
，用以昭示社會全體人員，俾其不忘本身之權利與義務
」。

的同情的敬意。蔣先生的論調在今日一定要挨那班「瞎說
的國際形勢論者」的詛咒的，正如我十年前挨他們的詛咒
一樣。但今日的國際形勢的事實比十年前明顯的多，瞎說
的人未必能使今日全國的人都變成瞎子。我相信蔣先生這
種歷史事實的觀點終久是會佔勝利的。

一九三三，四，三夜。

胡道維

宣言本部包含有下列的敘述與解釋，都是與人民權利
有關的條文：人類都是生而平等且繼續保持其平等的，都
有平等的權利；任何政府的目的，都是要保存人類的自然
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與反對壓制等權利；主權是屬於
國家全體的；所謂自由，就是在不侵害他人的範圍內任意
行事的權利；因此，每個人自然權利的行使，只以保存他
人同一權利為限制，並且這種限制只有法律可予以規定；
不過這種法律亦只能禁止一切違害社會的行為，凡法律所
不會禁止的行為，人民不能受限制而不作，凡法律所不會
命令的行為，人民亦不能被強迫的去作；法律是公共意志
的表現，所以任何國民都有直接的或間接的（假手於代表

們)參與法律制定的權利，這種權利對於全體國民都應有不分軒輊的一致性。

除此項關於法治精神的規定外，官言內還有種種特殊權利的記載：類如宗教意見的自由——祇要這種意見於發揮時不妨礙法律規定的公共秩序；言論自由；財產自由——非因有公共需要且經給付代價後，這種自由是不能剝削的；並且一種行為若在發生時沒有應受懲罰的性質，人民便有此後不因此而受刑事制裁的權利。本憲法的其他部分還承認有別種的權利，例如國民和平集會的權利，用調解方法解決其紛爭的權利，不受未經法律規定的法官的審判的權利。

這些話可見此宣言所最注意的，大部分都是些實質的權利，人類自然的權利；牠不會重視到限制這些實質權利的方法，尤不會注意到唯一限制的方法。但是在本宣言與憲法的其他部分（尤其是關於司法制度的一部分）裏面，却也有剝削人民自然權利時所必經的手續程序的規定；不過這種規定大半都是關於刑事案件一方面罷了。按這類規定，國民於尋常刑事案件裏非經陪審員提起控告不能受裁判；控告提出後，控告的事實應由陪審員加以審判，並且陪審人員不得在十二人以下；被告人有否認二十位陪審員

的絕對權利，而無須提供任何否認的理由；他有聘僱律師的絕對權利；並且如被告宣告免罪，有不為同一事由而再受審訊的絕對權利；法律問題應取決於裁判官，並且審訊程序應一律公開；非有警察或法庭傳票，不得擅行逮捕；被捕者應立即帶於警吏之前，於二十四小時內即應受審訊；如經審訊後證明無拘禁理由，便應立將被捕者開釋；若依法得付保證金而求開釋，他如自願如此辦理，亦得以保證金而達其開釋之目的；監獄看守人非見相當拘票，不得接收或拘禁任何罪犯；未經法律規定之拘留處所，不得拘禁人民；如有人未經法律授權而欲逮捕或拘禁任何罪犯，便犯有擅行拘禁的罪狀。

內中也有取締民事案件的規定，最重要的就是禁止法庭在雙方當事人尚未出庭以先，或在原告人尚未招被告人於調停人之前而進行和解手續以先，而受理任何民事訴訟的案件。

緊隨着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之後，法國又採用了若干共和形式的憲法；這些憲法都曾插入與上述宣言極相類似的權利宣言。並且在許多地方，還可以發見新的權利的規定。譬如，在一七九五年成立的「指導委員會」式的政府，牠的共和憲法就有法國領土上任何人的住宅統有不可侵犯的

性質的規定。任何外人於夜間均不能擅入他人住宅，若有水火變故或有宅內人請求的事由則在例外。日間外人進入亦須有法定事由，或有公共權威所頒發的命令。並且這次憲法還規定：拘捕令狀若不載明拘捕理由與頒發本令狀所執行的法律，不得謂為合法；此項令狀並須說明係由某合法權威所頒發，並須以拘捕令的頒發事實預先通知被捕人而以令狀一分交存於該人之手。

但是當時三權鼎立之說盛行，影響於人民權利殊不淺：司法機關與行政官吏既是立於平等的地位，所以原來法庭並不能因行政人員之行使職務時有所錯誤而將其帶庭傳訊；這樣，如果人民的公民權利有被政府官吏加以蹂躪的時候，他們便要感覺呼籲無門有冤莫白了。後來一七九五年的憲法，對於這種缺陷，曾稍予以更正：按牠的規定，人民可以於普通法庭內控告行政官吏，唯一的條件就是要預先取得全國最高行政權威（指當日的國務會議）的許可。

這種權利保障實太欠充實，個人公民性質的權利絕不能盡免政府的蹭踏；加之法國革命常有過分的舉動，在一七九五年已引起了守舊派的反響；因為這些原故，一般人覺得由憲法予人民權利以形式的廣泛的保障，實於事實無

多大裨益；所以一七九五以後的各種憲法，均不會載有範圍的個人權利的規定。但是，這却不是說法國人民的權利就果真要遭官方踐踏的毒手了；因為我們知道在這些新與憲法裏或普通法律裡，還是散佈着不少的關於拘捕審訊等手續的特殊規定；另一方面，一七九五年以前的各種憲法莫不給人民權利以詳細的說明，在人民心理上已經產生了極深刻的印象與認識，現在雖沒有明文的權利規定，但是舊日各種規定却還被一般人認為有法律的效力。

馴至一八三〇年，自由運動——從前會產生過正式權利宣言的運動——又興奮起來了；結果在法國讓菲列卜路（Louis Philippe）得着了王位；在比利時也產生了革命，成立了一個離荷蘭而獨立的新王國。一八三〇年的比國憲法又包括有一種權利宣言，但與從前法國的宣言有兩種很大的分別。

第一，絕不似法國的那樣複雜。牠給個人自由的定義，就說個人自由是非在法定案件上並非依法定手續不得受檢舉的一種權利。對於一種特殊的法庭拘票，尤認為必需的條件。若被拘人不是正當發生犯罪行為時即被拘捕的，拘捕人犯時——至多在拘捕後二十四小時以內——一定要提供拘票的。並且按憲法的規定，任何人非依法均不得

受懲處，其懲處方法亦不得出於財產的沒收。人民住宅有不可侵犯的權利；非在法定案件上並非依法定手續，任何人不得擅進他人的住宅。若非爲公共利用，非在法定案件上，非依法定手續，且非經預付公允的代價，任何人的財產都是不能被剝奪的。此外，宗教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平集會自由，請願自由，及書信秘密自由：也都在憲法承認之例。被認爲絕對的自由，却只有兩種：即結社自由與書信秘密自由。其他項權利的積極的公開行使，均可以受法律的限制。

第二，比國人民因有鑑於前三十幾年的經驗，所以在制定憲法時側重於權利的保障或救濟方法，而不崇尚絕對的實質的權利。凡憲法中所列舉的權利，幾乎無一不可受立法的限制，並且憲法對於權利限制的方法也有相當的規定。據比國憲法的特殊規定，人民對任何官吏的行爲都可以提起訴訟而無須取得長官的許可，只有國務員是唯一的例外。並且憲法中關於司法機關的條文，爲刑事檢舉規定有陪審制度；厥後國會通過的組織法庭的法律，亦不曾規定任何特種法庭得訊審政府與私人間的訴訟；這種案件按憲法規定概屬於尋常法庭的權力範圍以內，只要國會不會以法律另作別一種的規定。

普魯士與義大利的憲法，係產自十九世紀中葉的革命運動中；這種革命潮流幾乎影響全歐各國，所以普魯憲法也可以當作歐洲典型的根本大法來看。這般憲法對於個人權利的條文，頗受有比國憲法極深刻的影響。牠們首先有一種類似權利宣言的規定，然後對於權利的限制與限制的手續再行加以說明：足見牠們注意的對象，不是實質的權利而是程序的權利了。

所以就一般的憲法來觀察，歐洲人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便已逐漸放棄十八世紀中在美法二國中盛行的實質的絕對的自然權利的觀念了。自二十世紀開端以來——尤其是自歐洲大戰以來——歐洲人簡直有回到原來英國人的觀念的模樣。換句話說，他們所日欲冀求的目的，不在於爲絕對的實質的權利取得承認，而在於爲保障與救濟方法（此種方法大半爲司法的性質）取得規定；各個人民既有了國家積極法所授予的權利，他們就要代這些權利力圖有效的保障，免受政府官吏的摧殘與侵蝕。比國憲法的評論家亞瑞納（Friers）說：憲法中關於私人權利的規定，「純無趨重學理的性質；牠們只是防禦政府的（那怕就是立法部的）行動的一種堡壘。牠們都是加在公共權威之上的憲法規則；牠們禁止除法官外任何別人對於私人自由的干涉，

雖個人有濫用其自由的情事也是這樣」。一七八九年的權利宣言的基本觀念，既已深入近代人類的精神，形式上的權利規定似已不復為緊切的需要；憲法所三致意的對象，只是一種法定的方法與程序，用以在一般假定的權利之上加以限制的；這是亞瑞納與任何別人都承認的事實。所以歐洲人的觀念現在雖還未完全脫離十八世紀的窠臼，但是事實上早已有向英國方面轉變的趨勢了。

綜合我上面三篇文章而加以論斷，三種權利觀念英國則趨重事實，歐洲則趨重理想，美國則介於二者之間而事理俱重。歐洲方面既久有與英國觀念打成一片的傾向，則

陷落時的熱河

劉節

我們從北平動身赴熱河的前一天，正是朝陽失守的消息傳到北平的那一天，然而我們的計劃已經決定，熱河訪古的興致也決不能打斷。雖然知道這回旅行有點危險，却以為熱河的形勢險要，又有十多萬的大軍把守，至少也要個十天半月才能影響到承德，於是就決定了，和諸位夥伴計畫着所走的路綫，怎麼設法把熱河那些喇嘛廟裏的藏經搬運過來，並且還要傳拓那邊的各種古碑。一切都預備

現時所存之權利觀念可以說只有兩個系統——即英美二系統。然而無論我們採擇那一種觀念，權利保障端賴於權利被侵擾時有救濟的方法，並且這種方法的實施最好是假手於獨立的法院；否則權利斷難行使，亦徒托空名而已。英國的人身保護法案，以及該國人民因政府官吏越權濫職所產生的損失而對他們提起控告的權利，比任何別國的補救方法都要有更進一步的效力；這可以說是我們最好的模範。

（全文完）

胡道維先生的「權利是什麼？」一文共分三章，其一、二兩章分見本刊第四十二、四十三期。（編者記。）

好了剛要出發，那天晚報（二月二十五日）又傳凌南吃緊，我們也管不了許多了，打起精神半夜起來到一位朋友家裏等遼吉黑後援會的第一號汽車，六點半鐘出發。車中除了我們三人以外全是往前線打仗的忠勇愛國健兒，越發壯着我們的膽子。在車上走了半個鐘頭，才慢慢的天亮。八點半到密雲，十一點半到南天門，路上又因孫殿英的給養車和駱駝隊擋住我們的車，只得下來步行，從南天門到古北口

祇八里路，中間隔着一道大沙磧，走了一個多鐘頭才到。從古北口再往北，一路是崇山峻嶺，車便走得很慢了，直到晌晚時分才抵承德。我們三個人搬到玉成飯店。我們住的是一間極小的屋子，大約只有六尺見方，土坑却佔去三分之二，屋頂上掛滿了塵網，白色的門帘子已經變成黑色的了。這屋既沒有窗子又沒有火爐，單靠燒坑取暖，然而像這樣的旅館在承德還算是頭等的，也就可以想像承德的市面了。承德雖然是熱河的省城，其實還不如南方的一個小縣城。當地的人民歷年經軍閥們剝削，真是十室九空，據土人說：自從湯玉麟到了熱河，熱河的天都高了三尺。熱河的沒落，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們到那裏本來有很多的事要做，第一天，早上去找湯玉麟，沒有碰見。（據說熱河省政府裡一個小科長也得過午才見客，到了下午四點就停止辦公，雖在軍事緊急的時候也一樣。）那天下午兩點鐘光景我又到司令部去造訪這位湯將軍，承他派參謀長李贊庭氏接見。對於我們所要求保護當地藏經的事，沒有肯定或否定的答覆，說是要等省政府會議之後再說。過了一天，省政府會議已開過了，打聽的結果是交秘書處，民政廳，教育廳，警務處，會同辦理。我們得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即刻去見教育廳長張翼庭

氏，承他替我們寫了一封介紹信去見省政府代理秘書長濮良至氏。在他的口裏才得到一番正式的答覆。說是：「搬經的事我們是贊同的，不過這幾天時局太緊張，如果搬運起來，非得三四汽車裝不下，這樣做法恐怕要搖動人心，等過幾天再說吧。」我們知道搬經的事是沒有希望的了。便進行拓碑的事。承濮先生替我們辦了一封公函，允許在熱河境內自由傳拓各處的古碑。我們拿了這公函就一邊調查，一邊就近的先拓起來。據我們調查所得的，有下列各種的藏經和碑板：

一，札什倫布，亦名福壽寺，又名行宮。

大門外四體字小碑三，大門裏碑亭內四體字碑三，西藏板甘珠爾及甘珠爾經各一部。

二，布達拉，俗名白臺子。

門外四體字小碑二，大門裏碑亭內四體字碑三，北京官板甘珠爾經一部（又一部封好的，恐怕是西藏板甘珠爾經），西北院四體字碑一。

三，殊象寺

無碑，滿文甘珠爾經一部。

四，羅漢堂

無碑，亦無經。

五，普寧寺，俗名大佛寺

碑亭內四體字碑三，（四體中的蒙古字爲新疆蒙古人所用的托特字）。

六，安遠寺，又名伊犁廟

四體字臥碑一。

七，普樂寺，俗名圓亭子

四體字碑一。

八，溥善寺，俗名後寺

無碑。

九，溥仁寺，又名前寺

漢文碑一，漢滿蒙三體字碑一。

當我們開始拓碑的那一天（三月二日），早上便來了兩架日本飛機，在空中兜了兩個圈子，去了。下午凌源的電話不通了。晚上七點鐘光景後援會的汽車一齊叫湯玉麟抓了去。那時我們便要走也走不了，祇得先住在玉成飯店，等到夜間，那些客人更忙亂起來了，好像事情即刻就壞，其實那時候平泉的電話都還通的。街上的大車轎車，擠滿了。問起來都是給省政府裡的官員們搬運行李的。我們想要是跟着他們走呢，無論如何總覺得不妥。三個人還是在玉成飯店候了一夜。等到天快亮的時才隨着行李移到熱

河東岸的一個喇嘛廟裏去住。這廟就叫溥仁寺，我們開始拓的碑就在這兒。這天剛好下很大的雪，日本的飛機沒有來。我們在寺裏遠遠的聽見散兵放槍聲，一打聽，說湯玉麟早已退灤平去了，行宮裏的貴重東西都搬起走了，省政府裏的人員也散光了。中午在廟裏吃了點東西，我便踱到街上看一看，很靜，沒有什麼。一問起來才知道承德縣長已會同商會的會長伊君組織了一個承德地方維持會，籌備歡迎日本人了。

到四日的上午，湯玉麟的兵大部分都已退去，祇有在獅子溝的兵還沒走完。在東北山口裏還隱的聽到砲聲。那天早上八點左右又來了十幾架日本飛機，這回却在獅子溝和故宮下了十多枚炸彈。日本兵就是四號下午三點半鐘進街。那時我正從廟裏出來，看宮裏已經掛起日本國旗了。走到商會附近看那邊停着一輛鐵甲汽車，裏面坐着一位日本軍官，正和商會會長在那裏說話。一會兒這鐵甲車望西開，日本的先鋒隊便跟着進來，領頭的是什麼百武司令。商會的職員們都趕着出來同他握手。一路上貼出「歡迎大日本軍」的標語，家家掛起日本國旗。我便在人叢中拍了幾張照片。這時候我纔知道；熱河的民衆對於亡國的觀念是沒有什麼難堪的。否則日本國旗怎麼會做得這樣快呢！

那天進街的日本兵大約有五六百人光景，其中夾雜着

許多蒙古兵（報載入承德日兵祇有一百二十八人，不曉得根據什麼的），總共有六七十輛汽車，大半都向西開走。

這些日兵住的都是民房和旅館，並不駐紮宮裏，許是怕我們尚有埋伏，或怕我們夜裏會反攻的緣故。（因為這行宮很大，又在山上，我們要是把他們一圍起來，他們會整個毀掉的。）

等日兵進來半個鐘頭以後，我們也從溥仁寺搬回玉成飯店了。剛搬進去不到一個鐘頭，日本軍第八師團的衛生班也搬進來了，一共有三十個人，其中一位是將校，其餘都是士兵。一到，即刻要掌櫃的辦五樟酒菜，付五元老頭票一棹，還硬要喝紹興酒。那掌櫃的苦苦央求，說今天街上舖子都不開門，買不出來。他們看實在沒有法子，只得喝他們自己帶來的玫瑰酒，大喝大嚷，鬧了一宵。到夜間十二點的時候，掌櫃的引着兩個日兵和一個翻譯員到我們房裏來。我們從夢中醒來被他們澈上澈下的搜檢了一番。那兩個日兵看見我們有一大包的藏經目錄，以為我們是蒙古人，態度即刻和緩了許多，大約檢查了五分鐘，也就出去了。第二天一早起來我便到商會設法打電報給北平的朋友，因為電報局在行宮裏面，給日兵把守住了，商民無

法通電，祇得作罷。

日兵進承德的頭兩天商民還勉強開市做買賣，到了第三天，又是關起門來，什麼也買不出，我們在店裏常挨餓。掌櫃的說我的口音不很對，疑心是替南方傳達消息的，對我們更冷淡了，以前幾天還給些高粱米飯吃，現在連高粱米飯都不給，到街上去買大餅十六個銅子一個都買不着。我們想都這樣下去可了不得。正在設法，却來了一位姓張的翻譯員，吉林人，和我們說：他已經在日本人面前替我們說了許多好話，不然日本人是多少要給我們點虧吃的，還說了許多駭人聽聞的話，我們也摸不着頭腦，只有默默的聽着。他又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應該互相幫忙的，既然你們沒有東西吃，我可以叫他們拿來。於是把日本兵吃的大白米飯和紅鹹魚都一盆一盆的送過來我們吃。我們倒接連的吃了他三天的飯。

這三天以內（四日至六日）沒有看見東邊來一輛車，他們的食品原來都用飛機送的。街上的日兵漸漸的稀少了，原來他們又都已開赴前方去了。這時承德便覺得十分空虛。到了夜深只聽見遠遠的炮聲。我們猜想這大概是我們的軍隊在反攻。到了七日下午，日軍從前方運回許多死傷的兵士，承德的空氣便即刻緊張起來。我以為我們的軍隊

有反攻入承德的希望。到九日下午，又從東邊來了二千多日軍。我說這一回可糟了，再住在這裏真會餓死，並且我們又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我們想還是趕緊設法回北平。走的計畫是定了，還得向人打聽走那一條路妥當。一問，說是從承德向南走，經興隆山，直到薊州，這一路都是大高山，山嶺又都是羊腸小徑，這裏兩方都不好用工，大約可以走得，並且路上又有各村的伙會保護，土匪也不怕了。於是我們當天下午便雇好腳驢，先將行李搬到承德南街的一個李家店裏去，在那裏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出發更方便。

十日早上九點鐘出南營子，並沒有碰見一個日本的哨兵。走了五十里路，經過兩道山嶺，渡過灤河，灤河的水並不凍，因為那水是流的，又很淺，我們騎驢過去，水只到驢腿。過了灤河就到大澤南溝，這兒就是馮夫們住的村子。在那裏憩息了一下午，晚上就住在村裏那姓家中。次早五點鐘上路，過五道嶺，又渡白河，便在胡家營子打尖。熱河陷落的消息，雖也已經傳到這村子裏，然而這些莊戶人家的興致真不淺，他們正在大唱其戲，據說已經整唱了七天的戲了。我們在那裏喫過午飯，便又起路，走到六點鐘左右，才上窄道嶺，這嶺上去並不十分高，下來足足

走了二十來里路。還承伙會裏的領頭派了一位姓楊的荷槍送到二撥子，晚上就在那裏的李家店上歇宿。那天正是舊歷二月十六，月亮非常的好，我們雖然在流亡的時候，心裏也覺暫時安慰。大家談到十點鐘左右纔睡覺。睡到半夜三點鐘，正好睡，驢夫們却催我們起來上路。出發的時候還不到四點鐘，走了二十多里路纔天亮，一路都是在很窄狹的山溝裏面走的。出了山溝便沿着柳河的上游向南走。這河的兩岸都是很肥沃的土田，沿路的村落也比較以前所經過的那些村莊整齊些了。這裏已經不在熱河的境內，是屬河北省的興隆縣管轄。興隆縣在東陵的西邊，雖然也是在萬山之中，却因為這裏的山溝比較廣闊，水流比較遲緩，所以農產物還豐富。據說這些山上從前都有森林，自從曹銳作直隸省長的時候把樹都砍去賣了，到現在便只留着滿山的樹根，很像經火燒過一回似的。我們到興隆縣城正是上午十一點半鐘。這邊的商業狀況比承德熱鬧多了，街市長至二里多路。附近的山上都蘊藏着金礦和鐵礦。只恐這裏地在長城外邊，日本人很容易來，現在雖然有東北軍駐守，怕遲早也得要逃的。出了興隆縣三十里，又走向很窄狹的山溝裏，足足走了五個鐘頭，大約在下午七點鐘左右纔到柳樹坑。住紀家店。這裡飯店的設備已經比熱河整

齊多了。前幾天吃的是高粱米飯，小米粥，現在也可以買到白麵了。足見熱河農產物之少。柳樹坑還在長城外邊，離黃崖關有八里路。我們經過黃崖關在早晨七點鐘光景，那邊看不見長城遺址。但當我出了山口向南走時，就看見對面兩峰之間一個山頭上築着一個堡壘似的，大約就是從

前長城上的墩臺，從這兒逐漸往南走，出了很窄狹的山溝。到晌午時候，在揚庄子打尖。揚庄子離薊縣三十里，雖也一路是山溝，比較前幾天所走的路，人煙稠密多了。我們在那天（十三日）下午三點半鐘到薊縣。從山上一望而南是河北省的大平原，薊縣正在盤山脚下。我們在路上遠遠的就可以看見獨樂寺的觀音閣。閣前的白塔。寺口白塔都是唐代的遺蹟。據梁思成先生的考證獨樂寺始建於唐代，到了遼統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重新修建，又經過元明清三代的修葺，寺中祇有山門同觀音閣保存本來面目。寺後殿從前有臥佛一尊，現在也搬到觀音旁邊來了；又有銅佛一尊，倒在閣的東北角。觀音高有三丈多，背後

叫人掘了一個大窟窿，這想必是有人覬覦觀音肚子裏的寶貝出的主意。在觀音閣前兩百多步，就是白塔的所在。塔並非西藏式，四旁圍着短牆，不能上去。究竟塔上有些什麼，我們也沒法考察。從遠處看看塔上的字體，決不是遼金以後的作品。

我們到薊縣，不上一個鐘頭光景，那邊的街道幾乎走過了大半。在那天晚上打電話給北京的朋友們，老是軍隊裏說話，直等到第二天上午纔打通。又因為那幾天軍運很忙，雇不到車輛。祇得向二十九路軍總指揮部辦事處借了一輛大車回通州。十五日早從薊縣動身，路上遇着大雪，一百八十里路整整的走了兩天。從通州坐火車回北平，到家已經是十六日晚上八點半鐘了。這一回的旅行，我們目的是訪古。想不到會碰到這樣軍事嚴重的時候，亡國的滋味也叫我們嘗到了幾分。並且我們這回所見的人和所做的事，大半都是平常所想不到。

中國科學發展的路綫

秋 若

無論在那個地方，科學的發展的順序不能完全照任何

種人定的科學系統或層級進行。照學問的系統說，天文學

很不應該那麼早發生；然而竟然因爲天象的週期性很早引人注意而早發生了。就在近代的西洋，各科的發達也不完全是是有規則的。生物化學必在生物學及化學之後發生，是當然的事情。但許多旁的科學的關係不是這樣順乎人意的。

曾經在外國的好的科學環境中工作過的人很容易覺得中國科學工作的情形許多地方不對：譬如，這一科在外國已不時行，而在中國正在起頭；這一種研究，外國人已不熱心，而中國人却在動手。我的淺見以爲一國科學怎麼樣發展，由於當時的各種情形，不能一定照別國的模型。外國科學發達已經長久，當然許多門類都比較平均地發達。中國科學發達不久，有些部份先發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姑舉一個假定的例子。設想一種現象有構體與機能兩方面。在外國許早已過了研究構體時期，現在正在注重機能的研究。但中國則不能不也注重構體方面。要就從機能部份做起，也未嘗不可。這種做法，就是把構體已經外國人研究過的東西來研究它的機能。這種辦法有一個好處，就是很可以給外國人「印象」，使他們承認中國的科學工作能够趕得上他們。但若真正發展科學，從根本上做起，構體的研究是不能不做的，無論在外國人的眼中這種研究是怎樣無味。同理，一個學術機關要那種工作先來，那種工作後

起，也不能以外國人的看法爲標準。

至於那種研究法有價值，那種無價值，科學家也不免各有各的見解。即如統計法的應用這件事。近年在某些學科中，有好些工作，原得的材料不好好小心地收集，而既收集之後則大用特用統計以求達到精確的地步。原得材料不精確，無論用多少統計，都不會變成精確的；這種濫用統計當然是不應該。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懷疑統計法本身。有些已負重望的科學，其中的工作，假如對於統計學中取樣及比較差異的條件稍微注意，對於這些工作的價值總是有益無損的。並且因爲不重視這些條件，恐怕將來好些工作還要重做。一個用得小心得法實有用處的方法，一經濫用，會發生許多流弊：這是當然的。經人濫用的方法，自己能够不用，確然是「明哲保身」的研究政策。但我們不能因此斷定這個方法在任何條件之下都是不能用的。一個方法所以招人攻擊，多半是因爲用的人中有些不知道它的來歷，詳情，并應用的條件與限制，只是「依樣畫葫蘆」，機械地照抄。假如認識充分，使用小心，并且把它與那攻擊這方法的人所認爲好的新的方法聯合起來作比較參稽的分析研究，往往可以得到新的重要的事實。科學的事實是客觀的；但對於研究工作的評價，常常不免帶主觀的成

份。近年國內有些工作，得外國同道及作相關科學研究的人贊許的，中國的同道有以爲不够「摩登」，沒有意思的。中外翻過來的例，也有。所以就是同道，也有「見仁見智」的不同。

科學的研究工作是有計畫的，但也是嘗試的。單看論文的人或許以爲作者最初想到的方法一試就成功。這種湊巧的事當然是有的；但許多時候，在這成功的方法以前，他曾試過別的不成功的方法的。這些失敗的方法，除非有特別關係，當然他不必報告。那些失敗的方法所稍耗的物力時間一面可以說是虛耗的，一面又可以說是必需的；因爲不這樣消耗，就沒有最後的成功。還有，他論文發表以後或許又想到更滿意的方法，到了他用這方法得了更精確的結果之後，從前所謂成功的方法所需的物力時間又好像虛耗的了。又有所得的結果，雖是事實的資料，而意義

不明瞭，或許是看不出有什麼意義的。往往到了他自己或旁人找了相關的事實之後，就忽然看出來從前結果有了確定的意義。在這些相關事實未得之先，那得到第一次結果所需的物力時間不免總有覺得是虛耗的。這種種的嘗試工作，好像是無用的，其實是有用的。這種精益求精永無止境的工作正是科學家所謂科學；所得的結果還在其次。（結果當然也是重要的，在一般人的眼裏尤其是這樣）。這樣看，一切理論科學都好像是虛耗的無用的，而實在是必需的有用的，研究理論科學的人記得這個道理就能夠用公正并同情的眼光看旁人的研究工作；研究應用科學的人記得這個道理就不至於誤認理論科學爲可有可無的頑意兒。必須國內學科學的人能夠這樣互相了解，才能夠誠心合作。

討論「中國農民何以這樣多」

吳景超

適之先生：

在拙著「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中，主要的論題，并非討論「中國的農民何以這樣多？」所以對於此點，并未

暢所欲言。今天看到獨立評論四十三號董時進先生的大作，知道他對於我在那篇文章裏說到的「農民多是由于生產方法落後」一點之外，還加上他的一點意見，便是「農

民多是因爲大家沒別種事體可幹，祇好擠在鄉間種田。」其實這兩個意見，并不衝突，而是互相補充的。關於董先生所提出的這個意見，我在別的文章裏也提到數次。如五

年前我在新月一卷十號中，發表了「中國移民之趨勢」一文，提到解決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三個方法，其中

「解決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第三方法，便是發展實業，把那擠在鄉間的農民，疏導到都市中別的職業裏去。」

三年前我又在新月三卷三期中，發表了「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一文，提到擴大中國農場的幾個方法，其中

「第二個方法，便是發展農業以外的實業，如工業，礦業，商業，交通業等等，疏導擁擠在農業中的人口，到別的實業中去。」

此外在拙著社會組織中，也提到了這一點，因爲自己對於這個意見，在數年中發表過好幾次，所以在「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一文中便把他忽略了，以免重複之嫌。

其實改造中國的經濟組織，別種實業的發展固然要注

的發展，與農業的革命，是要并進的。中國人尤不可忽略此點。因爲中國的農民，誠有如董先生所說：

「他們雖是生產者，然而生產能力很薄弱，不過可以養活自己。」（獨立評論三十號「鄉居雜記」三）

假如發展中國的實業，而同時不用十二分力量，去改良農民的生產技術，以及其他需要改良的事，請問在別種實業中謀生的人，其食料問題，如何解決？董先生在他的食料與人口一書中，不是歎息中國以農業國而向外國輸入食料一現象嗎？假如中國的農業不改良，而農民的數目却減少，（姑承認他是可能的）那麼中國將來的食料問題，比現在還要嚴重若干倍。

總之，我的意見，以爲一方面要改良農業，一方面要提倡實業，并不偏重于任何一方面。假如董先生主張提倡實業，而對於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良，以「不成問題」四字了之，那我不敢與他同意。假如他以爲改良農業技術之外，還要提倡實業，那麼我們的意思是一樣的，因爲提倡實業，是我心中想說，在別的地方也說過，不過在「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一文中，未能暢所欲言就是了。

景超。

二二年三月二十九。